



埃德加·斯诺传

(美)约翰·汉密尔顿 著 柯为民 萧耀先 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

27

埃德加·斯诺传

〔美〕约翰·汉密尔顿 著

柯为民 萧耀先 等译

陈 强 审校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沈阳

034550

责任编辑 王海晨
封面设计 陈景泓
责任校对 幸莹棠

埃德加·斯诺传
〔美〕约翰·汉密尔顿 著
柯为民 萧耀先 等译
陈 筱 审校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日报印刷厂印刷

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60千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610-1068-0
K·78 定价：平5.50元
精7.50元

(辽)第9号

Edgar Snow, A Biography
By John Maxwell Hamil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由于我的同情心、我的身世、我的教养和我所信奉的原则，我被说成是一个革命者。我总是站在革命者一边，因为如果没有那些压迫和无法忍受的状况，就绝不会有反抗它们的革命。

——马克·吐温

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或他们的宣传所造成的，而是在恶劣、无能和腐败的政府统治下那些无法忍受的状况所造成的。在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使更多的人相信，他们有值得为之而战斗和牺牲的事业，而蒋介石从未能做到这一点。

——埃德加·斯诺

鸣 谢

我开始为写作这本书而进行的研究工作，是在1972年埃德加·斯诺去世后不久。从那时起的这些年来，我作为一名派驻海外的记者和政府的雇员，断断续续地一直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在此期间，许多了解埃德加·斯诺的人帮助了我，他们同意接受采访和提供资料，并提出了往往是很有价值的建议。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无所畏惧、社会良知和正派品行的楷模。我在各方面对他们的感激，在这本书中是表达不尽的。

这些接受采访和提供资料的人的姓名，列在本书后面的说明之中。在此，我想举出几位，头一位就是洛伊丝·惠勒·斯诺。虽然斯诺夫人并没有委托我写这本书，但是她如实地回答了我的提问，为我获得她丈夫的资料提供了方便。我钦佩她的坚定的信念，以及她对她的丈夫和对改善美中关系的责任感。已故的玛丽·希思科特，也是一位依靠信念生活的妇女。她从一开始就鼓励我，倾听我的叙述，尽管她知道的事情比我多得多。海伦·福斯特·斯诺，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位妻子，她自己也与30年代的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两次长时间的采访中，她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背景材料和来往信件。谢伟思是当代历史上的一位典范人物，他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手稿并给予了价值无量的指点。我也要感谢J·霍华德·斯诺、米尔德里德·斯诺·麦基、多萝西·索尔兹伯里·戴维斯和哈里·戴维斯、西尔维亚和比尔·鲍威尔、

罗伯特·巴尼特、路易丝和伦道夫·赛勒、特鲁迪·谢弗，以及为我花费了整整一个晚上时间的前外交部长黄华。在去中国的旅行采访中，我还采访了其他一些中国人，按照他们的要求，我没有把他们的名字列入本书的说明之中。我尊重他们的意愿，在此一并致谢。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朋友们和同事们的帮助。约翰·H·沙利文这个总是乐呵呵的朋友，根据他自己关于亚洲的广博的知识，提出了研究思想，并对我的全部书稿提出了建议。查尔斯·亚历山大阅读了这部书稿，并且总能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乔治·克里姆斯凯、保罗·C·内格尔和唐纳德·沙诺对这本书的许多部分提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见。利奥·里布福和霍华德·吉勒特以及劳伦斯·马丁，在很早的阶段，就为我提供了学术上的指导。唐纳德·吉林、苏珊·埃克特、迈克尔·埃杰顿、罗伊·费希尔、A·汤姆·格伦菲尔德、雷普斯·赫德森、路易丝；蒙哥马利和葆拉·沙利文，帮我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已故的迈克尔·H·B·阿德勒与众不同，他在关键时刻对我进行鼓励。

许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给予了我重要的帮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资料组的工作人员。虽然从其它方面来说，这里并不是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心，然而斯诺资料组掌握了学者们所感兴趣的关于中国的一般性材料以及关于斯诺的材料，这些，都是很有用的。在这个资料组里，玛里琳·伯林盖姆的重要作用是别人无法比拟的，她总是迅速、认真地回答我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达特茅斯学院贝克图书馆的肯尼思·克拉默以及格伦维尔·克拉克资料组，给了我以极大的帮助。布赖恩·沙利文、米里亚姆·迪斯曼和拉马斯·达菲的表现，证明他们是勤奋、高效的研究人员。

本书的一些内容最初曾刊登于《太平洋历史评论》和《密苏

里历史评论》。我充分采纳了他们在编辑中提出的建议，并在此感谢他们允许我把这些文章收入本书。

考虑问题周到、有耐心的彼得·谢泼德，的确无愧于“著作”代理人的头衔，他对我和这本书的关心总是胜过金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约翰·高尔曼，在我们共同为本书工作的几个月里，表明他自己是一个朋友和有才智的同事。

里贾纳·N·汉密尔顿尽管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仍然对全部书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并给予了我坚定不移的支持。马克斯韦尔·丁·汉密尔顿的作为则从始至终证明了，有些人是天生的好人。

序

1970年10月1日，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座古代建筑高高地耸立在北京的中心广场旁边，俯瞰着广场。在它下面，成千上万中国人列队走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纪念日。

斯诺即将完成一次惊人的长途冒险旅行。这次长途冒险旅行是从美国的密苏里开始的，正是在这个地方，斯诺萌生了一种既超脱于自身又不受他人支配的浪漫幻想。这次长途冒险旅行使他取得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上的成就，包括那些关于中国在本世纪发展的最有预见性的报道。然而，在那黑暗的岁月中，这些报道却被他自己国家里的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所排斥。这次长途冒险旅行造就了一个人，他自称为世界公民，为了中国和美国之间最为至关重要的联系，他吃力地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斯诺怎么会在10月1日那天站在从未有美国人到过的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长途冒险旅行又说明美国人对中国以至整个世界具有什么样的洞察力呢？

这些，就是这本传记的主题。

引言 青年时代

我只是在一次即兴采访中发现，查尔斯·怀特的判断最能概括埃德加·斯诺的一生。怀特是一位医生，他和斯诺一起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长大。小时候，这两个男孩都属于同一个西港中学兄弟会，一年夏天，他们在堪萨斯的麦地里劳动之后，一起去了加利福尼亚。从中学毕业之后，怀特仅见到过斯诺一次，至今他还能回忆起他读过斯诺写的十一本书中的一两本的内容。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他搭乘船到了远东，踏上了斯诺在记者生涯中所走过的道路。30年代，斯诺在那里成了有关中国共产党情况的权威；40年代期间，斯诺是著名的《星期六晚邮报》的驻外记者，负责有关苏联、西欧和印度的报道；在令人痛苦的麦卡锡年代，他成了受各种攻击的对象，被指责为“反美”。怀特无法相信这些指责。

在沉思了片刻之后，怀特对我说道：“你知道，埃德并不是共产党。他象我们大家一样长大，只不过他比大家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埃德加·斯诺，生于1905年7月19日，一个炎热夏天的星期三，在堪萨斯城长大。此时，这个国家正满怀信心地期望着一个经济和道义上的世界强国。1972年，他在瑞士他的小农舍里去世，长期的越南战争这时已近尾声，这场战争留给美国人的是

疑惑和惊讶。

在这骚动的几十年里，斯诺的确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的许多同伴偶尔在假期里出国去做服务员，他却住在国外。他超出政府的宣传材料的陈规，独立于那些聚集在日常报道周围的记者们之外。他在新兴的革命运动中变得成熟了。这些新兴的革命运动推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昔日的殖民地上，几十个新国家按照它们自己的意愿崛起了。斯诺同情这些民族解放运动，他以浪漫的笔法记述它们。然而，他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美国人的个性。当其他人都在学着与20世纪形成的世界共同体友好相处时，斯诺却在固执地坚持那种孕育在大草原上的美国故事书中的理想——提高“小人物”的个人尊严，尊重民族自决权，颂扬这种自决权的极端表达方式——革命。

斯诺是在前线看20世纪历史的。他是第一批关注越南和缅甸农民起义的美国记者之一。他从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苏联西部的前线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战争结束时溜进维也纳，写出了有关苏军占领下的奥地利的第一批报道；他注视着战时的美苏联盟的解体，演变为全球的冷战。他成为第二个进入利雅得的美国记者，现场报道了印度的独立和1948年刺杀甘地的事件。

斯诺在中国看到的最多。1936年，他看到了与西方断绝联系近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在他的报道中，他们并不象国民党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群“赤匪”，而是一股团结一致的、拥有忠实的农民追随者的力量。这不仅在海外而且在中国国内，都是奇闻。费正清对斯诺的长篇报道《红星照耀中国》作出了准确的评价：“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这本书，是关于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袖的生活、长征、共产党的游击战略以及关于革命期间的其它事情的原始资料，被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们视为“必读书”。1949年国民党失败之后，斯诺对共产党中

国的接近程度也是无人可比的。1960年，他是访问这个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有过中国经历的美国记者。他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记者，也是文化大革命后头一个回到这里的外国记者。

斯诺对行动主义的偏爱，使他自己深深地卷入了外国的事务。1935年，当国民党政府打算把华北割让给日本人时，他帮助北平的学生动员中国的社会舆论反对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期间，他帮助开展大后方工业化运动，这个运动在最高潮时组织了1,850个合作社。他写了许多文章，劝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其他领导人。1949年以后，他试图在对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美国之间架设桥梁。他雄辩地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他认为美国人不可能体面地取胜。

急剧变化的形势迫使斯诺犯了记者们常犯的错误。卷入历史事件逐渐使他的报道带上了色彩。但斯诺是杰出的。文学评论家马克斯韦尔·盖斯默把他列为美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虽然，斯诺在小说和诗歌方面的几次尝试完全失败了，但是他在运用“个人历史”的写作风格进行报道方面达到了最高水平，他本人在报道中的出现，不仅使报道变得更有趣和更可信，而且又不致于使事实失去光彩。然而，更重要的还不是他怎么写，而是他写什么。与人们的普遍印象相反，斯诺始终不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记者，而且是大事件的一个卓越的解释者。他不仅设法到了其他记者不去的地方，而且有能力理解他看到的和即将看到的。许多评论家逐渐看到了他的朴质。他可能会充满幻想，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国家，不过，他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

然而，从斯诺一生的戏剧性遭遇当中，从他的报道和美国人对他的报道的反应之间的紧张关系当中可以看出，他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的成就。在斯诺记者生涯的前半段，他大受欢迎并博得了喝彩；而在后半段，他的作品却找不到地方发表。然而，他的

感情却始终不渝。在他的整个记者生涯之中，美国人看待他的作品如同看待中国一样，无不透过他们主观愿望的棱镜。30年代期间，美国人深感担忧，怕被拖进正在形成的世界大战。他们急切地接受了斯诺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与国民党人结成联合战线，发动当地人民抵抗日本人的报道。由于渴望看到反法西斯联盟，美国人忽略了斯诺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人；他们用他的作品“证明”红军仅仅是农民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斯诺来说，申明这是一种不完善的解释并没有什么好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对那些“失去了中国”的人进行政治迫害期间，美国人责备斯诺欺骗了他们，没有说明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的真实性质。又是由于看到红色浪潮“将撞击太平洋诸岛并淹没美国——一切都按照苏联的计划”，美国人忽略了斯诺的报道中关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接管中国之后，发展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也忽略了他提供的消息：共产党人愿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最后，悲剧并不是斯诺欺骗了美国人，而是他们没有认真听他的。

斯诺周围的各种紧张关系引起了对他的严重歪曲和相互矛盾的攻击，主要来自左边。自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的《每月评论》的编辑利奥·休伯曼，把斯诺叫做“只凭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毛可以喜欢斯诺，但他认为斯诺是资产阶级分子。还有美国共产党，当《红星照耀中国》刚刚出版的时候，美国共产党实际上对这书提出了唯一强烈的批评，给斯诺贴上了托洛斯基分子的标签。在斯诺的右边，站着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和那些把斯诺叫做野心家和共产主义工具的人一起，在国会中助长了这种恶毒的红色圈套，最后，国会强迫斯诺离开了美国。后来，1972年，尼克松在作出了对中国开放的历史性的决定之前不久，写了一封信给住在瑞士已身患癌症不久人世的斯诺，赞扬他的“杰出的生涯”。

尽管如此，斯诺并不是一个招惹是非的人。他的悲剧人物的性格并没有增加他的污点，却使他的心灵受到折磨并招来了周围的敌意。即使那些用最刺耳的言词指责他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批评家们，也承认他们喜欢他。正如斯诺作品的一个编辑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声称的：“埃德是一个我所愿意带回家见妈妈的记者。”斯诺不是爱慕虚荣和自负的人。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开密苏里前往纽约，他没有头戴高帽手持拐杖，模仿沃尔特·李普曼那样绅士们的作派，也不玩弄诸如使用中间的名字一类的伎俩（斯诺的中间名字是帕克斯，他认为埃德加已经够糟的了。）

斯诺渴望冒险。他冒险经常凭着一时的冲动，但即使在年轻时，他不是乖僻、野蛮的。年轻的约翰·里德在动身去苏联之前，在纽约富尔顿大街的码头上嬉戏直到深夜，喝得醉醺醺的。斯诺却是独自一人在码头平静地漫步，幻想着旅行。

在听众面前装模作样会使斯诺很不自在，他害怕这样做。从他的性格来说，他不是说话声音尖锐刺耳的、伪善的或爱发脾气的人。当他的第一个妻子，爱激动的佩格·斯诺和什么人激烈争论的时候，他总是从容地走开。与斯诺同一个时代的记者，例如他所喜爱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或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都是在与对立面的斗争中成长的。斯诺则不然。从年轻时起，他就平静地走他自己的路，因为他作为一名辅祭不愿意失去对天主教的信念。他知道教堂对他的母亲有多么重要，直到离家之前，他都没有间断过去做弥撒。他是那种愿意和姐姐跳舞的男孩子。他的姐姐米尔德丽德，在离家不远的杰克——欧兰顿冷饮店工作。50年代，他拒绝写那些无甚争议的文章和保留他在《星期六晚邮报》的工作，虽然同事们都认为他倔强得象一头密苏里骡子，但他却想要得到美国人民的承认。

现已掌握的材料表明，埃德加·斯诺的真实情况，正如查尔

斯·怀特知道的那样，不仅是由于在他那惊人的旅行中所见到的，也是由于他的身世所造成的。虽然斯诺的青年时期并没有什么可以表明他日后会成为杰出人物或是有争议的人物，但他所生长的环境和他年轻时的个性为他的一生撰写了意味深长的序言。埃德加·斯诺，在他成为一个成熟的男子汉时认识他的另一位朋友写道：“永远是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人。”

由于密苏里州远离美国边境，密苏里州人喜欢把这个州看作是他们的强大国家的一个缩影。在斯诺的青年时期，堪萨斯城以惊人的速度和信心从一个小城镇转变为工业化的大城市。狂奔的马车和漫不经心疾驶的汽车造成了多起致命的交通事故。斯诺出生几天后出版的该市1905年工商名录表明，“大都市铁路”每年运送旅客达7,700万人次，在5年内增长量超过了三分之二；不动产的让渡一跃为1900年的250%。当地的商会把堪萨斯城称为“最美国化的城市”，市民们也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大草原上其他人的榜样。斯诺4岁那年，当地商业俱乐部的100名成员和50名其他的商人，包租了一辆专列载着他们游历了密苏里、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3个州的83个城镇，行程1,400英里。他们希望见到170,000人并使这些人意识到堪萨斯城的积极性进取精神和他们的口号“继续发展”。

炼油厂、汽车装配厂、制造服装和油漆的工厂在大草原上出现了。到了埃德加·斯诺上中学的时候，密苏里的工业生产产值超过了农业生产产值。这个州的制造业在全国名列第11位。

从农业的美国到公司的美国的这种变迁，使这个独立的农民由于出众的成就而变为人们崇拜的偶像。但是在斯诺的少年时代，堪萨斯城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都还记得，他们的父辈最初在改造故乡的大草原时，并没有任何使之成为理想中的乐园的经验。堪萨斯市民们墨守密苏里农民的保守观念“眼见为实”。一位历史学家描述道，他们认为“美国的希望在于自由的市民普遍拥有

土地所有权，因而免受高压统治。”

堪萨斯城的历史和它在密苏里州的地理位置，使堪萨斯人很重视自己自立的感情。历史学家保罗·内格尔敏锐地发现并指出：“由于是投机冒险，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和至今仍然是由一家私人公司建立的。”这个城市总给人一种变化感。它从不给人一种社会的稳定感。此外，这个城市的人不满意它在这个州的地位。一道宽阔的鸿沟把它和东边的圣路易斯分隔开来。圣路易斯虽然和它同在一个州内，却具有更多的大西洋沿岸文明。堪萨斯城则面向西部那片陌生的土地。因此，堪萨斯的市民是多疑和极端个人主义的。

堪萨斯人的这种道德观念，在该城的政治家们身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由吉姆·彭德格斯特创建并由他的弟弟汤姆加以妥善协调的政治机器，因左右了当地的政治生活而享有极高的声誉。虽然彭德格斯特们经常令人瞩目，可是他们不能忽视平民的情绪。汤姆允许市民们非法酿酒并降低了电话费。当他开庭的时候，任何企望得到偏袒的人都得依次等候，而不论那人在城里的地位如何。即便如此，堪萨斯市民们也不总是让彭德格斯特们当道。彭德格斯特在竞选中屡次落选，汤姆最终进了监狱。

物质方面的追求和个人主义的双重观点，是斯诺继承的一部分遗产，虽然他来自东部的祖先们是通过不同的路线和有着不同的背景的。

斯诺的母亲，安娜·凯瑟琳·埃德尔曼，是这个家庭中第一代美国人。她的母亲，玛丽·福加蒂，是爱尔兰提珀雷里郡的梅耐福人；她的父亲约翰·H·埃德尔曼是德国人，出生于西里西亚。埃德尔曼一家向西迁移到堪萨斯城，途经哥伦布，安娜1878年就在那里出生了。约翰·埃德尔曼，是个粗暴的老人，当埃德加·斯诺懂事时，他拥有一家建筑公司。玛丽·福加蒂在人

们的印象中是个可爱的妇女，她和城里的其他爱尔兰亲戚们在提到英帝国主义时，言词都很尖刻。这种情绪在中西部人中间非常盛行。

埃德加·斯诺的父亲亲戚们，支配着斯诺的家庭圈子，他们深深植根于美国的过去。埃德加·斯诺的第五代祖先威廉·斯诺是弗吉尼亚州人，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后来，他带领全家在肯塔基州坎伯兰山定居。埃德加·斯诺成年后曾特别自豪地指出，在肯塔基的斯诺家没有保留奴隶。尽管年轻的斯诺拿不出更多的证据，但他当时仍然自夸他的一个祖先是在“五月花号”第二次远航时来到美国的。在他成年后，每当评论家们询问他的美国家世时，斯诺总是玩弄概念，说他的祖先包括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塞缪尔·斯诺，那是独立战争后的某个时期美国驻广州的首任商业领事。

埃德加·斯诺的祖父霍勒斯·帕克斯·斯诺有一副铁石心肠。他的农场从肯塔基州不断向西扩展，他用从土地上挣来的钱，在堪萨斯州温菲尔德的主要街道上建了一家百货店。到他去世的时候，3个州的土地上都有了他的农场。他能用他在银行里的存款利息抵销他每年的开支。每年夏天，他的孙子们到他的家庭农场来玩，可以见到他的牛群遍布堪萨斯州的伯登一带。霍勒斯经常对孙子们吹嘘自己，说他这辈子没有给别人干过一天活。

埃德加·斯诺的父亲詹姆斯·埃德加·斯诺，1873年生于肯塔基州，即霍勒斯举家西迁至堪萨斯的7年前。人们都说，詹姆斯离开了父亲的农场却仍然接受父亲的资助。他曾在伯登附近的西南学院里工作过不长时间，挣钱偿还霍勒斯，并为此而自豪。为寻找工作，他到了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在那里，他遇见了安娜·埃德尔曼，并于1899年6月娶她为妻。他为一家羊皮代理公司在盐湖城和芝加哥工作了几年之后，定居在堪萨斯城。他用存

款在商业区买下一个小印刷所，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有一段时间，他为牧牛人出版了一份报纸。1900年詹姆斯和安娜的孩子米尔德丽德出世了，1902年又生下约翰·霍华德，后来又有了小儿子埃迪，堪萨斯城成了他们的家。

打算在物质方面成功是一回事，实现它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人们普遍尊敬商业的私营企业自由竞争，但是有些人不是总能同时兼顾追求利润和追求独立，因为他们太个人主义了。詹姆斯·埃德加·斯诺就是这样一种人。

詹姆斯工作很努力。他的印刷所的信条是“随来随印”。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堪萨斯明星报》有商业印刷方面的急活儿，代理商就去找斯诺。埃德和霍华德也得工作，不是在市区的印刷所，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埃德还有些零活儿，比如站柜台卖冷饮或走街卖《星期六晚邮报》。上中学期间，他和别的男孩子一起在麦田里干活儿，收割庄稼。在用手捆麦束并装上四轮马车运走的艰苦劳动中，他每天磨破一双手套。斯诺家庭教会这个少年懂得了进步是可能的，事情会变得更好，但你必须为此而工作。

在这个时期，詹姆斯被他的印刷所，至少是被从上个世纪就开始繁荣起来的这个行业吸引往了，因为他的兴趣远远超出了从事单纯的商业经营。西部有产生印刷技术工人的传统，印刷工人走到哪里都可以用得上的专业技能使他们能够独立，每天接近书面文字又使他们有一扇通向文学作品的窗口。“当一个知道世界上所有主要图书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意图的学生走进图书馆时，他一定会感到自己是无比富有的！”1893年在西南学院的詹姆斯在一篇随笔中这样写道。“对他来说，图书馆里有多少资料啊！”在家里，詹姆斯踱来踱去，用德语大段大段地背诵歌德的作品。当小埃德在大街上的印刷店里干着活儿的时候，詹姆斯却怀揣报刊评论文章，正在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诵哈姆雷特的剧中独

白。

熟识的人给这个经常心不在焉的小个子詹姆斯起了个绰号“梦想家”。“他有点儿象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哲学比印刷业更深刻，”查尔斯·怀特回忆道。“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正在考虑某件事。’他也许是这样。”詹姆斯抱怨彭德格斯特集团，支持各种“独立市民”改革组织，尽管这样做无助于他的经营。

埃德在成年后显示出他具有与他父亲同样的性格特征，他经常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直至它被烧坏。他在采访过程中，对直接获取事实是很认真的，因此他从不制定旅行时间表。甚至在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会面的时候，似乎他也下决心迟到。而且和他父亲一样，他也不让金钱妨害原则。

詹姆斯的经营远没有成功，这并不令人奇怪。霍华德重视詹姆斯作为堪萨斯城企业家的地位，建议他扩大经营，但遭到了他的反对。埃德还记得他父亲宁可和印刷工人们一起玩台球而不和主顾们打桥牌。

斯诺家庭的气氛是融洽的。他们在堪萨斯城里有不止一处住房，但都是标准的中等水平，其中一处是斯诺上中学时期他们住的夏洛特街上那幢方形的两层小楼。这幢小楼是所谓“堪萨斯城女衬衫”式的，它的第一层的外部是砖或石结构，第二层是木结构，这种建筑式样在堪萨斯城里很普遍。安娜是个很好的厨师，她总是把她的工作地点安排在离注重实际的家不远，她的业余消遣是打桥牌和参加妇女义务缝纫组的活动。詹姆斯只是偶尔抽抽雪茄烟，他把烈性酒带回家里也只是为了加进棕榈汁用来治疗感冒。他喜欢穿戴得整整齐齐，叼着施里纳大雪茄。他带孩子们去附近的网球场打网球，或在后院里玩草地槌球游戏。詹姆斯要求孩子们守规矩；而他深深地喜爱着的安娜，则在孩子触犯规矩时出面求情。

詹姆斯是个共和党人，安娜则是个民主党人，然而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却在于宗教信仰。詹姆斯打破了家庭中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传统，娶了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妻子，而且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起初，詹姆斯同意他的孩子们依照正规的程序，从洗礼到坚信礼和来世，但很快又对教堂感到不耐烦了。等到了埃迪上学的年龄，他已经无法忍受了，因此，他拒绝让这个男孩象米尔德丽德和霍华德那样进教区的学校上学。当安娜试图哄劝詹姆斯去做弥撒时，他把星期六下午专门用来痛斥天主教教义中的自相矛盾和给他儿子读天主教禁书目录中的禁书。

詹姆斯这种与天主教针锋相对的情绪和做法影响了全家人，也给孩子们留下了令人沮丧的印象。或许正因为如此，斯诺在他的自传中宣称，他对教堂的幻想的破灭并非是由于他父亲的观点，而是由于圣餐的圣饼的来源也是很普通的。无论埃德加·斯诺成年以后对相互敌视的反感是来自于詹姆斯的消极反抗的榜样，还是来自于安娜做出的忍耐克制的积极榜样，他对教给他读禁书的父亲并没有表示出什么信任。

詹姆斯并不是埃德通向书面文字的唯一窗口。诺曼小学的校长露西·斯穆特，是个严厉监工。她在1922年写道，学生们“认识到了不诚实的行为和半途而废是最可耻的犯罪。”她坚信，如果一个人不能真正懂得这一点，他就上不了三年级。这个瘦小而精力充沛的女人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他离开堪萨斯城许多年之后还与她通信。凯瑟琳·特丽萨·埃德尔曼，是一位嫁给了安娜的弟弟的爱尔兰女子，也是当地的一个文学人物。她的诗歌定期刊登在《堪萨斯城明星报》上，这个呼风唤雨的“明星报”本身，也有特别的迷人之处。红头发的小埃迪经常吃力地提着他父亲交办的成捆成捆的印刷品，送到大街上那幢厚实的红砖楼房里去，并在新闻编辑室里和那些记者们交谈。

作为一个男孩子，斯诺能自得其乐，他喜爱男孩子的各种活动。在西港中学时，他参加各种户外体育活动，尽管没有什么突出的成绩。他参加各种俱乐部，也是德尔塔·奥米克龙·奥米克龙兄弟会的成员。兄弟会的活动有内部的运动会、大希腊舞会和每周的会议。在这种会议上，男孩子们要进行相互批评。斯诺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在男童子军里获得的。他13岁加入了童子军，是鹰童子军在这个城市里的第一支队伍的一员。在一年时间里，他的仿军服式样的草绿色童子军制服右袖子上，别满了21枚奖章。

在努力适应生长环境的同时，年轻的埃德加·斯诺热衷于创造性的事业。在中学里，他创办了一份兄弟会报纸《德塔》。为了兼顾自己对文学的兴趣和堪萨斯城对经营的重视，他担任这份报纸的营业经理。他创作了多首兄弟会歌曲。1923年从中学毕业后，他参加了堪萨斯城初级大学，那里离西港中学隔一条街。他在那里呆了一年，在学校的报社半工半读。也是这个时期，爵士乐在堪萨斯城流行起来了。斯诺和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人，包括鼓手巴迪·罗杰斯，一起去郊外的咖啡馆听卡布·考勒威和考恩特·贝西演唱。斯诺不大熟练地打鼓和吹奏萨克斯管，并经营他们的风铃草爵士乐队。

坐在教室里就是另一回事了。也许是由于斯诺在中学里平庸的学习成绩和他的独立意识，促使他选择了一条多少有点防御意味的警句并写在他高年级时的照片上：“要紧的是自尊。”在初级大学的两个学期里，他的成绩是3个B，7个C（其中4个是英语课的）和植物学的1个F。他没有学完数学三角学。

堪萨斯城郊外有可供孩子们游泳的水坑和可以在里面玩耍的大片大片树林。这里如果从前没有过汉尼拔的马克·吐温那一代人的传奇故事，就一定会有一个男孩去做马克·吐温梦。实际上，

斯诺的朋友们后来开玩笑说，他是一边读着马克·吐温的书一边被生下来的（在永远地离开了密苏里许多年之后，斯诺在哈罗德·拉斯基著的《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空白处写道：“见马克·吐温对此的论述。”）。斯诺就象哈克贝里·费恩和汤姆·索耶以及他在《鲁滨逊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和《金银岛》中读到人物一样，也想从事冒险旅行。他为他的爵士乐队印制的广告卡片上写着：“郊外专业演出”。在中学期间，他在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的铁路或者凯蒂的铁路当办公室勤务员，这使他能免费乘车去欧扎克。他少年时期最突出的一次违法活动是用一辆汽车，就是他姐姐米尔德丽德的男朋友开的那辆史蒂文斯牌汽车。16岁那年有一天，他偷着把这辆汽车开跑了。在回家的路上，他远远地发现了正在等着他的父母亲。他紧张起来，无意之中踩下了汽车的油门，汽车猛撞在一棵树上。为了赔偿损失，他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乐器。斯诺决不是一个好司机。

《哈克贝里·费恩》鼓舞了斯诺和另一个男孩子，他们打算乘一支木筏漂流密苏里河，但没有实现。1922年夏天，斯诺和查尔斯·怀特及另一个男孩子鲍勃·朗一同向西旅行。他们并没有说这次旅行是要去冒什么险，或许斯诺对母亲说明了真情。表面上，他们三人是去往堪萨斯州萨莱纳附近的麦地。孩子们先是帮人家割麦子，一旦挣够了钱之后，他们就乘着朗那辆黑色T型游览车，向加利福尼亚进发。在车身的一侧，用稚气的笔迹写着：“三个失去知觉的人”。他们沿着圣菲小道走了一大半路，寻找一条通往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路，然后直下新墨西哥州。他们自己做早饭和晚饭，在饭馆里买中午饭。在天气宜人的夜晚，他们就睡在露天。

当孩子们抵达洛杉矶时，他们的钱用光了。那辆残破的汽车，一路上一直靠着一只有划痕的汽缸缓慢行驶，被他们卖了95美元。朗的妈妈和弟弟出来接他，斯诺和怀特则自己乘火车返

回堪萨斯城。

新的冒险计划遇到两个障碍。目前铁路附近有大队大队的警察，这是7月初开始的全国铁路员工大罢工造成的。此外，怀特和斯诺对免费搭乘火车旅行一无所知。他们第一次免费搭乘他人便车旅行的努力曾碰得头破血流。虽然事隔多年，却带有为人熟悉的斯诺毕生嗜好的印记。两个孩子跳上一列他们认为是在向东行驶的火车，在一辆棚车的扶梯上踌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他们到了萨克拉门托。由于没有带什么钱，他们只得寻找工作，最后来到离罗斯维尔大约20英里远的一个水果装运中心。有5天时间，他们在一所院子里的餐桌旁当招待员。这所院子戒备森严，是为破坏罢工的墨西哥人圈造的。

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对搭便车更内行了。他们知道了挑选快车和找到虽不安全但却舒适的地方把自己藏起来。在一个小站上，斯诺从汗津津的睡眠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辆空闲棚车的车轮下面。原来是列车员把他俩从火车上扔在了这个内华达沙漠里的加水站上。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最后一刻，两个孩子又偷偷登上了车头前面的排障器。在艾奇逊——托皮卡——圣菲铁路公司的列车上，他们在科罗拉多州的拉马尔又被人逮住，这里离堪萨斯州的边界已经不远了。这次，他俩在牢房里过了一夜。在堪萨斯州，专门在收获季节劫掠的匪徒们抢走了斯诺的50美分和车上农业季节工人人们的夏季工资。

在这两个孩子看来，铁路罢工并没有什么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他们的父母亲或许还赞同报刊上的批评，就是工人们对于更高的工资的要求，致使食品运输陷于停顿并使消费者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斯诺所感兴趣的，是这种艰难的冒险旅行，是他所遇见的普通人民，以及他在晚年经常缅怀的大洋彼岸的珍奇世界。这些，都是他初次所见。

少年时代的旅行尝试，非常符合19世纪20年代崇尚旅行的时

代精神，哪怕是只到海外去过一次。斯诺读过理查德·哈利伯顿富于浪漫色彩的游记，他那种不抱任何政治目的和充满自由自在的冒险旅行，极富于时代精神。美国青年在满足自己的旅行癖方面几乎是无所畏惧的。美国与那些殖民国家不同，在海外没有什么敌人。随着经济的繁荣，金钱对许多人也不成为什么障碍了。哈利伯顿早期的旅游同伴之一就是堪萨斯城人，这个城市的年轻人也要加入旅游者的行列。鲍勃·朗和堪萨斯城的一群大学生一起去海外旅行了9个月，访问了中国和其它一些地方。

在初级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之后，斯诺停学一年。曾有一度，他到了霍华德那里。霍华德退了学，在纽约的商业界里混得不错。霍华德已经回忆不清当时埃迪在那里做什么，只记得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的记分册表明，1925年春季学期斯诺在这所大学的夜校学了两门功课。他在广告写作课得了一个A，而在广告心理学课“没有成绩”，“因为不时缺课。”无论如何，1925年秋天斯诺回到了密苏里。他进了密苏里大学，这是一所为堪萨斯城的男孩子开办的有名的学院。

密苏里大学位于宁静的、田园式的哥伦比亚，在这个州的中心。但这所学院的诱人之处，并不是它宜人的环境，而是它招收象斯诺这样渴望旅行的年轻人。密苏里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创建于1908年。它的创始人迪安·沃尔特·威廉斯享有国际声誉，是个有远见的人。在斯诺出生之前，他就组织过多次国际性的新闻会议，并成立了世界新闻协会。威廉斯通过与驻外的美国编辑们的各种特殊关系，陆续把许多有才华的年轻毕业生派到了国外的工作岗位上。

威廉斯在日本和中国安置毕业生尤其成功。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有50多名从密苏里大学毕业的新闻记者在远东工作。密苏里人在中国开创了新闻教育，并为中国的年轻人去密苏里学习提供了希望。人们开始谈论在中国的“密苏里新闻垄断”。最后，

密苏里的势力超出了新闻界并进入了商业界和政府。1920年，有120名成员的密苏里联谊会在上海成立。19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时身为大学校长的威廉斯，被提名为中国邮电部长的候选人。

这个国际性的前途对斯诺不是没有诱惑力的。他在大学校园里的第一个学期，1925年11月10日，临近毕业的新闻班献给学校一件礼物。他们选择了一个带有子午线的盘子，并把它安放在这所新闻学院的活动中心内夫堂的前面。在盘子上标有距离许多外国城市的英里数：莫斯科—5,273，德里—7,730，上海—7,136，纽约983，……

斯诺进了这所新闻学院的广告提高班。他获得了比在初级学院更好的成绩，但仍在迪安·威廉斯讲授的新闻史和新闻理论课中得了一个D。他加入了社会上的一个名为贝塔·塞塔·派的大学生联谊会，因为他厌恶这个联谊会里对新生搞恶作剧，就又参加了全国广告专业大学生联谊会阿尔法·德尔塔·西格马。他担任了《堪萨斯城明星报》驻该校的记者。但后来那个在内夫堂前面带子午线的纪念碑对他的吸引力超过了上课，使得他经常缺课。加上他有一种遗传的感情，感到他的父亲也不应当担负他受大学教育的费用，因此，仅仅一年后，他就离开大学又去与霍华德搭伙。

1926年，20年代的繁荣使堪萨斯城的人们普遍对成功充满了信心。尤其是在纽约，各种各样的机会闪烁着诱人的光彩。斯诺在斯科维尔兄弟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广告公司，它作为华尔街金融机构的代表，最能体现这个时期的繁荣。在经纪人们以近似疯狂的节奏进行着股票交易的同时，广告界的经理们宣布了一个长期的、光荣的使命：“直到我们消费掉所有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之后，消费工程才会结束。”这是由这个城市里最受人尊敬的广告商之一欧内斯特·埃尔莫·卡尔金斯宣布的。

斯诺兄弟在齐格菲尔德·福利斯剧院拐角处的西55街56号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巴迪·罗杰斯曾和他们同住过一段时间，另一个负责《纽约时报》有关航空业方面内容的年轻人也来住过。霍华德凭着天生的好相貌找到了一份工作，为斯珀牌蝴蝶式领结作广告模特。他戴着这种领结的照片以整页篇幅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在这个小公寓里，经常举办带有炫耀意味的聚会并经常有聪明、有才干的客人们光顾，其中包括贝特·戴维斯，她那时还是个不出名的女演员，和母亲住在一起。

斯诺以他那随和的方式，能很快地结交朋友和有教养的良师。对他来说，任何人的重要性也比不上查尔斯·汉森·汤。

“纽约先生”汤喜爱闪光的文学事业，斯诺到达这里时，他在《世界主义者》月刊、《时髦人士》、《麦克卢尔》和《哈泼斯市场》等报刊做编辑。这位圆脸的、父辈的记者以能够发现年轻的作者而感到特别自豪。这位《时髦人士》的编辑回忆道：“那时我经常挑出一篇稿子并对自己说‘这篇可能就是。这里可以用它。’所有对稿件的偏爱都是对作者的偏爱。”

斯诺喜爱纽约那令人陶醉的无拘无束感，而对广告公司里日复一日的苦差事感到难以忍受。他认为，这里的人们似乎都没有特别的才干，狭窄的天地也限制了他的个性自由。斯诺没有被提过薪，因为他总是习惯性地迟到，甚至与老板会面时也是如此。不过，他结交朋友的本领救了他。凯利·格雷厄姆是一个难对付而出名的商人，36岁当上了第一全国银行的总裁，他喜欢斯诺，还把他那大受欢迎的广告交给斯科维尔公司去做。有一次，格雷厄姆邀请他陪同参议员爱德华·I·爱德华兹出席晚宴，这样斯诺可以有机会拉到一家保安公司的广告，因为参议员在这家公司里享有股权。但是斯诺却只顾了谈话，而忘记了拉广告的事情。

在特有的思乡之情勃发之时，斯诺谈起要回到“可爱的堪萨

斯城老家”，但他又总是拖延回去的时间。在写给他父亲的信中，斯诺似乎是为自己辩解，又什么都不肯定地写道：“我决心要出人头地，而且要在更大的范围里成功，但目前在堪萨斯城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打算进法律学校。他在由《储蓄银行杂志》赞助的世界通信大赛中获胜，并争取到几个月的时间考虑是否作为一个独立撰稿人，比如写小说或电影剧本作为自己的职业。他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自己的行动，而是申请去做塞缪尔·戈尔德温电影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斯诺的愿望没能实现，但这位电影巨头却敏锐地预见说：斯诺有“演戏的天赋！”

1927年下半年，当斯诺把不多的股票变转为800美元时，他演戏的天赋告诉他今后的出路有答案了，那就是出国做一年冒险旅行。银行家凯利·格雷厄姆鼓励他这个想法，因为他想做的这件事挺了不起，象个年轻人。斯诺说服了堪萨斯城的好友、兄弟会的会员阿尔文·乔斯林与他同行。通过查利·汤，斯诺认识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儿子克米特，他是罗斯福轮船公司的总经理。罗斯福雇用了斯诺和乔斯林在拉德纳号轮船上做舱面水手，工钱是一个月25美元。这条船的航行经过巴拿马、夏威夷、菲律宾、中国，根据在远东装船的货物而定，还可能去印度。

斯诺仓促地拟订了旅行计划。他从沃尔特·威廉斯那里获得了密苏里在海外的毕业生的名单。汤和罗斯福按照斯诺的要求，为他写了一封适用于各种情况的信给美国的“辩护律师”（原文如此——作者注）。他用25美元买了一架旧的柯达4A型照像机，并与几个编辑探讨了他在旅行途中如何向国内发送新闻报道的问题。汤同意让斯诺作为他的代理人，也同意把斯诺工资存入格雷厄姆银行。

拉德纳号驶出港口后，斯诺的父母亲才收到他的信。在这封信中，斯诺对他的决定作出了解释。

我一直对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和劳神的思想方式感到有些压抑，就象一部庞大的机器里的一只齿轮，当我年轻的时候，生命却在悄然消逝。笼罩在我头上的陈旧的生活方式应该终结了。我下决心，我的生活方式应当是幸福的。我所喜爱的生活，现时的幸福就是一个。那就是旅行！！冒险！体验！我想要克服困难——肉体的困苦——享受成功后凯旋的喜悦！我愿意去体验艰难险阻！我想要用更多的东西来充实我的青春，而不止是在我周围的那些虚伪、可怜的陈词滥调。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日子使我感到厌倦，它加重了我的神经紧张，并使我梦想到那些传说中的、遥远的地方。许多城市的名字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使我无法集中精力：“加尔各答！”；然后是“巴勒斯坦！”；“上海！”一个声音小声说：“巴格达！”；“麦加！”；和“遥远的大马士革！”。当这首城市的歌在我脑子里不停地回旋时，我怎能为摆在我面前的那一点点死气沉沉的职责而费力地工作呢？

尽管斯诺以哈利伯顿式的语言来解释他的冒险，但同时也意识到了他作出的决定是危险的。他要求他的父母亲不要对朋友和亲戚们过多地谈论他的旅行。“如果我的计划失败，因为总会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我和你们大家将成为笑柄。”甚至连别人已经答应他回来以后可以在另一家广告代理处工作这样一件很保险的事情，也似乎是不值一提的，因为他顾虑同伴们会采取的行动。此后不久就出现在堪萨斯城名人录上的鲍勃·朗，放弃了投身外交界的宿愿，进了他父亲很赚钱的保险事务所。查尔斯·怀特正走在通向成为一名好医生的路上，而巴迪·罗杰斯已经成了明星。当斯诺正在拟订离开纽约的计划时，霍华德在《美国银行家协会会刊》找到了一份做广告的工作。霍华德决定先要获得财富，然后再用中年时期寻求知识。

斯诺的看法与其相反。虽然他也和堪萨斯城的其他男孩子们

一样长大，但他却没有选择留在家乡，而是在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种种变革过程中变得成熟了。他已经用马克·吐温的农业美国式的幻想武装起来了，他一定要去见见大世面。

目 录

鸣 谢	1
序	4
引 言 青年时代	1
第一章 漂泊奇遇	1
第二章 第二次行动	27
第三章 红星照耀中国	53
第四章 烧焦的土地	91
第五章 人民在我们一边	129
第六章 荆棘载途	169
第七章 以实玛利在自己的祖国	203
第八章 展望远景	245
第九章 光荣的结束	283
第十章 会纠正错误吗?	323
译后记	336

第一章 漂泊奇遇

大约在斯诺出生的年代，美国对被外国干涉者们围攻的中国人怀有一种深深的同情感。但是，当美国人象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样把中国说成是具有“最尖锐的民族关系”时，同情也就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了。1899年和1900年，美国在两次“门户开放照会”中，要求列强在中国让位于美国的利益和理想，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欺骗，一种全国自我欺骗的大骗局。虽然参议员们宣称“我们必须拥有（中国）市场，否则我们会面临革命”，然而资本家们为他们大量的工业产品找到了其它的市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美国各城市中发展得很顺利。1910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不到1%。上述两个照会的设计者国务卿海约翰断言，舆论根本不支持政府采取行动以使中国免遭外国的侵犯。

直到斯诺踏上征途时，上述情况仍没有什么改变。美国对华出口额在最高年份1928年，也仅占出口总额的不到2%。美国人依然在说着大话，例如在1928年8月27日签订的“凯洛格—布里昂条约”中宣布，战争为非法。普遍的经济国家主义把美国的关税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有迹象表明，从1928年开始，美国报刊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进入了3年的衰退时期。斯诺有充分理由期望看到这个国家象曾在北京闲逛的哈利伯顿（Halliburton，

Richard, 1900—1939年, 美国游记及历险记作家。——译注)说过的那样“大量的财富、幸福富足的生活、无忧无虑的人们、12月的天气。”与此相反, 当美国人眼看着自己陷入大萧条时, 他的旅行癖只能使他面对贫困与压迫。他的理想主义不允许他看别的。

在拉德纳号船上的生活就是斯诺所希望的一切。他被晒得黝黑, 暂时留起了小胡子, 他站哨, 还轮班掌舵。这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 “‘甲板上的小伙子们’很少能为此取得一致意见,” 他在一封写满惊叹号的信中告诉查利·汤。“我曾劝说伙伴在通过巴拿马运河时让我掌一段路的舵, 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那种惊险感。”在巴拿马城, 他游览了那些延伸了好几个街区的酒店, 在“臭名昭著的‘椰林’”感受了年轻的妓女们是如何拉客的。

在拉德纳号继而驶向夏威夷的途中, 斯诺感到自己逐渐了解了这些水手, 他们都是退伍兵。斯诺和其中绰号叫“新加坡”的萨姆·摩根一起站8点到12点的哨。他羡慕他们肌肉发达的体格和他们的“无拘无束, 欢乐的心情和他们在无人赞颂的生活中那种心满意足,” 他告诉他的哥哥霍华德。但是, 这条船的锅炉发生了爆炸, 他和这些人一起去远东的幻梦破灭了。原定中途在夏威夷只停留6个小时变成了得等几个星期。斯诺乘拉德纳号的航行结束了。

斯诺和乔斯林住进了陆海军基督教青年会。下一步怎么办还无法确定, 斯诺渴望到那些能去的地方冒冒险。他在怀基基懒散地闲荡, 在墨绿色的海水中驾冲浪板锻炼自己。他和乔斯林寻找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家桑苏西; 参加夏威夷宴会(“就象我们密苏里人说的‘第一流的宴会’”); 悠闲地开车环游全岛; 以及朝奥拉挤眉弄眼。奥拉是个跳夏威夷草裙舞的演员, 是被他们说服来为他们表演的。她“有点儿太健壮了而且一两天前就已经不是处女了”, 她伴着从那架老式留声机划擦出的“美丽的桃金娘树花环”乐曲不停地跳着, 直至筋疲力尽。斯诺和乔斯

林为了挣钱，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场地上摆摊卖菠萝汁。斯诺写了一些文章，并希望汤能在美国本土发表，此外，他还写了三首诗，发表在《檀香山广告报》上。他乘坐船的底舱去考爱岛，作了一次7英里的、令人晕船呕吐的旅行，之后，又用3天时间作了一次“田园诗般的”徒步环岛旅行。在这次徒步环岛旅行期间，他为《太平洋的乐园》杂志写了一篇文章。

斯诺对乔斯林的评价是，他有“两大消遣”，啤酒和家。不久以后，他决定“退回”堪萨斯城（他进了一家广告事务所——管理运输帐目！）。斯诺打算继续旅行。然而，在夏威夷停留了两个多月之后，他已经没钱买船票了，作舱面水手的工作机会也很难得。有一次，他几乎得到了顺路的日本幼马期妻号船上的工作，但在最后一刻这份工作被派给了另一个人。

在目送幼马期妻号驶出港口后回来的路上，一群去往码头的日本人从他身边走过。他们是为乘坐西尼奥丸的日本大使和他的女儿送行的。大使的女儿要回国嫁给秩父亲王。西尼奥丸定于当天下午启航。斯诺想起旅客中有个熟人丹·克拉布，他是普林斯顿人，准备去塞得港并进行“一次深入‘最黑暗的非洲’的冒险！”斯诺决定去向克拉布告别。结果发现，克拉布乘坐的是一个宽大的头等舱，大得足够两个人用。两个小伙子冒冒失失地商定了一个偷乘计划。或许此后，斯诺会在为《堪萨斯城邮报》写的一篇富于浪漫色彩的报道中，在令他兴奋不已的家信中，对此详细描述。

斯诺预料自己在一两个小时内就会被人发现，所以便匆匆忙忙、随随便便地和乔斯林告了别。斯诺最终实现了他和克拉布的计划——了不起的东方式奇迹变成了现实——显而易见，正是由于他那种随随便便的方式。他先在二等舱里混了一天，第二天又和头等舱的朋友们在一起，头等舱的乘客中有7个是美国人。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和克拉布开始与未来的亲王夫人和她的母亲打

桥牌。在一次打桥牌时，一位美国老教师突然问斯诺：“你到底是哪个舱的？你好象是乘头等舱，可我从未在餐厅见过你。”

“呃，我是……不错，我是自己乘一个舱，”斯诺答道，他后来回忆说：她是“一位有身份的女士，不太爱打听别人的事情，而且有一种绝妙的幽默感。她和我一起笑了起来，我们又继续打牌。为了使我们的谈话内容更保险起见，我打出一张‘王’压住了我的搭挡的‘A’。”

夜里，斯诺就睡在克拉布客舱里的沙发上，在服务员进来收拾房间之前爬起来。他吃克拉布的早饭，而送到每间客舱的早饭只有一份。在下午5点左右通常喝鸡尾酒的时间，他用三明治填饱肚子。一天早晨，斯诺正在穿裤子时被日本服务员抓住了。

“我告诉他我是二等舱的，我和丹是好朋友。”斯诺在给汤的信中写道，“如果对我睡在丹的客舱这件事保持‘沉默’，我就会毫不吝惜地奖赏他。我给了他11日元（5美元左右）。”

6月22日清晨，在驶离夏威夷9天乘客们吃过8顿早饭之后，西尼奥丸驶入横滨。船上有一位神经紧张的乘客，至今体重已减轻了14磅，正在甲板上来回踱着步。斯诺没有上岸所必需的登陆卡。他看着几百名日本人高呼“万岁”欢迎船上这位日本未来的亲王夫人，感到自己就象被关在监狱里一样。

这次，斯诺的救星是一名英国记者。他和一伙记者乘着一艘领港艇驶出港口，向西尼奥丸开过来，准备采访亲王夫人抵达的新闻。当克拉布和斯诺把他拉到一旁并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后，他感到很惊讶。

“哦，这种事可是第一次，你们知道吗？”他说。“许多人试过，但是都失败了。现在，我们必须把你弄上岸，获得圆满成功。”

办法很简单。当船停靠码头之后，斯诺和这个英国人以及几个西方记者一起走下了船。他若无其事地对海关人员点点头，晃

了晃拿在手里的一叠采访笔记和几张照片，并用日语说：“记者，《日本广告家》报的。”

到了东京，在美国人的俱乐部里，记者们花日本人的钱，庆祝斯诺的航行成功。那天晚上，斯诺与《日本广告报》的总编辑O·D·拉塞尔及其夫人共进晚餐。船上的咸肉和鸡蛋，他早就吃腻了。

拉塞尔提出要安排斯诺在《日本广告报》工作，他非常希望能因此使密苏里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远东。斯诺拒绝了。查利·汤来了一封信，鼓励斯诺坚持按原定计划旅行，并作为自由撰稿人写题为《漂泊奇遇》的系列文章。这位和蔼可亲的编辑说，他打算在《哈泼斯集市》报上刊登一则关于斯诺在夏威夷逗留的消息。他付给斯诺500美元。而斯诺回答说：他“正在粉红色天堂的云朵上和长了翅膀的檀香树交尾！”这则消息，是那种“只发生在阿尔杰（Horatio Alger，1834—1899年，美国作家，专写男孩子的故事。——译注）作品中的事情。”

在日本期间，斯诺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他从西尼奥丸逃脱的经过。拉塞尔想要发表这篇文章，并答应等到斯诺和克拉布平安离开这个国家之后。其他的记者也答应不透露这个消息。两个小伙子去游览了日光山城，然后，住进了一家舒适的小旅馆。正巧一名日本巡警顺路来检查，询问他们是怎么来到这个国家的，他们便匆匆忙忙地收拾东西溜走了。

他们沿着海岸从横滨到了富士、名古屋、京都和神户。在神户，他们买了两张三等舱船票，上了亚洲女皇号。这艘船将经过日本内海，乘着它可以看到一个个被海浪拍打着的港湾和一艘艘装备奇特的帆船。在长崎，斯诺为父亲买了一件丝绸和服，然后向中国进发。

斯诺于7月6日星期五抵达上海。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人。有一半是赤身露体的苦力，他们用颤颤悠悠的竹扁担挑着

沉重的货物，小跑着从令人生畏的印度巡捕身边走过。坐在锃亮的奥斯汀牌汽车里的英国人在马路上与人力车抢行。到处都悬挂着写有中国字的招牌、横幅和旗子，只有在外国人管辖的沿江一带见不到。那一带的深灰色石头建筑物是欧洲式的，高高地俯视着黄浦江。

斯诺在四川路上的海军基督教青年会找到一套房间。后来，他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爱多亚路(现延安路。——译注)，这条街蜿蜒曲折象一个无尽的S，连接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斯诺进了这条街4号的大北电报公司大楼，又上到第6层，走进《密勒氏评论报》的办公室。这里除了报社常见的杂乱之外，书桌上、饭桌上和椅子上，到处都堆着书，有的塞在书橱里。这些四面玻璃的组装式书橱，摇摇晃晃地一直堆码到天花板。这是中国最好的私人图书馆之一。这个图书馆的所有者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J·B·鲍威尔，斯诺向他递交了密苏里的迪安·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虽然斯诺对这封信的内容一无所知，但他作为一名中国通的生涯即将开始了。

在密苏里出生和长大的鲍威尔，使斯诺呼吸到了家乡的气息。于是，斯诺成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人。

《密勒氏评论报》是由密勒创办的，他也是密苏里人，被视为“东方的美国新闻记者老前辈”。密勒在密苏里大学完成学业之后，从《圣路易斯共和报》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但倔强的性格使他失去了工作，因为他拒绝去采访一次火灾。于是，他去了纽约的《先驱报》，并被作为驻外记者派去采访南非战争、在菲律宾的美西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中美洲的战事。1900年，他又到中国采访义和团起义，这个国家把他吸引住了。

密勒憎恨欧洲人的帝国主义行径。在南非战争期间，他的电讯批评英殖民主义者，颂扬他们的敌人。由于激怒了基奇纳勋爵，他被驱逐出英国。密勒不反对美国在中国拓展商业，只要是

这种商业能够帮助中国人。他尖锐地批评抵制变革维护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在外国租界里的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商会、银行家和其他美国人。他试图使美国政府形成新的看法，呼吁它采取一种“巧妙的侵略”政策，其含意是美国政府应当成为帮助中国的主要力量，即使不惜发动反对他国的经济战争。

密勒认识到，中国正处于一场社会剧变的边缘。1911年，他为了表明对于迅速变化的形势的种种看法，采取了毕生最大胆的行动，在上海创办了《大陆报》。密勒打算使这份报纸“给予中国人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同情”，尤其是要破除忽视“本土”新闻的殖民主义旧框框。那年10月10日，《大陆报》披露了反清起义的真相，这次起义导致了清王朝的最终解体。此后，在这家报社工作的密苏里人卡尔·克罗，每周单独会见这个国家的新领导人孙中山博士。

在华的外国社团中有影响的人士，尤其是《大陆报》的竞争对手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反对密勒的观点，特别是当他在形成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拒绝站在英国一边的时候。1915年，由于《大陆报》的亏损和被人们普遍厌恶，密勒只好把它卖掉。两年以后，这位果断的编辑再次尝试，创办了一份周刊《密勒氏远东评论报》。由于迪安·威廉斯的推荐，他把约翰·B·鲍威尔带到上海，协助他处理日常编辑工作。鲍威尔到上海后，问他这份报纸刊登什么内容，密勒以其特有的方式回答说：“我们想要诅咒的一切。”

鲍威尔和密勒给人的印象截然不同。密勒趾高气扬，经常对人粗暴无礼，总是穿戴时髦、生活舒适的。他是个爱清洁的人，即使在战场采访时也是如此。鲍威尔出生在密苏里西北部一个农场的家庭，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他与密勒不同，在来中国之前并没有过海外的经历。他所作过的全部新闻工作，就是与中西部的报纸打交道。他与密勒的不同之处还有，他

待人真诚、友好，穿着随便，常常用一个玉米棒子芯做的烟斗吸烟。1922年，密勒决定去作中国政府的顾问，他把他自己在这家周刊的股份卖给了鲍威尔。鲍威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接办了这份周刊，他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刊登在刊头上，而是把刊名简化为《密勒氏评论报》。

这些差别只是表面上的。鲍威尔是个人民党人，他厌恶银行家和来自任何人的压力，他也反对帝国主义者并亲善中国人。他有许多年都不坐人力车。最后，他逐渐习惯了由一种人拉着另一种人，但他总是多付给车钱。他和密勒一样，也相信美国在保护和帮助中国方面应当起特殊的作用。“用注重实用的美国人的话来说”，鲍威尔写道：“‘门户开放’在中国意味着头等的中国反垄断法。”还有，他发表他想要诅咒的一切，他支持不知名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而不顾西方同行们的强烈反对，这些也和密勒一样。

但是，1911年革命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是败落为一个相互争斗的军阀的集合体。从前的领导人孙中山博士改组了他领导的国民党并率领这些残余的国民党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政府，向北京的名义中央政府挑战。19世纪20年代，他们还发展了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孙于1925年去世。他的副官之一蒋介石采取行动，控制了新近宣布成立的国民党政府。1927年，他开始扩大他自己的势力范围。鲍威尔象密勒一样，对共产主义并没有好感，但是他也不同意把蒋的北伐说成是一场“长江上的红潮”。他相信蒋会与他的“红色”同盟者决裂，进行彻底的改革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并结束各种不平等条约。鲍威尔兴致勃勃地报道了库利奇政府(卡尔文·库利奇〔1872—1933年〕，美国第30任总统，任期为1923—1929年。——译注)将不帮助在上海的外国侨民，而那些得不到帮助的外国侨民们则建立了一个“自由城”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国民党的攻击。他呼吁西方人士自愿

放弃他们的治外法权。上海的美国商会指责鲍威尔“援助分裂”分子，并要求他从这个组织中退出。鲍威尔阻止了为把他驱逐出商会要进行的投票并宣称，“根本不打算改变我的观点”。

在关于蒋的问题上，鲍威尔是正确的。蒋进入上海之后，借助贩卖鸦片的中国黑社会，策划了一场血腥的“白色恐怖”。据当时一些人的估计，这造成了5000人丧生和使共产党处于混乱之中。然后，蒋继续北伐。1928年7月3日，正是斯诺抵达上海的3天前，蒋到了北京。真正的国家统一仍然是梦想，然而稳定的形势使鲍威尔确信需要编一份《新中国》特刊。鲍威尔需要有人帮助，于是便问斯诺是否想要一份工作。斯诺由于欠着丹·克拉布的钱，并把中国当作是一个很合适的逗留之处，于是同意了暂时中断漫游。他在家信中写道，他成功地“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为期一年！”

虽然斯诺对中国一无所知，但他出于本能地赞同这位友好的、正在谢顶的编辑的观点，厌恶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权。“不是很奇怪吗”，在上海上岸仅3天后他在家信中写道，“就是说，中国这个最先进、最富有的港口应当由外国人控制！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说好，毫无疑问，对他们来说是这样。”

斯诺定做了一身亚麻布的衣服以适应上海的湿热气候。他和中国助手们一起开始了工作，收集新闻材料，哄骗过去由于鲍威尔的政治主张而离弃《评论报》的客户们来登广告。那年夏天，斯诺对遇见的人，好象都是友好、腼腆和严肃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鲍威尔图书馆的藏书，专心致志地听这位编辑讲述中国和它的未来。

10月10日，《密勒氏评论报》出版了198页的特刊，这一天是1911年革命的纪念日。《密勒氏评论报》评述道，这期特刊的出版是为了“纪念多少年来为中华民国的发展和现代化，使之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独立成员而进行的奋斗。”在长长的撰稿

者名单里，有这个年轻政府的许多位领导人。他们的文章赞扬了中国的铁路和电报系统的重建，中国所拥有的“人类的财富”，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以及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密勒氏评论报》使用的词汇与《堪萨斯城明星报》描绘当地景致时所用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它预言50年后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里，都将有宏伟的建筑……和美国一样的摩天楼，里面有许多电梯。人力车将被取消，而只使用汽车。”

显而易见，斯诺在他单独署名的文章中谈论的是他在密苏里的经验。他在描述美国的自助活动时写道：“几十年前，在美国的许多乡村地区马路还很罕见”；他继续写道：而现在，“有一种精神，或者说至少有一种看起来很有希望的精神，‘把中国从泥淖之中解救出来！’”

这期特刊出版之前，鲍威尔让斯诺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广告经理助理，每月工资180美元左右。这项工作在接受行政事务的同时，也提供了采写报道的机会。斯诺由于介入了各项事务，因此同意逗留一段较长的时间。

10月中旬，鲍威尔派斯诺前往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这座城市不象各通商口岸那样有外国人安家落户，它也和上海不同，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不使用很多洋泾浜英语。在旅馆，斯诺对服务员说他的房间里有臭虫，但他们听不懂。最后，他让他们看他身上衣服的边缝，他们才在他床上吊了一顶蚊帐。

在南京，斯诺从国家注册局得到了一份为期12个月的广告合同，他和蒋介石握过手，会见了政府的部长们：宋子文、王正廷和孙中山博士的儿子孙科。这次南京之行使斯诺更加深信：“中国正在以世界上任何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

12月，在赴山东的北方之行中，斯诺有机会领略日本式的帝国主义暴虐。日本自从在1894年对华战争中获得重大胜利后，一直寻求在这个国家中扩大其影响。他们在山东特别活跃。1928年，

当国民党军队开进这个省的时候，日本派去了5000人的军队保护日本侨民。双方发生了几次小规模冲突，日本便乘机进一步加强控制。几个月后，它又夺取了铁路和商业特权。为了引起国际上对这个日本人所否认的问题的关注，孙科邀请斯诺和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记者阿尔·巴特森亲自去看一看。

圣诞节刚过，这两名记者就登上了为这次旅行安排的专列。由于国民党政府注重其装备的经久耐用，列车只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缓慢行驶。在每一站上，斯诺都看到有长期堆放在站台上方的大米、大豆、小米、面粉、高粱和其它的货物，有的堆码的太高，把站台都遮掩住了。

12月30日星期日上午，他们抵达泰安。在泰安停留了22小时之后，日本人才让这一行人启程去山东省省会济南。此后，列车时开时停。沿线各铁路车站的站长由于受到日本人的胁迫，在他们强烈抗议之后才让列车通过。在距济南3英里处，日本军官截住了列车，声称不允许它开进这座城市。等候了3小时之后，这两名记者决定徒步走完这段路程。

据斯诺估计，日本人总共扣押了51辆机车、492节货车、33节客车和9节殡仪车，这造成了国民党政府每天损失4万美元的税收。他还断定，日本人正在拖延黄河大桥的修理。这座大桥是被异己的中国军队为阻止蒋的军队的追杀，在撤退时炸毁的。“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是日本人阻止了济南府全部车辆的运行，是他们干扰了铁路的管理，种种迹象表明，也是他们正继续阻碍着这条线路恢复开通的进程。”

总的说来，斯诺认为这次10天的济南之行是一次极其幸运的冒险旅行。阿尔·巴特森对斯诺讲述了在他早年生涯中那些不可思议的经历。他曾作过加拿大的军官、海员，曾徒步穿越全国，做过演员，还曾担任过尼加拉瓜自由战士奥古斯托·桑地诺的顾问，直至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并把他逐出这个国家。在返回上海

途中，在泰安，斯诺爬了6 000多级台阶，上了神圣的泰山。山上冷得令人发抖，巴特森甚至认为这是在蛮干。最出格的还是一则错误的报道，说日本人拘留了这一行人。几天之内，“白云”——斯诺的中国名字，出现在天津、北京、广州、香港、武汉和青岛诸城市报纸的头版上。

虽然斯诺幸免于难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家乡，但他的母亲还是恳求他立即回家：“我希望你不再被派去搞任何调查，假如再有的话，你要拒绝去……你冒险的次数已经太多了。”

斯诺没有因此而却步。他接受了鲍威尔指派的另一项出差任务。这一次，他准备了一本有中国铁路网沿线风景名胜的导游手册，他的同伴是S·Y·利文斯顿·胡，哈佛大学毕业的铁道部技术专家。他用了四个月时间，坐在摇摇晃晃的客车里观察中国，在各种各样的车站，他漫步穿过一条条街道和边远的乡村。4月份，他从上海向南到杭州和宁波，再向西北到南京。而后，他又从南京沿津浦铁路向北到天津。5月和6月，他到了更北边的满洲并进入朝鲜，那里处在可憎的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之下。然后，斯诺返回北京，制定7月份向西赴绥远的旅行计划。

鲍威尔刊载斯诺所写的四部分的连续报道是有所考虑的。他要表明，在国民党治理下，中国的“富于浪漫色彩的铁路”能为人们提供安全、愉快和有趣的旅行。斯诺在一架蹩脚的花冠牌打字机上匆忙打出的稿子，描述了清洁、舒适的列车，“供应精美 的外国食品，”高效管理下的中国旅馆，耳朵后面戴着桃花的年轻姑娘，能与（他在少年时代与查利·怀特和鲍勃·朗一同西行途中曾见过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和罗伊尔峡相比的景观，以及与古代庙宇相邻的现代灯泡厂。在描写北京至沈阳铁路的文章中，斯诺嘲笑日本人在沈阳建造的砌着白瓷砖的大和式旅馆，象一间“豪华的仰拱浴室”；在一篇文章中，他专门叙述了他注意到日本的帝国主义野心：“在满洲的每个日本人内心深处都坚信，直

到那轮朝日独一无二地升起在南满上空，日本才会罢休。”然而，斯诺也强调了他认为他在国民党人身上所见到的那种新的精神：“即使不是预言家也能发现，正是在这里——历史名城南京，中国的伟大事业正在形成未来的核心。”

在所到之处，除了斯诺寻找的风景名胜，贫穷困苦的中国人的构成了另一番景象。在与巴特森一起巡视铁路期间，斯诺发现济南俱乐部“这座精巧的现代建筑，是外国人为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中国的家庭则住在窑洞里，他们“冷的发抖，面容萎靡、憔悴。”他顶着寒风爬上泰山，见到的却是一张张乞丐的脸，他们住在“并不比狗窝大的、搭在其它房屋侧面的稻草窝棚里，这些可怜的人们爬进去以躲避刺骨的寒风。”然而，使他最难以磨灭的印记，是在4个月的沿铁路旅行结束时留下的。

斯诺不顾他的旅伴胡的反对，坚持乘北京至绥远的列车进入干旱的戈壁沙漠南部边缘的荒凉地区。在途中，他们遇见了路易·艾黎。艾黎是新西兰人，身体强壮，在上海一家工厂里当监察员。现在，正利用假期帮助搞救济工作，已经骨瘦如柴了。斯诺认为，艾黎是比胡更合适的同伴，因为胡象所有的哈佛人一样，既无能又傲慢。对斑疹伤寒的恐惧和无所不在甚至灌进眼睛、耳朵里的灰尘都没有阻挡住斯诺，他和艾黎在归化下了火车。第二天，他们一起走了大约60英里到达萨拉齐（旧县名，现在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黄河北岸。——译注）。在归途中，斯诺就远不再是逍遥自在的了。

O·J·托德里密执安州人，也是在华洋义赈会工作的一名工程师，斯诺和他结伴而行，走过了萨拉齐的一条条散发着恶臭的街道。当时的景象，一直缠绕着斯诺的后半生。他们跨过一个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儿童们的脸由于饥饿而浮肿着，他们的眼睛茫然地凝视着前方。憔悴的年轻妇女在挖掘地里的枯树根。“我们遇见了一个情景，这肯定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图画，”他

在为《密勒氏评论报》写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

一个小男孩，还不到6岁，坐在一个老头身边，这个老头，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尚处于弥留之际。这个孩子的身上什么也没穿，只有厚厚的泥土和污垢……我走过去跪在这个孩子旁边，用手摸了摸老家伙的脉搏。没有任何反应。显而易见，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我们轻轻地把这个不知所措的幼童从尸体边拉开了，我们把他带在身边。那天，我至少努力填饱了一个空着的肚子。

当斯诺正在北京完成他的旅行系列报道的时候，鲍威尔打来电报让他立即返回上海。因为鲍威尔担任了《芝加哥论坛报》驻中国记者，《芝加哥论坛报》要他去满洲北部报道那里的战事，因为张学良少帅要接管由苏联控制着的中东铁路。斯诺抵达上海时，鲍威尔已经走了。他留下信，委托斯诺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代理主编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当地记者。这两项职务要担任几个月，因为鲍威尔还要去苏联。

在中国的第二年和执掌《密勒氏评论报》期间，斯诺变得成熟了。这时他二十五、六岁，精力充沛。当他露出宽厚的微笑时，脸上的皱纹加深了。他棕色眼睛上的两道眉毛更浓密了。红色的卷发变成了棕色，有时，他会留心地在头顶把他们分开并向后梳理得光溜溜的。斯诺身高近5英尺9英寸，并不比一般美国人和中国人高；但他的皮肤和肌肉紧绷绷的，使人感到结实和富有活力。

他把自己的活力派上了适当的用场，于是他比许多在外国租界里住了多年的人，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更多的东西。斯诺把许多被所在报社解雇的新闻记者和其他的西方人看作是自己的朋友，

和他们谈论政治或向他们借书。他们中间有一个年轻的内布拉斯加州人约翰·阿利森，是通用汽车公司驻当地的广告经理，斯诺搬出了基督教青年会和他住进西摩路的一套小公寓房间。

斯诺在职业方面的成功也是了不起的。在他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广告经理助理的头几个月里，广告的数目比原先增加了一倍，达到每周20页。鲍威尔除了把《密勒氏评论报》交给斯诺管理之外，还给了他一个助理编辑的头衔。让他接替《芝加哥论坛报》的工作，更是提高了他的声望。斯诺在一篇为《密勒氏评论报》写的文章中表达了他的自信心，他哀叹“美国的大学生‘流浪汉’……漫不经心地漂泊到了东方。”

斯诺的文学作品登载在《密勒氏评论报》以外的报刊上，但还没有确定的刊物。他作为自由撰稿人，把文章卖给两家杂志《堪萨斯城邮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旅行》杂志和《广告和销售时代》。他试着写了一篇小说，描写在上海的一个年轻的“金发”美国海关人员，被美丽的俄国情人所欺骗，原来她是搞毒品走私的。“绝不要相信俄国人，约翰尼，”在故事的结尾处，这个姑娘与变得聪明的小伙子离别时告诫他说。斯诺承认这篇故事“很糟糕”，或许仅有《自由》季刊发表了它，因为这家杂志的编辑们想要人们知道它有一名作者在遥远的中国。

斯诺逐渐开始形成了他自己关于中国的观点，但他仍旧与鲍威尔一样，相信最美好的未来掌握在国民党人手中。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在关于铁路沿线的系列报道发表之后，孙科送给他一张带有签名的照片，他为此感到自豪。但是，斯诺也看到了，国民党要真正使中国得到改变，还有很多路要走。萨拉齐那些奄奄一息的人，使他为中国人的步履之缓慢而深感忧虑。蒋似乎不能迅速地改变这一切。他在制止西北地区军阀的长年混战方面束手无策，却“在破坏铁路，在使北方的山西和吉林陷于穷困方面获得成功，以致这些救济的通道被关闭。”在一封家信中，斯诺称

蒋为“能力平庸”的“独裁者”。这位总司令的巨大成功是因为他的“卓越的”夫人，斯诺发现她美丽又能说会道。1929年初，斯诺在家信中写道，中国“需要一个十字军从军骑士，一个中流砥柱，一个能够领导他的人民摆脱恶臭和腐朽、不幸和苦难以及国家的痛苦的注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能使她以现在正因之而衰败的腐败、贪婪和愚昧种种罪恶的渊藪中解放出来的人。”

将近1929年底，斯诺在与家人的通信中暗示出他对共产党人的兴趣。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根据一些第二手材料编写出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描写的是当时还不出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乡村中为之生存而奋斗的情况。斯诺以敏锐的洞察力注意到，蒋不履行自己诺言的行为，为赤色分子提供了有效的武器。然而，斯诺还远不是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分子。他从上海的熟人们那里了解到了蒋与声名狼藉的青帮的联盟以及他们在1927年血腥清洗共产党人的许多细节。在斯诺看来，蒋的行为似乎是谋求法律和秩序的一个步骤。

斯诺对强有力的领导人感兴趣，但也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在他的美国生活经历中，这两种价值标准是并存的。使斯诺感到忧虑的是，蒋没有表明什么迹象要放弃国民党的一党专治。《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刊和《堪萨斯城邮报》刊出了斯诺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说，对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神化是不民主的。“大家都清楚这个事实：孙中山这个名字经常被那些与高尚的道德观和理想主义的信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政治家们和军事家们所利用和滥用。”斯诺的父亲提醒他，对政府的宣传表示异议是不明智的，斯诺则以一段论证作为答复，这段论证或许与他父亲的反天主教观念相契合：

“你看得出这里所使用的方法与三个世纪前西班牙在征服美洲时所使用的手段之间有什么大的区别吗？西

班牙使用香火和对天主教的偶像崇拜打垮了她要征服的种族的精神；国民党政府把孙中山说成是一个神并对一个鄙视任何形式的崇拜的人制造个人迷信。他们都是叛徒。西班牙背叛了耶稣，国民党也会背叛孙中山。”

几次旅行加深了斯诺对外国人在华种种特权的本能的厌恶。他对中国人的冷漠感到沮丧，对中国人在萨拉齐受苦而西方人却无动于衷同样感到无法容忍。他挺身而出帮助那些不幸的人。有一次，他要求一个中国老太太不要再打一个挑不动重担的小女孩。另一次在上海，一个露宿街头的苦力被火烧了衣服，跌倒在斯诺的“射程之内”。当时中国人都站着围观，斯诺冲了过去，匆忙把自己的驼绒外套裹在这人身上。

在鲍威尔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斯诺所主持的《密勒氏评论报》毫不犹豫地涉入了多起亲华事件。

《密勒氏评论报》所在的办公楼有两个电梯，其中一个专供西方人使用的。一个来访的中国人抱怨说，这是对中国人的歧视。斯诺便就大楼里英国管理部门的这条“傲慢无礼、厚颜无耻的侮辱性规定”发表了一篇社论。他写道：“大北楼的管理者们仍旧怀有几十年前确定白人领地的前辈们那种偏狭的观念。”

这正是那种会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过去在与《密勒氏评论报》的交往中就总是侮辱对方，这次借机跳了出来，攻击斯诺的社论。“那个被当地报刊抛弃的以实玛利（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被其父亚伯拉罕撵弃，泛指被社会抛弃的人。——译注）凭借全然置事实于不顾而崭露头角”。这篇署名为“一个事实的情人”的文章，刊登在《字林西报》的读者来信专栏里。另一封署名为“约翰·英格兰”的来信说：“我要……再次向你呼吁（我在去年5月29日的信中曾呼吁过），”“带头或采取其它必需的步骤，把《密勒

氏评论报》的这个编辑撵到乡下去。”

对此，斯诺在紧接着一期《密勒氏评论报》上回答说：

“经常阅读‘评论报’的读者们都知道，这份周刊既不是反对外国的，也不是公然反对英国的。它是一份美国人办的杂志，一贯追求公平竞争的原则。如果有时‘评论报’的态度似乎是在牺牲外国人利益的情况下支持中国人，那是因为它的编辑们试图运用这把解剖刀去主持正义，这是公正的。我们攻击的目标是偏狭观念的各种表现，因为它是与公正相对立的。”

办公楼的英国所有者改变了原先乘用电梯的规定。几个月后，鲍威尔回来了，他们便用拒绝续签与《密勒氏评论报》的合同来进行报复。鲍威尔只得把报社搬到了这条爱多亚路的38号，在一幢几乎没有窗户的楼房的4层租了一套5个房间的公寓。这件事给斯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的老板连“一句温和的责备也没有说”。

在许多封家信中，斯诺都发誓说他们打算离开中国。那时霍华德刚弄到一份制作广告的工作，年薪6 000美元，斯诺给他写信说：一旦完成了铁路系列报道，“就不会再有什么能说服我离开家了。”但是，似乎总是有什么东西在拖延这件大事，那些东西归结为一点，就是正如一年之后，当他还在中国时所解释的：

“我真不想回去再干每天9点到5点的活。我可能有的一点儿遵守纪律的感受，早就被这两年多的自由散漫消磨掉了。”甚至在他被鲍威尔提升并四处旅行的时候，他还抱怨说这份工作过多地侵犯了他的自由。

1929年初，多年来一直穿梭般奔忙于中国政府和新闻界之间的密勒，打算去为国民党工作，他担任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

者的职位将成为空缺。密勒和斯诺属于同一个兄弟会，而且他喜欢这个比他年轻的人，他有权指定他的接班人。于是他问斯诺是否对此有兴趣。对斯诺这个年龄的记者来说，能成为有声望的《先驱论坛报》的记者，这是一个天赐良机。然而，斯诺拒绝了。这份工作有一个较大的欠缺，就是要求斯诺必须留在上海。

这年的年底，一个十全十美的工作机会来了，鲍威尔收到了德鲁·皮尔逊和戴维·劳伦斯发来的一份海底电报。皮尔逊和劳伦斯组织了“国外新闻社——报联社”，为纽约《太阳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以及其它50多家日报收集新闻。他们需要在远东有一名兼职的流动通讯员，要求是未婚男性，可以自由地寻找奇闻轶事。他们不在乎这名年轻记者是否另外还给杂志社写文章，也不在乎他是否为美国以外其它国家的报纸进行报道。鲍威尔向他们推荐了斯诺，他们在12月2日的海底电报中确认了。使斯诺懊恼的是，当他要作另一次旅行的时候，鲍威尔都说服他在《密勒氏评论报》再呆几个星期。

1930年3月22日是斯诺的名字出现在《密勒氏评论报》报头上的最后一天，促使斯诺回家的一个主要原因突然消失了。斯诺的母亲因腹膜炎而意外地去世了。在此后不久的通信中，他父亲叙述了那所天主教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对她的粗鲁和漫不经心，对此，坚定的天主教徒安娜临死前也是承认的。她的死讯带给斯诺的是心碎和为自己没在家而感到内疚。多年之后，他仍然流着悔恨的眼泪。

比起《密勒氏评论报》来，报联社对斯诺的要求就更少了。考虑到海底电报需要支付较高的费用，报联社的编辑们劝止海外通讯员们用海底电报传送那些用专线电报发稿的主要通讯社报道的新闻，除非他们象斯诺所说的，有“关于暗杀蒋介石的独家抢手新闻，或者是圣灵感孕（认为耶稣由童贞女玛利亚神奇地怀孕的说法。——译注）之类的事件。”那年夏天，斯诺报道了蒋联

合其他军阀以争夺北京的经过（指1928年2月间，为了争夺华北，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形成蒋、桂、冯、阎四派的联合，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译注），他准备了几种为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做广告的小册子，并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了几篇文章。

其中一篇刊登在由H·L·门肯办的《美国信使》月刊第八期上。在文章中，斯诺向外国侨民们开火，抨击种种令人生厌的治外法权。斯诺以《上海的美人》为题，鞭笞了门肯的几乎所有替罪羊——俱乐部和社团的会员、基督教徒、城市里的腐败现象、基督教青年会、常见的虚伪——文章材料之详尽是以使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几乎所有外国侨民大吃一惊。

照斯诺看来，每个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实际上都是想赚钱。甚至“传教士也来卖《圣经》”，他写这些话时，笃信天主教的母亲再也不会强迫他了。“他们中间某些人属于富有的阶层，与当年那些一面掠夺夏威夷人，一面把自己与‘耶稣基督拯救罪孽的人们’的奇迹相混淆的开发者们不相上下。”他批评公共租界的美国总办，因为他公然“反对撤回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反对废除治外法权”。斯诺列举了“专为外国侨民开的”那些妓院的地址。他认为当地的英国行政管理机构是“最封建的……现今世界上残存的最狭隘的寡头政治集团之一。”

《大美晚报》的编辑，美国人兰德尔·古尔德“认为埃德加是有点儿无情和幼稚，（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使我们这个罪恶、贪婪和残忍的城市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但是，大部分人被伤害了。“埃德加·斯诺先生看来是一个专写令人失望、失实但听了令人发笑的报道的能手”，斯诺发表这篇文章的消息传到伦敦的外交部后，一名英国官员断定说。

上海的外国侨民们有理由把斯诺撵到乡下去，但他们没有给斯诺找很多麻烦。斯诺无论如何想要离开上海，他一直在心里盘

算着各种旅行方案。首要的打算是访问苏联。办去苏联的签证毫无指望，于是，他询问报社的编辑们他是否能够经由陆路去印度。报联社看出这是个为顾主的报刊提供丰富多彩的报道的机会，于是在8月下旬通知斯诺，按每月300美元支付给他这次的旅费。

斯诺于9月25日离开上海。他按照预定的计划，向南经过台湾、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澳门到了河内。从河内，他乘了两天火车通过北部湾平原上了海拔6400英尺的云贵高原，并于12月7日抵达昆明。昆明以“天涯海角的屋檐”著称，是中国朝向西方的最后一个前哨基地。斯诺在那里拟定了计划，要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西方人之一，跋山涉水去“上缅甸”，这个想法他在读马可·波罗的游记时学到的。

驻当地的美国领事哈里·史蒂文斯劝阻斯诺，不要徒步400英里穿行这个盗匪出没的地区，但是斯诺不听。他到达的第二天，和约瑟夫·F·罗克博士共进了午餐。这位在维也纳出生的博物学家和探险家，由于在云南的考察而赢得了世界性声誉。此时，他正经历着一次痛苦的抉择，美国的全国地理学会提出要他在这个地区进行一次植物考察，但他还没拿定主意。斯诺的计划似乎使他澄清了自己的想法。他决定组织一支旅行队并邀请斯诺同行，然而同时坚持把动身日期推迟到1月份，说那时山上会更安全。

斯诺尽管很不耐烦，但还是呆在史蒂文斯那所凌乱、寒冷的中国式房间里，度过了出发前的这段时光。这座城市充满了异国情调，北部湾人穿着棕色和白色的宽松的裤子，中国人的穿戴艳丽而俗气，西藏人则是邈邈遏遏的，虽然这些地方遭到的破坏是造反者所为，但人们的生活状况使人对国民党的治理能力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在去往昆明的途中，他所看到的国民党官员不是在改善社会而且在掠夺它。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广州，一个由国民党资助的当地报人透露说：“这里的所有官员都靠横征暴敛发了

财。”在昆明，营养不良的婴儿吮吸着涂裹着鸦片的甘蔗；奴隶的人数发展到了50万；不在此地居住的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而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民拥有自己的耕地。斯诺了解到半官办的个旧锡矿雇佣童工，多年来这里的主要采矿工程师一直是由一个美国人担任的，他很痛心。“40%（的矿工）在三四年后死于砷中毒”，他在给《亚洲》双月刊的编辑迪克·沃尔什的信中写道。

“几个月之后，他们的皮肤几乎变成了绿色，砷非常迅速地侵蚀了他们的躯体。而他们的年平均工资只有20美元左右。”

斯诺与罗克的关系也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好。罗克难得遇见一个他喜欢的人，只有在昆明的基督教会传道会医院院长J·A·沃森博士似乎是个例外，但罗克也从未与沃森一同旅行过，他的传记作者指出，大概是因为她那冷漠无情的气质。斯诺受到了罗克的纳西族随从人员的保护，他钦佩罗克对这个省里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株植物都了如指掌并愿意为当地人治病。但是，他厌恶这位博物学家携带的豪华的用具，包括折叠式洗澡桶和豪华的餐具，他也不怎么欣赏罗克的谨慎。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斯诺曾提到在路上使用氰化钾消毒他要吃的果物。罗克在日记中写道：斯诺“还会毒死他自己。”他断定，这个记者是“一个粗野的美国青年，缺乏经验而且据说名声很坏……他带着他自己的无知，他那个州的美国人的无知和一般的无知。”

罗克得了热病，便雇了几个四川苦力抬着自己，这使斯诺感到极为烦恼。而当斯诺的身上突然发出了一片莫名其妙的疹子时，罗克只不过说了句：“但愿它不传染。”他们在一个乡村的破庙里过夜时，发现墙上刻着：“约瑟夫·F·罗克，你会再来这里吗？不，决不。1930年1月28日。”斯诺划掉“不，决不”，然后写上“会的，会再来。1931年2月7日。”罗克在日记中写道：“我决不会再要任何人与我同行。”

从昆明出发大约两周后，考察队抵达大理，斯诺和罗克便接

照预定计划分了手。斯诺带着自己的小骡马队，一名伙夫和赶骡人，加入了另一支去往缅甸的有很强自卫能力的商队。两周后，他走到了涟漪闪光的伊洛氏底江边，他胡子拉碴的，被骡子踢伤了膝盖的那条腿还肿着。很快他又因患疟疾而病倒了。

斯诺住在一位英国地方官员家里养病，护理他的是一个叫芭塔拉的缅甸姑娘，后来斯诺再次因患疟疾而病倒在仰光时，她又出现了。斯诺在发给纽约《太阳报》的一则电讯中，形容她是一个苗条、纤弱的姑娘，17岁，“黑色的眼睛中闪动着撩人的欢快”，漆黑的头发在夜色里闪着光。有一个月时间，斯诺和她沿着长满竹子伊洛氏底江边散步，听她唱民歌，由她陪着度过当地的节日，去剧场和寺庙。休养过后，斯诺继续前往印度。在干旱的开伯尔山口和翠绿的神里兰卡之间的辽阔大地上，他游历了4个月。

斯诺把自己的大部分冒险经历都写入了报道材料。他象哈利伯顿一样，似乎也发现了在他所到之处，都有一种非常精彩的体验。一个到德里城堡的庭院里参观的人，使他感到“进入一个幻想和浪漫的地方那种不可思议的欣喜。”他的这类报道都很成功，比如，他详细叙述了在云南，那个傣村妇女是如何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

与此同时，旅行也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斯诺看到社会的大动荡正孕育着新的政治局面。在台湾，他险些丧生于中部山区的土著造反之中，他注意到自1895年日本人打败中国后接管这个岛使当地文化发生了几乎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河内，他意外地目睹了熟悉的情景，旅馆里的法国管理员训斥越南服务员，火车上的西方列车员因当地乘客出示车票太慢而打他们的耳光。斯诺对当时共产党鼓动的造反所做的报道是简短的，根据第二手材料写成的。使斯诺感到困惑的，不仅是法国人的严厉的报复，而且是他所接触到的越南人：“当你走得离他们太近时，他们便绷着脸避开，他们害怕。他们没有志气。”斯诺的同情是在那些反叛者一

边。萨雅山（1930—1932年缅甸咖咙会起义领袖。——译注）领导缅甸无地农民起义时，斯诺是唯一的在现场采访的美国人，他也唤起了斯诺的同情。萨雅山的起义是“一次土地运动”。在一则电讯中，斯诺正确地预见到，英国人由于有受过正规训练和良好装备的军队，最终将会把起义镇压下去并打死萨雅山。而后，这个造反者将成为烈士，“再次的不满将激起缅甸人对统治者的憎恨，可以看出，他们对中东地区的统治已经使人们越来越不堪忍受了。”

印度使斯诺有机会接近那些敢于向帝国主义统治挑战的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无党派新闻记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上海时是《密勒氏评论报》社的常客，她早已给斯诺写了封找尼赫鲁的介绍信。在孟买，斯诺一出示这封信，就立即感受到了印度的求实的理想主义。他对甘地没有什么热情，在那年凉爽的夏天，他曾在西姆拉的首府见到甘地。他在给姐姐米尔德丽德的信中写道，甘地是“一个相当令人讨厌的人”。这位自我克制的领袖正在为结束1930年的不合作运动而进行谈判。甘地所倡导的节制性欲、非暴力方式和贫困，与斯诺的信仰和实际行动直接抵触。斯诺也担心这位圣雄联合人们对英国纺织品所进行的抵制，为日本人的布匹开辟了印度市场。“奇怪的是，”他在一篇新闻报道中写道，甘地“似乎还相信用手摇纺车取代机器是可能的”。一次，当斯诺在行进中的采访时向甘地表示了的这些疑虑后，这位印度领袖劝告他“多研究一点”。

斯诺报道了在密拉特对31名同谋者的审判，他们被指控为组织纺织工人的“战斗劳动运动”。被告中除3人外都是共产党员。在审判中，他们“为自己进行了才华横溢和吸引人的辩护”，每个人都描述了“共产主义某个特殊阶段的大量细节”。

“如果把审判开始以来报纸上的报道翻回来再读一遍”，斯诺在报道中写道，“那将是一次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的教育，

也是一次列宁和他的伙伴以及他们的接班人们把它运用于革命实践的教育”。

萨洛吉妮·奈都是一位女社会活动家，也是甘地的亲密追随者。通过萨洛吉妮的介绍，斯诺认识了她的共产党员妹妹苏哈西妮，斯诺认为苏哈西妮是自己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苏哈西妮带着乔装打扮的斯诺进入了工厂区，斯诺在那里看到了工人和他们家庭的悲惨状况。

萨洛吉妮和苏哈西妮是哈多巴迪雅家庭的成员，“我所知道的最有趣的家庭”，斯诺在报道中写道。这个家庭里的一名激进成员与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德国自由结婚，另一个妹妹是个印度艺术方面的权威，可还有一个姐姐是个老处女，开办了这个国家中第一所蒙台梭利（Montessori, Maria, 1870—1952年，意大利女教育家，采用让儿童自由发展的教育法。——译注）式的学校。斯诺对这四位妇女的喜爱，反映了他对印度的厌恶。斯诺一贯赞美那些开化的妇女。他在一篇赞颂她们的文章中曾写道，这些女士，为其他印度人树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榜样。“处于半奴隶地位的数百万印度妇女，是她们自己的宗教信仰、陈旧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牺牲品。她们因此愚昧、无知，并信奉一种哲学，它建立在一种从根本上使人堕落的迷信之上——今生遭受的苦难是前世的恶果。——应该唤醒她们，使她们认识到，在别人眼里，她们的生命是无足轻重的，应该让她们看到，解放是可能的”。

虽然斯诺开始自愿地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他既不接受共产主义的解释，也不接受甘地主义。苏哈西妮把他称为“冰山先生”，因为他屈从于她那热情的政治信念。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商业剥削的本质的揭示，为斯诺提供了这方面的新词汇。他在印度和在其它地方的游历中所见到的贫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感到立即进行变革是必须的和可能的。他反复考虑了中国和为释放那里的民族的活力所需要采取的

步骤。

在西姆拉遇见斯诺的新闻记者威廉·夏勤，觉察到中国已经引起了这个年轻的密苏里人的兴趣。印度自有它的美妙，但是，斯诺告诉他的父亲，“我没有发现我所见到的印度人（有几个除外），象身材矮小的日本人、中国人甚至越南人那样有吸引力”。

斯诺原打算继续旅行；从印度去欧洲和美国，但后来又改变了想法。因为他的钱花光了而且担心回到纽约后“我必须几乎立刻得找到一份工作”，所以，他告诉报联社的编辑们，他想要回到中国。然而，没有回音。于是，他假设他们同意了，便登上日轮斯妻部丸，经海路返回中国。

当这艘轮船朝着东亚破浪前进的时候，斯诺并没有放弃他对冒险的喜爱。“我爱上了巴厘人，和大家一样，”他在给汤的信中写道。“那里有世界的其它地方已经失去了或根本不知道的生活的奥秘和笑声”。

轮船停靠在新加坡港，斯诺在甲板上走过来走过去，他清楚地回想起自从三年前他偷乘西尼奥丸以来，已经出来多远了。

日本船长走了过来，满脸厌恶地打量着他。

“你是埃德加·斯诺先生吗？”他问道。

“是的，我就是，”斯诺回答着，还打算朝前走。

“啊，斯诺先生——你买票了吗？”

“哦，当然了。”

“斯诺先生，请让我看看好吗？”

斯诺不耐烦地掏出了船票。船长从容不迫地察看了斯诺的船票。他把票递还给斯诺时，若有所思地说：“斯诺先生，我曾是船长——西尼奥丸的！”

中国通们喜欢在俱乐部里端着威士忌酒讲述这种故事。斯诺准备加入最前列的时候，已经把自己躲在船舱里偷渡的那些日子丢在脑后了。

第二章 第二次行动

1928年，斯诺离开纽约时，寻求的是无忧无虑的冒险，别无其他。“你会说我删掉‘肮脏的细节’而描绘出一幅半真半假的画面，”几天的旅行后，斯诺告诉霍华德。“的确，是有许多不愉快，但为什么要提这些呢？如果愉快的感觉紧随痛苦而来，那么痛苦也就易于忘却了。”

1931年，斯诺从印度回到上海时，他的观点变了。他依旧想自由自在，依旧喜欢冒险。他计划完成《云南》这部描写他从云南到缅甸长途跋涉旅行纪录片；而不愿回到大萧条和生活费用较高的故乡，被迫“出售广告或耍些类似的愚蠢花招，却没有时间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是他告诉汤的。他越与世俗的观念相悖，中国对他的吸引力就越大。在即将来临的动乱岁月中，这个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为持续的政治、社会及经济专制及混乱折磨的国家愈来愈深地吸引着斯诺。

“我痛恨的当然是这个国家的污垢、人民的绝望、显而易见的贫困、灾难、疾病及随处可见的不平等，”回到中国后，斯诺告诉霍华德。“这些虽然令人愤怒，但却比在美国大家都寻求同样的生活真切得多，甚至能更深刻地激发人性。”

1931年8月，斯诺回到上海时极不高兴。人们没有忘记他为《美国信使》月刊写的文章。天气闷热难忍。他马上病倒了，高

烧40℃。医生认为是疟疾。斯诺三天卧床不起。这场病刚过，他又生了疟子和一阵思乡病。“我已在东方呆了一年多了，”斯诺告诉汤：“也可能没那么长。但我不能再呆下去了。”

斯诺离开中国去南亚旅行后，国民党人没什么新的进展。他们能牢牢控制住的，只有江苏和浙江两省。至于其他地方，蒋介石所能做的，只是与地方军阀结成松散的联盟，即使仅仅结成联盟，他也要使用打、收买或二者兼用的方式才能做到。在邻近的江西，共产党人组织了苏维埃，迫使蒋介石在1931年6月把其精锐部队投入第三次“围剿”。这时，改革仍是个遥远的梦想。有时间的地方官员为自己的利益经营低息借贷，并按传统的高利息将钱贷给农民。看起来，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效率要比大胆的地方官僚低得多。

在上海的马路上，斯诺遇到了一个年轻的中国熟人。1928年，他们初次见面时，这个年轻人即将成为一个国民党部长的秘书。那时，他热情地感到“中国终于启程了”。而现在，他已成为一个银行职员。国民党政府3个月没给他发薪水了。他告诉斯诺：“他们就是让我当部长，我也无法支付住在南京的开销。”

长江的水位猛涨到了历史最高点，使200万人丧生，2500万人无家可归。这时，斯诺刚刚卸下行装。他乘一条小船沿着汹涌的江水向上游驶去，小船费力地通过了淹没的村庄，他看到中国人紧紧抓住漂在水面上的东西。仅在扬州的一天里，他就看见12艘帆船驶入港口，甲板上装着4000口棺材。斯诺赞扬“头脑敏锐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高效地管理着“全国治水委员会”。对整个政府，他没什么好话可说，他认为这个政府花在内部争吵的时间比组织抢救的时间还多。他在一篇有关水灾的文章中提到，犹豫不决和浪费精力是典型的“军阀统治，其冷酷、专制和破坏性的无能在当代是首屈一指的。”

9月18日，斯诺从长江旅行回到上海的当天，国民党的统治

受到了第二次考验。南满铁路上有一颗小型炸弹爆炸了。日本人宣称要采取自卫措施，侵占了中国的沈阳并在24小时内控制了几乎整个关东半岛。其行动的速度和效果提醒了斯诺和其他西方观察家，这是日本人策划的控制满洲的借口。

日本人迅速进军满洲。虽然蒋介石并不想抵抗，但驻守齐齐哈尔的中国将领马占山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斯诺、鲍威尔及许多其他报社的记者前往报道这一进展神速的事件而到达齐齐哈尔时，战斗已经结束了。马占山和他的粮草匮乏、装备简陋的部队已在西伯利亚边境上全军覆没了。中国士兵被撕碎、冻僵了的尸体遍布城郊，其中有些已让野狗和狼吃掉一半了。

斯诺在沈阳采访了新上任的中国地方官。这个前清官员对他的新职务感到有些为难。他承认，日本人违背他的意愿把他放在了位置上。他还说，由于没有中文译本，因而他还未批准财政预算。据此，斯诺写出了一篇很好的报道。12月，他回到上海时认定，这仅仅是日本利用代理人控制中国的策略的开始。

“那种认为满洲存在着一个政府的想法或许不应当再存在下去了，”他私下评论这个已被推翻的中国政权时说：“但仍旧存在一个伦理学上的难题：难道仅仅由于一个民族无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其他民族就有权接管其土地、财产和政府吗？”

日本人正在北方强化其统治时，中国南方的平民却出人意料地独自采取了行动。他们抵制日货，拒绝为日本雇主做工，上海的60家工厂因此而关闭了。上海中国银行家协会还使日本人无法清理商贸业务。

1月18日发生了流血事件。5个日本和尚在上海公共租界北面由中国管辖的闸北区内闲逛，随后发生了骚乱。虽然确切的起因仍有争议，但其中一个和尚死了。这次骚乱为日本人提供了再次行动的借口。这次，日本人提出了最后通牒，其中要求逮捕被控袭击和尚的中国人，解散所有抗日组织并停止抵制日货。

国民党苦苦思索了一个多星期才做出决定。街上开始象个兵营了，所有上街的人都明白，日本人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了。斯诺准确地预见到，即使完全接受最后通牒，中国人也免不了遭受进攻。1月28日，最后通牒截止时间前4小时，中国官员通知日本人，他们接受全部条件。日本海军上将盐泽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中国军队必须在午夜前全部撤离闸北。这个信息11时30分才传达到市长，而此时日本军队已经开进了各个攻击地点。

斯诺得到消息后立即向闸北火车站赶去，这时刚过11点。他警告那个毫无准备的车站运输经理，日本军队正在途中，并建议他疏散正在候车的中国人。在归途中，斯诺遇到了日本军队，并看着被日本人子弹射中的第一个中国士兵倒下。斯诺那篇登在《芝加哥每日新闻》和纽约《太阳报》头版通栏的专电，是有关这场战斗的第一篇稿件。编辑改动了他那惊人的导语——“上海街道今夜被血染红”，并祝贺他抢先发了新闻。

当晚，斯诺彻夜不眠地工作。第二天中午，他目睹了日本人以平民为目标的空袭。这是30年代第一次这样的轰炸。这天晚上，斯诺从还在燃烧的城市报道，“鲜红的火柱冲破无月、无星的夜空，在狂乱和死亡之中摇曳着可怕的光”。

中国的蔡廷锴将军保证，不“放弃每一寸领土。”他的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日本人感到震惊。在将近5周的时间里，斯诺一直呆在战斗的中心。他在战场上穿梭，接连不断地写出头版报道。日本人在真如投下600磅炸弹后，他是第一个到那里的外国人。为了确认中国人是放弃了阵地还是仍在固守，他不顾日本飞机仍在头上盘旋，在留有25英尺宽弹坑的战场上寻找通过的路线。采访蔡将军回来的路上，他在黑暗中走了3个小时，两次被捕。他还在日方阵地的一块墓碑后面蹲了一小时，一个中国狙击手在他帽子上打了个洞。“我将中国人的自卫看成是英雄式的，”斯诺早期就这样报道，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同情。

斯诺一般做不了什么能帮助中国人的事。在一次采访时，斯诺无能为力地看着日本人把成群的中国老百姓从家中赶到已放火燃烧的竹林中，然后向从火光中惊慌地奔跑出来的人射击。比较成功的一次是，在一次轰炸后，他救出了一位在燃烧着的废墟中跌跌撞撞的小姑娘。小姑娘的父亲是个铁路工人，已经遇难。斯诺越过战线后方的路障把她带出来，还为她找到一个家，“就是一个家住虹桥的中国人，我从大房子里抢救出了他的财物。”上海北站的运输经理受到提拔，还得到奖金。正是由于他听了斯诺的劝告，在日本人开始袭击闸北前疏散了人员和站上的货物，他得到一枚奖章。他宴请了斯诺。

月底，日本人最终宣告胜利。斯诺外出调查复仇的日本兵巡逻经过所造成的破坏。他停下来帮助受难者，其中有位年轻姑娘，她的腿和手都炸开了。“我真看够了，”斯诺说，“我的脑海中不断地交替出现恐怖与大屠杀的景象……。我想着许许多多普通的、无辜的百姓的痛苦、损失和死亡，想着几乎未进行警告就开始的大屠杀。”

3月初，日本人宣告在满洲成立一个新国家，他们称之为满洲国。他们把前清的统治者溥仪放到首领的位置上。一年以后，当国际联盟的利顿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人侵略满洲时，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为表示抗议，他们还控制了热河省（其南部边界距北京不到50英里）。

英勇的中国人反抗着装备精良得多，而且训练有素的日本人，这一事实使斯诺对未来产生了一线希望。自从1928年来到中国后，他就在寻找证据，试图说明中国人能够处理自己的问题，但毫无结果。在上海的战斗中，他看到“一些在西方可以理解为爱国主义的东西”。商人捐献了物资、食品和衣物。中国童子军在传递消息。中国指挥官蔡将军的举止吸引着斯诺。他衣着简朴，谈吐直率有力。这一切使斯诺比过去更加确信，中国的问题

是由其政治领导造成的，而不是人民。

战斗开始前不久，陈友仁向斯诺解释说，蒋介石不大注意公众舆论。陈友仁刚刚辞去国民党外交部长的职务。陈友仁以向记者发表杰出的演说而闻名。他告诉斯诺他是如何反对蒋介石对日本的要求作出让步的，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决定会破坏人民运动，而且“任何一个这样的政府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据陈友仁说，蒋介石的回答是，“讨厌的人民！我们通过他们的耳朵来指挥他们。他们要按我们说的做。”

战斗过后，斯诺同反国民党评论界的联系增多了。最重要的联系之一是与孙中山夫人。他第一次与孙夫人会见是经她同意在静安寺路的巧克力商店里。孙夫人以其美貌、热情和不好抛头露面而著称。在谈话过程中，斯诺就已初步组织好了采访的材料，后来，文章首次刊登在1932年10月的纽约《太阳报》上。第二年，他完成了一篇较长的报道，登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星期刊上。宋庆龄（她婚前的名字）成了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她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家族中的成员。她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蒋介石；另一个姐姐与国民党的常任行政院长孔祥熙结婚。财政部长宋子文是她的弟弟。孙夫人不顾家庭的反对而与比她年长30岁的孙博士结婚。孙博士去世后，她在批评处于国民党负责人地位的蒋介石时，表现了与孙先生在世时同样的独立性。

“在国民党统治下，税收已变成了掠夺，”她告诉斯诺。“学校数量减少，文盲实际上增多了。‘帝制’以来，教育已下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饥荒遍布，重建国家的工作简直还没有开始……。”

“如果孙博士还活着，他会否认自己与这个国民党有关系。他会宁愿看到它解散也不愿它的名字与封建军阀统治沾边……。6年已经过去，一个哪怕是简单的人权议案还没有产生，甚至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宪法。”虽然孙夫人不是共产党人，但她告诉斯

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

孙夫人按照斯诺喜欢的方式讲话，不久就赢得了一个忠实的崇拜者。斯诺说：“我从未遇到过一位象孙夫人这样能使人鼓舞并迅速让人信赖和感动的人。”

斯诺成了孙博士在法租界莫里哀路旧居的常客。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中外活跃人士聚集在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夫人周围（斯诺这样称呼孙夫人。）这些人中，有美国记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兰德尔·古尔德，中国作家鲁迅和林语堂以及杨铨（杏佛）博士。杨博士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并在孙夫人按照美国人民自由联盟模式组建的中国民权联盟中担任秘书。他公开批评国民党，并为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组织工作所感动，而后者也是斯诺愈来愈感兴趣的事。许多人相信，1933年杨在法租界被暗杀一事是蒋介石的部下干的。斯诺认为，这次谋杀是国民党暴政的又一明证。

从个人角度看，斯诺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在近处观察日本人在北方和上海的侵略行径，而二者均为重大国际新闻。在此过程中，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战地记者。1932年2月，伦敦《每日先驱报》聘请他为特约记者。他在不断建立一系列与中国的联系，因而比其他记者更胜一筹。

他把搞《云南》旅行纪录片的想法搁置一旁，而开始写一书记述他回到中国后所目睹的事件。就象让中国缠住了一样，这本书的写作迅速耗尽了他的精力。

霍华德为他这本书的出版找了一个代理人，亨里埃塔·赫兹。5月，斯诺刚刚写出几章，赫兹就要求他8月1日前完成全部书稿。虽然斯诺肯定地说过年底前他不可能写成一本好书，但当他得到报联社的准假后，便全力投入了写作。在他写作的这段时间，上海的气温一直高达38℃左右。空气湿度很大，在太阳底下放一碟水要3天才能蒸发掉。更使斯诺难受的是，房主决定对

公寓进行现代化装修，制造了整整一个月震耳欲聋的喧嚣声。7月19日，斯诺在他27岁生日那天完成了第一稿。

正如斯诺开始时曾向赫兹指出的，这本书的目的是陈述“战斗故事并将冲突中的人物戏剧化”。这本书也是斯诺理性进程的标志。

斯诺再也不受鲍威尔对国民党仍抱希望的看法的影响，他对蒋介石及其政党的幻想已全部破灭了。在这位最高统帅指挥之下，“统一中国的钟声仍在鸣响”。斯诺看到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的秘密法西斯小组”滋生出了什么样的机构。远不可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前景“看来比在国民党统治下更遥远了”。

如果说，斯诺已看出这个时期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实行军国主义的阶段”，那么他还不清楚以后将要或应当发生什么。他相信，一些国民党官员的确有意把掌管政府的权力从军方移交给人民。确已进行了一些改革。改进铁路和公路就是光辉的例证，于是斯诺继续为政府撰写游记。共产党人则是个大问号。孙夫人将她丈夫的政治生涯形容为“逐步左倾”。斯诺并不隐瞒自己热衷于了解共产党究竟怎么样。他将国民党早期的成就归功于与共产党人的联合。他把中国中部共产党人的活动描绘成“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群众运动之一”，只用长矛武装起来的农民成群结队地站在红军后面抵抗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进攻。不过，有关共产党的真实情况都很粗略，因而斯诺完全无法确认这场运动是否能团结整个民族：“到目前为止，它的表现说明其胜利可能意味着暴民统治的胜利。”

他在黑暗时期写信给姐姐米尔德丽德：“真令人沮丧，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斯诺对中国国内问题的解决不能肯定，但他对中国的外部困难，以及美国在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应起的积极作

用，已逐步形成了固定的看法。

斯诺受到奥斯瓦尔德·斯彭格勒的书中关于西方威信下降说法的影响，加上自己亲自观察到的情况，斯诺预感到日本的崛起标志着西方在亚洲统治的末日。东方正逐步认识到，西方并非不可战胜。斯诺没有为此而烦恼。不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使亚洲的民族主义和民主精神受到抑制，却使斯诺感到不安。与此同时，斯诺认为，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对满洲傀儡国家的不承认政策，维持了美国在亚洲半冷不热的地位，却没能阻止日本侵略的威慑力量。他注意到：“美国看来要同日本一道被推向战争了。”

斯诺用美国的理想主义看待这种窘困的场面。这种场面与世纪之交密勒所持的乐观主义截然不同，他指望的是将商业作为先锋在中国传播美国的理想。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和印度所进行的殖民主义活动使斯诺确信，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急于获取利润的做法只能束缚广大工人和农民，使亚洲人丧失国家观念，而无法使他们看到美国民主原则的正确力量。他指出，“如果我们文明的真正基础使东方人失望，难道他们还能严肃地对待这些理想吗？”

斯诺认为，避免战争和解放中国的办法是：美国应按自由理想主义原则行事，挽回自己的过失。美国应当用“确凿的证据……加强日本温和派的力量”并以在亚洲提供道义上的指导的作法来补充史汀生的不承认政策。特别是，美国应当消除自己“在菲律宾的帝国主义者的冒险（往往成为失败的投资）”；那项政策“应作为杠杆来衡量其他大国并确保它们在东方采取类似的行动”。

斯诺意识到他自己“建立世界人类家庭谐调关系……”的理想主义方案“会被看作幻想而遭到拒绝”。实际上，没有几个美国人注意到《远东前线》，这本书经大量修改后于1933年10月出版。世纪公司在斯诺开始热心写作前曾表示过对这部书稿感兴趣，但最后还是拒绝了。在史密斯—哈斯公司所属的哈里森·史

密斯公司接受这本题词为“献给青年时代的朋友C·H·T（查尔斯·汉森·汤）”的书之前，赫兹曾与16家出版商联系过。这本书美国人只买了675本，斯诺除了提前支取的250美元外，没赚到什么钱。随后，该书出版了法文、英文和中文版。但到1935年年中，斯诺所得的钱还不足1 000美元。

这本书中采用的夸张的散文写法招来了斯诺记者伙伴们的窃笑。书中写道：子弹“喷出死光”，蒋介石“血腥镇压劳工运动”，“日本人的刺刀每日都愈来愈深地插入满洲的心窝”，“狠毒地射出子弹”，还有日本船舰“带着死亡和仇恨的信息到达”。他还把日本占领大连描写成“（日本人的）刀柄插入大陆”。书中还有，“试图为在满洲的扩张建立强大的基地”是“最近竞赛先驱者的护身符”。关于斯诺的写作风格，《星期六文学评论》的评论家指出，《远东前线》“读起来就象《时代》在响闹钟”。

《远东前线》虽然有些夸张，但日后斯诺成为一个知名作家的天才已初见端倪。象其他现代记者一样（尤其是文森特·希恩，他的《个人史》1934年成了畅销书）；斯诺自己也出现在书中，使读者感到身临其境而不是在远处观望。如果说斯诺对自己的长篇报道过分沾沾自喜，那么他至少已将评论家卷入到他的激情中了。他们最宽容地评论道：“显而易见，作者……将自己的同情抛向中国，正如世界上大多人所做的那样”，一位有代表性的评论家说。“不管怎么说，这本书从头至尾都很吸引人”。

尽管斯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形成美国早期政策的扩张主义思想相悖，但这并未使他的大多数美国人感到恐慌。30年代，一般美国人都得出了与斯诺相同的结论，虽然原因可能是不同的。大萧条给国家带来了信念危机。不仅在中国市场的炫耀，实际上只是一种错觉，就连美国经济体制本身看来也有缺陷。正当斯诺怀疑资本主义是否真的需要殖民地时（通过他的观察），美

国人看到自己过热的经济正迅速化为灰烬。不仅国内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要有某种集体经济计划，美国商业部在其1931年的一个报告中也承认，美国人“正处于一个国民经济作为控制因素必须整顿的时期”，当然他们认为，大企业有责任策划这种变化。同年，《巴尔的摩太阳报》的社论作者杰拉尔德·约翰逊指出：“有相当资财的美国人（指年收入在2 500美元至25 000美元范围内的许多家庭）并未认真对待对资本主义的怀疑，但他们已形成了一种新的和明确的批判态度，用来对待在本国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某些细节。”

美国人为解决自己的困难耗尽了精力，因而不反对放弃菲律宾。国会正在考虑让菲律宾人长期独立的请求。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是否从这些岛屿上撤出，而是何时撤出。“我要的是亚洲人的亚洲和美国人的美国，”在辩论的最后一天，国会议员休伊·朗说。他的观点代表了一些选民的意见，他们希望止住免税的菲律宾糖、干椰肉、油源源不断地流入疲软的美国市场。一位记者指出，促使菲律宾人自由的真正动力，不是“菲律宾人渴望脱离美国，而是美国要摆脱菲律宾的渴望”。

同样，正如对《远东前线》的多数评论指出的，斯诺对中国人的广泛同情并未使美国人忧虑。他们也持类似看法。有几年，缺乏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但经过这一时期，日本人的侵略已把中国人摆到了报纸的头版位置上。赫斯特及其他出版商急于要他们的记者采写生动的战斗故事。一个记者指出，关于受害的中国人的新闻带起“一股同情中国的、感情用事的风气”。当然，行动起来去帮助中国人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过，斯诺所倡导的，正如他承认的那样，很容易看出完全是史汀生主义的空谈。而史汀生主义则不是胡佛时期提倡的最流行的外交政策。

这些相似之处掩盖了斯诺与美国人的真正分歧。通过排队领取救济品的穷人队伍，美国人学会了怀疑纯粹的资本主义。同许多

中国革命者一样，斯诺则是通过西方人的通商口岸学到这一点的。他的怀疑可能是永久性的。此外，美国撤出远东，对他来说是一种与自身相关的举动，而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则只是一种使自己与亚洲的难题拉开距离的方法。

《堪萨斯城明星报》的一位编辑直率地指出了美国人盛行的态度：“日本显然是利用西方大国正全神贯注于处理内部事务的时机来紧扼住中国的脖子……。世界其他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抗议，并且相信也许能够在中国的混乱中建立秩序。”

这种消极的做法只能向斯诺证明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西方国家发现，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比奉行保护中国主权的政策要容易些。“我想，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其中当然也包括美国）的外交政策，至少在最近十年内其主流将是反动的，”斯诺在给他父亲的信中，用这样的话来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加深了认识。不过，他补充道，美国和亚洲一样，都在发生变化。“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结成一体，与我们的广大群众相对抗，他们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人数正迅速增加。”最终结局可能各地不尽相同，但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了。

斯诺的辩解虽然比史汀生主义的词句现实，但这些主张依旧是天真的。斯诺的言论也有实用性，不过自顾不暇的美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斯诺是意识到世界各国将与日本交战的许多美国作家之一。5年后，记者约翰·根室在一篇保守的评论中指出，《远东前线》“并未得到应有的广泛承认”。

《远东前线》出版时，斯诺的生活已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他结了婚并且住在北京。

1931年，斯诺从印度回到上海前后，海伦·福斯特乘U·S·S·林肯号到达上海。即使在这个充满舶来品的港口城市，佩格（人们这样称呼她）也是出众的。她身材健美，有一双蓝眼睛，而且只有23岁，格外引人注目。在她的好奇心和很强的个性

背后，蕴藏着惊人的活力。她后来追忆道：“我在完全恰如其分的教育中长大。我接受的教育中没什么错误的东西，因为它们很实用。我爱学校。我爱每一堂课。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应当读书；我是老师的宠儿同时又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学生。二者兼得着实不易。”

她到上海时，斯诺正过着舒适的单身汉生活。他在静安寺路有一套两居室房子。上海的社交活动总是很活跃。他活得自由自在，值得珍惜。但他也不总是高兴的。他告诉姐姐：“有时我闷闷不乐而且为一点小病感到烦恼，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将部分原因归咎于中国的斗争，部分归于与其姐姐、哥哥的生活相比产生的孤独感。米尔德丽德结婚了。霍华德也要结婚的消息使他情绪低落了“很多天”，虽然不久他就给新娘发去了热情的贺信，欢迎她成为他们大家庭中的一员。

佩格强烈的女性特点吸引着斯诺，就象一块磁铁那样使斯诺着迷。佩格给了他生活中所缺乏的亲密友爱。她对时事、政治理论以及变化着的世界所流露出的见解，与斯诺不断加深地卷入中国问题的行为产生了共鸣。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佩格到上海那天。佩格通过在犹他州做律师的父亲，在美国领事馆作了职员，但她真正的抱负是成为一名作家。来中国前，她就读过斯诺的新闻报道并打算一上岸就要见他。西方人仍在为斯诺在《美国信使》月刊上发表的文章而感到痛心，因而警告她离他远点。他们一见面，佩格就指出，她并不想为结婚而放弃自由。不过，几周后斯诺就因鼻窦炎病倒了。他在写给家里的信中提到，佩格是他病中的安慰。1932年夏天，斯诺就已在描述他们一同到郊外的短途旅行了。佩格想起个笔名，斯诺提议用“尼姆·威尔士”。这个名字是希腊语“姓名”和佩格的威尔士祖先的组合物。此后，佩格一直使用着这个笔名。12月，《远东前线》的大部分工作看来已完成了，斯诺携佩

格沿着寒冷的上海外滩散步时，他提出立刻结婚。这样他们就可以搬到北京，并有时间一道寻求写作的乐趣。

婚礼很快就举行了，并且没有声张。在佩格的坚持下，斯诺买了一套哈利斯牌花呢衣服，替换他在印度买的那套不合身的淡紫色细条西装。他们只通知了很少几个朋友，其中包括孙夫人。她送给他们一个电热咖啡壶并为他们举行了广东菜晚宴。佩格坚持婚礼要在圣诞节中午在东京举行。只剩下不到一周了，他们通知了斯诺在上海的老同屋约翰·阿利森，他现在在美国国务院驻日本外事处工作。他作了安排，办理了日本复杂的登记手续。尽管他正他休假，还是为他们找到了主婚人。不过，佩格也没让她未来的丈夫赶上从神户到东京的火车。他们赶到大使馆时只剩下两分钟了。

在蜜月里，这对新人到了台湾、巴厘、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各沿海港口。2月，他们到了北京并在城中心的一间小屋里安顿下来。斯诺告诉汤：“我并不确知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的，也闹不清她穿了什么衣裙第一次迷住了我的双眼，不过，这是生活中的另一种机会，让人感到福星高照，感到跨越了许多细小的障碍之后，生活显得绝妙动人。这一切确实都发生了。我们现在都异常快乐。”

虽然北京显得更适于进行闲散的思索而不是干其他事情，但它还是为斯诺的精力提供了理想的去处。那时，北京的鸡尾酒会上到处流传着一个笑话。这笑话讲的是一个已移居到上海的社交界的西方人士，他提高了两个城市的社交档次。这种比较的背后隐藏着的情是，上海是淘金者的乐园，而北京有许多古玩店和古老宁静的皇家庭院，可让人达到充实的崇高境界。

聚居在北京周围的近千名西方人士大多从事非赢利的专业性工作，诸如教育、艺术、外交和新闻。在那些没完没了的聚会上，客人们能一面嚼着用做餐前小吃的干莲藕，一面有机会听德

国出生的魏特夫编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能与瑞典探险家斯文·海丁聊天，1933年时他正为一这丝绸之路探险队制定详细计划；还会遇到太平洋学会的中国佛教学者费正清和欧文·拉铁摩尔；可以同正在写《莫托先生》的J·P·马昆德讨论文学或与谢伟思交谈，后者是来北京接受中国语言培训的美国国务院外事处许多年轻官员之一。美国外交官柯乐博每星期六都举办午餐讨论，斯诺每次必到。L·C·阿林顿可能是当地最可敬的汉学家了，他每星期日下午都与斯诺交谈。瘦高的法国耶稣会会员、古生物学家泰亚尔·德·夏尔丹来访，与斯诺讨论哲学和法西斯主义。由于勇敢地在天主教神学中使用进化概念，他受到教会的敌视。休息时，斯诺夫妇骑马，去美国公使馆游泳，他们在上海时的朋友埃文斯·卡尔森现在在那里任海军官员。有时，他们也去郊区黄褐色的西山野餐，他们的一个朋友在那里租了一座寺庙。

斯诺夫妇在北京住了近5年，曾在3个地方安家。两个在城里，一个在城外靠近燕京大学，能俯瞰颐和园。房租和食物每月只需35美元，佣人、厨师、园丁和一个包租人力车夫也只要稍多一点钱。

斯诺不断计划着回家过一、两个月。他虽然抱怨工作实在太紧张，但由于新闻汇集速度相对缓慢，生活安逸，因而他有足够的自由去写自己感兴趣的长文章。对这种自由的真正威胁来自报联社，它被迫在大萧条压力下进行削减。1933年4月，新闻部削减了他的工资，年底又完全终止了与他的联系。随后的几个月，斯诺不断写信给《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及其他美国报刊，询问是否能聘用他当记者。这些信虽然没有任何回音，但不知怎的好运总是光顾，使他能保持住桌上的食物和自己的独立性。

最值得一提的幸运之幕是由美联社导演的，它让斯诺主持北京的办事处。斯诺并不想干这工作，因为这样就把他拴住了。可

是；他又需要钱。于是，他决定由命运来作出决断。他将一部分积蓄拿到跑马场的两次赛马中去赌，结果奇迹般地赢了近千美元。这样，他就没有接受那份工作。使斯诺振奋的另一件事是，《星期六晚邮刊》摘登了《远东前线》中的一篇文章；并付给他750美元。该刊还建议他继续供稿。再加上纽约《太阳报》的每周一栏及伦敦《每日先驱报》不时刊登他的新闻稿的收入，他算计着可以用这些维持生活了。

中国给予斯诺的教育，不仅仅是在政治与经济的现实世界中当一名记者，而且让他有时间沉迷在自己闲散的阅读习惯中。在北京期间，他在思想家如埃默森和弗洛伊德的书中流连忘返。他订阅了英国新左翼书刊俱乐部的书，他特别喜欢肖伯纳的书。他和佩格在一起互相诵读着肖伯纳的《知识女性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指南》。蜜月期间，他们还去看过作者，当时他的船停在香港港口。肖伯纳对香港大学的一位听众说：“如果现在你20岁时是个共产主义者，那么到了40岁时，你就可能是在世界各地都能生存的人。”斯诺听了觉得很有趣。不过，这种观点使英国人大发雷霆。斯诺逐渐对左派思想家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和反感。这在30年代是很普遍的。法西斯主义对斯诺和其他在北京的人有直接的重要影响，他们害怕蒋介石可能会真的会参加轴心国联盟而不抗日。蒋介石似乎是个用法西斯警察战术来对付自己人民的老手。1934年晚些时候，当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邀请斯诺给教师们做一次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讲演时，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斯诺的讲演涉及从希特勒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特雷奇等许多作家。后者将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斯诺发现这一观点很有吸引力。他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是，包括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同时维护资本主义并不维护的一切：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不允许个人自由，“国有化资本主义或更确切地

说是资本主义化的国家”。相比之下，斯诺对理论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这种理论的最终目标具有一系列关于共产主义的民主。共产党人深信“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动力进程的一部分，是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前的一个必要的灾难。而法西斯主义者，根据他们的绝对国家理论，则认为一旦实现专政，他们就已达到了终极政治形式”。

斯诺的讲演颇为枯燥。虽然一些朋友，如华而不实的《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弗洛伊德·吉本斯等，曾给他指出过应如何将想法传达给活生生的听众，但斯诺不可救药，只会慢吞吞地讲话。而且，他一上讲台，就感到不舒服。这次关于法西斯的演讲比哪次都差。他用一种干巴巴的学术风格写出了这篇偏重理论的讲稿，而内容所涉及的又大多是欧洲的例子，他本人对此亦无亲身经历。斯诺的长处在于写出他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东西。

斯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兴趣是他能成功地将增进知识与积极关心中国事务结合起来的一个领域。与过去完全决裂的中国当地写作群体正在成长。这些作者一反过去为艺术而艺术，用文言写成只有精英人物才能理解的作品传统，改用口语写作，并对政治和社会情况发表尖锐的评论。斯诺把最主要的作家之一鲁迅，与俄国的高尔基和美国的马克·吐温相提并论，并指出，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鲁迅也抨击“中国社会的灾难，如压榨、行贿、高利贷、奴役儿童、自私、迷信‘儒教’、军阀对工农的剥削、压制言论、破坏民众组织、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以及在当代中国所观察到的其他现象”。

斯诺认为，“中国的小说和哲学，比用歪曲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所有外国人写出的无数材料都更有价值”。

还没有几部中国作品被译成英文。斯诺在快要结婚时，曾考虑过着手翻译一部短篇小说集。他度完蜜月途经上海时，在一次集会上曾与鲁迅、林语堂及其他作家会面，并受到了他们的鼓

励。于是，他在北京开始了这一工作。

在中国的第一年，斯诺只学会了很少一点儿中文。为准备进行翻译，他开始在一位穿长袍的中国讲师指导下用功地学起了中文。此人任教于美国国务院外事处官员的语言学校。斯诺很快就能写几百个汉字并能用汉语进行交谈了，虽然他的朋友们笑话他的汉语带有密苏里口音。他同能说两种语言的中国助手一起翻译短篇小说。开始是与一位上海作家合作，后来是一些学生。他们先尽量将小说用英文写出来。斯诺仔细品味每一句话，以求达到最好的文学翻译效果。斯诺指出：“肯定有人会对这感兴趣。不过，我更宁愿自己写三本书也不愿为这一本书做重复劳动。”

斯诺这本选集为英语世界提供了阅读中国作家作品的机会，但书稿一再被退回。直到1936年，英国乔治·G·哈拉普出版公司才同意出版此书。第二年，《亚洲》杂志的编辑迪克·沃尔什通过他自己的出版社约翰·戴，在美国出版了《活的中国》。这本书受到了极高的赞誉，使斯诺在对这感兴趣的美国人圈里的威望提高了，还为他赚了一小笔钱。

斯诺将该书献给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并写道：“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与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活的中国》也是斯诺成为国民党的反对派的标志。他的选集所收入的中国作者都是现政权的敌人。国民党人将其中许多人的作品列为禁书。蓝衣社监禁了丁玲和孙席珍。1932年，国民党处决了6位左翼作家，其中包括柔石。斯诺曾翻译过他的一篇讲一位奴隶式的母亲苦难生涯的故事。国民党的镇压只能使作家们进一步投向左翼。当以能正确地使用汉语而闻名的美国大使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赞扬《活的中国》时，斯诺回答，他在努力翻译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可能已经学得太多了，对某些国家来说，它们会再次仁慈地看待我。如果你不具有产生事物的某种感情，你就不能对象这样的一件事了解得非常深刻，而开始对

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有了感情，对一个‘外国记者’来说，则可能意味着一条毁灭的捷径。”

斯诺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在《密勒氏评论报》工作时，一个白俄告诉上海国际移民局政治处的负责人帕特·吉文斯，斯诺的真名可能是“拉维斯基”什么的，他还是第三国际的特务，并且用假护照旅行。吉文斯的档案复本有一份落到海军官员、斯诺的朋友埃文斯·卡尔森手中，并转给了斯诺。在被鲍威尔正式“踢出”《密勒氏评论报》的办公室前，那个白俄说，他就是冲着吉文斯的那种强烈反共思想才编造出这个故事来开玩笑的。

1931年，这份伪造的报告追随斯诺到了印度。这至少是对下述事实的最好解释：有一个印度侦探非要同斯诺乘一趟车从德里去加尔各答，还问了他很多问题。事后，这个印度人表示，斯诺并不象最初被怀疑的那样，是个带麻醉剂非法人境的走私犯以及共产国际的特务。然而，他在孟买又再次面临被指控。照顾斯诺的一位年轻的英国陆军军官说，地方警察负责人企图将斯诺驱逐出境或予以更重的判决。斯诺立即跑去见美国领事，后者答应澄清事实。

回到中国后，斯诺的档案材料在上海继续加厚。领导机构漫不经心地象50年代在美国“红色恐怖”时期的做法那样，只是暗指斯诺与激进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是朋友，他还从被怀疑为共产党特务的人那里接受文学作品。1933年，北京再次流传着有关他同情共产党的谣言。这一次，斯诺去找约翰逊大使，并将大使当成他的保护人。斯诺告诉大使，他同“孙夫人是朋友，而且与上海的中国年轻人团体中的几个人有友好交往。但这些人主要是进行自由主义思想宣传的”。他还同其他几个新闻工作者一道参加了孙夫人组织的民间自由组织。斯诺说明，他不是搞颠覆的激进分子，并且问约翰逊他该怎么办。

约翰逊在远东工作30年，已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行为准则。他认为，美国应当通过治外法权在其他方面帮助中国，而不应当由于积极参与中国内部事务而牺牲自己的行动自由。他在俄克拉何马度过了4年的童年时代，他认为这一问题与俄克拉何马州的边界问题的原则是一致的。斯诺过界了。约翰逊并不太同情斯诺，他有另一套哲理观念，即由道教归纳并书写在一幅卷轴条幅上，悬挂在他办公室内的一句名言：“无为而无不为”。他以此为出发点对斯诺提出忠告，并建议他干脆别理睬这些人身攻击。约翰逊在一次谈话记录中指出，“吉文斯先生所建的档案显然已经逐步建立起来了，这些如同报纸资料一样，已经很难改变了。”斯诺应当“用自己的行动和作品来证明其真伪”。

斯诺面临着的是个难题。他意识到，打上共产党人的烙印会破坏他在广大出版商中的信誉。尤其是，他刚刚开始定期给《星期六晚邮刊》投稿。他很重视在那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会连续几个小时一遍遍重写，还不停地拧着自己的卷发，抽着骆驼香烟，试图把关于中国的文章写得既有意思又易于理解，因为美国人很容易被大量的中国名字弄糊涂。不过，进行报道的全部意义还是在于报道本身。斯诺虽然担心自己的声誉，但他并不愿在报道国民党的越轨行为时约束自己。结果，他写出的故事成了他叛逆性格的明证。

《现代史料》月刊上的两篇文章表明了斯诺的一贯态度。在第一篇文章中，他从侧面描写了蒋介石，那是在他与约翰逊交谈后不久。斯诺指出，这个国民党领导人“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是真正的将军，在某些方面还是个平庸之辈……。他所持的传统保守主义态度因所获得的财富和权利而加强，从而使其社会与政治观点显得更加狭隘”。第二篇文章研究了国民党审查机关制造麻烦的模式。国民党人经常进行荒谬的详细审查来限制中国的出版界。一次，检查员删去了中国政府对中日双方在北方交战的

说明。外国记者也不能幸免。中国检查员插手稿件时，经常乱砍，根本不通知记者对文章做了哪些改动。30年代初，国民党人不喜欢《纽约时报》记者哈利特·阿本德的报道，他们禁止政府官员会见他，也不准他使用政府的电讯系统发稿。阿本德虽然可以在通商口岸使用外国控制的通讯装置，但在北京这样的内陆城市，发稿就成问题了。由于个人在审查机关遇到麻烦，又担心自己支持的左翼作家遭到攻击，他曾撰文列举出一长串卑劣行径：烧书、雇用特务埋伏在学校周围、禁止传播“借古讽今”之嫌的故事、对“蓝衣社”采取宽容政策。蓝衣社是秘密法西斯组织，创建的目的是反对共产主义并倡导蒋介石的政策。

刚刚在保守的全美制造商协会找到工作的霍华德来说，美国流传着自己弟弟正在成为“左翼分子”或“共产主义者”的闲话。斯诺立即回信，表示他既关心自己的声誉，又不愿做出让步。

“别对我讲这些让人心烦的事。你一定很清楚，这些憋气的事对我的工作绝无益处。如果人们认为我是共产党人，那在美国就很难找到哪个编辑出版我的东西了。我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我不是共产党，也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不管怎么说，我也不会想方设法用任何编纂好的经济或政治理论去解释事实，无论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列宁主义的、墨索里尼的或罗斯福的。我身上存在着最糟糕的不利因素是，我一向相信人权、平等机会这类东西，相信这些概念基础的彻底性，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我还相信一种观念上的不朽信念，即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在最广泛的社会意义上讲）不一定要与民主政体密切相联。看着休伊·朗严肃地走在通往白宫的路上，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同时，我相信下述可能性（虽然我也不知为什么自

己相信这种可能性），即我们美国人能够与这个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起初的理想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他们是那个时代非常先进的人物，他们所制订的生活与经济的相当先进的文明制度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把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到人民手中，这样做是为了最大的社会利益。如果这就叫叛国，那就请通知自由联盟（或无论这个组织叫什么）准备绞索吧。”

私下交谈时，斯诺一般是诚恳和愉快的，而且很少争吵。他不善于自夸，也不窥探别人的隐私。这些品德，再加上他不大重视时间，使佩格觉得他有点象中国人。但他的性格与其说能使他避免麻烦，不如说有助于他与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进行更密切的接触，其中包括他在燕京大学兼课时认识的一些政治上活跃的学生。

燕京大学位于北京城外5英里，是中国最大的基督教会办的大学。由于学费高昂，而且，如果学生负担不起昂贵的社交活动费用，就会丢面子，因而该大学吸引了中国有钱人家的子女。学生在校园里可以生活在梦境中，他们可以在湖边读书，还可以打网球。虽然深得人心的伦道夫·赛勒计算过，这里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有敏锐政治眼光的，佩格还是抱怨她丈夫的很多学生缺乏社会意识。不过，新闻学院还是吸引了一些关心政治的学生；因为这里的课程相对简单，学生有闲暇参加课外活动。

斯诺在新闻学院教授的第一门课是特写写作。这门课由中美两国教授合作教授。他们都在密苏里受教育而且受益于密苏里大学的财政资助。斯诺的第一堂课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告诉他们，他“到中国不是来教书，而是来学习的。按照他的观点，中国有很多东西可学”。不久以后，学生们就聚集在他家中，帮助他翻译文稿，借走满满一书包国民党禁书单上的书，还

谈论政治。

政治上活跃的学生和斯诺都耗费了大量精力研究在日本侵略和统帅下宁愿放弃领土而不愿抵抗和战斗的问题。1932年后，日本在满洲大量投资。斯诺去这些地区旅行，发现日本人“就象面粉厂里的象鼻虫大军一样人丁兴旺”。斯诺说，在日本军队的独裁统治下，中国政府日渐从舞台上消失了。在1935年的一次旅行后，斯诺在一篇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文章中预测：“满洲将很快在财政上控制中国，这不仅是想象，而是可能。”同年，日本人强迫国民党宣布长城以南地区为中立地带。他们的下一步，就该是要求这个地区成为脱离首都北京的自治区。

1935年晚些时候，一位家在满洲的新闻系学生、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张兆麟来看斯诺，并询问了有关宋哲元（负责北方地区的中国将军）要投降一事。斯诺说，一个提供消息的人刚刚确认了这类报道。张兆麟走到客厅大窗户前，凝视天井，不让别人看到他的眼泪。斯诺深受感动。张兆麟透露，他和其他学生要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使之抗日，斯诺和尼姆予以鼓励并答应帮助这些学生。

学生们虽然并未将自己的全部活动情况告诉斯诺夫妇，但机智地将他们当做宝贵的和诚心帮助他们的盟友。斯诺的家成了他们能安全聚会与交谈的几个西方人士的住宅之一。作为西方记者，斯诺还能通过新闻稿公布学生的要求；同时能为国内秘密联系提供良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们想征求宋庆龄对如何正确行动的意见，斯诺夫妇就用英文打字机将信件打下来并发送出去。过后，学生们又聚集到斯诺的家中读她的答复。她指出，不要担心国民党对政治活动的禁令，“你们应当表现出勇气并采取行动。”

日本人规定，中国要在12月10日前建立自治区。斯诺和妻子想，如果学生施加的压力，能迫使中国领导人拒绝投降；那么，日本人就可能放弃这一要求。斯诺将他对学生提出的忠告告诉一

一个朋友：“我强调……需要立即正面表明学生的意见。过去10天里，事件发展如此迅速，以致必须迅速行动，才能使群众意见对事态发生影响。我建议，在10日前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学生们也认为需要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因而得出了与斯诺相同的结论。12月8日那天，燕京大学派驻北京学联的代表王汝梅（即黄华。——译注）和一位经常与他在斯诺的会客室里会面的年轻人通知燕京的同学，计划已经拟就。第二天早晨，学生要上街提出九点声明，要求国民党全力抗日，并恢复民众的自由，使爱国的中国人能有机会说话。

那天晚上，斯诺帮助学生把口号翻译成英文。第二天早上7时许，他们已经准备好，八百名燕京和清华大学学生在寒冷的天气中列队向城内进发。他们沿途呼喊口号，还举着长条横幅标语。当这些学生川流不息地走过街道时，其他学生爬出校园的围墙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店员和苦力为他们鼓掌，并急忙跑出来抢一份传单。在一个交叉路口，斯诺看见一队示威者与一个国民党军官相遇。这个官员从自行车上下来，在与他周围的学生们拥抱时哭了。学生们也在流泪。在其他地方，日本宪兵在增援中国警察时，用皮带抽打示威者，还将他们的旗子撕成碎片。斯诺看到，学生们毫不畏缩地向前推进。上午11时，学生们将自己的要求递交给了蒋介石在北京的代表何应钦将军。然后，他们开始寻找被关在城外的其他示威队伍。接近使馆区时，学生人数已达2000人。消防队将水龙头对准了他们，在寒冷的冬天，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战术。撤退前，学生们已将水喷向了警察并割断了软管。

斯诺在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电讯稿中写道：“在这里，示威经常对抗议日本在中国北方建立殖民地，终止中国历史的爱国学生运动发生巨大的影响……。制止学生的计划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学生受到成功的鼓舞，第二天便上街罢课了，而且在筹备第二次示威。这次示威定于12月16日进行，参加者逾8,000人。官员们要控制这次抗议活动，他们告诉示威者应从西直门入城。学生到达那里时，发现城门紧闭。外国记者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斯诺的朋友，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麦克·费希尔回忆道：

“装备了毛瑟枪的宪兵，身着皮外套，头戴钢盔。还有上好刺刀的驻军，已将软管全部拉出的消防队。这是一场对峙。突然，一个身材矮小的姑娘从学生队伍的前面冲出来，径直冲向宪兵的刺刀和毛瑟枪。我们已经看到宪兵象打牲口一样打学生，弄得大家都喘不过气来。那位姑娘突然避开宪兵，扑倒在石板路上，然后乘机滚到城门下面。”

不等她打开城门，宪兵就截住了她并开始打她。斯诺与《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托·基恩急忙跑过去，希望他们的出现能使宪兵感到羞耻而住手。她的举动是示威中很多英雄行为之一，并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对迁就日本人的高潮。截至年底，全国32个城市（其中包括南京）中举行了65次示威游行。史沫特莱在从上海给佩格的信中写道：“北京的学生们点燃了席卷全国的烈火。”

外国记者汇集了示威的事迹并站在学生一边。鲍威尔到城里去为燕京新闻系的学生演讲，他看到了12月16日队伍行进的全部情况，并认为这是一次“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示威”。他谴责日本人（而不是国民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堪萨斯州恩波里亚来的美国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也在北京，在斯诺家吃晚饭时，他对学生们的要求表示赞许。

斯诺紧随游行队伍，用他的电影摄影机记录这一历史性事

件。事后，学生们继续在他家中聚会。他和他的妻子帮助了很多人。他们掩护了那个冲向城门的英雄姑娘。她叫陆瑾，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鼓励她离开北京去了上海。1936年初，警察逮捕并殴打了王汝梅。放出来后，他就藏在斯诺家里，睡在他们会客室的老式床上。南京政府撤销了斯诺的记者特别待遇达数月之久，但他还是能与地方电报局进行特别约定，将新闻稿发送出去。

“一二·九”运动（后来这样命名的）达到了其近期目的。抗议刚爆发，宋老将军就告诉土肥原，他不能抗拒公众的意见。以后几周，他继续避开日本人的纠缠。正如斯诺已经预料到的，日本人还未准备好使用武力，并召回了土肥原。然而，多数观察家认识到，日本人重新集结力量只是个时间问题。威廉·艾伦·怀特对斯诺说：“我们正在看第二幕的后半部分，而整个戏是个悲剧。”

这场运动也成了另一个戏剧性事件的重大转折点。

共产党后来将自己描绘成“一二·九”运动的鼓舞者。这种声明是夸张的。正如王汝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解释的，他和其他策划游行的学生当时都不是共产党员。他们确实与共产党有一定的接触，还听说过被包围在农村的红色领导人全力以赴地支持抗日。1936年初，王汝梅和其他决定继续反抗的人参加了共产党。正如国民党的在政治上不让步和镇压迫使许多中国作家奋起反抗一样，12月事件动员了学生活动分子反对这个政权。

斯诺已经对作家和学生都给予了支持，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他又付出了双倍的努力，为了自己能亲眼见见吸引这些爱国人士的政治力量。

第三章 红星照耀中国

威廉·詹姆斯注意到，确认一个人真实性格的最好方法，是找到一些特殊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事情，这些事情一旦来临，他就会感受最深，同时表现得极为主动和活跃。这时，会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说：“这就是真正的我。”对斯诺来说，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他遇见了戏剧性事件中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时候。只有在这时，他那种密苏里人常有的热衷于公众行动与民主的情感才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斯诺一直等待着中国出现这种情况。1936年，他发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

大约在写完《远东前线》的前后，斯诺开始认真考虑到红区旅行。1933年，出版商哈里森·史密斯致信斯诺，谈到图书销售不景气，他写道：“看来，这是唯一能赢得读者的关于中国的书恐怕只能是长篇小说了。但我坚信，某个作家很快会写出一本非小说类读物，我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不应当是你。具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就能冲破这一奇特的禁忌。”不久，史密斯——哈斯出版社就为斯诺1934年底出版一本“红色中国或其他题材”的书预付了750美元。

允许写“其他题材”，考虑颇为周密。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同写一本能畅销的关于中国的书一样，是个难题。1927年，共产党在上海被蒋介石清党的血泊所唤醒，但其后又不断遭受挫

折。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他们拼命维持与汉口国民党政府中左翼的联盟。最后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几个西方记者之一文森特·希恩写道：“1927年的几个月，汉口汇集、象征并燃起了世界革命的希望。”不过，军阀很愿意与蒋介石做交易，因而与主要军阀联盟本身就存在缺陷，再加上一些国民党盟友对联合的幻想破灭，因此，不久后共产党就在汉口遭到袭击。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顾问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城市中心萌发。依照这一前提，共产党将自己的武装力量转向长沙、南昌、汕头和广州。其所到之处均惨遭失败。到1927年末，共产党员的人数从5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5000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撤退，并从国民党占据的城市包围中躲到了农村，在那里幸存下来。

总共出现了十几个苏维埃政权，其中一个由张国焘领导，位于湖北、安徽、河南三省，另一个在遥远的北方陕西。邓小平接受的第一次党的主要任务，是在边远的南方省份广西，组织游击战。最大和最成功的苏维埃跨越湖南、江西两省边界，位于崎岖的井冈山上。1927年10月，毛泽东带着一支只有1000多人的溃败的队伍到达那里。13个月内，朱德将军和彭德怀将军带着自己的队伍与他汇合。这支壮大了的军队受到鼓舞，走下山岗，于1931年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有关共产党的“消息”使人迷惑，并常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描述。当共产党在汉口紧紧抓住其国民党左派盟友时，《字林西报》报道了“裸体”游行：“了解过去几个世纪间中国妇女端庄行为的人们不再要求更多的证据来说明苏俄共产主义的恶劣影响了。”1927年7月，联合破裂后，西方记者没有访问过支离破碎的中国苏维埃。显然，他们在自己的几个苏维埃之间的联系也很困难。记者们除了依靠二手材料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合众社1930年以传教士带来的消息为基础发的电讯稿。

这则电讯描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重新分配土地方案，而后者正是使共产党在较贫穷的人们中受欢迎的措施，因为“穷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有断断续续的消息说，毛病重或被他的同志们驱逐了。莫斯科被设想为指挥着中国共产党，其实他们与其他人一样，也对其知之甚少。1930年3月，共产国际的正式刊物《国际无产者电讯》公布了毛的讣告，说他死于结核病。

国民党对不时在上海街头冒出的呼喊“红色”口号事件迅速予以镇压。共产党员的小组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过后仍保证不了参加者的安全。1931年，西方巡捕在公共租界的一次集会上逮捕了36个人并将他们移交给国民党，但后者并未报道处决了其中23人的事。国民党禁止发行不同政见的出版物，并用自己的宣传机器将共产党描述为“赤匪”、杀害婴儿及完全没有思想感情的人。对于少数想方设法关注这些事的西方人来说，这种描绘往往变得十分顺耳。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能在中国生存是难以置信的。正如一位观察家说的：“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感情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为淡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纳撒尼尔·佩弗和《纽约时报》记者哈利特·阿本德这样写“所谓的”共产党人。

虽然蒋介石每次都把他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描绘为是胜利的，但这些军事围剿本身却对他的反共宣传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1930年至1933年间，这位最高统帅曾4次把军队开进江西企图剿灭共产党。但4次他都失败了。虽然红军伤亡达50万人（史沫特莱按国民党的报告计算），但他们仍在坚守。如果国民党的计算正确，死亡的共产党人数相当于1853年太平天国叛军在南京暴动的规模。如果这是个夸大的数字，他们不过是一支小小的匪军，那么又怎能抵抗国民党的大军呢？而且，如果共产党没有发动真正的革命，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宣称，不消灭“赤匪”，“我们就不能让祖先传下来的古老品德和智慧延续下去”

呢？

斯诺认真地看待共产党，也愿意考虑他们进行真正的革命的可能性。1930年，他离开中国去印度前，就在《现代史料》月刊上的一篇综述中写道：“在中国，如果共产主义曾经仅仅是大惊小怪者们的幻觉的话，那么，如今再也不是了。”回到中国后，斯诺与极少数对共产主义提出严厉质询的人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是西方记者中最能获得红军消息来源的人。在上海，她参加秘密集会，听共产党活动的报告。还有一段时间，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她家中秘密养病。孙夫人的同事杨铨博士被刺前，曾在蒋介石的围剿中获得的文件里搜集到共产党及其忠实追随者的情况。斯诺读到了他的报告。他还通过佩格了解到，1931年，在上海的美国外交官杰伊·C·休斯顿曾对共产主义进行过调查。不过，总领导克宁翰对休斯顿利用业余时间写的报告兴趣不大。休斯顿身患疾病，同时感到孤独，在佩格到领事馆工作后不久，就与她成了朋友，还给她看了那些报告。1932年，即休斯顿去世的那年，柯乐博对共产党在农村的活动进行了评价。柯乐博是驻汉口领事馆的副领事，他引用了斯诺在《现代史料》月刊上的文章。后来在北京，斯诺与柯乐博成了朋友。1934年早些时候，斯诺还与诺曼·汉韦有接触。后者从事农村研究时，收集了有关共产党的资料。同时，斯诺也在自己的图书馆里积累了有关共产党的剪报及其他资料。他想尽办法了解红军。

柯乐博和休斯顿都犯了人们常犯的错误（柯乐博用最审慎的语言——如同象棋大师走棋一样——报道了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的死讯）。他们有见地地断言，无论如何，共产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党的弱点，国民党军队“存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掠夺人民”。斯诺在《现代史料》月刊上的文章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会做什么还不清楚，但他们为什么得到

追随者的拥护是很清楚的：“国民党不能信守诺言”。

其后，斯诺也并未改变他的想法。1935年，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提到：“记住，正象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所进行的真正的革命，是为了改变那些无法容忍的状况，是在用尽了其他一切解决办法之后，才试图采用的方式。……你如果到这里来，你不会看到在红军同美国选举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如果你象我一样，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会开始看到，这场革命完全是群众历史需求的表现。这些群众受压迫太久，遭拒绝时间太长，以致现在在其政治示威中表现得暴烈和富于灾难性。这是人民对国家统治者的责备。”

大约在1932年，斯诺要结婚时，他告诉他的代理人亨里埃塔·赫茨，他正试着“从当地(上海)的共产党人那里搞一个去中华苏维埃访问的‘护照’。我都快弄到手了，但在最后关头，共产党通过和我一道工作的人又对我产生了怀疑，于是一切又都消失了”。1934年，斯诺与史密斯—哈斯公司签合同时，去访问看来又有了可能。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停止了。几周后，战斗重新开始，蒋介石将江西苏维埃包围得水泄不通。4月，国民党在广昌给了共产党决定性的打击。约4000名共产党人在战场上死去，恐慌笼罩着幸存的队伍。共产党领导人承认，开小差已成了“比蒋介石还可怕的敌人”。斯诺通知纽约，写一本红色中国的书的计划正在“很快消失”。他与最高统帅做了一次有意义的谈话，如果国民党“宣布的是事实，那么，看来江西的共产党基地实际上已经全部消灭。”

在斯诺转向“另一题目”，即他的《云南》旅行纪录片时，共产党进行了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艰难的长途跋涉，铤而走险的6000英里的“长征”，以逃脱国民党的追捕。整整一年，红军队伍受到小战斗、恶劣的气候、险恶的地域、疾病和缺乏食物的折磨，在中国蜿蜒前进。同以往一样，关于他们活动的报告展现

了一幅令人迷惑的画面。美国国务院的外事处官员收集了混乱的电讯稿，描述这支队伍先是向西进发，然后向北。给人的主要印象是，这支军队正在自我消耗，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柯乐博认为，共产党人将成为比过去更强大的队伍。美国在云南的副领事阿瑟·林沃尔特这样描写那些来到他工作地点附近的共产党：他们有超凡的领导能力、坚定的信念以及对追随者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报纸报道了令人震惊的红色暴行。最出名的是，在安徽南部两名年轻的美国传教士被杀害。

1935年，纳撒尼尔·佩弗写道：“我们实际上对共产主义运动一无所知。你所相信的关于共产党中国的事情取决于你愿意相信谁，你同情谁或你尊敬谁；而这种相信、同情或尊敬的程度，能使你接受他的判断，按他衡量事物方式行事。”

1935年10月，当毛的队伍被迫进入陕西省时，其人数还不到原来红军的十分之一。这支队伍仍极易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攻击，而其自身也并非完全步调一致。负责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对抗毛的领导。张与毛的不和可追溯到20年代初期。在最近的几年间，张独自领导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苏维埃。当张的军队在四川同第一方面军和毛会合时，他与毛争论，反对毛继续北上的计划。虽然张失败了，但政治上双方都做了让步。军队进行了改组。张和朱德带领西路军（以四方面军为主组成）；毛带领一方面军的主力为东路军。这是个分裂的协定。经过几周的行军，一条泛滥的河流将两支军队隔开了。张带着朱德转向南方，据许多报道称，朱德成了人质。

在毛领导下到达陕西的行军者是有理由欢呼的。到达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宣传胜利，而且，在这个新的苏维埃里，共产党的地位比过去更高了。在南方时，共产党被分割开了。在这里，他们有了一个开始联合的基地。由于陕西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有希望招募到许多新兵来壮大队伍；由于它靠近日占区，又

能为中国的爱国人士提供重新集结的地点。早在1932年，虽然没有攻击敌人的实际可能性，但毛和朱德就已对日宣战了。在西北，他们有了这种可能性。几周内，共产党就过了黄河，假装向北挺进，攻击日本人。而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侦察可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征募新兵，收集食物和钱财，同时取得宣传的胜利。蒋介石彻底粉碎共产党的计划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大错误。与其说他把共产党军队引了出来，不如说他把他们赶到了高原上。

斯诺认为，共产党将国民党推到了一个难堪的境地。他写道：“对共产党来说，对日作战不会丧失什么，而且还可能赢得一个社会主义世界。对军阀来说则相反，他们会丧失一切，而且除了‘被光荣地载入史册’外，什么也得不到。”

斯诺看到一些明显的征兆，即在北京，共产党的吸引力在不断增长。12月9日学生游行，发生在共产党刚刚到达陕西后。在这场运动激励下，王汝梅和其他学生领袖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美国驻北京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和另外一个人，不相信“中国人的天性使其成为共产党”，但他们看到了红军的精神，这正是在蒋介石这个不打日本人的“混蛋”身上找不到的。上校告诉斯诺：“我不知道（共产党正在）鼓吹什么，但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已经有了能克敌制胜的指挥官了。我的意思是指那些不说‘给我去，伙计！’，而说‘跟我来，孩子们！’的指挥官！如果情况的确如此，而且有足够数量的这样的指挥官，就够让日本人受的，直至把他们送上西天。”

在西安（北京西南约600英里）的剿匪总司令部里，对蒋的领导的怀疑情绪也在不断增长。年轻的张学良元帅指挥着这支军队，多年来一直坚定地支持最高统帅，打退了分裂的阴谋。日本人侵占他的故乡满洲时，他忠诚地服从了在日本人面前撤退的命令。但他的东北军（或称满洲军）对打内战越来越不感兴趣。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与共产党的小战斗中多次失败，另一方面，他

们还不清楚共产党是否是真正的敌人。共产党释放了被俘的军官，这些回来的人带回了红军热诚打日本人的故事。很多东北军士兵冲破防线加入了共产党的军队。“一二·九”游行后，这位少帅宣布，所有抗日的学生，不分政治信仰，都可安全地来到这座城市。很多学生都去了，其中有两个人与斯诺的关系密切，他们是张兆麟和陈翰伯。他们在一家当地报社工作，写宣传抗日的文章。

1936年初，一位共产党密使拜访了少帅，希望能利用他日渐加深的疑虑。这位密使是红十字会官员，而且曾经是基督徒，大家都知道，他与共产党有联系。他就是王牧师（其真实姓名是董健吾。——译注）。王告诉张，共产党希望与抗日的队伍联合。经过与中共领导人的长时间讨论，张同意非正式停火，并允许一些共产党人在西安以东北军士兵的身份工作。这项协议是秘密的，连蒋介石那无所不在的地下组织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人暗示斯诺，张转变了。1936年3月，一位在西安访问过张的总部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拜访了斯诺。这个学生说，张在公开表白效忠蒋介石的同时，很不明确地补充道：“可惜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在西安或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想，无论如何，你们会满意我最终的决策……我深切同情你们的运动。”他还告诉斯诺，西安的大部分军官同情共产党。

共产党进行长征时，斯诺感到望尘莫及，尽管他难以打消去采访他们的念头。看来，他不可能完成那部过期的旅行纪录片了。他向古根海姆学会申请一笔研究金，以便就中国的土地危机问题进行研究。他在申请书中提出，根本的问题是“在象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或无产阶级政权是否可能存在”。他没有得到研究金。后来，他开玩笑说，这笔钱给了一名研究人员，他是“根据中国人的脸部表情研究他们

的种族特点和心理特征”。这位古根海姆研究金的获得者在北京街头走来走去，让翻译给中国人讲述一些打动人心的故事，他则在一旁拍中国人的照片。

那些与共产党地下组织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北京居民并不为此而大肆声张。那样做是致命的。同样，也无多大必要询问别人的政治关系。虽然如此，但人们还是可以进行猜测，斯诺很机敏地试图找到关系，以便协助他进入共产党的营地。其中之一是谢尔盖·波列伏依，他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来中国的俄罗斯人。在自己国内时，波列伏依同情革命，并与一连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友谊。有一段时期，他还可能协助过共产国际。斯诺结识波列伏依时，后者正在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俄罗斯语言与文学。经过几次一般性的交谈后，斯诺问波列伏依是否能帮助他与共产党接触。波列伏依要斯诺发誓保密，并说他愿意做他能做到的事。至少，这是多年后波列伏依的儿子回忆起来的故事，过去没有人提到过。

还有一个也可能是中间人。他是一个高个子，脸色苍白，穿着不整洁长衫，他是个中国青年，叫俞启威。他曾是共产党活跃的地下工作者，青岛大学的学生（经他介绍入党的人中，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后来成了他的情人。但后来她与毛泽东结婚并改名江青）。在一次青岛学生被镇压后，俞在牢房里呆了几个月，出来后转到国立北京大学从事激进的学生运动。“一二·九”游行开始后，他曾与其他学生领袖一道访问过斯诺的家。斯诺夫妇看出了他学生身份后面的背景。他给自己起名大卫，并在其他学生面前采取家长式的态度。在客厅里谈论政治问题时，其他人专心地听着他讲。他谈起话来就象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处世很谨慎，与他人交往不多，而且只在一处住几个晚上。大卫要离开北京时，斯诺夫妇给了他一套西装，并把他送上开往天津的火车，临行前，大卫说他会告诉一个联络点（一个神秘的K·V·先生），

斯诺向他表示了想访问苏区的愿望。1936年3月底，他写来了鼓舞人心的信，提到他已汇报了斯诺的情况，可望几天后会有回音。“我想他们没有理由拒绝你的要求。我希望能办成此事。请在出发前给我来信！”接到这封乐观的信后，就再也没有来自天津的肯定答复了。而斯诺也不可能与过着逃亡生活的俞再取得联系。

5月，斯诺开始试着找别的门路。他去了上海，见到了宋庆龄、鲁迅和史沫特莱。虽然看起来史沫特莱对斯诺很恼火（可能是因为她希望自己能第一个到苏区），他还是希望自己的提议能有结果。

月底，斯诺回到北京。他时来运转了。斯诺认识的一位当地的大学教授徐冰来找他，带来一封用隐显墨水写的信。他指示斯诺去西安，在那里就能找到到达收件人毛泽东所在地的安全途径。

显然，斯诺并不知道徐是共产党员，他接到信时也只是模糊地猜测。他总是认为，安排这些事时，宋庆龄起了作用。由于需要特别保密，这些细节多年来一直没有搞清楚。近20年后，斯诺才知道，那封信是刘少奇授权写的，刘少奇即大卫·俞所说的K·V·先生，他是秘密设在天津的共产党华北局的领导人。1937年，斯诺旅行结束后，大卫·俞告诉佩格，他是华北局的第二号人物。这正是80年代中国共产党一些老的领导人的看法，即大卫在安排斯诺的旅行中起了作用。但斯诺却从未提到过大卫的帮助，也未将他列在华北局成员的名单上。谢尔盖·波列伏依告诉自己的儿子，他在使斯诺得到邀请问题上起了作用，并将这种协助看做自己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围绕斯诺被邀请一事产生的问题增强了事情的神秘感，这使斯诺在准备这盼望已久的去“红色中国”旅行时，想到这可能是一次冒险。但关于这封信的最重要的问题，早已超出了“它是

如何到斯诺手中”的这种纯技术性的方面，而是他被邀请的原因。

一种解释是，在新生的统一战线上，共产党正在与张少帅进行非正式的谈判。从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占优势地位的新观点看，他们开始采用了进攻性战术，以便迈出自己的边界。他们用隐显墨水写信给中国学生们，同时也写给斯诺，他并不是唯一被邀赴西北的外国人。共产党人也欢迎马海德。马海德对自己在上海进行的有限的医学实践不满意，而认为在红区能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技术。通过史沫特莱，他同能帮忙的宋庆龄会面。从共产党的观点看，一个记者能起特殊作用，他可以将共产党是有生命力的抗日力量和它应该得到大众的支持这一消息传播出去。西安的休战，使斯诺有可能通过国民党人的防线，他的报道又能使突破口进一步扩大。

另一因素是共产党领导本身的。张国焘握权不放，坚持反对毛的领导，只标志着近年来共产党内骚乱的历史性的一幕。多年来，共产党的领导者分散在中国各地及莫斯科，而且互相之间并不完全协调一致。关于30年代初期，毛与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和的令人迷惑的报道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毛在革命者中是个叛逆。他提倡游击战术，并且相信，农民而不是城市无产者具有最大的革命潜力。这些都严重背离了党的路线。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突围前，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开除了毛。次年1月，长征队伍到达贵州遵义时，他被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主席（这是个新的职位）。但秘密会议并未包括政治局名义上的领导人王明，他当时在莫斯科。毛在会议上获得的支持主要来自列席扩大会议的将军们，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的支持则较少。1936年，张国焘独立而去，王明仍在莫斯科，毛有足够的力量取得新闻界的支持，但却无力建立自己的领袖形象。

但是，为什么选中了斯诺？答案在他的国籍、关系和独立性

中。就算能找到一个中国记者，他在整理报道时也得不到外国人所能享受的治外法权的保护。而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记者，由于他们的国家成功地首先创造了这种令人厌恶的特权而声名狼藉。一位俄国记者会受到外界的怀疑，而且毫无疑问，毛和其他与莫斯科不一致的人也不能接受。这样，就只剩下美国人了，而且斯诺从他们当中站了出来。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并帮助斯诺的人（或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正迅速增多，这是不同寻常的。与中国的左派关系比他密切的唯一一位美国记者是史沫特莱，但她同他们的关系太好了。她是个彻底的同党，因而她的作品只能在有限的地方刊登。而另一方面，斯诺的文章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外交》季刊上，无论如何，这些出版物只不过较为激进而已。共产党人可能无法控制斯诺写的内容（如果是个独立性较差的人，他们就可能控制），但他们有理由相信他是公正的，而且人们会读他的报道。

斯诺匆忙准备启程，结果在太短的时间内接种了太多的预防疫苗，把自己都搞病了。他指导佩格收集研究材料，还请麦克·费希尔在他“在内地”期间继续为伦敦《每日先驱报》收集素材。斯诺只含糊地告诉北京的朋友：“我明天就要去红色中国，去见毛泽东了。而且还要旅行、拍照和写我愿意写的东西”，斯诺在给自已的出版商的一封“绝密”的信中写道。“如果我成功了，就会得到世界上最抢手的新闻。”正是由于他那独特的个性，使他几乎误了去西安的火车。

根据指示，斯诺住进了西安的宾馆。不久后的一天清晨，共产党的密使王牧师将他带到城外的一个小丘上。在那儿，斯诺发现自己简直被红军秘密保安部门负责人邓发拥抱住了。斯诺觉得，他从未见过一个象他那样的中国人。邓身穿东北军军装，住在少帅的房间里。在那身硬邦邦的制服下面，斯诺看到的“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时常在户外活动的人”。邓闪烁着热情的

目光，他有一种美洲豹的优美风度，手象铁爪子似的有力。他一再与斯诺拥抱，不停地开着玩笑，显得兴奋不已。斯诺过后说：“真是个意想不到的共产党人！真是个意想不到的赤匪！”

共产党邀请的美国内科医生马海德也在宾馆等候旅行安排。他同斯诺交谈、玩简单的纸牌游戏及听王的奇闻以消磨时光。他们告诉管闲事的宾馆经理，他们在等组内其他人员到达，然后立即出发去进行科学探险。按照联系人的建议，斯诺从北京带了一位年轻的中国朋友为他做翻译。但这个年轻人一到西安就改变了主意，带着斯诺预付给他的钱上四川去了。斯诺将困难告诉了佩格。为了作出这一性命攸关的决定，佩格去找学生领袖王汝梅，他同意前往。离京赴西安前，王顺便去看了燕京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代理院长哈里·普赖斯。普赖斯把王看作是自己最好的学生之一，便提醒他两三周后要进行毕业考试和毕业典礼，他可能会错过。这位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回答说：“埃德加·斯诺安排我去见周恩来。我不能拒绝。”

7月初的一天黎明，斯诺和马海德乘一辆国民党的6吨道奇卡车离开西安（王汝梅后来才去）。第二天，他们到了100英里外的延安。早晨7点，一个向导带他们穿过国民党的防线直接进入苏区。两个美国人在人迹稀少的深褐色山丘间穿行了两天，到达了百家坪。在那里，斯诺见到了周恩来，这是他所会见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他花了两天时间采访周恩来。7月10日，斯诺骑在摇晃的马背上，同一个小分队一起向保安进发，路上花了三天时间。

非少帅（张学良）管辖的零散的国民党军队例行公事地进犯苏维埃。斯诺曾在一处与巡逻队擦身而过。不过，与过去那些使他紧张不已的共产党本身相比，这算不了什么。所有事情，甚至包括共产党人那些未加修饰的宣传，都是新闻。斯诺不断地提问，并将答案写在笔记本上。他结束旅程并踏上保安的土地时，

共产党人边唱歌边在他坐骑旁行走的情景映入眼帘。一个参加过长征的17岁的“老兵”说：“红军教我看书写字。现在，我已学会了操纵无线电和使用来复枪。红军是帮助穷人的。”

在响亮的军号声中，斯诺进入了环抱保安的青山绿谷之中。人群高喊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维埃中国作调查访问！”接待委员会的人带斯诺看了他的住处。这幢房子有四个单间小屋，斯诺住进了其中的一间。与此毗邻的同样老式的房子，是“外事办公室”。

斯诺在日记中写道：“我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整个城市都出动来欢迎我。如果让我发表演说（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我肯定说不出话来。我完全让这种欢迎的热烈场面震慑住了。在这个由许多凸起的山脊山脉‘守卫’着的边远小城里，受到这样的迎接，真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而且，在辽阔的山脉的寂静中，还不可思议地回荡着庄严的军乐。”

那天黄昏，毛泽东走下山来与斯诺握手。毛高而瘦削，面部上方有两束黑发，透出一种创业者的朴素和吸引力。不到一星期，他就邀请斯诺到自己黄土坡边的窑洞里去了。这是毛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他们谈了许多个黄昏。他们弯腰坐在矮桌边，桌上放着毛夫人准备的夹着辣椒的馒头和酸梅做的甜食。他们常（通过翻译）谈到后半夜。

周恩来给斯诺制定过一个日程表。但这位年轻的记者意识到，是毛在安排他在苏维埃的行程。毫无疑问，毛重视这次采访。斯诺将问题写下来，毛按笔记回答，还两次审查采访译稿，进行修改和补充。通过斯诺的访问，他的主要言谈形成了一个“主旋律”：即“当前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必须“认识到要同时解放受压迫的农民”，“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忠于马列主义”，“我们为解放中

国而斗争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把中国移交给莫斯科”。

谈话并非是完全正式的。在小心翼翼的“问与答”当中，还夹杂着随便的玩笑和交谈。毛花了12个晚上详细谈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后，斯诺说服毛打破共产党人的惯例，谈谈个人问题并回顾一下他的生活。在此之前，毛从未这样做过。那些细节都鲜为人知，以至毛的妻子也在近旁徘徊并屏息静听。

毛生于湖南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他就剪掉了自己那传统的辫子，以示对清朝统治者的蔑视，还参加了一个以推翻满清为目的的起义军。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军阀混战，中国贫穷落后，因而他也愈来愈激进。成年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1921年参加了党的成立大会。在此过程中，毛多次自己处理问题，而且经常受到人们的误解。他描述了党内斗争，包括与张国焘的斗争。而张经过一系列军事上的瞎闯乱碰后，现在，正与朱德一起在来保安的路途中了。但毛回避了他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并流露出自信。他似乎漫不经心地评论了王明从莫斯科写来的报告，说它脱离了**中国苏维埃的实际**，这样就巧妙地打发了王明。毛的评论是靠不住的，但他的故事却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了在中国能使共产党得以产生的各种力量。此后，毛再也没有将他的个人历史与这些细节加以联系。

红色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用语言和行动确认，毛是代表党发言的，中国共产党是致力于革命的，这场革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但却是由中国人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保安的唯一顾问李德（人们这样称呼他），加重了这一说法的分量。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其真实姓名是奥托·布劳恩。斯诺第一次在北京见到李德时，是1933年，当时他带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李主要是为了确认他的德国记者身份，不过佩格觉得，他来是为了喝光他们家的白兰地酒。除了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外，他与斯诺夫妇在任何问题上都谈不拢。此后，他就没有再来拜访过。在保安，李并未向斯

诺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只是讲了1933年他如何秘密进入江西苏区，成了参加长征的唯一西方人，尽管李有特殊身份，但没有什么影响。曾批评过共产国际建议的中共领导人，只是出于礼貌才与他商议，并非真的对他的观点感兴趣。李告诉斯诺：“中国人毕竟比任何外国人都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革命。”

很明显，这些中国人便是共产党人，这恰似印在制服上和列宁俱乐部墙上的红星、斧头和镰刀标记一样清清楚楚。斯诺所记录的每一部传记，几乎都描绘出一幅同党紧密联系的画面。这种情况不仅经常发生在中国，也时常出现在苏联。在一次具有代表性的交谈后，斯诺在日记中写道，一位红军卫生局的局长是“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局总书记洛甫强调指出：“红军虽然大部分由农民组成，但这不是一支农民的军队。红军首先是共产党的队伍。”军官和士兵都重复着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士兵和“红小鬼”镇静地站在斯诺面前，背诵他们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红军是革命的军队”；“红军是穷苦大众的队伍！”

对斯诺来说，农民和士兵的陈述比领导说的事情要重要得多。农民在交谈中指出，共产党在国民党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苏区的许多贫苦农民批评了共产党政权，并且流露出怨气。在一次说明问题的观察中，斯诺注意到：“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在谈到苏维埃时，都说我们的政府。这一说法使我突然感到，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新事物。”

据当时的报道，在陕西的国民党统治区，贫苦农民将收入的65%用来交税。很多人出售土地，换取一小点食物。相反，共产党让每一个想要土地和家畜的人都能得到这些；他们降低税收，有效地废除高利贷并消除特权及特权阶层。在上海，斯诺曾亲眼见到孩子们按惯例被卖到工厂当童工。工作12到13小时后，他们就睡在机器下肮脏的褥子上。全家一天劳动所得只能在工厂领到约一个美元的工资。在吴起镇，这个原始的缺乏电力的苏区

工业城市，工作条件是斯巴达克式的，但工人拥有俱乐部、食品和工资。斯诺认为，他们还知道，“没有人利用他们赚钱”。朱作其是位著名的工程师，他放弃了上海的高薪职位，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他告诉斯诺，他对吴起镇唯一严肃的批评是，“人们用于唱歌的时间实在太多了。”

红色宣传遍及苏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使斯诺感到很不舒服。不过，扫盲运动虽然羽毛未丰，但至少已经开始了。后来，斯诺告诉人们：“你可以感到，几乎任何一个农民都能同你谈非常初步的政治问题。”在保安，作家丁玲是位女英雄。斯诺曾翻译过她的作品，1933年，国民党曾逮捕过她，如今，共产党的演员们在人民剧场演出她的激动人心的讽刺剧，反共宣传无法与之抗衡。在红军大学，学生们用敌人传单的背面做笔记。使斯诺感到惊奇的是，共产党并未限制他的行动。

他没有发现制鸦片的罍粟、乞丐、打妻子、卖淫、一夫多妻或裹脚。斯诺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清秀的年轻姑娘坐在手拉风箱旁，连续一小时或更长时间高兴地抽拉着这种古老的工具，为士兵们烧饭，同时与他们谈笑。在此逗留期间，我未曾看到打孩子和虐待老人。”

总之，这里的一切比斯诺在国统区看到的要好。斯诺在给妻子的信中神秘地写道：“几周前，我安全到达，并立即开始收集植物标本。”这里生活简朴，吃的全是单调的食物，还有“昆虫，即我正在为美国国立博物馆收集的东西。其中包括：跳蚤、蚂蚁、蜘蛛、臭虫、虱子、蚊子、苍蝇等……。不过，能到此地确是一种难得的经历，值得忍受这一切，甚至更多的东西。各方面的事情都令人兴奋，但最使人激动不已的莫过于与英雄的年轻科学家接触……。他们通过艰苦的劳动去发现新的科学世界，就象学童参加足球赛！”

佩格读着这段话的时候，斯诺正与苏维埃的军队一道，在苏

区西部——甘肃和宁夏——崎岖荒芜的地区旅行。这次旅行的艰险正对斯诺的口味。他骑着一匹粗壮的小黑马，为安全起见，带着一支自动手枪，头上还戴着一顶帽沿上闪耀着红星的旧军帽。他的面颊上长着密密的红色络腮胡子，斯诺的主人是第一方面军的指挥官彭德怀。彭不戴军阶标志，与部下过着同样的生活，显然乐于从事剧烈的体力活动，而且，斯诺认为，没有某些中国人带有的那种躲躲闪闪的毛病。斯诺喜欢他。

与彭一道旅行期间，斯诺观察到，红军将领努力在部队中灌输统一战线的思想。这可不总是件容易事。彭的部队遵守红军的纪律，他们会付给农民给养钱，但他们还没能完全学会劝说那些忠于国民党的士兵的条例。彭“怒斥”了一起打伤俘虏军官的事。一次，在同自己的副官开会时，彭指出，他们应更清楚地向自己的士兵解释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

彭的所做所为仅仅是共产党决心抗日的证据之一。在保安的红军大学里，开设的军事课程几乎全部侧重于抗日战争。在整个苏区所进行的宣传，看来也为了同一目的。人民抗日剧社的一次演出中，有一个“统一战线舞”。这是一个描写“动员中国进行抗日”的普通节目。

长征前，共产党人就曾谈起过统一战线。但究竟与谁联合，在什么条件下形成这样的“战线”是模糊不清和变化无常的。毛同其他人在开始与斯诺交谈时就提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团结”。斯诺当时就感到很惊奇，因为共产党竟能接受同蒋介石结盟。周将这位最高统帅称做多年前就已“掌握了最高权力的”、“喜好作恶”的战略家。斯诺访问战争前线时，领导层人士将这些模棱两可的话部分地进行了解释。在一封“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即1936年8月25日发表的《致国民党书》。——译注）中，共产党人提出了从未有过的最高和解呼吁：如果国民党同意参加抗日，如果他们给人民群众公民权利并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共产党就将

接受一个新的“国防民主政府”的法律，还将修改土地政策，并考虑改变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名称。斯诺从前线回到保安后，毛告诉他，共产党不坚持在新政府的部门中派自己的代表，也不组织反对新政府的群众运动。

斯诺感到，如果他能回去披露这些话，这会成为重大新闻。到达苏区前，他就担心过离开的问题。目前，他已收集了很多共产党人的传记、各种长征故事，以及能说明这些人不仅仅是赤匪的各种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他愈来愈急于让外界得知这些消息。毛关于统一战线的最新声明一时成了新闻热点，于是，佩格就试图与保安联系，但未成功。在西安，国民党正在撤换少帅的东北军，以便准备又一次围剿共产党的战役。新派来的军队加紧了封锁。斯诺原想等张国焘和朱德到达后与他们会面，但最后还是决定立即回家。

4个月的苏区生活，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朴的乡村设施，与北京沉醉的奢华和上海热望的追求功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为斯诺同情农民的心态提供了完美的环境。与他们的国民党对手相反，共产党人“转回到自己国家深深的根基中去了”。经过8年的探寻，斯诺终于找到了一种政治运动。这种运动虽然不是哺育了斯诺的美国中西部大草原上存在的人民党主义的翻版，但它焕发了人民的活力，并使之投入到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之中。

共产党人依靠自愿的行动。他们获得这种自愿行动的办法，是创建一大批人民群众的组织，给每个人分配工作，并对那些勉强加入的人施加社会压力。这样做虽然带有强制性，但斯诺没有看到在国统区的那种粗暴的压力。在苏区内部，共产党人并不需要使用战斗部队执行警察任务。苏区的公民自尊、威严，有一种超出自我狭隘家庭观念去改善物质条件及驱逐日本人的目的意识。斯诺第一次看到“政治工作者和人民相结合”，通过它，“能最

大限度地发挥和运用蕴藏在群众中的热情、智慧、爱国心和经济建设的潜力”。

共产党想得到普通人民的支持，并通过普通的接触达到了这个目的。斯诺所厌恶的那种中国古老的、已衰败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已不复存在了。农民同知识分子一起在红色剧院里集会。领导者不寻求特权或物质享受。毛与“星期六工作队”一道，在田间劳动。理智的财政部长林伯渠是很少几个五十开外的官员之一，他没有穿银行家通常穿的黑衣服，而是穿着一身褪色的灰制服，戴一顶破布帽子，眼镜由一根细绳挂在一只耳朵上。

在某些方面，毛显露出一种值得注意的美国态度。他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他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行动，受到人民党主张和冲动的深刻影响。”毛在政治上倾向农民，他使他们的居处和生活方式充满浪漫色彩。他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怎么相信历史的力量，就象星辰在天空中占有相对位置一样，中国人必须首先确定自己合适的位置。他不相信知识分子和官吏。

斯诺对毛的第一印象是“林肯式”的；另一个印象同样反映出了美国人的想象力。毛虽受过教育，但向其追随者讲话时，使用的是他们的语言，而且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机敏。他意志坚强，能长时间持续工作。在长征途中，他几乎总是同部下一道行军。他那富于魅力的个人声望，如同美国英雄的形象一样，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斯诺写道，看来是有老天相助，使毛从被俘和死亡中得以逃生。毛虽然很杰出，但未被神化，看来他也不渴望被神化。在一次照像的时候，斯诺将自己的红军军帽借给毛，因为他根本没有军帽。在很多方面，斯诺与毛很相像。他们都贪婪地读书，穿着随便，早年就鄙视强迫的信仰，愿意按自己的既定计划行事。而且他们都认为，实践比理论更重要。

斯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密苏里的民主党人。中共是权力主义者，他们想统治整个国家。他写道，共产党对国民党所作的任何让步，都是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对其进行审查、讨论、决定及综合才做出的，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共产党人并未放弃的最终目标”。同样，共产党人靠其民主的一面，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首先，共产主义思想要纠正中国古代制度中不公正的东西；同时，要消灭外来帝国主义，这两者均意味着解放中国人。其次，共产党人的讲究实际和他们所处的现实状况，都使他们能避免建立纯粹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拟定政策，以便适应人民的要求。

斯诺认为，共产党的计划是要强制性地在全中国形成原始的民主动力。尽管共产党人一直是成功的，但他们的胜利却没有保障。他们的胜利取决于蒋介石，他也可以通过答应民众要求的方式来进行竞争。建立统一战线提供了双方都能争夺权力的格局，而这种格局看来是由共产党的威胁所引发的特殊的积极进展。正如斯诺所说：“如果没有共产党作为反对派的10年对峙，期望中的‘民主’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

两种都可能成为集权主义的政治运动之间的竞争不可能是纯民主化的，而民主化正是斯诺熟知和喜爱的。即使如此，中国也已从国民党冷漠的一党专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斯诺将此作为一种（与他初始想法不同的）在特定情境中的实际解决办法来接受。在妥协过程中，斯诺将自己的价值观与中国情况结合起来考虑。例如，新闻自由仍旧是他在中国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他认为，重新调整中国的“封建”体制，加上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最终可能出现这种自由。与在国统区看到的令人绝望的情形相反，苏区充满希望的情景使他在心中确认，社会主义可能推动这一进程。他已经学会在异国土地上做一个密苏里人了。

斯诺后来说，多数时候，他“感到完全自由自在，就象置身于自己的同胞中一样”。那种放松和自在，表现在闲暇时间的活动中。斯诺、马海德医生和几个中国人向吴起镇兵工厂的篮球队挑战。在保安，他与李德和红军大学的几个政委在住处附近的一个石铺场地上进行竞争激烈的网球赛。他教一个单臂的政委蔡树藩玩兰米牌（一种看谁的牌出手快的游戏，类似“争上游”。——译注），很快，这种游戏就风行全城了。同时，他还将扑克牌引入到黄昏体育项目中。给佩格写信时，他请她将《人的命运》一书寄给共产党人。这是一部马尔罗描写1927年上海清洗共产党的书。他还要求寄史沫特莱的两卷集、杂志、茶叶、巧克力、咖啡及一种制作地图用的（他将它描绘为）圆形仪器。林彪邀请斯诺到红军大学讲“英美对华政策”时，他答应了。他被人们的信仰深深打动了。他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他再次见到他们之前，很可能被杀掉了。在一次集会上，他对马海德说：“他们非常勇敢，”当时，会上正在进行关于解放全中国和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热烈发言。

这次旅行，斯诺带回家的纪念品中，有他的红军帽、两枚在江西苏区铸造的（一个参加过长征的战士送的）铜币和一个黑色玉制鼻烟壶。另一位说话直率的将军徐海东，在甘肃平原上与斯诺道别时，将这个鼻烟壶送给他，并告诉斯诺：“请将它作为十五军团和我个人给你的纪念品。我的部下将它送给你，为的是让你别忘了我们。这东西过去属于一个蒙古王爷，而且在这一带农民中赫赫有名。带着它，你就能平安地到家。”

10月12日，即朱德的部队与苏区军队汇合3天后，斯诺离开了保安。马海德和王汝梅留下了。斯诺出城时，毛还在睡觉，但许多其他政治领导人前来同他告别。斯诺路过红军大学的露天课堂时，学生们走来向他致意，“斯诺同志，一路平安，千万珍重。”斯诺上马离去时，他感到简直象是离家而不是回

家。

10天后，没有预先通知，斯诺满脸胡子拉碴，咧嘴笑着，出现在北京的家门口。进屋后，他从包里拉出一顶红军帽，将这个旅行用旧了的纪念品戴在头上，在佩格身旁跳来跳去。他的狗戈壁用爪抚弄着他。他请厨师为他准备盼望已久的饭，包括鸡蛋、牛奶和咖啡。

斯诺的归途几乎酿成悲剧。那天早晨，他走出共产党的领地，进入国统区，同情他的部队将他偷偷塞进一辆装满枪支的国民党卡车上，才进了西安。斯诺用了一个枪支袋，藏他的笔记本和电影胶片，以及共产党人给他的照片。到了西安，他发现那个袋子已在前一站错扔下去了。他简直吓坏了。他彻夜未眠，等着司机和一位东北军军官去取回袋子。

现在，他回到了北京，不必担心了。他想，过几天再把去红色中国访问的消息透露出去。这样，他就能有时间写系列新闻报道，并在国民党检查人员了解到他在干什么以前，将照片洗印好。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他自己的死亡消息破坏了这些计划。

回家后两天，美联社电讯发了一条消息：“斯诺落入‘赤匪’手中。他正在笔记本上记述他们的情况时被捕并被处决。”在堪萨斯，斯诺的父亲读到这条消息后，便立即要求《堪萨斯城明星报》通过美联社电讯向中国查询。斯诺在英国和纽约的编辑也发来同样内容的询问电报。那天早晨，主管美联社北京办事处的密苏里同乡吉米·怀特给佩格打来电话，问她是否有丈夫的消息？

她回答说：“哦，我今天还得到了他的消息。他很好。”

怀特谈到那条消息时，斯诺自己接过了电话。几小时后，他在美国大使馆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这个招待会也是为他的福气而召开的。斯诺欣然借用马克·吐温的话说，他的死讯宣布得

过早了。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斯诺说，可能在中国内陆，某个其他人被杀了。他在旅途中从未受过折磨。红军待他很好。

国民党人将斯诺的报告打上了欺骗的印记。斯诺沮丧地注意到，“日本人资助的天津白俄法西斯新闻社”，宣称他“受雇于华尔街和斯大林。”不过，斯诺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报道，人们大都还是严肃对待的。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他对毛的采访。中国人饶有兴味地读着这篇文章。燕京大学的学生请斯诺去演讲并展示他的照片。新闻界采访了斯诺。他的报告使北京饭店的听众感到震惊。兰德尔·古尔德在《大美晚报》上刊登了斯诺的一篇讲演稿。上海总领事C·E·高斯认为，斯诺同情共产党，但他相信，斯诺提供了“应引起总领事馆重视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全面、最权威和最新的报道。使馆应密切注视此事。”斯诺所属的一个非正式的讨论小组在谢伟思家聚会，听斯诺讲他旅行的情况。谢伟思想：“在中国的方程式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还不能肯定有重大意义的因素。”

在此后几周内，伦敦《每日先驱报》用头版刊登了斯诺的系列报道，发表有关社论，还登了他的大幅照片，并将他提升为远东首席特约记者。《纽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对斯诺提供给北美报业联盟的系列报道在美国的独家刊登权问题产生了争议。斯诺不知道有这些争议，他认为不予刊登是因为报纸想压制这些消息，因而就将文稿要了回来。令斯诺感到惊奇的是，由亨利·卢斯新近创刊、支持最高统帅的《生活》杂志，竟用1000美元买下了他拍摄的照片，还连续两期用了11页的篇幅刊登了其中的41张。斯诺的长篇文章出现在1937年《亚洲》双月刊的3期上；《新共和》周刊刊登了关于苏维埃中国的4期连载；《亚美杂志》半年刊很想刊登斯诺的作品，于是登载了他采访毛的摘录；《星期六晚邮报》也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

记者文森特·希恩在评价1927年人们对于他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缺乏热情时说：“早一个月的新闻与晚一个月的新闻同样是没有价值的。”希恩曾提前得到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消息，但北美报业联盟的编辑当时就是对此不感兴趣。斯诺并未经历过这种困境。从他整理出第一条消息直至写完书一样长的报道，中国一直是个大新闻。日本人的侵略可能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起来，这个联盟对美国人有巨大的吸引力。

斯诺刚刚回到北京时，认为蒋放弃同共产党作战的可能性不大，“除非在全国抗日群众运动情绪的促进下，其多数军官和军队开始不听他的指挥”。事态迅速朝此方向发展。12月12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要求当时正在西安布署反共新攻势的蒋介石掉转枪口抗日。斯诺夫妇用了一整天兴奋地采访了抗议的学生，到拉·塞勒和路易丝·塞勒夫妇家中共进晚餐。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贝特兰，他带着令人震惊的新闻出现了：叛乱的军队在西安杀了最高统帅。

蒋的死讯象那次斯诺的一样，“宣布”得太早了。少帅和其他东北军“叛乱分子”绑架了蒋，但并未杀他。但是，蒋被监禁就足够令人震惊的了。虽然结果不明，但绑架蒋的人无疑希望自己的行动能结束内战。国民党人严格审查了斯诺的新闻稿，但还是禁止公布叛乱分子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们却对错误的报道加以鼓励，诸如共产党人占领了西安，叛乱分子将警察头目钉在城门上，妇女被“共妻”了，等等。国民党代表（其中包括蒋夫人）到西安恳求释放蒋时，官方并未提及共产党人也参加了谈判。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发表的报道中提到，叛乱分子是亲日派，企图破坏统一战线。这种报道使事态更加复杂化。斯诺感到困惑和恼怒。塞奇从莫斯科发来的评论指出：“这样一来，公众的思想更加混乱，此外，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实际上，由于严格的控制与检查，新闻已被弄得不能再混乱了。”

一位东北军领导人苗剑秋请求斯诺陪他去西安。苗是绑架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之一。他认为，斯诺在场能为他做些掩护。斯诺拒绝了。但他安排了麦克·费希尔和贝特兰与其同行，并委任他们为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直到旅途中苗自己说明，他们两人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由于紧张，贝特兰和费希尔决定将斯诺请他们带到西安去的一封信毁掉。他们象演滑稽戏似的尽力用水将信封冲下老式厕所，又将信烧掉后分散丢掉碎灰。只有贝特兰和苗到了西安，时间是圣诞节当日，蒋被释放几小时后。当时，史沫特莱晚间在西安的一个广播电台播发新闻，贝特兰答应帮忙。他的声音刚一传出电台，南京方面就说他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并要求路透社承担责任。

约翰逊大使是唯一对这一切都表示疑惑的人。斯诺将自己采访毛的出版物寄给他时，约翰逊回答：“毛泽东先生同其他许多我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一样，说得很多。不过，他的情况并不象有些人那样糟。由于他了解世界局势的渠道较少，比其他我会见过和交谈过的人要少得多。”约翰逊认为“西安事变”（人们这样称绑架蒋的事件）仅仅是张学良和他的同事逼迫“蒋充分认识他们的天才的愿望。这仅仅是一次绑架。正如你所知，我常常感到，我们强加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困惑和复杂的想法，实际上是我们比这复杂得多的思维的产物。

斯诺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在绑架后不久，他收到马海德寄来的一张令人费解的明信片。马海德描述了保安的庆祝活动和毛的讲话，以及其他领导人要求召开群众大会，对蒋进行审判。不过，虽然周也参加了关于释放蒋的谈判，后来还是没有进行审判，蒋介石回南京去了。事情过了近一年，斯诺才知道，斯大林指示中共领导人释放蒋，否则他将宣布他们是土匪，那样会使他们名誉扫地。又过了些时候，斯诺得出结论，认为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在“中国党进行关键性决策”时用“命令”干预。

蒋采取了谨慎的步骤来隐瞒他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交易：同意中止反共战事，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少帅为帮助蒋挽回面子，同他一道回去，并受到监禁（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在台湾继续受到监禁）。蒋在公开宣布其原有政策仍生效的同时，慢慢地、悄悄地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其速度之慢，犹如春天向夏天的缓缓过渡。斯诺甚至担心，国共和解可能会引发另一次围剿。后来，7月7日冒出了另一次中日事件，这次是在距北京城约10英里的芦沟桥。同以往一样，确切的起因虽不明了，但后果却非同寻常。杂乱的战斗演变为阵地战。7月27日，三架一组的日本轰炸机和重型大炮轰击南苑驻军，南苑是北京的最后一个人防阵地。3000名中国部队官兵，三分之二阵亡。次日，斯诺与一名路透社记者冒险进入沾满血污的街道。斯诺看到，伤兵沿街倒着。中国人的尸体堆成了堆。日本人估计，自己损失了50人。一周后，他们就正式进入了北京城。

在这种形势压力下，统一战线迅速形成了。蒋不仅与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还释放了那些过去谴责过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无党派政治犯，同时，解除了对抗日歌曲和口号的禁令。持不同意见的将领，包括云南和四川军阀，都集结到了国民党的旗帜下。

与此同时，日本人源源不断地涌来。9月底，30,000人的日本军队以太阳旗开路，在京汉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总部驻地保定烧、杀、抢、掠。蒋试图通过战斗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或许还能得到外国的军事援助，他在上海部署了军队，引起了对抗。随后的战斗持续了3个月，其报道率比1919年联军突破德国防线以来的任何一次战斗都高。《生活》杂志刊登了一个被吓坏了的中国婴儿坐在烧毁了的海上海铁路仓库的瓦砾堆中的一幅照片。这使美国人形成了一种失落感。他们读目击者的报告，这些人每天目睹日本飞机在20个中国沿海城市轰炸平民。

12月的一个星期内，日本人在长江炸沉了美国军舰班乃号，杀了3个美国人，还在中国首都南京大肆屠杀。据估计，有30万名中国人被杀死，数千名妇女遭袭击和强奸。据《堪萨斯城明星报》报道：“市区不复存在了，只剩下冒着烟的断壁残垣，建筑物残骸上还留有日本现代化攻城炮的炮弹孔，以及一堆堆成了碎片的石块。”斯诺报道了班乃号上一位水手的谈话，日本人“不可能”搞错，“不可能”没看清这是条美国船。美国国旗在飘扬，甲板上还漆着两面国旗。

斯诺正在写的书几乎不可能再有更好的情节了。看来，人人都对中国感兴趣。总统顾问团执行部的头头们现在每天都在关注着这个国家，而不只将这些交给国务院外事处的官员了。对一般公众来说，1937年，赛珍珠在电影《大地》中塑造的英勇的中国农民形象，已愈来愈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了。民意测验表明，2%的公众支持日本，74%支持中国。《时代》杂志选举最高统帅与蒋夫人为1937年的“本年度男士和妻子。”正如哈罗德·艾萨克斯后来说的，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人已跨过了“仁慈的纪元”而开始了“赞美的时代”。

同情中国与惧怕日本是联在一起的。经济萧条这个“老敌人”已让位给新的幽灵，法西斯主义酿成了世界大战。1936年，希特勒步入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区，阿比西尼亚落入意大利人手中，德国炸弹为佛朗哥的国民党轰平了格尔尼卡。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建立了“罗马——柏林轴心”。几天后，日本与德国联合，建立了“反共产国际公约”。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恰似班乃号的沉没所表明的，美国可能卷入战争，这是美国人不愿意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班乃号事件后，感情上主张美国退出远东的公众人数，从54%急剧上升到70%。民意测验也表明，人们尽管仍然同情中国，但相当数量的美国人想让国家停止向日本和中国出售战争物资。从彻底的孤立主义基调出发，美国人欢迎国共统

一战线的建立。一个因此而得到加强的中国或许有能力独自对日作战。

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愈来愈使人感到威胁，而共产党人愈来愈象盟友了。法西斯的联盟也向苏联敲响了警钟，后者开始向西方大国呼吁，寻求联合行动。在美国，美国共产党试图树立有利于联合的大众化的正面形象。1935年7月4日，《工人日报》并排刊登了列宁和华盛顿的照片，重印了《独立宣言》。共产党再也不向罗斯福施加压力，要求他将新政策左倾了。在美共内部发行的一本小册子警告在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作的党员，不要象“疯狂的赤色分子”那样说话。也有人反对这种努力赢得尊敬作法，他认为，这种作法似乎不是为“伤害《星期六晚邮报》以往的投稿人”而制定的。

1937年7月晚些时候，斯诺在北京郊区的枪炮声中写完了自己的书。这部厚书长达400多页，完全是报道性的。写的是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同时也对共产党支持什么以及他们在中国这个变化不定的舞台上的重大影响进行了说明和分析。他将此书献给他的妻子“尼姆”。起初，他将书名定为《中国的红星》。但当他的代理人亨里埃塔·赫茨，或许漫不经心地，或许是从外交方面考虑，建议采用《红星照耀中国》这一名称时，他认为他得到一个完美的书名了。

使斯诺一直感到非常焦虑的是这本书出版的时机。他担心，事态的迅猛发展会使“红星”在出版前就已过时。他辛辛苦苦补充统一战线一章时，很担心会有竞争对手写的类似书籍先行问世。兰多姆出版公司买下了史密斯—哈斯出版公司及其与斯诺签订的合同，他们同样感到紧迫和焦虑。兰多姆出版公司虽然喜欢这部书稿，但还是希望斯诺写一个描述日本对沿海地区攻击情况的附录。当时，斯诺正在前线，因而没有联系上，但又焦急不安，怕真的找不到他，于是终于决定1938年1月15日出书。听说贝特兰

写的一本关于西安事变的书将于1月3日出版，兰多姆出版公司又仓促地将“红星”初次登台的日期改为同一天。

其实，兰多姆出版公司和斯诺都不必担心。“红星”得到了作家们梦寐以求的喝采。在对当时所有报刊上发表的100多篇评论文章所做的抽样调查表明，没有任何全盘否定的评价。那些评论中的溢美之词是出版商想象中的护封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闻奇迹”（缅因州波特兰市《晚快报》）；“绝对必需的”（布鲁斯·卡顿的《诺克斯维尔看守者》）；“本年度的杰出之作”（《佛罗里达联合时报》）；“有预见性的”（加州费尔菲尔德的县图书馆员写在《共和党人日报》上）；“极其动人的”（《威斯康星州刊》）。最有影响的报刊的反应也同样热烈。《星期六文学评论》将斯诺的照片登在封面上。杰出的作家、《新共和》周刊的编辑马尔科姆·考利说：“由于埃德加·斯诺杰出的工作，他赢得了荣誉。这可能是本世纪一个作家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无与伦比的功绩了。”

1937年10月，维克托·戈兰茨在英国出版了“红星”。它被选入左翼俱乐部文选中，并在出版的第一个月内就重印了3次。销量迅速达到10万册。此书在美国出版了一个月后，亨里埃塔·赫茨致电斯诺，称此书已售出12 000册。兰多姆出版公司的出版商说，订单以每日600册的速度涌来。很快，其他6种文字的版本问世了。瑟夫惊呼：“人们是冲着一本中国共产党人的书而来的！”但他还不能肯定整个销售热潮何时结束。

销售数量不能完全衡量“红星”的声望。罗斯福总统的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基斯告诉斯诺的一个中国朋友，他用了整整一晚上读“红星”。他还让罗斯福注意此书。斯诺的报道鼓舞了年轻人，一位女士放弃了她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位研究课题，去中国采访了。白修德接受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导师费正清的劝告，启程去中国“做斯诺做过的事”。“红星”问世的同一年，米尔特·卡

尼夫根据纽约《太阳报》出版商约瑟夫·帕特森的建议，开始创作喜剧连环漫画《特里和海盗》。他很想得到连环画内容所在地中国的背景材料，于是就按斯诺的图片和书稿来画，他承认这是“摹仿”。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红星”是他们所见过的，关于中国的无与伦比的最好的报告文学书籍。很多人，如菲律宾记者亚历杭德罗·罗塞斯，50年后还能记起书中动人的段落。与赛珍珠的《大地》齐名，“红星”成了那个时代（即中国成为头版新闻的时期）两本最令人难忘的书籍之一。

只有一个例外：令人啼笑皆非的美国共产党拒绝接受“红星”。工人书店禁止将“红星”放在自己的书架上，《新群众报》拒绝为该书刊登广告。美国共产党接受莫斯科的指示，而莫斯科则有理由不欢迎“红星”。斯诺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而“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红军开始自然而然地、完完全全地在中国人自己的领导之下，”斯诺很重视这一点。但斯诺这样做，就是向莫斯科作为世界马克思主义革命中心的地位提出挑战，也就是等于向苏维埃国家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在写“共产国际或许应对中国共产党人所遭受的严重倒退负责”时，斯诺可能也触动了克里姆林宫那敏感的神经。斯大林不顾托洛茨基的反对，坚持要国共合作。结果，1927年许多中国共产党人被杀，从而结束了这一合作。目前，斯大林又怂恿中国共产党组成一个新的统一战线。这是为了加强苏联东翼的力量，抗击可能出现的日本侵略的步骤之一。

美国共产党人为地使用典型的滑稽戏式的歪曲来挽救莫斯科的声誉。《共产党人》的一位评论者给斯诺贴上“不负责任地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和诽谤之词的人”的标签，说他将中国共产党所受的挫折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从而将读者引入“托洛茨基主义的泥潭”。斯诺在上海见过一个名叫海因茨·希普的德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在两封致《太平洋事务》季刊的信中批评“红

星”。他使用了阿夏蒂克斯的笔名，他指出，斯诺的下述提法是错误的：“如能控制大城市，红军将试图实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将土改完全看做取得政权的策略，这样，他们就可能在压力下向前挺进，直至彻底实行社会主义变革，其中包括实现集体化”。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者。中国还未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就象苏联已进行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只能希望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将帝国主义赶出去，并根除“中国农村强大的封建残余”，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在此之后，由莫斯科领导的其他人，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阿夏蒂克斯发表在《太平洋事务》季刊（该刊以前也刊登过对“红星”有利的评论）上的批评激怒了斯诺，他写了两个答复。不过，对共产党的批评实际上并不影响斯诺的声望。斯诺如果能预料到以后发生的事情，他就会希望美国人注意来自美国共产党对他的诬蔑了。在另一个年代，美国人可能会责备斯诺，认为他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目标的土地改革者，将美国人引入歧途。

正如对斯诺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指出的，“土地改革”的神话成了正确制定远东政策的障碍。这种错觉使美国人无法理解共产党人的重要性。不过，“这些重大思想的诞生地”并不象某些人指责的那样，是“红星”这本书。这种思想源自美国公众，他们对考虑世界问题不感兴趣，并公开表示不愿在国外实现理想。1938年，正值美国人渴求反法西斯盟友的时期。他们寻求的是能自己反抗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而使美国处于和平之中的朋友。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结盟后，将成为反法西斯的力量。为此，美国人接受了共产党人，而且，似乎是为了使这一“恋爱事件”更令人心满意足，他们还希望抹掉预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种种复杂因素。在公众心目中，似乎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民主主义者，他们是不可能成为盟友的。

斯诺厚爱中国共产党人，他将他们浪漫化了。为此，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30年代中期以前，斯诺就已成熟并已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了。在“红星”中，他将读者带进了生动的情节之中。他将他们抛入邓发的双臂，让他们感受到通过国民党封锁时的疑惑和恐惧；让他们坐在毛那原始的窑洞里，听他讲述生平故事。斯诺还描写了红军在长征途中过大渡河的情景；红军敢死队冒着国民党的枪林弹雨，摇摇晃晃、一步一抓地爬行在铁索桥上。这样的描述，能使读者潸然泪下。斯诺渴望与美国人沟通，因而采用了一个个美国人的形象来描述中国共产党。总之，书很感人。仅仅这一点，就为美国人提供了激动人心的画面。

但这还仅仅是“红星”的一部分。斯诺在这本里从始至终明确指出，无论他怎样钦佩中国共产党，但他还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来看待他们的。他们依旧是革命者。同是在这些关于苏区的“农村平均主义”的章节中，斯诺还写到了中国共产党正在为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奠定基础。这就是美国共产党批评他的原因，这就是他看到一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理由。

各种评论表明，美国人是如何短视，他们在读“红星”时又是多么片面。海伍德·布龙新近转入天主教，而且强烈反共。他利用自己在“本月最佳图书俱乐部”的地位，反对将“红星”作为俱乐部的入选书——至少斯诺是这样听说的。如果事情果真如此，这只是个较大的例外。事情看来不可能，但10年稍长的时间内，评论家的确很少提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某些短评，除了引用书名外，甚至都不使用“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赤色”等词。重点在于共产党人的抗日活动，他们的短期改革，以及斯诺为得到这些事迹所进行的冒险。《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指出：“这些‘赤匪’与我们通常所称的爱国者极其相似。”《密尔沃基新闻报》指出：“人们不难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那些原始的基督徒的信仰间找到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少数评

论家注意到，斯诺同情共产党人（有许多人直率地说，他是个客观的记者），或者他“对蒋介石的批评可能过于严厉了”。即使这样，他们最终还是对斯诺持肯定态度，罗杰·S·格林在《伍斯特电讯报》上的说法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格林曾在中国工作多年，除干其他工作外，他还当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而且，他支持蒋介石。虽然格林发现，“（在斯诺的书中）有一种使人生疑的感情，这种感情可能削弱了他的判断力。但其他人士却为我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足以说明他的结论至少是正确的”。

几年后，约翰·根室问：“赤色分子怎么会成为共产党人的呢？”他引用斯诺采访毛时，毛的话说：“按照我们的标准，两者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共产党人想使生产国有化，但那还是“遥远未来的事……中国共产党人目前想努力推进的是农业改革”。

观点上的重大分歧，使斯诺与其他美国人产生了隔阂，他希望能进行弥补。同其他美国人一样，他对抗日统一战线满怀热情，但他对国共合作的理解与别人不同。别人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而斯诺看到的，是国民党参加中国共产党。此外，他对在中国进行的国内改革有着与他人完全不同的理解。首先，他非常关注中国发生的变化，而他人则不然；其次，他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已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削弱了民主。他将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是建设性的。不过，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有信心。他们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处于发展的顶峰。某些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实际上宁愿要法西斯政府，而不要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政府。使他们感到焦虑不安的，只是法西斯的侵略扩张。

一天晚上，斯诺与哈里·普赖斯坐在壁炉前，详谈他去保安的旅行。最后，普赖斯说：“埃德，这简直太生动逼真了。真令人难以置信。”

斯诺答道：“实际上，我只是讲了我所看到的。”

虽然《红星照耀中国》被人们误解，但它仍是一部不朽的著作。虽然书中存在不足之处，但绝不会抵消和否定它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大部分是基于斯诺诚实逼真的报道，同时，按照普赖斯的分析发现，有些也是以其浪漫的理想主义和偏袒为基础的。促使斯诺引人注目地到共产党统治下的西北去的原动力，首先是由于他渴望冒险，其次是因为他不愿被北京或上海的一份差事或例行的会议束缚住。他对民众有着强烈的同情心，因而可能比其他记者的冷嘲热讽式的报道更为深入。在苏区，中国人真诚地与斯诺交谈。斯诺也凭着自己的直觉，去理解促使民众反抗外国侵略的目的和愿望，并进而理解共产主义对中国人的吸引力。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未来成功的关键。尽管斯诺对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但他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重新改造马克思主义，以便使其适合自己独特的情况。

在《红星照耀中国》发行的当月（1938年6月），斯诺在回答阿夏蒂克斯时写道：“（红星中的）事实是有些出入，而且可以肯定，判断和分析也有错误，其中一些还涉及到苏联。”毛和他的支持者们试图借用斯诺之口，将他们的主张公之于世。正如斯诺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的那样，他过分地全盘接受了他们对共产国际的批判。斯诺并未彻底了解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规模。他过早地将毛的对手王明搁置起来（只有一次提起过他），而后，却又拐弯抹角地提到了毛对他的指责。

斯诺不得不依靠第二手材料，而第二手材料往往是不可信的。在他为当时不在苏区的贺龙和朱德写的传记中，有不少谬误。不过，他还是成功地采用了标准的新闻写作手法，将问题缩小到最低限度。他在“红星”的大部分篇幅中，只是稍带修饰地记述了共产党人讲给他的故事（毛的自传占了大约60页，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的）。虽然这并不能保证其准确性，但却能挽救斯诺，

证明他并未将未经证实的材料当做事实来写。他提醒读者，他只是使用了客观的报道方式。多年来，全世界只能听到国民党一方的观点，这一次，人们有机会听听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了。

尽管斯诺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工作的，但他只犯了很少的错误，这一点比他的几个错误要意义重大得多。没有出现更多的错误，证明了他的判断力、作家小心谨慎的直觉以及他的独立性。斯诺拒绝在保安写报道，也没有让毛检查。他提问时毫不留情，记录时小心翼翼，常常工作至深夜，对材料进行整理和仔细思索。他还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具有分辨细节的眼光。他注意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已近3年没有读到共产国际的《国际无产者通讯》了。这一事实比关于苏联对保安日常工作施加影响的任何一个政策声明都更能说明问题。斯诺对材料进行了鉴别，并删去了江西苏区的资料，因为他无法去核实。他对周恩来提供的有关红军的统计数字心怀疑虑，在笔记中写道：“象多数中国指挥官一样，红军指挥官夸大自己的数字。”斯诺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某次要求的怀疑。他推测，共产党人在反击蒋的第五次灭绝性围剿中利用了农民（虽然他们否认这一点）。他注意到，共产党人利用长征走向西北，将自己放到与日本人作战的位置上，同时还利用长征，使之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武装宣传。”

斯诺在谈到自己的报道时，对约翰逊大使说：“无论我同情什么，我仍然是密苏里人”。密苏里州，是个崇尚“眼见为实”的州。

对自己在报道中采取的细致谨慎的态度，斯诺引以为荣。纽约《太阳报》的一位评论家怀疑斯诺对共产党在长征中每日所走的平均路程的计算时，斯诺立即回信说明自己是如何得出这个数字的。斯诺真是好样的。

“红星”可能是本世纪美国人作为外国记者所写的最伟大的

新闻报道类的著作了。它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历史记录，是关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毛、周及其他领导人生活以及长征的原始资料。它遥遥领先于其他（那些由后来去苏区访问人所写的）报道，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准确，还由于它对中国即将发生的事件有明确的说法，即中国共产党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真正和完整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不肯听任莫斯科的摆布。同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

“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会遭受挫折，可能会暂时退却，可能会暂时看起来奄奄一息，可能会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甚至可能会在一个时期内默默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它最终将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这本书所证明的，如果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

阿奇·斯蒂尔多年后指出：“斯诺的书向鲜为人知世界开启了一扇窗户，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看法。”这句话只说对了一部分。的确，斯诺将中国共产党人介绍给世界，但他未能改变数百万人对中国事态进程的看法。美国人赞美中国共产党人，但并未完全理解斯诺所看到的事物的重要意义。

正如哈里森·史密斯所预见到的，斯诺打破了写中国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的“奇特的禁忌”。在此过程中，他成了混血儿，一只脚牢牢地踏在密苏里的土地上，另一只脚则踩着中国的西北大地。然而，美国人还是将斯诺看做地道的美国人，一个具备霍雷肖·阿尔杰个性的人。“红星”出版时，斯诺只有32岁，但已被收入《美国名人录》的下一版了。他有广泛的新闻报道才能和竞争力，他是故乡的英雄。

《堪萨斯城明星报》的报道说：“绝大多数人失去了幼年时

的浪漫主义情调，安心在办公室或工厂里工作，而埃德加·斯诺新近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全国各地均获好评。他体验了自己在西港中学学生时代所梦想过的冒险，同时，在报道一个令人困惑而又复杂的国家方面确立了自己的威望。”

第四章 烧焦的土地

《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的特别畅销倒颇出乎斯诺的预料。1938年1月该书在书店开始售出时，斯诺正在采访报道日本人对中国沿海的进犯。斯诺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任何消息（而实际上该出版公司没有斯诺的通讯地址），他担心出版公司对他的书已失去了兴趣，因而推迟出版，所以他曾给代理人写信说：他感到书就是出来了，销路也不会太好。

斯诺的担心是很容易理解的。那是每个作者在书稿寄出后所常有的，特别是为他这部劳动结晶成果的助产者与他相隔万里。不过斯诺的担心还反映了一些其他方面，对他来讲是特定的和更深层次的问题。他深切地希望美国人能自然而然地接受他的书，他想要美国人了解他在中国所目睹的一切。可是他所知道的一切表明，美国的态度恰恰相反，美国对远东不太关心，更不必说让他们考虑应在远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了。因此，多少知道一些《红星照耀中国》畅销情况的斯诺认为，此事根基并不扎实。

斯诺知道他所能做出的唯一反应就是更努力地解释自己。一个前住中国的传教士在给《堪萨斯城明星报》的信中写道：“红军在一片丛林中杀死了40个无辜的儿童。”信中还对《红星照耀中国》中关于红军在抗日前线的描写进行了攻击。斯诺给《堪萨斯城明星报》写了一封两页的回信，驳斥了“对中国人民的诽

谤”。

大约与此同时，斯诺给美国共产党书记埃尔·白劳德写信。斯诺知道，美国共产党对他不满之一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把共产国际描写成苏联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而非世界革命运动的首脑机关。曾在中国为共产国际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白劳德本人是应该接受这种批评的。斯诺在写给未曾谋面的白劳德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并非共产党员，我不想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回来。”斯诺又写道，他本可以根据他掌握的“充分材料”把共产国际写得更糟些。共产党人之间互相冲突的琐事分散了他们的主要任务——反对法西斯，“天晓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人民阵线时期，它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斯诺问道。

“中国和共产党军队需要在各个方面得到帮助和同情，我最关注的也就是对中国的援助。”

斯诺的反应与许多爱国的中国人是一样的。正如鲁迅所写：

“昔日的文学犹如隔岸观火，而今日的文学，因为作者本身也被火烧火烤，感受深刻。而一旦他感同身受后，作者就一定会投身这场社会斗争中去。”

国民党痛苦地意识到，斯诺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报道也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936年之前，许多中国与西方人一样，对红军所知甚少，他们往往把朱（德）、毛（泽东）当作一个人的名字：朱毛。斯诺对红军的访问改变了中国的平衡。他不仅介绍了红军领导人，而且是第一个向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的独立记者。这些政策使共产党对全国领导权的要求有了可信赖的基础。对此，共产党也非常清楚，他们特地发行了的一个小册子介绍斯诺对毛的采访。斯诺意识到，他在苏维埃地区出现这事本身对中国共产党就很重要，因为这证明了他们声称的他们是名副其实地在进行一场国际革命运动。

斯诺无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他把最初几次的新闻稿分

送给全国救亡总会的一些作家和教授。这些稿件先以中文版的《中国西北印象记》出版。1937年7月，斯诺写完《红星照耀中国》后，把书稿交给了全国救亡总会，条件是他们答应把他们翻译出版此书的所有收入交给中国红十字会。为了减少麻烦，他们把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国民党极力阻止《西行漫记》的传播，但不久连非法翻印的版本也出现了（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后，一位中国学者写道：终于可以看到《红星照耀中国》了。）。

斯诺给燕京大学里许多想访问延安的年轻中国朋友提供了地图。他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一些中国人“腋下夹着”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在打听如何能进入共产党在西北办的一所学校。几年后，顽皮的记者爱泼斯坦在访问共产党控制的西北地区时，随便地问一些中国人：“你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他们的典型回答是：“看了斯诺的书。”正如费正清所讲的那样，“《红星照耀中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国民党极力诋毁斯诺对共产党人的报道，然而却枉费心机。斯诺关于蒋介石被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反叛者绑架的报道，也使国民党非常不快。新闻审查官扣押了斯诺的书。政府发言人李某通知斯诺说，如果斯诺对此事作进一步的“宣传”，将会导致他们采取特别“措施”——威胁要取消他的采访权。斯诺花费了很大精力来防止国民党采取这种报复手段，他仍在毫不畏缩地进行如实报道。斯诺在后来写给李某的信说，他的真实而准确的报道，不仅不会伤害国民党和中国，相反还会促进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和解。“且不说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任务是什么。我相信国共合作会在各种意义上为创造一个强大团结和有战斗力的中国奠定基础”。在写给李的信中，他使用了给白劳德的信中类似的一句话：他还有“大量可以用作‘攻击目的’的材料”没有使用。

正如斯诺所暗指，为了中国起见，他乐意审查自己的报道。周恩来在与斯诺的多次谈话中批评蒋象一个无能的骑手一样亲率

部队奔赴前线，致使其部队遭到惨重损失。后来，统一战线初现雏形时，周恩来担心他的这番评论会引起蒋委员长的反感。他通过地下渠道给斯诺捎话，要求斯诺不要把他的话收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可当时斯诺已把周的评论收入了。周的要求使他有些不快，但他还是删去了周对蒋的这些评论。《红星照耀中国》异乎寻常地没有对蒋的批评，在某几处斯诺还称赞了蒋几句。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几个月之后，斯诺采访了蒋夫人。宋美龄发表了一个半小时的指责性的长篇激烈演说，猛烈抨击那些批评她丈夫的人。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生、国民党政府发言人董显光吓得双手直发抖。斯诺认为这次采访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素材，但他仍同意不将之公布于众。斯诺当时正倡导一个工业复兴项目，他不愿失去蒋夫人的支持。

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战线的，也并非斯诺一人。当时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即使拥护共产党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与拥护国民党的J·B·鲍威尔，在此期间也结成了亲密的朋友。鲍威尔曾写道：他宁要“中国的土匪，也不要那些日本的恶棍”。长期以来，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与英国控制的《字林西报》相互敌视，几乎在各个方面相互攻击，但他们都拥护国共结成统一战线。为了不削弱国共联盟，许多记者都撤回了一些批评报道。

如果斯诺善于与人相处，他绝不会感到不愉快的。他的处境是相当复杂微妙的。由于他接近共产党的消息灵通人士，因而他的新闻报道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他也感到责任重大。因此，他感到有义务报道出共产党在思想和政策上的某些细微差别，同时又恐怕给统一战线带来破坏作用。他可以删掉一些他认为是不那么重要的内容，但他不同意剔除真正重要的东西。斯诺采访毛的内容刚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马海德就从西北给斯诺写信，转达了毛的一个要求。在报道采访毛的内容的最后一小段，斯诺

猜测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时期不会放弃阶级斗争。马海德在给斯诺的信中说：毛说共产党不会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阶级斗争，但目前还是不强调这些为好。尽管毛提了这个要求，但稍后问世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是写道：阶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8年，斯诺在汉口也面对一个类似的要求。美国共产党对《红星照耀中国》提出了批评，并有证有据地说中国共产党在某些问题上把斯诺引入了歧途。斯诺为此非常烦恼。他花了很多时间重估他对红区的印象。在汉口，斯诺问博古如何看待《红星照耀中国》中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没发挥好作用的内容，博古回答说：“你的批评稍微硬了些，你所讲的一切全是事实，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不希望谈论这些。”

博古的劝告没有引起斯诺的重视。不久，他就给《红星照耀中国》写了一篇简短的补白，借此机会对中文原版做了少量修改。他隐去了毛泽东对王明的尖锐批评。斯诺写道：王明“肯定已经发现即使是在红军主力集结的地区，他也难以搞到为共产国际写报告所需的精确情报”。斯诺没有把王明在俄国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描写成“令人震惊的”。斯诺也对书中批评奥托·布朗的内容和批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倒退的内容做了温和处理。

斯诺的这些修订后来成了他屈服于苏联压力的证据。毫无疑问，共产党对他的批评(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他在给白劳德的信中说，他“已主动地删去了《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那些我认为会得罪共产党的句子”。但是无论他用什么语言来抑制白劳德的批评，只要仔细阅读斯诺的修订文稿，就会发现他只对有些观点作了反复推敲润饰，而并未全部遮掩。结果这些观点使中外共产党人更加恼火。斯诺仍然把中国共产党人描写成可靠的社会革命党人，共产国际“仍然要为中国共产党痛苦的成长过程所遭受

的挫折负责”。斯诺对“中国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红军开始完全自发地在中国人领导之下”的陈述没做任何改动。为了尽量改善共产党内部的分歧，斯诺在修订本中说：“现在援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共产国际已不能动用‘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庞大资源，只能象一个可怜的继子那样走一步看一步，如果举止稍有不当，就很有可能被正式取消继承权。”因而，这个修订本，也仍不被苏联共产党或美国共产党所欢迎。斯诺应该想到他得罪了中国共产党人，因为他当着他们的面更明确地批评了他们以前的失败。

高昂的统一战线的热情，也使斯诺卷入筹办一个新杂志，以推动中国抗日事业的前进。创办新杂志的想法是左翼基督教传教士丁·斯宾塞·肯纳德提出的。肯纳德曾在日本出版过《基督教画报》，后来由于受到日本军政府的压制被迫停刊了。肯纳德从“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得到1000美元，希望再次在中国出版他的刊物。他问斯诺夫妇是否愿意为他编辑《应用基督教伦理学杂志》。

斯诺那时已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定期为伦敦《每日先驱报》撰稿，还要急于完成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和杂志的约稿。而佩格，则是个社会活动分子，她非常想获得一个讲坛，因此热衷于承担此事。在一次时装展览会结束后，她把她丈夫也拖来一起搞。佩格着手筹办出版《应用基督教伦理学杂志》之事，而斯诺觉得如果只是偶尔写些文章，他也乐意担任该杂志的编辑。其他人则不得不帮助干些编辑部的杂活和筹措资金。

斯诺夫妇成立了一个代表各方面意见的编辑部，并聘请约翰·利宁作总编辑。利宁是个年轻的英国人，他经常穿一件高级绒衣，玩弄着一个长烟嘴。利宁曾为工党的下院议员休·多尔顿当过秘书。后来，作过一次自由的环球旅行，到过中国。利宁以前曾干过新闻工作，有一定的新闻编辑经验，此外没有从事过别

的职业。他也愿意接任总编辑工作，条件是在该杂志社租用的便宜住房中食宿。

编辑部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每次开会都长时间地争论不休。佩格提出了许多建议，比如：为什么不向中国人那样从右向左排字？为何不在标出文章和作者姓名的封面上避免大写字母？但佩格的这些主意对编辑部不起什么作用。因为采纳了她后面那个意见，导致了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E·T·肖的辞职。肖说他来中国不是教人如何不合规范地使用标点符号的。其他人也效仿肖辞职不干了。利宁不愿把杂志叫作《应用基督教伦理学杂志》。最后，他把肯纳德拒之门外，拒绝发表他的任何文章。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引起了苛毒的讽刺，以至于当晚该刊第1期出版时，佩格流着泪认输了。斯诺承担了更多杂志出版工作，这是刚开始时他所不同意的。然而当时，他也许就象他在医院做肾结石手术一样高兴。

最后，大伙一致同意把这本杂志定为《民主》双周刊，它的基本使命就是保持民主意识在中国的活力，具体地讲，就是象它在创刊号上所保证“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支持言论自由”。

斯诺在初期的某次会议上发言说，《民主》杂志“将会给已告失败的事业以支持”。J·B·鲍威尔是这本杂志的热情支持者，但他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他估计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都会来找《民主》的麻烦。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国民党最先发难。中国的法律规定，象《民主》这样的杂志必须有担保人，可警方却找了各种借口对编辑们提供的担保人予以拒绝。连司徒雷登这样一位亲国民党的燕京大学校长，也未能使警方相信《民主》杂志的经费并非“来自镰刀、斧头之处”，如编辑部一位成员所说。编辑部最后找到一些无可指责的人——一些中国银行家——做担保，但他们的麻烦仍然没有结束。

《民主》的第1期就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开了个大天窗，他们砍掉了毛的照片，那是和斯诺的文章一起登的。此后，国民党宣传部通知在《民主》杂志编辑部工作的两名中国人，杂志“明显地使用了对共产党和人民阵线大唱赞歌的材料，这非常不合适。从现在起，严格遵守新闻法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的几期《民主》既刊登反映共产党观点的文章（有一篇是周恩来写的），也刊登亲国民党的文章。司徒雷登写的《蒋介石将军——一个值得欣赏的人》和另一个人写的批评共产党民主自由理论的文章，也刊登在《民主》杂志上。6月，南京的一家书店给《民主》写信说，他们不能接受更多《民主》杂志了。因为国民党政府禁止他们出售。与此同时，西方人控制下的上海市警察署也把斯诺与《民主》杂志的关系记录在案。

《民主》编辑们为该杂志能得到会讲英语的中国人的赞赏而感到欣慰。非国民党人士，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兼北京市市长孙科赞扬了这本杂志。一些中、英文期刊也相继转载《民主》的文章。7月，日本人占领北京之后，《民主》杂志的任何生存希望都成了泡影。由于印刷商的机器被毁，《民主》第6期夭折了。8月下旬，杂志社刊登通知敬告读者，宣布《民主》杂志停刊，并让订户告诉他们退款地址。

日本人在7月份进攻北京时，斯诺加入了援华外国团体。日本人挨家挨户搜查并监禁拥有现代书籍的人，在斯诺家的院子里，学生们埋了许多书。东北人在他家里架设了一个无线电短波电台。很快在他的家中就聚集了日本人黑名单上开列的中国人。斯诺帮助许多人化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离北京，其他人则翻过紧挨他家花园的城墙逃脱日本人的魔爪。斯诺还帮助一支游击队收藏他们从一座帝王庙里抢来的珠宝，条件是他们释放被当作人质的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劝告他们说：勒索这几个修道士会使国际舆论大做文章，给游击队造成很坏的影响。斯诺写了

《对中国指挥失误的分析》和共产党方面的反映。他将这份材料给贝特兰看过，为了不在中国军队之间造成不和，他没有拿去发表。

斯诺感到日本人随时会对他采取突然袭击，佩格不在身边也使他忧心忡忡。1937年下半年，共产党把他们的总部迁到延安——一个离西安不太远的地方。随着国共关系的缓和，别的记者也开始访问红军总部。斯诺在保安时，佩格曾试图也到保安去，但未能成功。1938年4月，佩格又做了一次尝试，在年轻的共产党人俞启威的陪同下她到了西安。国民党不欣赏西方记者象合众国际社记者利夫那样，把延安比作“童子军夏令营”，即使他亲国民党（利夫后来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方面的经纪人）。西安的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阻止佩格的延安之行。一天晚上，她从西安宾馆的二层楼上跳窗而出，租了一辆私人汽车，向红色首都奔去。

佩格给斯诺写信说，她得了痢疾，斯诺也为她的人身安全担心。他考虑带领一个由欧文·拉铁摩尔、T·A·毕森和菲力蒲·杰夫夫妇组成的小组去延安。杰夫以前做贺卡生意赚了一笔钱，还是一份新办的名为《亚美》的杂志的主编。拉铁摩尔和毕森在编辑部工作。斯诺力图帮助他们与在西安的红军领导人取得联系。虽然斯诺决定不亲自去延安，但他让杰夫一行给佩格捎去了生活用品。杰夫一行和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籍的司机于6月中旬到达目的地时，佩格已在苏区多呆了快一个月了。杰夫一行在苏区呆了三天。佩格要跟杰夫一起离开苏区，但是，他那辆1924年生产的琴马牌汽车已经挤满了人，同时他们也担心一张美国新面孔出现在他们中间，会引起日益提高警惕性的边界卫兵的注意。因而佩格决定乘下一辆红军货车返回。不幸的是，从7月下旬到8月的滂沱大雨冲毁了道路，卡车短期内不能出发了。

斯诺对朋友们悲叹，他想念妻子。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少有的

事情。在北京有人夸张地散布他们夫妇的流言蜚语。《民主》编辑部成员、北京医学院的社会工作者艾达·普鲁伊特回忆说：当时，一个典型的说法是：“斯诺怎么能与一个喋喋不休的佩格合得来？”虽然斯诺几乎受到每个人的欢迎，但佩格却咋咋呼呼，且讲话从不饶人，因此，许多熟人不跟他们夫妇来往。有些朋友认为佩格好象在和丈夫竞赛。数年后，佩格回顾两人不同的个性时说：“有一次，斯诺问我‘你为何老指责我？我可从来没有说过你。’我惊讶地发现这是真的。”尽管有这些差别，但他们伉俪对中国的看法和他们的事业心还是相似的。海伦·斯诺的书是研究他们那个时期的生活脉络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虽然没有太多的温情脉脉，但他们的婚姻却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地。

由于佩格迟迟不归，加上收到她那充满命令和指责的信件，斯诺也发开脾气了。“你总说要乘下趟车回来，可别人总没完没了地问我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我想知道你是否近几周或几个月内不打算回来，好让我不再时时挂念。”

雨停了，佩格的答复也终于以电报形式传到了斯诺手中。虽然内容被歪曲了，但斯诺还是弄明白了她的原意。“我很好，你能来最好。”斯诺决定把佩格接回来，然后去上海。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要他去采访上海之战。

离开北京之前，斯诺承担了另一项使命——帮助处于险境的中国朋友。五个月之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疗养肺病来到北京郊外的一座庙中。日本人进攻北京时，她正躲在城里徐冰教授的家里。徐教授以前曾用隐显墨水写信邀请斯诺访问中国共产党人。邓颖超和徐的妻子想逃离北京，斯诺同意帮助她们逃到港口城市天津。

此事过后多年，人们对这段小插曲众说纷纭。艾达·普鲁伊

特回忆说：在斯诺帮助下逃跑的人中，有一位是曾藏在她家里的红军将领，但是，陪同斯诺的贝特兰和斯诺本人都没有提到这位红军将领。周夫人后来对斯诺关于她在逃跑时化装成一位仆人的描写提出了异议。无论如何，有关这段轶事的许多资料表明：当时的逃跑是既艰难又危险的。

9月初，斯诺、贝特兰和他们的红色同伴来到北京火车站。他们挤上了数周来发出的第一批几列火车中的一列，人们似乎要把整个北京城都塞进这列散发着浊气的火车里。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尾端，斯诺找到了一个座位。火车东摇西晃地驶出北京站时，贝特兰靠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车尾围栏上，向普鲁伊特挥手告别。

一路上，火车频繁停驶，给日本军用列车让路，本来两个小时就可走完的路程，结果走了14个小时。途中，斯诺躲进了车上的盥洗室。他确信一旦他的随行人员暴露身份，他就会遇到大麻烦。当晚火车到达曾被严重轰炸的天津时，斯诺更加担心了。目光锐利的日本哨兵在车站站台与英国租界之间几百码长的地段边来回巡逻。日本兵从火车上拉下12个中国人，领着他们绕道向一辆军用卡车走去。一个绷着脸的士兵检查了邓颖超的稻草袋行李，把袋里的东西倒了一地，然后放他们通过了有刺铁丝网关卡。斯诺和贝特兰把共产党人平安地送上路之后，决定从天津乘轮船南下。离开天津前，斯诺给佩格拍了个电报，建议她只要有可能，就立即赶往青岛。可是后来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差错。斯诺和贝特兰在青岛没见到佩格，于是又乘火车去了西安，希望佩格至少已到了那里。他们赶到西安后，却得知佩格已在几小时前乘绿色快车离开了。西安警察部门急于让斯诺与其妻子见面并让他早日离开这座城市，于是给铁路沿线打了电话。四名警察把佩格从绿色快车上拉下来，推上了返回西安的火车。相聚后，斯诺夫妇与贝特兰豪饮畅谈，直至半夜。

贝特兰决定去一趟红色中国，他还从没去过那里。同佩格一

道从延安到西安的史沫特莱也决定再回去。起初，斯诺夫妇也考虑是否与他们一道去延安，但最后还是决定去东海沿岸。在向东行的路上，他们看到佩格离开西安时乘坐的绿色快车歪倒在铁轨旁。原来，佩格刚下车，日本人就炸了火车，许多乘客丧生。

在青岛，斯诺夫妇尽情享受着这里的一切。战争使这里看不到别的游客。他们用了两周的时间游览了德国人修建的码头，他们穿着租来的游泳衣，在白色的沙滩上漫步，吃着冰激凌。他们决定退掉他们在北京的房子，尚未痊愈的佩格留在青岛休养，斯诺先去上海，待上海安定后，佩格再去那儿与丈夫团聚。

10月9日，斯诺离开青岛。他到达上海时，中国军队已向日军发起了反击。斯诺从上海发出的第一篇稿子写道：“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日本人至少向上海投掷了60吨炸弹。今晚，中国的两个飞行中队从我头上飞过，去回敬日本人的空袭。我站在码头上，周围弹片横飞，离我不远的一扇门被一块弹片击中了。”

上海之战始于8月初，日本人骇人听闻的狂轰滥炸使得上海人的尸体堆积如山。J·B·鲍威尔竟看到血在水沟里流淌。许多记者蜂拥上海，报道中日上海之战。斯诺来得较晚，他期待着看到更多的交战情况。当残酷的战争持续进行时，他的确如愿以偿了。不过，他非常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他在11月初发出的一篇报道中写道：“日本人失去了一次取得速胜的机会。现在这场战斗已进入了缓慢的堑壕战和狂轰滥炸阶段。这个阶段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四天后，他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在这一战役中阵亡的将士：“今日凌晨1点，这个持续了88天，使中方伤亡125 000人的战役，由中国指挥官降下了帷幕。”

上海之战的最后一天，斯诺站在法租界里一个摇摇欲坠的阳台上，这里离中国领土只有50英尺。他和一群摄影师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在坦克和猛烈的空中、地面炮火的掩护下，打退了中国军队的场面。午饭后，斯诺和伦敦的《泰晤士报》摄影师马尔科

姆·麦克唐纳以及美国驻上海的武官、海军少校埃文斯·卡尔森站在一家法国发电厂的平台上，看到战线不断变动，他们刚要爬一座塔，日本人的机枪突然向塔塔塔地扫射过来。他们只好隐蔽在一堵墙的后面。从墙后出来时，他们发现塔上滴着血。斯诺看到被切断后援的中国军队爬过带刺的铁丝网，钻进了法租界。卡尔森登上通向塔顶的梯子，背回了伦敦《每日电讯报》通讯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的尸体。彭布罗克的头部被打穿了。

伦敦《每日快报》记者O·D·加拉格尔感到不能抢先发同事遇难的讣闻，就把自己的采访报告发给了彭布罗克所在的《每日电讯报》。斯诺和卡尔森当晚开了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酒，那是孙中山夫人撤离上海前清理酒窖时派人送来的，他们以此来悼念彭布罗克——此次战斗中唯一被害的记者。此后不久，斯诺保了一份5000美元的人身保险。

12月，日本人以强大的攻势威逼南京，但中国并没有屈服。政府和民众开始向辽阔的内地撤退，身后留下被烧焦的土地。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对斯诺说：“看一下地图你就会发现，日本与中国相比是多么渺小。我们必胜，这会有人怀疑吗？”

中国人产生了一种新的团结精神，它被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是奇迹，它将使日本人窒息在它那宏大的勃勃雄心之中，它给人们以最大的希望。孙夫人在秘密撤离上海前写给斯诺的一封信中说：“中国人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过。他们在为世界和平、改善社会、经济秩序、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共同斗争。”

在全国，毛泽东、朱德的照片与蒋介石、孙中山挂在一起。在内地，长江边的汉口——离海岸线约600英里的中国的新首都，周恩来在国民党全国非常委员会主席团任职，并担任国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在200多人组成的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中，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30多人参加。共产党人自由地印刷报刊，有人认为国民党在资金方面给他们提供了帮助。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军事胜利。1937年，因统一战线而改换番号名称的共产党部队在长城南部的一个环状地带平型关，打死、打伤、俘虏日军精锐部队4 000多人，摧毁了远离日军前线的一个机场上的21架飞机。在山西和河北，共产党训练的自卫队四个月内消灭了36支小股警卫部队。

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蒋介石正在运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战术。蒋终于敢做敢为了，他烧毁了日本人在青岛的厂矿企业，“书写了中日战争的新篇章”。4月，在台儿庄，蒋介石的军队用运动战术给了日军一次羞辱性的打击。两个月后日军才缓过气来。

亲眼目睹了上海保卫战的埃文斯·卡尔森，对这场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这种精神总结为“工合”一词。在读了《红星照耀中国》后，他想亲自去红区看看红军是如何成功地作战的。斯诺为他搭了桥，毛同意卡尔森访问红区。在统一战线的热潮中，卡尔森的上级和蒋介石也为其延安之行开了绿灯。后来，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尔森把红军的战术和“工合”一词介绍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的一个雷达营。

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的修订版出版了，其中有50页是新增的内容，斯诺写道：“在中国的山河、平原、山谷这些广阔的活动空间里，日本人不仅会遇到穿军装的中国军队的抵抗，而且也会遇到亿万男女老少、全体民众组成的劲旅的抗击。他们将在革命的讨伐中，为他们的家园、自由和未来而血战到底。”

所有这些都使斯诺受到了鼓舞。他象曾把蒋介石称作“团结有力的象征”的美国大使约翰逊一样为之振奋。蒋介石搁置了对日本绥靖的所有借口，终于成为全国的领袖。虽然斯诺还是从智力、军事和行政等各方面来审视蒋委员长，但他从蒋的平庸处看

到了优点。公允地说，蒋大体上尚能与国内的进步力量协调行动。斯诺在为《外交》季刊撰写的题为《富有斗争精神的中国委员长》一文中预言：“蒋、中国军队和蒋以总裁身份代表的政府，将使中国和平地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深刻变化意味着人民将逐渐拥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民主意识和公民权；意味着被长期推迟的反封建的土地改革的完成；意味着具有农民特点的群众权力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一体化和随处可见的深刻的社会变革。”

虽然斯诺有着上述积极的感受，但他每天也在想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小小的办公室位于上海市中心一座大楼的顶层，从窗口眺望出去，都是令人窒息的情景。昔日拥有中国70%的工业生产能力的上海，现在却瘫痪在一片瓦砾之中。大约有80万名工人失业，50多万人露宿街头。斯诺和上海市工部局的工厂督察、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在街上行走时，经常会看到这一惨景（路易·艾黎和斯诺是在经济大萧条的1929年相识的。）那些还算走运的中国人，在难民营里找到了栖身之所，500人挤在一个小棚屋里，勉强隔成三层，每一家占一层。这些难民营里每天平均有200人死亡。在一次访问难民营时，斯诺看到一个难民营中拖出了60具尸体。饥荒特别严重时，斯诺和艾黎曾从法国租界一幢楼的顶层给饱受饥饿之苦的中国人扔过馒头。

从废墟和绝望中，斯诺看到了西方经营的通商口岸旧制度的末日。在上海之战结束前，金融家宋子文告诉斯诺：“上海的陷落，使得在内地组织一种新型经济基地和国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建立一种新型贸易成为必需”。当晚，斯诺和艾黎一边饮酒，一边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组织办法，能为急需的衣服、化学药品、酱油、酒精、纸张、烟叶、机器、生铁、火柴、科学仪器、胶鞋、玻璃和面粉等提供新的来源？佩格到上海时，正赶上日本人为胜利而游行，帮助中国发展一种新型经济基

地的想法开始形成了。

在约翰和斯特拉·亚历山大举办的宴会上，发动战争的经济原因成了人们的主要话题。热心的英国外交官亚历山大争辩说：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会给国际和平提供良好的基础。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你还会有的什么主义的社会里——合作都是民主的基础。这是无可争辩的。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什么都可以建成。

佩格再三考虑了上述观点，她赞同合作社可以给背井离乡的中国人提供工作，并大大提高战斗力的看法。她开始为此事奔忙。斯诺没有象妻子要求他的那样尽快表示赞同，但这个想法却强烈地吸引着他的人民党的本能，并使之与他过去的经历结合起来。五年前，斯诺曾热情地报道过河北省的一个群众教育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合作自治的多种成分得以结合。1936年，他在西北看到了共产党的合作社所取得的成就。斯诺终于认识到，后方的工业组织有很大好处。工业合作社可以给人们提供急需的工作，给战争提供帮助，同时也给中国工人提供管理自己组织的机会。佩格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结识的艾黎，对建立合作社的想法也很赞赏。不久，包括亚历山大、前燕京大学新闻学教授梁士纯和中国银行家苏星洛（译音）在内的一些人，开始认真讨论有关“建立农、工消费合作社”的事情。第一次正式讨论会议在静安寺路斯诺夫妇的寓所召开，会上大伙一致认为艾黎是领导这项运动的最佳人选。

这样的一个项目的确需要艾黎这样的人。艾黎是一个豪放而朴实的人，能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碎核桃。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来到中国。这位爱尔兰血统的单身汉深深地爱上了中国，他收养了两个中国孤儿。他用了最大的努力和决心力保中国工厂的安全。艾黎愉快地接受了创办工业合作社的挑战，并草拟了一个计划：他想象着如何把三种工业合作社团体结合成一条友

谊合作之线，把最有机动能力的工厂建在最靠近前线的地方，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建立矿井和重工业。斯诺把这些企业命名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它又经常被简称为“工合”。“工合”后来就成了艾黎的电报挂号地址。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口号和卡尔森的口号一样，都是“工合”。

J·B·鲍威尔、兰德尔·古尔德和《曼彻斯特前卫周刊》的澳大利亚籍记者H·J·坦波雷经常参加计划讨论会，为这一计划寻求公众的支持。争取公众支持这一繁重工作的主要责任，落在了会员资格审查和宣传委员会主席斯诺的肩上。虽然组织者们热情很高，但他们发现筹措资金的一些组织和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的计划没有兴趣，也不打算给予真正的支持，而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又必不可少。他们很早就把创建工业合作社的设想计划书寄给了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然而没有回音。斯诺的首要工作，就是撰写一本名为《人民的反击！——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经历》的小册子。他和艾黎支付了印刷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费用。6月，当这本小册子问世时，工业合作社仅从法国的工会得到了很小的一笔捐助，他们仍需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

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的到任，使斯诺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伙伴。新大使以蔑视美国人著称，但对《红星照耀中国》却非常感兴趣。他到上海后首先要见的人士中就有斯诺。克拉克——克尔对寻求非官方智囊的兴趣，强烈反抗法西斯主义的言行，以及“叫我阿奇”的随和态度，都使斯诺很赞赏。阿奇博尔德爵士不仅从斯诺夫妇和他的部下约翰·亚历山大那里，也从另外两个朋友——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W·H·奥登那里了解了“工合”情况，当时奥登正与艾黎一起在为一本书收集素材。他们在一篇论述中总结说：“中国需要3万个工业合作社。”斯诺要求帮助他得到汉口政府的支持，于是，这位新任大使直接向蒋夫人提出了此事。蒋夫人则从她姐姐和姐夫

孔祥熙那里强求他们的同意，因为孔将对中国工业合作社实施监督。8月5日，“工合”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可是，不久人们就看出，实质性的支持还是遥遥无期。当时，斯诺正在汉口，住在海军基督教青年会（这里是报刊记者的中心）一套两居室的房间里。可是这座城市也并非乐土。频繁的空袭和难熬的酷热使呆在这里的那些“最后的掘墓人”大有毁灭就要来临之感。斯诺发现一些外国商人希望日本获胜。他们以为，日本人会“开放河流。他们懂得怎样做生意，我们能够与他们相处。”有个人在一次午餐会上告诉斯诺。“最好能再次恢复法律和秩序，它们将使红色商业永远结束。”蒋委员长也象商人们一样不切实际，在一次采访中他告诉斯诺：“日本人在精神上已吃了败仗。没有必要的精神基础，军事行动就不会成功。日本的精神观念是不正确的，因此它不会取胜。”蒋的表态，似乎在解释国民党对“工合”并不真正感兴趣的原因。

蒋平庸的才能，使斯诺对他所抱的热情产生得快，消失得也快。蒋并未象斯诺原来希望的那样奔向国家各种有生力量的中心，而是踉跄着退却了。同一天，斯诺给约翰逊大使寄去了他近期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一篇赞扬蒋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承认：“在此做了一次简单的实地调查之后，我对未来不那么乐观了。但我相信，总的来说，可能性仍一如既往。”

斯诺的信加速了他与约翰逊的信息交流，也尖锐地暴露了斯诺与美国外交决策人之间的明显分歧。约翰逊说：虽然中国早些时候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它只会进行消极的抵抗，而不会主动出击，动员群众起来抗战在“象过去千余年来那样组织的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是行不通的。约翰逊宁愿与蒋介石合作。他打算“把失望和不满发泄在早餐吃的咸猪肉上，并尽可能少地报告他对蒋的怨恨”。更加积极的斯诺却不是这样。他的“工合”计划，他辩解说，“不能由目前这样组织的政府来实施，因为中国

过去千余年来就是如此。但我不排除变化的可能性，甚至来一个迅速的变化，因为当前的形势发展是很急剧的。”

看来，共产党人仍是这种变化的主角。在汉口，斯诺在周恩来舒适的家里采访了周恩来夫妇，并在采访他们夫妇的两天里挤出部分时间，采访了与周一起工作的博古。博古揭露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后说，共产党在江西、贵州和山西的活动都很困难。

“虽然广西的情况也很糟，但至少红色领导人没被捕。”这位活跃的红色使节说：国民党虽然掌握着政权，但“从战术的观点”来看，共产党掌握着全国的领导权。

这种说法仍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国民党打击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共产党则积极招募军人和工人到内地抗日，甚至在汉口的外国共产党人也比国民党表现得爱国。沃特鲁·卡基就是其中之一。斯诺在基督教育年会见到过他。沃特鲁是日本共产党员，翻译过鲁迅的许多作品。在汉口，他冒着生命危险撰写抗日宣传文章。朝鲜和日本的共产党人也向斯诺保证：如果中国政府跟他们合作，提供某些方便，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中国召集一个师。

武汉（汉口和它附近的两个姐妹城镇合称武汉）的防卫似乎更加突出了国、共两党的分歧。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武汉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艾黎的首要工作之一，是帮助把武汉的工业设施运送到长江上游日本人打不到的地方。然而，武汉并非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很快就陷落了。合众社愿意每月支付给麦克·费希尔200美元，如果他能坚持到武汉陷落之日。按通讯社的标准，每月200美元的酬金是很高的。合众社的编辑们估计费希尔最多能在武汉呆三四个星期，可他却是在武汉呆了近六个月。共产党人利用了这个形势。他们特别提到西班牙工人是如何勇敢地抗击了佛朗哥的进攻，保卫马德里达两年之久的，他们敦促政府要“誓死保卫武汉”。由于害怕武装起来的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可能

潜在地受共产党控制，国民党拒绝了“誓死保卫武汉”的计划。8月下旬，国民党解散了“保卫武汉委员会”并暂时查封了共产党的一家拥护抗日的杂志。

斯诺在给鲍威尔的信中写道：“如果武汉和长沙的城市居民被组织、训练和武装起来，如果这些城市周围的2 000万人民也同样动员起来，我坚信，日本人就不可能占领武汉。只要防卫组织得好，武汉就会是坚不可摧的。”

斯诺在汉口采访的项英，就举例说明了这种战斗精神。这位豪放、牙齿稀疏的将军，是新四军的军长。新四军的大部分成员是1934年从江西逃出来的共产党纵队的后卫部队。由于没有赶上兄弟部队，项英的部队变更了部署，从国民党的追击中幸存下来，最后加入了统一战线。1938年年中，在日本人占领的安徽、江西的城市周围陷入混乱的农村，项英着手建立起农村地方武装抵抗力量。为人谦逊的项英，表示出对中国工合的一些合作企业很感兴趣。他抱怨国民党对由爱国农民充实壮大起来的新四军没有给予充分的支持。斯诺回到香港后，在给佩格的信中写道：项英“是我这次旅行中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闪光点之一。他是个真正的军人，而不是个政客”。

由于日本人占领了大片的中国领土，英国人统治的香港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为中国人筹措国际资金的地方。孙夫人在香港领导着中国抗联。斯诺经常帮助它筹措资金。在香港停留期间，斯诺为项英的部队募集了钱款、鞋子和医疗用品，从中国银行行长宋子文（宋是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人士之一，斯诺仍然喜欢他）那里为“工合”弄到了一笔秘密贷款。这笔贷款显示了外界对合作社的有力支持，也使得孔祥熙被迫拿出了早已许诺的政府资金。

斯诺放弃了返回江西与项英一起巡视他的部队作战的想法。一方面他需要休息，难捱的肚子痛使斯诺食不甘味，夜难成眠；

另一方面，他担心佩格可能“非常讨厌”他不断变更计划。虽然斯诺已经把伦敦《每日先驱报》的事务交给了鲍威尔，以便为自己留出更多的时间为杂志撰稿和写他计划中的一本书，但他远没有完成写作计划。9月，佩格来了，他们结清了里帕尔斯贝饭店的帐，使动身前往马尼拉。

气候温和的菲律宾，给斯诺夫妇提供了良好的休息与社交场所。《马尼拉公报》与密苏里州有紧密的联系。这家报社的一位编辑及其夫人到马尼拉港口迎接斯诺夫妇，并立即把他们送到了他们下榻的旅馆，当晚，身穿菲律宾服装的佩格和身穿当地产的亚麻布短衫的斯诺来到马拉卡南宫，参加曼纽尔·奎松总统举行的招待会。在这种盛大宴会上斯诺往往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并能很快交上许多朋友。威廉·巴布科克和夫人波利得知斯诺夫妇没带多少钱，便把他们带到了自己家中。威廉·巴布科克30年前来这个岛国执教，现在是进出口商。他的家，曾一度被作为美国占领军司令的官邸，如今成了给斯诺夫妇的舒服的休憩之所。仆人们每天穿着椰子叶做的半截衣裳，在地板上擦抹，把奈良木地板磨得明光锃亮。海贝壳制成的百叶窗外，是有榕树遮荫的静谧花园。不久，斯诺夫妇又搬到菲律宾凉爽的夏都——碧瑶市，在马尼拉时则与巴布科克夫妇住在一起。

在碧瑶的松树覆盖的山中，斯诺写了一首诗，纪念当地的伊哥洛人——近代唯一割取敌人头颅作为战利品的人。虽然，这首《伊哥洛人的变迁》写得不是太好，但却反映了斯诺的心情和正席卷全球的“恐怖的统治”的密切关注。

倘若这位绿林好汉
能与我们共同期盼，
还要用甚么交通法来规范
这人世浮沉的单程变幻？

除了它本身的不断演化，
何须操心防止逆变。

一旦圣洁的文化向魔鬼投降
管它叫什么元首或酋长，
即令是上帝的子孙后代
它们也要将他迅速地演变成
杀人的魔王

还要美称为：“神灵呀！雅利安”*。

*雅利安 (Aryan) 原为史前期居住在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后被民族歧视主义者引申鼓吹为优秀人种。——译注

在菲律宾期间，斯诺对日本人侵略的担心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达到了高峰。日益加剧的焦虑，促使他反省自己早期所主张的美国应从亚洲撤出的观点。他以不断高涨的积极精神，呼吁美国进行直接干预亚洲事务。

在马尼拉，美国驻当地高级专员保罗·V·麦克纳特举办的晚会上，斯诺见到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在与奎松总统进行的五分钟会谈中对奎松说，菲律宾群岛是能保住的，奎松总统便聘请他担任了菲律宾的军事顾问。麦克阿瑟告诉斯诺：到1940年，他将训练出40万名士兵，到1960年，预备役人员将增至120万人。在此过渡期间的任何时候，菲律宾军队都可以在美军到来之前阻止住入侵敌军的进攻。

正如斯诺所见，入侵已经开始了。日本人早就对菲律宾的石油、镍、干椰肉、大麻、烟草、黄金、稻米、生铁和木材垂涎三尺。据斯诺估算，3万名日本人已抵达菲律宾。在日本的宣传人员向菲律宾人民大肆宣扬东方民族间亲如兄弟的幻想的同时，近百家日本公司盯住了棉兰老岛达沃的农场，这些农场正在迅速变

成日本的领地。斯诺对许多菲律宾商人、记者、医生、律师、教授、家庭妇女和矿工的来访表明，他们对日本人蚕食的恐惧日益加深。碧瑶市的一位伊哥洛医生正在学说日语，许多菲律宾人也在为应付日本人的进一步控制作准备。由威廉·巴布科克充任翻译，斯诺采访了阿奎纳多将军，40年前，他是一支抗击西班牙军和美军的起义部队的领导人。这位“了不起”的老将军虽相信日本人的善意，但也批评了日本人在中国的所做所为。他要求斯诺不要发表他的抗日言论。

斯诺认为，美国1946年从菲律宾群岛全部撤出的计划只会加速日本征服菲律宾的进程，就象日本人在台湾和满洲所做的那样。菲律宾需要有海外市场出口其原材料，特别是糖。独立之后，菲律宾的出口商品就不能再免税进入美国市场，因此，也难以与美国国内生产的糖和古巴糖竞争。对菲律宾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日本法西斯那灾难性的拥抱。斯诺写道：“山姆大叔与菲律宾的诀别正一天天临近，而武士道老板则乘机一天天向菲律宾靠拢。”

尽管麦克阿瑟曾趾高气扬地作出保证，但斯诺却认为，日本的军事入侵将“给美国人民以猛烈的打击”。日本可能对中国发起突然袭击。有些美国军舰可能幸存下来，成功地逃回马尼拉基地。当这些军舰聚集在马尼拉基地时，日本人将会对美国在这个岛上的唯一防御工事——克里基多发起攻击，而克里基多的陈旧的防卫设备是挡不住日本人的。“我们的主力部队能否冲破日本人严密防守的环形阵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帕劳斯群岛，从而有效地援助马尼拉以防止菲律宾落入日本人之手，还是颇令人疑虑的”。斯诺还进一步论证说，美国国会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它否决了一个海军特别委员会提出的为提高重要战略要地关岛的海、空军基地的防御能力而提供的拨款建议。“几年后，这样一场战争将使我们付出比现在更高昂的代

价。”

斯诺相信，美帝国主义者助长了日本对菲律宾的文化、经济和军事威胁。为了攫取自己在亚洲的特权，美国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制造合法的依据，并迫使象菲律宾这样的国家继续软弱下去。尽管如此，美帝国主义还是比日本好得多。斯诺认为，美国人至少“清除”了西班牙统治时期存在的“大量的封建主义”。他们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甚至包括那些割取人头作为战利品的伊哥洛部落群众的教育水平，使得现在菲律宾群岛半数以上的人能读书写字；他们修建了道路、医院和公共设施；还教会人们实行民主自治。在非统治了这么长时间的美国，只有一个合适的行动方针：“继续美国与菲律宾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盟。在菲律宾能够独自承担自己的内部防卫之前，这种联盟是不能解除的。”

同样，斯诺也改变了对美国卷入中国事务的看法。1936年去保安之前，斯诺曾劝告美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脱离和废除长期以来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承认中国”有能力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人卖给“蒋介石每个月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火、飞机和其它作战物资”，应当告诉他们，这样做“他们自己要承担风险”。斯诺又说：“我们不能左右中国的民族自决权。只有中国人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1938年年中，向日本出售废铁、钢和石油之事震惊了斯诺，引起了她更多的焦虑，相比之下，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事已不足道了。在统一战线中出现第一次合作时，斯诺写道：“一个孤立的中国可以打败一个孤立的日本。”

现在，在菲律宾，斯诺改变了主张。他说，虽然美国人仍旧应当抛弃不平等条约；但日本人的侵略更使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所做所为比不平等条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考虑到美国人的自卫和荣誉，他们需要给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斯诺告诉《星

期六晚邮报》的读者们：“声誉和自尊都不允许我们把中国的主权交给日本人。”

在菲律宾，斯诺为给中国争取更多的援助而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在抵达菲律宾后的几个星期内，他一直在为中国抵抗联盟和新四军募捐。他帮助成立了一个菲律宾工业合作社协会，当地华人在资金方面给该会提供了大力支持。斯诺和佩格在碧瑶招募工业合作社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瘦小而可敬的纳塔利·克劳特，他的募捐集会成了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新闻。

虽然“工合”取得了这些成绩，但他们的经历却令人沮丧。日本使节力图阻止斯诺在马尼拉就工业合作社问题发表演说，那位妻子在菲律宾工业合作社协会中任职的美国高级特派员成功地干预了此事。然而，其他方面的攻击却防不胜防。力求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工业合作社结果却成了众矢之的。左派人士抱怨工业合作社帮助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却认为工业合作社成员即使不是“赤色分子”也是左派分子。于是，一方面，有人要斯诺组织募捐活动，另一方面，又有人批评斯诺常抛头露面，给人们留下了工业合作社是共产党人办的形象。这些批评是很不公正的，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斯诺几乎很少出头露面，同时他还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合作。

斯诺刚踏上菲律宾的土地就收到了艾黎的信，信中充满了悲哀和一些责备他的内容。“你对抛头露面已经厌倦，对此我非常遗憾，”斯诺到达两周后，艾黎就写信说，“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国际部，而除了你，没人能胜任。”一周后，艾黎又写信说：“你不能把正在待产的婴孩弃之不管。”几天后，他又给斯诺写信说，由于宋子文的中国银行不愿提供全部贷款，除非斯诺替他“作正式担保。你知道，无论你是否愿意，这件事你得管起来。”

斯诺在碧瑶国家俱乐部自己的住所里给艾黎写了回信，发泄自己的不满。他怒骂跟他一样不遵守时间的艾黎说：“我已经

写了起码有一打的信，但只收到你的一封电报。这是不可救药的。”斯诺同意建立国际委员会对争取急需的支持是必要的，但同时他也感到拿不出钱干更多的事。3月，斯诺给他的代理人写信说：“到这之后，我一个子也没赚。我一直靠积蓄生活，我的存款在锐减。”

4月，他又返回香港帮助建立国际促进委员会，孙夫人是该会的负责人。这项工作拖了三个月，在此期间，斯诺只有很少时间用来写作。

和往常一样，斯诺除了感到疲倦之外又很想家。而且，他越来越担心全面战争的爆发。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存越来越危险。几个月前，他在一架飞往汉口的飞机起飞前一分钟被赶了下来，这架飞机起飞后在途中被日本人击落了。更早以前，日本人在他们国内取缔了《远东阵线》刊物，现在他们又在中国国内对斯诺进行攻击。1939年初，一个亲日的秘密团体在中国宣布了一个“死亡名单”，鲍威尔、古尔德、史沫特莱和斯诺都因所谓“撒谎太多”被列入其中。在上海，日本人匆忙收缴了1600本《红星照耀中国》，无论任何人拥有的此书，包括一名来华的美国人的包中夹带的《红星照耀中国》，都被日本宪兵给没收了。斯诺把香港的事料理完之后，计划到内地参加工业合作社，并同时为一本耽搁了很长时间的书收集资料。他在飞往重庆之前，给在碧瑶的佩格寄去了他的“遗愿”。

重庆，是汉口陷落后中国的首都，在这里斯诺没有感到任何令人愉快之处。记者们都把重庆叫做“最令人扫兴之地”。这座深入内地的四川老城一年四季湿气弥漫，道路泥泞，处处都是粘糊糊的。猪在狭窄、泥泞的街道上随意打滚，政府官员、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住在空气污浊、老鼠滋扰的房子里。当夏天的酷热驱散浓雾时，敞开的阴沟中散发出难闻的恶臭，而天空放晴又招来了日本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使建筑物成为一片废墟。加之腐

败、效率低下的政府，使之一切显得更加糟糕。

尽管斯诺已写下了他的遗嘱，但他仍坚信好运在他一边。

《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夫妇让斯诺睡在他们的两间住房里的一张竹编床上，为他解决了住房困难。大多数晚上，他们三人都与200名中国人一起在地下防空洞里呆几个小时，躲避日本人的空袭。一天晚上，周恩来夫人和新四军的一位指挥官在德丁夫妇处吃完饭走了之后，斯诺提议继续呆在房子里，不去躲那讨厌的空袭。斯诺争辩说，按照概率，一颗炸弹不可能在数万间房子中单落在他们的住房上。但德丁的妻子最后还是说服了丈夫和斯诺与她一起躲进了令人窒息的防空洞。几小时后，当他们从防空洞里出来时，发现他们的住房已成了废墟。斯诺盯着这片废墟说：

“我全部收回该死的概率。”报界的朋友们闻讯后纷纷赶来。他们从书架下面找到幸存下来的两瓶酒，一直喝到第二天黎明。

斯诺发现，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热情大大减退了。国民党传统的权力基础是日本统治下的沿海城市，相比之下，多年来共产党则一直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红区及其影响一直在不断扩大。共产党仍在继续倡导统一战线，但无论联合与否，共产党都拒绝把自己的胜利之师交给国民党指挥。正如毛对贝特兰所说：八路军（新改名的红军）将“独立、自主地”行动。国民党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法”和“警惕共产党在敌后区活动法”。在重庆，一位重权在握的将军兼国民党政治领导人告诉斯诺：他认为共产党指挥的组织是非法的。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的游击队在南方和北方都发生了零星冲突。

“工合”的前途也变得不稳定了。该社成了收入低廉的政府官员的敲诈目标。那些认为“工合”已共产党化的政治集团也对“工合”进行攻击。斯诺在重庆获悉：政府官员逮捕并遣散了“工合”的工人。“工合”把希望寄托在孔祥熙身上，而孔祥熙本人也找“工合”的麻烦。斯诺在一封“绝密”信中写道：“孔

既腐败又无能”。“他优柔寡断毫无主见，经常象饭桶一样被各方面的人推来挡去。”

8月，斯诺险些被日本人炸死，在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中，又差点失去仅有的一条替换裤子。此后，他乘“工合”3号卡车离开重庆，去巡视一直延伸到共产党控制的北方地区的工业合作社。虽然国民党对“工合”百般刁难，但他们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38年12月，“工合”的合作社成员已发展到69个。6个月内，724个工业合作社生产出战争急需的矿石、被服、酒精、工具、肥皂、电器设备、帐篷和食品。这些由当地创办的工业合作社使工人们受益匪浅。“工合之城”宝鸡，有零售商店、学校和“城里唯一一个有淋浴设施的俱乐部”。在成都，斯诺骑着自行车参观了一个拥有150名工人的工业合作社的机器工厂。有一篇关于合作社的文章，很难说明斯诺当时的愉快心情，他写道：“工人们在工作时唱着他们在合作社训练中学到的抗日歌曲。在这种自由的空气中如此美好的感受，使人想起上海工人的黑牢。”

在西安，斯诺发现了国民党排挤“工合”和统一战线的更多的证据。他发现工业合作社的工人，包括艾黎收养的一个中国孤儿被关在集中营里，尽管他们曾给国民党提供过物资。国民党军队封锁了通往共产党首都延安的交通。由于斯诺是“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他又带了宋子文给当地国民党指挥官的一封信，因此，他得以搭乘发往延安的（为数不多的）一辆卡车，踏上了艰难的旅程。第一天傍晚，大雨使道路成了黄汤。斯诺充分利用中途短暂的停留时间教其他乘客打扑克，并为延安的“外宾”窑洞招聘了一名厨师。他们一行摇摇晃晃到延安时，此计划晚了一个星期。

斯诺这次访问延安的理由，是巡视这里的工业合作社，因为它们开办得较晚。1939年初，艾黎在延安为“工合”建了一个仓库，并为当地的生产者协会安排了贷款。可重庆的追加资金并没

到。无论如何，共产党人总怀疑“工合”的资产阶级性质。为了减少共产党的疑虑，斯诺曾给毛写信说：“工合”的原则与共产党自己的综合经济是一致的。斯诺到延安时，已有15家工业合作社开业。当斯诺催问毛如何看待工业合作社时，这位红色领导人强有力地声明：他们对国际委员会使用这些工业合作社给予支持。斯诺离开延安3个月之后，延安开了一次联社会议，投票表决是否改组现存的大约140家走工合道路的生产者协会。

几乎每个到延安参观的西方人士，都认为延安比重庆好得多，而且不只是因为气候的差别。1936年，共产党所追求积极改革的政治纲领，赢得了斯诺的热情支持。他在给埃文斯·卡尔森的信中写道：“延安又新开了数千孔窑洞，整整一英里长……店铺组成了一条新的商业街，街上摆的商品大多是由工合生产的。”虽然日本人的飞机不断狂轰滥炸，但这里的农业生产有增无减，环境卫生很好。在鲁迅艺术学院里工作学习的有500名作家、艺术家、剧作家和作曲家。识字运动在延安受到非常的重视。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王汝梅改名为黄华，在这里担任一个青年组织的书记和一所边区学校的校长。人们为战争做贡献的热情经久不衰。牛津大学毕业的乔治·霍格放弃了合作社记者的工作，来为工合工作，直到1945年因营养不良和缺乏治疗去世。乔治·霍格把人们所说的延安精神概括为：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在民族事业中把同志情谊和平等精神看得高于一切的地方，事情就这么简单。”

毛承担了比以往更大的责任。张国焘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同事们中间。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对他进行审查并让他悔过自新之后，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毛的另一个对手王明，1937年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又企图脱离毛的路线，重新回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战略上去。为此，他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判。后来，王又因擅自行动受到批评。斯诺在访问期间见到了王明，发现他温文

尔雅、非常年轻（当时王年仅32岁），但斯诺也看出，王已没有多少影响力了。

在延安逗留的10天里，斯诺在吃饭时，在打扑克和桥牌时，曾多次非正式地见到已学会打牌的毛泽东。这位红色领导人有一位新娶的妻子——苗条、迷人的江青，她也和他们一起玩。毛比以前胖了，留着短发，给人一种“宽厚”的感觉，斯诺在日记中写道毛的穿着和以前一样简朴，他的三间窑洞里摆着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和一个已没有多少弹性的低矮沙发。斯诺断定，这位共产领导人“仍是人民中的一个普通人，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绝妙的混合体，是伟大的政治敏锐和朴素的常识的难得的结合体。”

斯诺担心毛会怎样接待他。在与毛第一次见面后的3年里，有人散布谣言说斯诺是个外国特务。谣言的起源不知是何方。在中国，传遍了各种半真半假的事情。斯诺曾一度认为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应对谣言负责，但这并没妨碍他们在第二年过后成为好朋友。与此同时，菲利普·贾菲也从在纽约的中国消息灵通人士处听说周恩来认为斯诺是个间谍。斯诺还确切地知道，《太平洋事务》季刊负责亚洲事务短评的海因茨·希普曾告诉毛，斯诺犯了严重错误。斯诺也间接了解到，毛为他进行了辩护，虽然并没有认可他的作品。毛说：“在没有人愿意来的时候，斯诺来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通过介绍事实帮助我们。你没有来。即使他以后做了一些我们嫌恶的事，我们也将永远记住他为中国做的许多好事。”

在延安，毛迅速打消了斯诺的顾虑，他没有提及希普的指责。当斯诺问到《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记述是否准确，毛说，这本书正确地报道了党的各项政策和他的观点。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毛介绍说，斯诺是“关于我们的一本可信的书”的作者。

在两天的正式采访中，斯诺迫切要求毛阐释中共的各项政策，由黄华担任翻译。对于斯诺提出的共产党是否已变成纯粹的

改良主义者而非社会革命者的问题，毛明确地回答：“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者，我们决不是改良主义者……在目前那革命是民族和民主的性质。但到了某一阶段之后，它将转变为社会革命。”毛确认，虽然有了统一战线，但中共“一天、一小时甚至半分钟也没有放弃过独立”。

一个月之前，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在后来的几周内分割了波兰。在痛斥希特勒5年之久后的今天，毛异乎寻常地转而为斯大林辩护，阐明了斯大林这样做的必要性。毛说：张伯伦在罗斯福的帮助下正在组织一个“所谓民主国家”世界阵线，其最终目的是打败德国并孤立苏联。张伯伦准备彻底“牺牲中国以便与日本结盟”。苏联的自卫行动并没有放弃抗击帝国主义。毛注意到：“希特勒是在斯大林的口袋之中”。至于波兰，由于它的政府“受控于英国金融资本”，敌视苏联，拒绝接受莫斯科的援助。“这暴露了它的无能。仅仅两周之后，它就葬身于希特勒的铁蹄之下”。

斯诺则回答说，斯大林的这种作法也许只能加强希特勒的力量，从而得罪了那些曾通过人民阵线支持苏联的人民。斯诺还认为，其结果也许是“斯大林的口袋上有个洞”。后来，当英国试图以关闭缅甸公路这条中国西部的补给线来取悦日本时，斯诺开始怀疑毛是否了解英国的企图。

延安的报纸刊登了这次采访。采访的报道先于斯诺到达重庆，引起了巨大轰动。蒋委员长曾发表声明说，英国将继续支持中国。中国驻重庆办事处的博古对斯诺说，毛不必要地疏远了盟国。斯诺认为博古“似乎比毛更清楚地意识到克林姆林宫这个叛卖政策的‘矛盾’，而毛的观点在延安是无人敢挑战的”。虽然博古不知道是否斯诺必需发表这两次采访，但几周后它们都被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此后不久，国民党封锁了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斯诺成为最后一个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此后5年里再

没有一个外国记者获准前往延安了。

统一战线的恶化是使斯诺感到绝望的原因之一，这促使他撰写了许多集中在国民党首都的记者们不敢写的报道。重庆的新闻检查官说，关于统一战线的消极报道会帮助敌人。记者们同意这种说法。虽然国共这两个以前合作的伙伴已开始了一些小的摩擦，这些记者们仍杜撰了一些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报道。由于同样的原因，记者们惊愕地发现国民党的低效率和腐败。斯诺分享了这种对中国人的忠诚，但他认为，极端的自我检查制度只会使国民党采取无效的战略。1940年中，斯诺打破沉默，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稳定的联合”。遭到厌烦压抑的斯诺这时也很少与在碧瑶的妻子相聚。他虽然克制了批评，但仍然报道了重庆的国民党官员反对统一战线的言论，对外揭露了国民党孤立共产党的企图，并断定统一战线所产生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和谐”。

几个月之后，斯诺在《亚洲》双月刊上报道说：“很明显，政府没有根本的改革，它现在仍然是个独裁政府，也决不会自动改变。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游击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土地制度也几乎保持着原样。在‘工合’以外的其他地区，很难指望工人阶级能赢得什么新权利。”

斯诺对国民党的批评，使他在同行们中间独树一帜。直到1944年，其他的记者才表达出同样的关注。

斯诺是30年代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访问中共总部所在地区的西方记者，这树立了他的中国共产主义权威的形象。尽管如此，他意识到西方读者误解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亚洲战争的生动描写。他在碧瑶坐下来写书时，就力图解除这些误解。他的作品结集在美国名为《为亚洲而战》，在英国则为《烧焦的土地》。

斯诺所展示的共产党人具有某些民主的特点。毛捣毁了蒋塑造的孔夫子神像。他是“大家推举的领导，他的所有决定都是集

体讨论和共同的决议”。斯诺比以前更加确信地说，共产党人不可能实行任何与马克思主义类似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信仰基督的人称自己为基督教徒一样。这两者都在期待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他们可以真正实行他们所宣扬的一切。共产党人把创造一个民主共和国看作通向他们理想王国的一个必要的阶段。“今天的共产党人是相信中国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的不远的将来的最后一批信徒。”

时代将会表明，斯诺用了一个不幸的比喻来暗指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一个未知的时代才能够实现的，虽然他在其它方面讲得很有道理。斯诺注意到，共产党人虽然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从军帽上取下了红星，但他们却把红星别在“内衣左胸口袋上”。那些红星是他们社会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其他组织有很大的差别”，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斯诺补充道。虽然斯大林给重庆提供援助，而留给中共的仅仅是言词；但是，这些来自莫斯科的革命言词却限制了延安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象克拉克——克尔大使这样的人也错误地相信，共产党人是“19世纪的农民民主主义者”，斯诺写道“我真不知道忠诚地依附于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协调与所有这些人的调门……。我个人对此事的感觉是：那些自由主义者，他们把希望建筑在中国共产党是‘与其他共产党人不同的’；‘仅仅是改革者’；为实现他们的纲领他们已放弃了用革命的办法，他们注定最终会醒悟的”。斯诺的分析与许多记者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他们从延安回来后只知道不停地描写“可爱”的共产党人。

和以前一样，斯诺认为战争为中国摧毁地方观念、祖先崇拜、失败主义、文盲和依赖通商口岸创造了条件，从而为中国的真正变革提供了机会。“一个走出死亡之谷的国家将比走进去的更伟大，也比正在图谋灭绝它的国家更伟大”，斯诺在《星期六

晚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出了这个结论，赞扬了他在中国看到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延安，斯诺曾对这种新的自力更生的精神表示了热情的赞扬，他在约有2000名红军战士的集会上说：“你们的领袖毛泽东曾说过，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学会‘用自己的牙、手和脚来进行战斗’，这样，中国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他是对的。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你们自己。”

他的这番激励人心的讲话出自于他的密苏里的自力更生观点，但他懊悔不该把它表达出来，因为他认为，没有“外来的军事援助”，中国不可能收复失地。他的另一个同样是美国式的信条告诉他，美国有帮助中国的义务。在美国直接插手的问题上，斯诺以他最强硬的态度据理力争说：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应当卷入，而是在什么条件下卷入。

斯诺的论据是，只要美国卷入欧洲战争，它就不可避免地被拖进亚洲冲突中来。中立，甚至彻头彻尾地绥靖日本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做将迫使英国同时在欧洲和亚洲作战。“如果我们在东方无视英国，就等于在欧洲讨英国对手的欢心”。尽管斯诺尽可能地指出了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但他真正关注的根本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斯诺对威廉·巴布科克以及老朋友查利·汤说出了心里话：“在这场（欧洲的）战争中，没有什么真正……值得美国人为之丧命的”美国人的选择是：要么维护欧洲对亚洲的支配，要么促使亚洲的独立。

斯诺在书中写道：为了在亚洲进行一场强有力的战争，美国应当放弃治外法权并取消在战前准备给中国的所有贷款。他推测，英国和其他殖民主义国家“可能会领会这些明显的暗示”并采取同样的行动。作为投入战争的一个条件，美国应信守其实现战后非殖民地化纲领的诺言：解放印度、缅甸以及日本控制下的所有国家；使更多落后的殖民地走向独立的综合教育大纲；建立

在国家协调合作社或集体经济基础上的殖民地工业化 纲领和 金融、技术、工业、医疗及其他援助；帮助发展非殖民地化的民主国家联盟等。

斯诺认为，邀请苏联加入该盟约来保持“最后的合作渠道”畅通和减少日苏结盟的可能性是可行的。“如果大英帝国是民主国家，而它占人口总数 6/7 的人都没有民主权利，那么，我们谈论苏联的民主或许就是牵强附会了”

美国必须保证支持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美国援助的那些国家的民主。“如果民主胜利了，我们就直接向有关国家内的民主组织，比如中国的工业合作社提供贷款，关心他们自己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民主的经济基础的巩固，而不应为了在国内外搜刮去剥削廉价劳动力和开采原材料。”

斯诺认为，从根本上说，这场战争是一场观念的冲突，即民主与日本帝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冲突。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如果战争打起来，美国飞机应当向日本投掷几百万张传单，包括‘奴隶解放宣言’。斯诺的这种想法，大部分听起来都很幼稚。美国的理念不会对英国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时间将会表明，期望美国人在非殖民地化方面花更大的力气去影响英国政策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斯诺承认：“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进行明智的合作或者搞计划经济；或者在任何兼有进步与安全的国际方案上期待它有任何变化。”但他敏锐地洞察到这场战争绝不仅仅是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殖民地国家，一旦发现它们的欧洲主子并非不可战胜，就会从日本的崛起中看到自己独立的前景。问题是同盟国是以解放者的还是以压迫者的身份出现。斯诺写道：“这场斗争的最深刻的意义就是人类对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需要，而它的胜负最终将取决于最能表现那些需要的政治策略，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斯诺相信，美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对这些急切的需求给予积极

的满足，不仅要帮助亚洲人民，而且也要坚定美国自己的根本信念。他为此疾呼：“我们最重要的病线不在中国，也不在英国，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和我们自己的心灵中。”

斯诺在碧瑶中写书的同时，他对“工合”这一理想事业的投资也获得了丰厚的成果。1940年年中，“工合”已拥有1850个合作社和3万名工人。一项统计表明“工合”占中国全部工业产值的1%。《时代》杂志的一篇关于“工合”的文章正好与美国的主要的募捐事件相吻合。这篇附了斯诺照片的文章，把“工合”描写成中国民主的发动机。斯诺宣告了“工合”的成功，认为那是“不容置疑的”。总而言之，“工合”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当然，“工合”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太平洋学会”在纽约的工作人员罗伯特·巴尼特，在该会的一篇报告中探讨了“工合”存在的一些问题：缺乏受过训练的人员，不规则的财会制度，当地人的无知和怀疑，缺乏设备和材料。巴尼特还指出，一些批评家“感到外国人参加中国‘工合’，使‘工合’变成了人为的运动并削弱了它的一些如果由中国人来管理会更恰当的活动”。后面这一点暗示出一场决定命运的破裂。斯诺主张的“工合”要分散、自治的观念与国民党政府争执不下，然而，只有国民党让“工合”成功，它才能成功。斯诺帮助建立起来的国际促进委员会不能老是通过越过国家领导人的方法，直接向“工合”提供资金。

斯诺不同意巴尼特的文章使用“中国工业合作社在经受考验”的标题。在他看来，是工业合作社在使国民党政府经受考验。斯诺在他所写的文章中把工业合作社放在有利地位，贬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作用。但他私下却很坦率地承认存在的问题。在写信给巴尼特所在的“太平洋学会”会长爱德华·卡特的信中，他说，工业合作社有麻烦，成绩也是不稳定的。

即使象在碧瑶这样安静的城市，斯诺也很少能得到休息，“工合”使他花去几个星期的时间。他看出日本即将发起一轮新的进攻，因而，他要赶在这之前完成他的书。1940年，他体重减轻了40磅，还患有维生素缺乏症——他当时尚不知道。

斯诺写完了书，开始做以前经常做过的事：制定回家的计划；也和以往一样，先到别的什么地方走走。12月初，他回到上海，与鲍威尔一起把佩格送上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船。斯诺不想马上离开亚洲，便接受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派遣——途经暹罗（即现在的泰国。——译注）、缅甸、印度和欧洲四国，这是他早就谈论过的旅行路线。他在香港停留了几周，似乎希望能出现某种奇迹把他再一次留在亚洲。

然而，中国好象屈服了，这使斯诺很失望。12月下旬，他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他担心“内战可能会在更大规模上重新开始”。他主要的担心是，国民党要求在共产党领导下日益壮大的新四军在这个月底前转移到长江以北。蒋在最后一分钟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要求：走另一条撤退路线，而不至于使共产党的军队靠近日本军队的驻地。第二年，由于种种原因新四军总部的一支特遣分队和部分后卫部队停留在江南。于是，国民党军队就予以袭击，致使数百人死亡。

1月17日，国民党官员发布了一份很短的通告，说新四军由于反叛已被取缔。可是，地下传单和人们的口头却流传着另一种事实——国民党背信弃义屠杀了新四军。具有广泛联系的斯诺从共产党方面得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他虽不愿挑动更强烈的敌对情绪，但当他确信事实真相与人们传说的完全一致时，便把事实真相捅了出来。他在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报道中写道：这场历时9天的战斗致使4000人伤亡，2000人被俘。该报道激起了人们对国民党的愤怒。因为他是在香港发的稿子，国民党人无法阻止他把报道发出去，但他们采取了更厉害的一招，蒋的驻美国

大使要求《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一篇道歉的文章，并撤回斯诺的报道。但《纽约先驱论坛报》支持了斯诺。几周后，当斯诺的报道被证明属实时，该报刊登了一篇支持斯诺的社论。于是，重庆取消了斯诺的采访权。

数月后，斯诺在一篇挖苦性的评论中说：“从死亡人数和被俘人数来看”，国民党打败了新四军，是台儿庄战役以来国民党取得的最大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军事胜利”。国民党的袭击使斯诺倍感痛苦和压抑，他在汉口结识并极为赞赏的项英将军也牺牲了，“据说……是被蓄意杀害的”。新四军的损失也是斯诺失败的一个象征。他含辛茹苦地试图通过他的外国记者身份，通过办《民主》杂志，通过组织“工合”，来支持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统一战线，但统一并没有实现。斯诺含辛茹苦地力图吸引美国人注意远东的事态，并在战争的强迫到来之前注意到进行干预的必要，但他的美国同胞们却只有畏缩。

这些失败加重了他对个人事业的伤感。他在亚洲工作了近13年，却只有不足2 000美元的积蓄，和佩格的经常性的长期分离，使他感到自己的婚姻也失败了。

斯诺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发电报说：他已最后决定不再接受通过南亚回国的采访任务。他同样也婉拒了孙夫人要他留在中国的建议。相反，他动身去了马尼拉。在马尼拉的巴布科克夫妇发现他的精神极度疲惫，几乎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讲不出来了。在与佩格通过电话之后，斯诺登上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四引擎豪华型“飞剪式”飞机。这是回国的最捷径。

第五章 人民在我们一边

埃德加·斯诺此时回到祖国，是再好不过的了。美国正处于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的边缘。不管愿不愿意，美国人不能不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正因为新闻记者们对当时那个凶多吉少的世界有所了解，美国人也就注意依靠他们了。作为一位多年专心研究亚洲问题，并预见到这场战火即将到来的新闻记者，斯诺在同行中是名列前茅的。在随后的几年中，斯诺真是名满天下，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的一位妇女把斯诺这个寒冷的名字，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字混淆起来了。（斯诺的英文意义是雪，而弗罗斯特的英文意义是霜，所以都是寒冷的名字。——译注）由于能得到公众的高度认可，斯诺在撰写新闻特写时，可以自由地选择各种新旧不同的题材。他最有机会打动美国人的心，问题是美国人是否重视他的见解。

当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国飞剪式”飞机匆匆忙忙越过太平洋到达加利福尼亚海岸时，斯诺精神振奋。在威克岛过夜时，驾驶员感到斯诺情绪有些沮丧，便向斯诺讲了一个失恋的故事，看能不能使斯诺打起精神来。那次失恋造成了这位驾驶员所驾驶的单座式邮机坠毁。之后，这位飞行员又爱上了那位照料他的护士。斯诺喜爱这个描写驾驶员经历惊险并得到康复的故事，它不落俗套。此外，他考虑的不仅是他自己，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关岛、威克岛、中途岛和夏威夷停留时，他询问了军事方面的战备情况。

斯诺所乘的飞机是傍晚时分在洛杉矶的圣佩德罗飞机修配厂着陆的。佩格由于忙于为“工合”集资，派了她通过激进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介绍认识的一位年轻男子去接斯诺。这位名叫理查德·尼克森的男子，是不久前大学毕业的胸怀大志的诗人，他把斯诺接到他的家人在好莱坞开设的布雷沃特旅馆。他本人在该旅馆担任办事员。在位于旅馆后边的尼克森的单元住宅里，他们交谈到深夜。斯诺对自己久别重逢的祖国的情况，一个接一个地提问。第二天，佩格与他团聚，他们自己也在布雷沃特旅馆租了一套单元房间。这家旅馆地位适中，条件舒适，有一个游泳池，周围长满了香蕉树，是为“工合”筹款的理想场所。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有许多知名的宾客相继路过这里，其中不少人是电影明星，这促使斯诺同激进的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合作，写了一部关于战时中国的电影剧本（这部电影当时初步定名为《裁判席》，他们将剧本送给了奥森·韦尔斯，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演员约翰·加菲尔德和斯诺在中国文学界的朋友林语堂，分别担任好莱坞工合委员会的副主席和主席。在斯诺到达加利福尼亚州之后不久，他的《为亚洲而战》一书问世了。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林语堂写了一篇赞扬该书的评论。

在写这本献给他的父母的书时，斯诺使用了他那标准化的程式。全书的主要部分采取目击者的报道方式，内容则侧重描写日本对中国的野蛮进攻。结尾部分预测了以后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将会发生的社会变革——并对美国如何适应这种变革提出了建议。

仅仅有一位较知名的评论家弗雷达·厄特利在《纽约时报》写文章批评了这本书。这位英国妇女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她的俄国丈夫在莫斯科的清洗运动中失踪之后，她就退党了。之而

不久，在1938年汉口被（日军）围困期间，斯诺曾见过她，当时她担任《伦敦新闻纪事报》驻汉口的记者。斯诺为她的经历所感动，安排她采访了周恩来。厄特利认为，周恩来是她所见到的人中最聪敏过人的一位，她不同意斯诺的看法，即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真正称之为共产党人。她和人民阵线的思想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社会改革家和爱国者”。第二年，毛泽东为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辩解时，她的热情减退了。她担心莫斯科也许会同日本签订同样的条约，并要求中共“掉过头来反对重庆”。厄特利在评论中用了一半的篇幅来批评斯诺，批评他误解了莫斯科对中共政策的指导，批评他误以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苏联人可以成为良好的战时盟友。

厄特利在评论的结束语中写道：撇开这些不说，“斯诺先生书中的某些谈论政治内容的章节虽然引起了一些批评，但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基本评价；他对中国局势做过详尽论述；他以下论断所代表的真理，即如果要使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从法西斯暴政下拯救出来，如果大英帝国要从纳粹分子和日本人那里保存下来的话，英国就必须放弃那种不民主的帝国观念。”

在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更具有代表性。这篇评论没有谈及共产党人，只是提到，斯诺把“中国的未来”形象化了，但却没有对他所见到的东西进行解释。评论的作者把着重点放在“日本力图迫使中国向它屈膝”这个方面。评论家注意到了斯诺是“一位对共产主义持同情态度的观察家”，但在评论时并没有反过来对他进行责备。没有哪一位评论家警告读者不要去接触这本书。评论家们频繁地指出，这本书比《红星照耀中国》还要好。虽然《为亚洲而战》是当时对国民党进行严厉抨击的一本书，《底特律新闻》却将该书同蒋介石夫人的《中国应该重新站起来》一书一道加以评论，并予以赞扬。到4月初，该书的销售情况很好。蒋委员长的一位积极支持者亨利·卢斯给

斯诺写信说：“我想要告诉你，我对你的杰作深表敬佩”。

在好莱坞的布雷沃特旅馆住过之后，斯诺又在亚利桑那州图森附近的一个休养农场休息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恢复到他原来的体重。接着他偕同妻子前往东部地区。不论走到哪里，斯诺总是一位知名人物。在堪萨斯城，亲友们匆忙在穆埃勒巴赫旅馆为他设宴洗尘。由于来宾踊跃，亲友们不得不挪动家具，腾出地方来让宾客就坐。《星期六文学评论》将斯诺的照片登在该刊的封面上。3月21日，也就是他到达纽约市的第二天，兰多姆出版公司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介绍斯诺并推销《为亚洲而战》这本书。凯利·格雷厄姆（自1928年斯诺离开纽约市以后，一直将钱存在此人开办的银行里）曾设晚宴款待斯诺。20年代曾大力赞助过斯诺的查利·汤，以美味佳肴款待斯诺夫妇。《星期六评论》周刊总经理、出版发行斯诺第一部著作《远东战线》的史密斯—哈斯出版社的股东哈里森·史密斯也拜会了斯诺夫妇。费城的《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的编辑们也要求会见斯诺。在首都华盛顿，他会见了政界领导人。埃莉诺·罗斯福在她的专栏“我的一天”中提到，她会见了斯诺夫妇。这个专栏是在全国各报同时发表的。据《华盛顿邮报》的社交版报道，在一次杜邦集团举行的茶话会上，人们“聚集在斯诺的周围”。

请他撰写文章的要求源源不绝。《出版者周刊》希望他写一篇题为《亚洲战线》的文章，介绍最好的新书；《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载了他的文章《太平洋的危机》；《幸福》月刊要求他写一篇关于“美国怎样才能采取主动”的长篇论文。斯诺倍受重视，各种日报经常就他的报道发表报道。

在中国时，斯诺一直把堪萨斯城当作自己的故乡，把座落在夏洛特大街的那幢木结构的房子当成自己的“根”，“我就是从这个根上长出来的一条茎。”但回到美国这块故土之后他才发现，在远东的这些岁月里，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生活得到

了充实，可是另一方面，这些岁月却留下了一条鸿沟，美国成了他所不熟悉的国度了。他的家人变成了陌生人。他还没有见过妻子的兄弟姐妹，更不用说这些亲戚正在上学的孩子们了。在他自己过着动荡生活的同时，他的家族成员们却选择了从事商业，与他的情况迥然不同。米尔德丽德的丈夫克劳德·麦基在《堪萨斯城明星报》广告部工作。在波士顿的霍华德是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发展部经理。

一切东西好象都“在以每小时大约30英里的速度奔驰”。斯诺几乎难以置信，市场上的食品竟堆积如山，废品处理场上充满着在中国会被人们当成奢侈品的东西。在好莱坞时，他和佩格保存下来成堆的“纸袋、可爱的棕色包装纸、细绳、橡皮筋、广告折页、精巧的罐子、锡盒子以及罐头瓶”，到达加利福尼亚州时，斯诺打电话给他的著作代理人亨里埃塔·赫茨，以前他不曾和她交谈过，而她则认为斯诺听起来象是一位英俊、年轻和捉摸不定的人。

斯诺意识到，他所从事的新闻事业没有深深地渗透到这个富有的国度。他认为，“你可以使美国人深信，脓溢、体臭、口臭、便秘、皮肤长粉刺等会威胁家庭的安全”，“可是战争只是一种亚洲的疾病或者是一种欧洲的疾病”。1941年，战争的到来看来已经不可避免，而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仍然希望避免直接干预。一旦战争果然发生，战争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美国人的看法同斯诺的认识是完全不一致的。

没有什么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态度更能说明这一点了，而斯诺曾误认为罗斯福是他的主要盟友之一。1942年2月斯诺去华盛顿，要求会见并采访罗斯福，同他讨论“两三个关于远东局势的问题”。在罗斯福的每周记者招待会之后，总统助理韦恩·科伊把斯诺引到了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说，他本人倒希望采访斯诺。在此后的45分钟里，罗斯福显示了他那不可思议的魔力。

罗斯福说，他不赞成美国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事实上他在1933年就试图取消这种特权，可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顾问们就是不听。罗斯福说：“斯诺，为了消除旧的殖民制度，强制进行必要的改革，看来日本人几乎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祸害。”他要求斯诺在下次见到尼赫鲁时，代他表示对印度独立运动的同情。

“请告诉尼赫鲁，我希望他给我写一封信，确切地告诉我，他希望我们为印度做些什么。”

由于受到罗斯福上述谈话的影响，斯诺大胆地向总统提出了他本人关于促进非殖民化的计划。斯诺写道：“为了在亚洲进行一场有效的政治战和思想战，我们必须将西方殖民大国那种保住既得利益的防御战略，转变为进攻性的解放战争，许诺殖民地各国人民有充分参与战后民主世界事务的权利——并尽一切可能给他们提供直接的援助和武器。”他建议由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越南人、缅甸人、印度人、爪哇人以及其他旅美的亚洲人，组成一个亚洲民主联合会。这样一种国际组织将会进行更强有力的反对日本的宣传，比任何美国机构更能教育美国人和欧洲人，使他们了解海外的情况和支持亚洲民主的必要性。

罗斯福似乎意识到，“蒋介石的寡头政治缺乏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并且问到如何使援助能真正用来帮助中国人民。斯诺建议总统要求蒋介石明确说明美国给工合的贷款的具体用途。罗斯福虽然不能采取那种高压的手段，但他承诺，“要让蒋知道，我们就是希望看到中国那边的情况向这个方向发展。我将要求蒋让我本人了解进展的情况。这样做难道他还看不出我个人支持这种做法吗？”

罗斯福在会见结束时提出要求：“如果你听到什么有兴趣的情况，请随时写信告诉我。”

斯诺告诉他姐姐，这次采访“使我对我国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前途，有更大的安全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斯诺毫不隐讳

他的观点。到达东海岸之后不久，斯诺夫妇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买下了一幢革命前的农场房子。这是一个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城镇，位于纽约市的北部，只有很短的一段行车距离。此时正是下一届总统的竞选活动期间，斯诺在这幢住宅的前门上，贴了一张为罗斯福竞选的大型宣传画。

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评论道：罗斯福“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就象摆弄一架小提琴一样。他真是一位演奏大师。”罗斯福把他自己与记者们的定期会见，称为“愉快的家庭会议”，这种会见在他手中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新闻记者在与这位吸引人的行政首脑邂逅相逢之后，就成了向他个人通报情况的人，斯诺并非独一无二的一个。不过，随着罗斯福愿意选择斯诺那种对世界的看法后，这位总统在他的选民面前实际上并不显得突出。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恰当地描述的那样，罗斯福是一位既具有崇高理想而又能作有限度妥协的人物。

罗斯福喜欢以其祖先曾参与对华贸易一类故事来取悦斯诺及其他人。虽然这些谈话中对中国的同情是吸引人的，然而至关重要的是，罗斯福回忆往事时的谈话显示出他对中国的同情是浅薄的。象多数美国人一样，他对中国知之不多，也不大关心中国的命运。不管他怎么说他不喜欢治外法权，实际情况是，在整个战前时期，还是保持了这种特权。当1934年制定的美国购买白银的计划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时，罗斯福认为，白银从中国外流是“中国自己的事，与我们无关”。只是出于从美国的国防考虑，他在40年代才开始注意中国这个国家，而并非出于想要加深对中国的同情。

1941年，纳尔逊·约翰逊大使在回国前不久，在给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霍恩贝克的一封信中，回顾了他与斯诺在政策上的分歧。他写道：“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说……，美国的弹药和金钱不应该送给重庆的反动分子而应交给在战场上

作战的军队，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军队。斯诺恰恰在建议我们做那些日本人正在做的事情，即树立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傀儡，同日本控制的中国傀儡作战。因此，我认为，要是我从这方面指责斯诺是一个帝国主义者，那他会很反感的。不这样做，我们怎样才能防止将武器、弹药和金钱送到被斯诺称之为反动分子的合法政府手中呢？”

虽然约翰逊曲解了美国人所面对的问题的实质，但他承认，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同斯诺的观点之间已经存在着分歧。确实，美国必须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以便迫使援助能经过蒋介石的政府来分给该国的其他组织。但是支持蒋介石同样等于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斯诺回到美国之后写道：“美国人不但迫切需要认识到他们给中国的经济援助所起的重要作用和进步作用，而且迫切需要懂得所要避免的危险。”“美国帮助蒋介石不仅意味着干预了中日战争，而且意味着干预了中国内部的政治平衡。华盛顿希望中国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必须做出决策：是扩大内战，使抗日无法进一步继续下去；还是发展民主，使内部合作和继续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得到保证。”

到1941年，美国已经作出了决策。美国即将走上约翰逊所厌恶的树立代理人的那条道路，只不过美国慷慨援助的对象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人。由于担心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可能崩溃，罗斯福及其政府从1938年底到通过“租借法”时的1941年3月这段时间内，给了国民党人约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将这些钱通过一个中间机构，即由中国人开设的“环球贸易公司”进行交付，并允许中国在很宽泛的范围内使用它们。虽然按规定禁止这样做，但中国人还是将一部分援款用来购买军需品。由于美国越来越对亚洲这个侧翼感到关切，美国政府使用了另一个中间机构给中国提供飞行员。官方称之为“美国自愿航空队”，而它

的更广为人知的名称叫“飞虎队”。由于罗斯福将国民党人看成是坚强盟友，并竭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形象，因此，他再想要改变他本人的政策或者改变蒋介石的政策，就没有多少余地了。罗斯福声称，“中国人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人民在思想上和目标上同我们美国人更接近了——也就是说都具有同样伟大的理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主国家之一。”

对于罗斯福给战后的非殖民化以优先地位这一点，斯诺也期望太多了。1941年8月，美国与英国签订的“大西洋宪章”涉及自决权问题的调门是很高的，但是同“门户开放照会”一样，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在罗斯福会见斯诺那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含糊地提到，他和邱吉尔起草“大西洋宪章”时，就考虑到了一系列的情况。在私下里，罗斯福在关于英国的殖民地问题上只是嘲笑一下邱吉尔，而从不和他正面谈这个问题，唯恐产生意见分歧会妨碍就军事问题达成协议。1942年1月签订的宣战书概括了主要的战时议事日程。这个文件仅仅承诺要在其他国家“维护人权和正义……”。斯诺要求对这个文件进行修改。

罗斯福根本没有采用斯诺提出的宣传计划，即用亚洲渴望自由来教育美国人民，因为罗斯福担心舆论和国会会同他背道而驰，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舆论与国会对待威尔逊总统那样。罗斯福利用自由派的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作为掩饰，给他考虑和讨论战后促进海外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自由，以掩盖罗斯福本人的真实意图。在下一届大选中，罗斯福抛弃了华莱士，找了一个在基本倾向上更加保守的人——密苏里州参议员哈里·S·杜鲁门。

在第一次会见以后，斯诺在几个月之内给罗斯福写过两份关于印度和缅甸情况的报告，但显然并没有给罗斯福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份关于缅甸报告，是根据一位年轻的缅甸人所说的日本人残暴地接管他的国家的情况写成的。斯诺对这篇报告所加的评

语——罗斯福没有将其留下来，因而历史学家不可能看到了很可能同他当时写的新闻报道相似，强调将亚洲的战争与欧洲战争置于同等地位的“必要性”，和支持亚洲独立运动的“必要性”，认为这样做，才是保持对世界这个地区的关注的唯一途径。在私下谈论时，罗斯福认为斯诺关于印度情况的评论是“很不成熟的”；对缅甸的评论是“很有趣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的声明，令人读不下去。”

大部分美国人同斯诺的分歧，比这些美国人那种先打赢这场战争再说的态度（这种态度根本不把胜利后待解决的问题摆在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之列。）涉及的问题要深刻得多。这些分歧的最明显之处，就是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不同理解。

斯诺的观点来自他本人的经验，而这种经验是其他美国人生活中所没有经历过的。没有多少美国人在亚洲呆过较长的时间。实际上，在所有严肃认真的记者中，没有任何一个既有斯诺那样长期在中国的经验，又具有与他同等程度的个人自由。斯诺并非承蒙某个美国老板的厚爱，才有机会看到中国的发展前景。象许多中国人一样，他逐渐认识到，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威胁着民主。残酷无情地追求利润，导致了镇压亚洲人民的帝国主义的产生；残酷无情地追求利润，导致了美国商人向日本人出卖废钢铁，日本人再用它们制造炸弹，往中国人头上扔。美国商人把利润看得比人民还重要。斯诺质问道：“究竟哪一种是更大的暴行？是向那些认为用机关枪扫射平民是一种好的运动的日本白痴们出售战争物资；还是为换取高额利润，向另一些白痴出售供生产用的机器，这些白痴让机器去吞噬男孩和女孩宝贵的生命？”

斯诺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看法，具有他的亚洲经历的色彩。早在他回到美国之前，他是“完全支持罗斯福的”，赞成罗斯福在“关于公共工程建设”的国内政策，“这种建设会使消费品生产实现某种根本性的增长，并提高购买力水平。”他关心的是，

“我们能否将这项计划进行下去，使之达到其合乎逻辑的结果；实现社会主义，而不致让少数反动分子行动起来，最后站稳脚跟，让弗朗哥·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在我们这里上台。”

由于本身的富足，美国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果不抱怀疑态度——换句话说，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在促进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抱怀疑态度。罗斯福对经济理论并未作过多少孜孜不倦的研究，他对上述这些信念也没有提出挑战。与共和党的批评相反，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在实际上使大企业得以平安地发展。

斯诺非常过分地高估了美国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前景的可能性。他在回到美国之后写道：“旧式的帝国主义贷款，就象战前的状况一样，已不复存在。”“要进一步向民族国家里的个人、私人公司或者买办集团输出资本，而不致加强潜在的法西斯主义，也许不可能了。如果目标是要在国际上实现民主，贷款应当支持这些国家里的民主团体。”斯诺实实在在地相信，美国人会重新整顿他们的制度去援助别的国家，正如美国人将会实实在在地设想，他们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可能会在中国出现那样。

一位持赞成态度、并颇具理解力的评论家在《纽约每日新闻》上评论《为亚洲而战》一书时写道：“斯诺先生可能了解中国，但他对他的山姆大叔却太隔膜了。”

尽管人们对斯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但斯诺决不是一位狂热的激进分子。如果要问当代认识斯诺的人们如何评价他，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是可以信赖的。外交家柯乐博就是以这种方式评价斯诺的：（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诚实的人之一。”年轻的理查德·尼克森说服一批年轻的左派分子在好莱坞去会见斯诺时，尼感到窘困不安。因为这些年纪较轻的人想着去给斯诺上一课，而不是询问他的观点。斯诺并没有见怪，他耐心地听着。一天晚上，有20个人聚集在斯诺所在布雷沃特旅馆的单元房间里，

其中包括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这位身材粗壮的白发作家向斯诺一再追问：“你说得也对，可是共产党人怎么样？你觉得他们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吗？”开始，斯诺一直回避这种不客气的提问。最后，斯诺勉强地回答说：“是的，我认为他们有这种答案。”

德莱塞把大拳往下一挥，说：“好！那他们也有解决美国问题的答案！”

德莱塞非常希望加入共产党，可是，正如他对斯诺所说的，“他们不让我加入。”一直到1945年，他“才被认为是表现够好了”。斯诺不能理解他的情绪，这是不足为奇的。从秉性上说，斯诺就不是一个想要加入许多俱乐部和社团的人。他是一个新闻记者，要他走美国当代左派人士的道路，对他来说是太困难了。这些左派人士从组织里寻求力量和慰藉，同时要付出代价，使自己的观点服从于团体的正统观念。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斯诺批评了苏联，而且嘲笑了美国共产党人，说他们“被苏联的外交政策弄得处境困难，但承受这种困境的能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美国共产党意识到，斯诺是不适合加入该党的。到达加利福尼亚州之后不久，佩格·斯诺和帕特·托宾（她在回国的船上认识的一位激进的年轻海员）去参观旧金山的一家左派书店。她问道：“为什么这里没有埃德加·斯诺的书？”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位年迈的法国人回答说：“他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

1941年6月，美国作家大会在纽约举行，当斯诺同意向大会发表讲话时，他的独立的立场引起了一场冲突。在事前交给大会组织者的讲话稿中，斯诺说，美国应当援助英国和中国反对法西斯主义。他当时预见到，到一定的时候苏联会同德国作战。在斯大林与希特勒当时还在联合的时候，对美国共产党人来说，这种观点是异端邪说。大会的代表要求斯诺删去这几行令人不快的话。斯诺拒绝了。会议组织者受不了，他们撤销了对这次讲话的邀请。

两星期之后，德国入侵乌克兰，斯诺的预言成为现实。斯大林再次调整了莫斯科的路线，与盟国合作。斯诺极其高兴地看到反法西斯的事业得到了加强。他也以逗弄海员帕特·托宾为乐（帕特曾经反对过“给英国寄送包裹”的活动）（这是一个组织的名称，该组织系1940年1月由威尔士·莱瑟姆夫人创建于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英国寄送慰问品包裹。——译注）取笑他说，你们这些党员现在需要迅速转变态度。

斯诺认为，别人也应当和他一样享有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但是，也有那么一次，他却建议限制自由。在夏威夷的军队商店里他惊奇地发现日本工人，他很快就建议：禁止日本在美国进行宣传；解除日本及其他轴心国国民的武装；解散“日本及轴心国控制的俱乐部和颠覆性组织”。斯诺的建议有点象那种支持在战争期间将大批美籍日本人易地安置的可耻做法的理论。象斯诺、沃尔特·李普曼以及后来成为自由派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厄尔·沃伦这样一些人，都热烈支持按种族来剥夺人民的权利的措施。这一事实说明了宪法保障自由的虚弱性。当时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绪，显然能充分说明美国人接受了斯诺的观点。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法西斯的恐惧，美国人并没有严肃认真地考虑斯诺在其他方面的言论。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剥夺美籍日本人权利的建议，与他为《幸福》月刊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所写的一篇评论“帝国主义”贷款的死亡的文章，并排发表在这本月刊上，这篇文章连同其他两位记者的文章被汇集成薄薄的一卷，重新排印出来，书名为《粉碎希特勒的国际》。

1941年6月，金贝尔的费城书店举行《为亚洲而战》签名招待会。在会上，斯诺抽着烟斗，胸有成竹地预言道，在四个月内，几乎可以肯定在今年年内，美国将向日本宣战。这年的夏天，他为《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写一篇关于美国武装部队情况的文章而收集资料。“在得克萨斯一路易斯安那州演习地区闷热

的沼泽地，在佐治亚洲的玛丽广场，亚拉巴马州凤凰城的小旅馆以及沿着从卡罗利纳到新英格兰的免费搭乘便车的地带，”斯诺倾听了士兵和将军们的意见。在这些将军中，有乔治·巴顿和奥马尔·布拉德利。他所作的结论就象诺曼·罗克韦尔的画一样，在美国真是名不虚传。

在斯诺的青年时代，他同军队曾有两度短暂的接触。第一次是在大学时与一支后备军官训练队相处，他对这次接触并无好感。第二次是与纽约国民卫队短期共事，他感到高兴，因为他被分配到布鲁克莱恩去养马。他发现他所观察到的那些受训的美国军人，存在着同样崇尚实际的倾向。这些普通士兵“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坦克部队的士兵“比起他们的指挥官更令人感动——即使指挥官真是不错，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士兵准备为国牺牲——他们等待政治领袖们决定将战争进行下去，已经等得“厌烦死了”，再也不希望这样等下去了。斯诺饶有兴趣地写完一篇关于卢克·菲尔兹的生平的文章。这位卢克·菲尔兹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曾是斯诺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那所农庄房舍的主人。菲尔兹参加了起义军，仗打得不错，战争刚一胜利，他就离开了部队。

12月7日，波利和威廉·巴布科克从菲律宾回到美国之后来拜访斯诺夫妇，就在这个时候，号召美国人拿起武器的号角吹响了。在去公共汽车站的途中，他们听到了电台广播关于珍珠港被炸的消息。这个战争行为令人震惊地证实了10年前斯诺的预言。那份经常在社论中引用斯诺观点的报纸《堪萨斯城明星报》，评述了斯诺的明智和许多其他美国人的“无知和异想天开”。

找斯诺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了。广播电台记者洛厄尔·托马斯在这一年的年末与斯诺联系要他去广播电台工作；全国广播公司的电台邀请他去担任新闻分析工作。《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希望斯诺成为该报第一位特派战地记者。与此同时，政府也

在向他献殷勤。在12月间，他一度不得不去为“多诺万委员会”工作，除非该委员会能找到别的人。无疑，这里指的是“野小子”多诺万那个刚创建不久的情报组织，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战略情报局，该局当时在拼命招募新闻记者担任宣传工作。后来，斯诺显然曾被委以上尉军衔，在陆军飞行大队担任情报官。

斯诺喜欢讲他在采访罗斯福时，这位总统如何劝导他去接受《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的职务。这段很有意思的经历，是由于斯诺生来喜爱戏剧性的东西所促成的，而罗斯福的意见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在1942年2月会见罗斯福之前，斯诺曾写信告诉总统的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我将出国担任《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注：作者为行文方便，以下多处简称《邮报》。——译注）的战地记者。斯诺对多诺万的“虚构的宣传”几乎不予同情。显然斯诺对他决定去为《邮报》工作是否正确，可能没有把握，因此，他有兴趣去听取罗斯福的意见。如果认为他竟会为取得情报或军事官僚机构的欢心而放弃自己的自由，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最关重要的一点是罗斯福提出建议的动机。罗斯福对力促记者们为政府工作并不存有戒心。差不多在罗斯福与斯诺会见的同时，罗斯福的一位常住白宫的助理和心腹朋友哈里·霍普金斯曾劝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R·默罗参加战时新闻局的工作，但没有成功。罗斯福有充足的理由希望斯诺去《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而不是到军队里担任职务。罗斯福的档案中装满了《邮报》上发表的对他本人及家庭“最肮脏的”攻击的文章。斯诺到《邮报》去工作，罗斯福在这份保守的杂志里就有了一个盟友。

虽然斯诺不适应《邮报》那套陈规旧习，但世界上没有更适合他的工作。在30年代，位于费城独立广场，由柯蒂斯出版公司出资办的这份杂志，就象它维护资本主义那样，也是亲孤立主义的。人们有时把《邮报》称之为美国最大的商业杂志。然而，这

种传统并未妨碍该杂志赢得最优秀的作家为它做日常工作。那位曾买下斯诺在30年代担任自由投稿记者时所写文章版权的该报总编辑乔治·霍勒斯·洛里默概括地说：“给我写一篇好的报道就行，我并不在乎你的背景如何。”1941年底，《邮报》感到它过去对外交事务方面注意不够，于是将斯诺在海外能够找到的所有好的报道全都要去了。

从斯诺受聘，到他正式开始为该刊工作这段时间里，《邮报》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迁。洛里默的继承人，也就是出面聘任斯诺的那位名叫韦斯利·斯托特的人，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犹太人的案件》的文章。斯诺认为，文章的内容并不象标题那么令人不愉快，但由于引起了尖锐的批评，而导致斯托特离开了总编辑的宝座。接替他的是本·希布斯。这位在堪萨斯州美丽的大草原培养出来的希布斯，毕业于堪萨斯大学，获得过优秀大学生资格，曾主编一份州里的报纸，后来到柯蒂斯出版公司的《乡村绅士杂志》月刊工作，最终升任总编辑。他仅比斯诺年长4岁，同样轻松自如，衣着随便地在《邮报》用木板装饰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希布斯决心要振兴这份杂志，从用陈旧的铅字印出来的字样到刊登的题目，一切都要重新设计。由于他深信战争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新闻报道”，便迅速将一大批有才华的记者安排在国际专栏编辑马丁·萨默斯的周围。萨默斯是在密苏里州出生的，以前曾担任驻外记者，他懂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于小城镇中实利主义阶层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希布斯的主持下，该杂志有一期刊载有关国际问题的题目占了非小说类文章的一半；小说和漫画描写的对象也是穿制服的士兵；甚至在广告里也出现了露着大腿的女人正在从事某种国防方面的劳动。斯诺很快便发现，虽然希布斯具有与《邮报》同样的共和党倾向，但他并不害怕不同思想观念的人。斯诺考虑到，希布斯继续聘用他可能会有所不便，所以曾提出辞职，希布斯的回答是，增加斯诺已经很优厚的薪金。

在《邮报》任职，一般是每年签一次合同，这项工作使斯诺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经济上有了保障，同时也使他能有一定的机会与众多的读者接触。一位作家夸张地问道，“谁看这份《邮报》？”“各种各样的人——有教养的人、文化程度低的人以及中等水平的人都看；铁石心肠的商人和心肠软的悠闲妇女都看；知识分子常常把这份杂志当作一种不好的读物而偷偷地看；……反正你也看，我也看。”约翰·根室报道，蒋介石夫人也看这份杂志。

尽管如此，《邮报》并没有要求斯诺放弃他的自由。他所签的合同要求他一年完成10篇左右的文章，但他和其他记者写的文章通常超过此数。他可以腾出充分的时间来写书。他有权选择写什么内容的东西和到什么地方去，该刊并不要求他在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

他再次与佩格远离，有几次较长期不在一起，这似乎没有什么不便之处。他们在麦迪逊的新家有其吸引人的地方。斯诺把房后靠近池塘的两间玉米透风仓改装成为一间写作室。一家《波士顿旅行家报》刊载的关于佩格的人物素描评论道：他们夫妇轮流在那所朴素的房子里做饭，“他们说，情况很好。”然而在他们回到美国之后，婚姻破裂了。也许斯诺和他的妻子太远离中国了，因为以前中国曾作为粘合剂把他们维系在一起，而且他们又找不到新的理由结合在一块，比如说围绕着孩子们。人们对这对夫妇最清楚的印象之一，就是佩格爱训斥人。1942年春天，斯诺仍然没有准备与佩格决裂。他接受在《邮报》任职之后，将长期不在家，连通信也不固定，这才使他有可能推迟作出这一最后不可避免的决定。

斯诺希望去苏联采访，而俄国人并不欢迎他去。莫斯科驻华盛顿的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说，莫斯科对斯诺写的东西表示不满，并拒绝发给他签证。斯诺请求罗斯福的助手哈里·霍普金

斯为他说情，并决定在等待签证期间去印度采访。几个星期之后，斯诺才好不容易买到一张飞往东方的机票。

4月下旬，斯诺到达印度。他对这个国家的观感同他12年前第一次访问时一样。贫困和落后随处可见。一般农民一天靠五个便士维持生计，而印度的王公们吃饭用的则是金制餐具。英国人在新德里那幢用红色石头建成的壮丽的总督府里进行统治，而“从低级种姓（印度世袭的种姓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译注）居民所住的街道里粪便车所散发的恶臭是渗透不到那里的。”

驻在德里的第十空军飞行大队的一名美国负责通信的军官认为，斯诺不象其他新闻记者那样呆在舒适的住宅里专门等待现成的新闻发布稿。斯诺不时在各种场合露面，一副邈邈的样子，把报道稿发出之后，就又离开了。

这次在印度停留期间，斯诺采访了农民、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瘦削的穆斯林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以及英国总督等人。在那次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英国总督认为印度人还没有准备接受工合那样的合作社。斯诺和他那位漂亮的老朋友萨洛吉妮·奈都一道参观了加尔各答收容有20万从缅甸来的难民的村落。在阿拉哈巴德举行的甘地领导的国大党会议最后一次会上，斯诺和他在中国时的朋友、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是仅有的两个不属于国大党的外人。斯诺向尼赫鲁递交了罗斯福的信，以后他经常与尼赫鲁交谈。象以往一样，斯诺喜欢这位富有经验的、注重实际的领导人（他倒认为合作社对印度是有意义的）。还和以前一样，斯诺希望由尼赫鲁，而不是由神秘莫测的甘地，来管理这个国家。

甘地的反英立场在两个方面使斯诺感到不安。除非英国承诺给予印度完全独立，甘地拒绝进行合作共同反对法西斯分子。斯诺对甘地的目标是同情的。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他曾号召

把战争同亚洲的独立联系起来。但是，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比英国帝国主义更加邪恶。在邱吉尔顽固地拒绝在他指挥下实现大英帝国解体的情况下，斯诺认为，甘地不去把他们的精力首先用来反对敌人法西斯，这是天真的。

斯诺和《纽约时报》记者阿奇·斯蒂尔在塞瓦格拉姆甘地的隐居地访问了这位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的人民期待的救星。甘地谈到了他通过民众的不合作运动来进行“公开反抗”的计划。他手边有一本《为亚洲而战》，并希望斯诺能留下来，讨论这本书。一次甘地到一所医院尽某些义务，斯诺等了几分钟之后，不辞而别。看来同这位倔强的领袖的交谈没有什么成果。

在给《邮报》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斯诺试图说明，甘地对群众的号召力，来源于对“将近两个世纪的英国统治”的仇恨。斯诺还表达了他对“普通印度人那种深刻的信念”的激情，“这种信念就是，一切不幸都是英帝国主义造成的。”斯诺写道：“任何殖民地的人民，如果他相信能通过姑息日本人或与日本人合作来赢得自己国家的自由，那么他真是一位可悲的人物。”斯诺轻率地下了这样的结论：圣雄甘地的“类似宗教政治理论”终究是没有用处的。

在印度停留期间，他曾乘飞机到重庆作了一次短暂的旅行。这次访问使他深信，美国援助的流入不可能增强中国的抵抗活动。他告诉《邮报》的读者，通货膨胀及其派生的屯积居奇，毁了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他没有点国民党的官员们的名，也没有提到政府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但他确实说过，为了达到孤立共产党人的目的，蒋介石“按兵不动”，把他的军事力量“隐藏起来”，“这样做既对中国不利，对它的盟国也毫无好处。”斯诺预见到，报应的日子会到来，“到了那时，尖锐的内部政治矛盾就非以某种方式解决不可了。”

斯诺返回印度途中飞越喜马拉雅山时，几乎遇到了他自己的

报应。这是一条靠不住的航线。他乘坐的C—47型飞机沿着日本人火力范围的边缘飞行。斯诺手里紧握着一支冲锋枪。他收拾好降落伞，看是否有可能跳伞。机上一共有五六名乘客。这是他第二次遇到险情。他飞越北非到印度去时，为修理有毛病的发动机，飞机曾紧急着陆，再起飞时，由于天色已晚，驾驶员与空军基地的导航无线电信号台失去了联系。在3个小时中，飞机漫无目标地飞来飞去，除了可能要强行着陆之外，乘客们还会遇到别的险情，因为纳粹德国空军的一些飞机就在附近巡航。最后，驾驶员终于找到了信号电波，飞机降落时仅仅剩下4加仑燃油了。那位驾驶员对斯诺在这次考验中能保持“高度镇定乐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这段插曲，为他给《邮报》写的一篇文章增加了戏剧色彩（该文的标题是：《一位〈邮报〉记者拼着性命飞越喜马拉雅山》）。当他和鲍勃·巴尼特在加尔各答相遇时，巴尼特向斯诺吐露真情说，他一坐上飞机就有这是最后一次飞行的感觉。斯诺把他那次在北非的惊险经历看成好象是一次日常乘坐火车的旅行。

斯诺似乎对他在印度陆地上停留的时间比他在印度空中的遭遇更不感兴趣。最不好的地方就是靠近甘地最初的隐居地的沃尔塔，那里天气很热，到处尘土飞扬。斯诺说，“沃尔塔这个地方和一件用毛发做的衬衣（宗教禁欲主义者穿在身上以抑制情欲的衣服。——译注。）的区别在于：当你想要擦洗你的背部时，衬衣是可以脱掉的，而这个又热又脏的地方却无法摆脱掉。”斯诺在那里患了一种名叫登革热的热带传染病，当夏天即将过去，传来了苏联人允许他去俄国的消息时，他无疑得到了解救。斯诺是经过德黑兰这条旅客较多的航线飞往苏联的。

作为一个主要盟国，苏联赢得了美国人的尊敬和注意。苏联也是斯诺在战时所写报道的主要对象。他第一次到苏联旅行是从

1942年10月到1943年4月，当时正是俄国到处呈现不稳定的时期。斯诺在莫斯科的头几个星期，漫长的冬夜使得一天之中只有几小时是明亮的，商店的窗户都钉上了板子，此时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正面对着德国的野蛮进攻。虽然英勇的防御成为战争的转折点，但农民和将军们同样催问斯诺和其他美国人，盟军何时将开辟已经承诺的欧洲第二战场和减轻纳粹对他们的压力。1944年夏天，当斯诺再次回到莫斯科时，他几乎不能相信，他是回到了上次来访问过的同一个地方。俄国人已经清掉了建筑物上的伪装。人们呈现出新的面貌，“充满着希望和信心”。那年12月，斯诺离开苏联时，离战争结束仅有几个月了。

在战线的一侧写的新闻报道，其全面的程度就象在球网的一侧描写网球赛的特写一样。关于东线的报道是特别异乎寻常的——据当时的一位学者说，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报道得最差的一部分。对苏联人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苏联官员把记者们紧紧地拴在一块，集中在革命前建的洞穴式大都会旅馆里，只靠关于前线战斗的零星消息发稿。当地的电话簿被认为是军事秘密，无法得到。一份重复俄国报纸某些内容的报道，也许不能原封不动地通过新闻检查官的审查，因为这些检查官几乎不懂英文。旅行是如此受到限制，以致斯诺和他的同事们直到德国军队投降两天之后，还不能就近去采访斯大林格勒战役。

这种限制对斯诺来说是一次新的经历。在亚洲，他或多或少可以随意旅行；他享有独家采访象毛泽东和尼赫鲁这样的领导人的机会。在俄国，只有一小部分高级苏联官员在鸡尾酒会上出现，很难得说些什么重要情况。斯诺的老朋友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当时正出任英国驻苏联的大使。在他们会面时，这位英国外交官经常抱怨说，他总是感觉象个陌生人，能进行交谈的俄国人屈指可数。

斯诺在第一次访苏时，曾四次写信要求采访斯大林，但一直

没有得到答复。在第二次旅行开始时，斯诺以为情况也许改变了。他刚出版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该书号召人们更好地了解苏联。苏联人会认识到，斯诺并非是怀有敌意的，而且他回到美国后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当他在美国大使馆发着脾气向约翰·梅尔比表示抱怨时，克里姆林宫似乎并不在意。斯诺最接近斯大林的一次，是在莫斯科大剧院里。显然是由于走错了地方，斯大林进了一个门厅，正好斯诺站在那里。他们并没有交谈。

邱吉尔在访问莫斯科时对斯诺及其他记者说，当一名采访东方战线的记者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记者们都吵吵嚷嚷地抱怨苏联对待报界的态度，斯诺在这些人中并不逊色，不过记者们并不同苏联人分彼此。苏联与同盟国在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到那些被夷为平地的城市访问，采访那些失去亲人的幸存的孤儿，看到俄国人穿着用纸做鞋底的鞋子走路——这些都向记者们展现出苏联在人力和物力方面所作出的可怕的牺牲。同时，苏联为促进民族团结所采取的措施，使政府的形象变得温和起来。斯大林放松了对教堂和少数民族的限制。因为急于恢复俄国的人口数量，他采取了梵蒂冈式的做法，鼓励大家庭，并使一度写一张明信片就可以办的离婚手续，办起来困难得多了。由于忙于国内的防御，斯大林将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给予了正式的承认，并且解散了他从事世界革命的臂膀——共产国际。

记者莫里斯·欣德斯在《读者文摘》上写道，俄国显示出“对自己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不是看作国际主义的堡垒，而是看成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国家。”“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时刻，人民是那么深深自觉地认识到他们自己是俄国人，象现在这样对自己的国土充满着强烈的爱。”

记者们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提出去作报道旅行的申请。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当时承认，“俄国的情况非

常糟，所以我们并不喜欢提出那种会消耗迫切需要的食物和交通工具的建议。”要求记者对他们的稿件进行自我新闻检查是容易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亚历山大·沃斯回忆道，“必须做到不落入德国人的圈套。”他后来说，“我并非不了解（苏联的）缺点，可是在战时去强调这些，只会帮助公认的敌人。”

斯诺喜欢那些他曾在哥萨克骑兵营地采访过的红军战士，在莫斯科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遇见过的年轻人，在集体农庄里会见过的精神饱满的挤奶姑娘们。他特别敬佩俄国人的决心和干劲，敬佩人民将国防看成是个人应尽的责任的那种精神。他撰写报道的技巧，使得象齐娜那样的人物具有浓厚的传奇的色彩。由于当时前线需要健壮的男子，所以妇女们承担了战争时期工农业生产的巨大任务。在一家兵工厂工作的齐娜就是这些勇敢的女战士中的典型范例。斯诺不但描写了她那张开大嘴露齿而笑的面容和象活塞一样粗壮的胳膊，而且描写了她的爱国热忱：“她的丈夫在前线，所以每当她制造出一发炮弹时，她就觉得丈夫离她更近了”。

相比之下，纳粹分子的残暴则深深触怒了斯诺。孩子们告诉斯诺，当他们向德国军官讨要食物时，得到的却是踢过来的靴子。在波兰，位于卢布林城外梅达涅克的德国死亡工厂里的那种最野蛮的行为，就象强酸那样蚀伤着斯诺的心。1944年8月，斯诺和其他记者参观了解放后的这个营地。纳粹分子将不计其数的人，多数是犹太人，送到梅达涅克处死。根据一项估计，每天在这里死亡的人数不低于17 000人。死者的骨灰使一个模范农场的菜地变得肥沃了。斯诺花了几个小时参观受害者遗物的陈列室。有一幢50英尺宽、100英尺长的建筑物，陈列的全是鞋，从婴儿的毛线鞋到老年妇女系带的高统靴子，无所不有。

当时，英国广播公司不敢相信亚历山大·沃斯对这个地方所作的报道，以致于没有采用。而《邮报》则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斯

诺写的报道。他写道：“在卢布林这个地方，你得到的印象是，（德国）这个民族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才完全被滥用了，对那些象机械一样工作的人来说，方法和手段就是一切，行为完全控制着想象，目的本身已失去一切意义。”斯诺经常谈到梅达涅克的情况，正象他经常谈到1929年他在萨拉齐平原见到的毁灭性的大饥荒一样。

对那些经历过梅达涅克劫难的人，斯诺是无能为力的。对活着的人，他采取了他在中国时曾经采取的办法。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之后，斯诺和一位同行住在刚解放的村庄里的老百姓家里。他们看到，房东仅靠很少的一点配给面粉生活，就从为外国记者开设的食堂里偷偷带回一些食物。虽然斯诺不能请俄国人到大都会旅馆的记者私人餐厅与他一起进餐，但他可以把他们请到自己的房间里。他尽可能经常“和一位俄国人”在他的房间用餐——“如果我能够引诱任何俄国人到旅馆来的话！”

个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发展起来了，其中不少是与那些使莫斯科保持正常运转的妇女们的联系。象齐娜那样坚强的妇女，总是吸引着斯诺，处于大都会旅馆寂寞的集体生活环境中，这种吸引力就更大了。在斯诺的文章中关于迷人的、体态优美的妇女的热情描写，暗示出他的思念之情。在他第二次去苏联旅行中，他多情地被一位担任导游服务的、碧眼的莫斯科大学学生给缠住了。

在这方面，斯诺并不脱俗。记者们普遍同他们的俄国工作人员分享食物并发展了浪漫的风流韵事。一天在大都会旅馆，一个美联社记者把同一位年轻的俄国美女站在一起的英国烟草商打倒在地。然后，这个记者把姑娘扛在肩上，进了他自己的房间。

斯诺与别人不同的，是他那安安静静的工作方式。斯诺与许多记者不同，他研究了俄国的语言和历史。有一天晚上11点钟，在定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竞争，由于他不抢写最新消息，所以没有被牵扯进那场风波。在政府发言人发布了战

争前线动向的新闻之后，为了一张地图三位紧紧扭在一起的通讯社记者用拳头厮打起来。结果两个人扫兴地出去了，地图被撕得稀烂。

《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戴维·尼科尔说，斯诺的“那种平静的情绪，使得同事们铭记着他，因为这在当时我们所处的那种令人沮丧的环境下，实在是一种幸福。”当他和斯诺在夜间“乘坐一辆连后窗玻璃也没有的破旧救护车”去斯大林格勒时，“车外的温度大约在零下40度”，然而斯诺并没有抱怨。斯诺把精神都集中在工作上，不经常参加花费很多时间的自由讨论和那种厮杀似的设法不拿到红桃的纸牌游戏。而这种游戏在大都会旅馆住的那些自称为“同狱犯”们的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

记者约翰·赫西说，每当美国大使馆的物资供应商店隔一定时间分配供给品时，斯诺常不参加。分东西一般在《纽约时报》记者比尔·劳伦斯住的373号房间进行。多数食品是用小罐头装的，容易分配，而花生酱则是用一加仑的大罐装的，就得一匙一匙地弄出来。赫西回忆说，那些有政治立场的记者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拉·温特和弗雷达·厄特利，“为他们确切分到了多少属于公有的这份好吃的东西，叫嚷得特别厉害。”“而埃德加则不然；由于他是那么泰然自若，所以经常选他来掌勺分配花生酱。”

斯诺在其他方面也与别人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他对亚洲有丰富的经验。别人也在那个地区工作过，但谁也没有象斯诺那样在那里长期生活过。亚洲给了他进行比较的标准。正象斯诺后来评述过的，他倾向于把苏联看成是一个先进的亚洲国家，而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落后的西方国家。他在亚洲的那些岁月也教育了他，使他了解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互对立的，并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解放力量。斯诺认为，亚洲的经验“是外国学者去俄国时应当带着的特殊装备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既是有益

的，也是有害的。

斯诺到达苏联时，并不认为苏联是完美无缺的。在中国，他曾经和贝特兰那样的好朋友谈论过几小时，试图解决这样的难题：即为什么苏联的政策似乎在阻挠中国革命。他同样辛勤地寻找社会主义所以适合苏联的证据，这种探索很容易为当时那种“我们都是这样想”的精神所证实。

俄国是进步了。沙皇的统治及其极不平等的政策曾使大部分俄国人民感到失望。斯诺只要看看莫斯科的街头，就可以发现自从革命以来所发生的消除差别的情况。尽管人民穿着比较简陋，但没有一个人穿着非常华丽，也没有一个人象亚洲国家里“衣衫褴褛的叫化子那样”。斯诺对共产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估计太高了。虽然他承认在20年代开始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人民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但他过高估价了这些政策所获得的裨益。尽管他引用了农业生产的正面数字，但1933至1937年的收获持续低于1928至1932年并不富裕的水平。斯诺可以找到具有充足粮食和人们热情工作的集体农庄，但农民们普遍开始与一系列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作斗争。引用后来的一位经济历史学家的话，整个说来，集体化标志着“一个痛苦的时代，当时许多处于高位的人应当在内心对此感到羞愧”。

在到俄国之前，斯诺看到中国游击战术和苏联的“动员人民的智慧和计谋”之间有相似之处。他一度得出结论，“红军的胜利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特别是苏维埃计划的胜利。”与蒋介石公然不愿同敌人作战形成鲜明对照，苏联政府精心地培育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斯诺将红军描绘成一支民主的军队。军官中的许多人是不识字的工农的子弟；“不允许由于种族歧视而阻挠个人的升迁；”“俄国军官和平民一样，没有任何经济投资，会影响他们一心一意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

直至1945年年中，当斯诺已经较多地了解到苏联国内的镇压

政策时，他仍然这么说，“不管人们对这个政权统治下缺乏个人自由说些什么——实际上也可以说很多反对这种说法的话——毫无疑问，在苏联内部实现了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原则，这是与最好的民主传统一致的”。

不幸的是，斯大林为争取人民参加他所从事的事业而采取的有效策略，并非象斯诺所想象的那么民主。军官团的组成并非仅仅是社会流动（西方社会学者所说的“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各个社会阶层内部，以及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一切形式的转移而言。——译注）在起作用。30年代的大清洗，使20 000至25 000名军官被取消军衔，也许人数比这更多。人们要升迁是有充分余地的。而且，那些擢升到文、武高级职位的新人，在意识形态上是承担了义务的，而对人民的福利则毫不关心。在号召团结一致保卫国防的政府战时战略后面，存在着实行种族歧视的巨大可能性，如果这样做适合国家需要的话。

受到想象中的苏联的干劲和计划经济的鼓舞，斯诺预测，五年计划“将使俄国在20世纪中叶成为工业大国，能生产它的公民所需的一切以及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奢侈品。”他的这个估计也错了。斯诺还预测，10年之内，俄国人将“比欧洲或亚洲大陆任何民族”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尽管工业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购买商品的排队现象持续不断，成为战后购买消费品的一种生活方式。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将斯诺列入“最同情苏联”的记者之一，并且认为斯诺在中国的经验是他采访东方战线的的一个不利条件。尽管如此，他还是以赞赏的态度将斯诺所写的报道同其他专业记者进行了比较。索尔兹伯里是正确的。斯诺最大的错误产生于他担任驻苏联记者的早期。斯诺给同事们留下的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总是为了弄清和理解事实而刻苦地工作。斯诺了解的情况越多，就越是变得稳健。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不管他

们个人的观点如何，斯诺和所有其他记者所面对着的是同样的问题：对苏联这个盟国要抱积极的态度，这是压倒一切的；很难使反映消极面的报道通过新闻检查；况且好的新闻本来就不多。例如，多年来得不到关于集体化的可靠的经济统计数字，也不可能得知（更不要说了解）俄国对其南部边疆一带亚洲少数民族所实行的政策的严酷程度。在斯诺对苏联政策表示不满意的那些领域，他几乎无法找到公开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他厌恶围绕着斯大林所树立起来的个人崇拜，正象他痛恨甘地那种半神半人的地位那样。由于知识分子受了折磨，由于他们能说清问题，人们也许期望他们能批评斯大林的强硬策略，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倾向于把斯大林当偶像崇拜，而把他的过分的行为归咎于其他官员。

记者们好容易有机会写文章时，他们对苏联的形象总是给以压倒优势的正面评价。美联社记者亨利·卡西迪在战时出版的那本名为《莫斯科电讯》的书中写道，俄国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它的仁爱厚道，尽管有些是微小的，几乎察觉不到的，但又都是有意义的。例如，清洗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柯里尔》双周刊的昆廷·雷诺兹说，深信这个政权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在苏俄没有第五纵队，没有一个叛国分子能自由活动。”曾经在苏联采访过几年，持同情态度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达兰蒂在美国写道：“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表面上——也许是真正地——放弃了它的国际革命这一方面，”虽然政府相信社会主义，它却“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资本主义的方法，”例如，给有贡献的人发额外工资、勋章和慰问品。《生活》杂志、《全国地理》杂志、《扶轮国际成员》杂志以及除少数以外的所有美国主要日报，也同样持乐观态度。根据当时的一项调查，“对战时俄国的最实质性的和最直接的报道，都是持赞赏态度的。”

然而，对斯诺关于苏联的报道的最后评语，到此尚未结束，虽然他的中国经验也许在某一方面是个不利条件，但在另一方面

也使他头脑更加清醒。许多记者完全按美国的情况去看待苏联，以致于造成这样的印象：苏联在走向象记者自己国度里的那种制度。由于斯诺不害怕社会主义，并且培养了一种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的的能力，所以他对共产党的动机和展望，相对说来比别人协调得更好一些。正如一位记者所指出的，对多数美国人来说，斯大林会见基督教贵宾，“就象《芝加哥论坛报》支持白劳德（白劳德1891年生，曾于1936年、1940年两度以美共领导人的身份竞选美国总统。——译注）当总统的新闻那样耸人听闻。”斯诺懂得，克里姆林宫是在利用基督教来争取“在群众中持反对态度的最后几个孤岛”的支持，并在此后与其他欧洲国家为得到教会的忠顺而进行竞争。斯诺认为，解散共产国际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的结束，也不意味着共产主义运动不再恪守莫斯科阐明的学说”。确实，在战争的最后几发子弹打完之后，斯诺杰出地预见到了苏联将要采取的行动。虽然他在苏联时不象他在中国时那样是一位很好的记者，但斯诺作出了当代人和历史学家所忽略了的贡献。

早在1943年年中，当斯诺结束第一次对苏联的访问时，他就得出结论说：红军将会支持它所进入的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势力；苏联“至少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那里施展主要影响和承担主要责任”。他预见到俄国决心要进驻德国。到第二年年底，离盟国领导人在雅尔塔开会讨论战后欧洲的地图和地位还有几个月时间，斯诺就更明白地预先觉察到在苏联影响下东欧将采取的形式：“在稳固的警察权力”的支持下，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工业收归国有和由国家控制，因此“我们在美国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将不能在那里存在；”这些国家的政府执行“尊敬苏维埃祖国并与之合作的原则，对它们的安全来说，这不仅是最好的政策，而且是最主要的政策。”苏联人将会索取大量的赔款。尽管许诺人民享有新闻、言论、集会和信仰的自由，但已经向“思想上不顺从

的人”发出了警告，“不允许用民主权利来为民主的敌人服务。”

所有这些都适用于德国。苏联人将以自己的方式管理他们在德国的占领区。“必须记住，总的来说，这里既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具体问题而言，也没有放弃对英国所以走上反动道路的原因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斯诺对俄国参加亚洲战场作战问题也同样是有预见的。早在1943年10月，斯大林还没有开始与美国外交官非正式地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斯诺就预言：在打败德国以前，俄国不会把它的部队调过来反对日本。当莫斯科同意向东方调头时，它“将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在远东的战略地位讨价还价”，而且“尽可能冒最小的风险，来达到相应的利害攸关的巨大目的。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也就是说在日本临近崩溃以前，”莫斯科是不会真正参战的。

一年半之后，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从罗斯福那里赢得的秘密协议，差不多正是按这些方针行事的。以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同日本作战为交换条件，苏联将从日本接收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库页）岛，并取得对外蒙古以及满洲的主要港口和铁路的控制权。斯诺1943年所作预测的最后一部分将在以后展示出来：当苏联的“干预到来时，就可能是不同于人们预先想象的那种干预方式。”

斯诺认为，在多年避开中国共产党人之后，苏联可能会开始真正给他们以支持。斯诺在雅尔塔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写道：“在红军开始向欧洲进发之前，美国人存在着严重的懒汉思想。因此，现在许多人‘大失所望地’发现，克里姆林宫对在东欧如何交朋友，如何影响东欧人民，有它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些人甚至可能假装惊恐地发现，莫斯科对它与中国建立睦邻关系已有某些非常具体的设想。……如果我们不立即老老实实地面对有关俄国和中国的众所周知的现实，我看除了遇到麻烦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前景。”

在斯诺第一次访苏结束时，他曾报道过，在无意中他听到一位年轻的俄国妇女说，战后美国会使“各种各样的货物”，象潮水般地涌进这个国家。斯诺评论说，她的这种想法，“很可能比许多人估计的更接近政府的期望。”不久之后，斯诺提出了一项强有力的补救办法。闪闪发光的俄国市场是一座海市蜃楼。他在《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上写道：“对这一点要仔细注意：并非俄国的消费者个人，或者某个地区或集团可能需要向我们购买什么东西，而是执行国家计划时需要什么，决定着苏联市场的规模和性质。”

1944年8月，斯诺在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的一次谈话中，显示出了他对社会主义既抱有浪漫主义又抱有现实主义的复杂心情。斯诺说，他把红军看成是一种解放力量。红军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东欧唯一有真正民主政府的国家”，可能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这个国家已经发展了一种与苏联人一道生活的能力，但其他国家的人民是会欢迎苏联军队的。在苏联人到来之后，“有组织的农民和有组织的工人，而不是大地主和资本家，将居于统治地位。”如果说斯诺忘记了他在中国学习到的一个基本观点——有效的社会革命必须产生于本国国内，而不可能，也不应该从外部强加给一个国家——然而他对东欧其他国家的现实情况的了解是清楚的。他认识到，美国式的民主不适合东欧情况。他说：“在这些国家中，了解我们所谓的民主的人为数极少。”“因为没有完全推翻封建传统，我国那种意义的民主在这里是不可能存在的。俄国人也不可能理解这种民主。”他对哈里曼说，此外，苏联人几乎不会允许反对派存在。他们会在这些国家里清除那些“反对苏联统治的人”。

有一次，斯诺曾提醒哈里曼说，他们有着类似的任务：他们两人所写的报告都得考虑以后几个月的情况。这是一种有启示性的意见。因为斯诺认识到，哈里曼也存在着记者所面临的同样问

题，而斯诺则把他本人看作是一名非官方的使节，代表着普通美国人的耳目。而正是这些普通美国人的态度决定着美国与苏联的官方外交关系的形式。斯诺对他承担的责任感到苦闷，他问过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苏联外交家李维诺夫等各种各样的人：作为一名作家，能够为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和导致更多的战争”做些什么？他在俄国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不仅必须了解苏联人在战后将会做什么，而且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做。

斯诺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疲倦了，而且感到不安全。战争使这个国家所遭受破坏的程度，是多数美国人不敢想象的：至少有2 000万士兵和平民死亡或者失踪（相比之下，美国的伤亡人数是322 000）；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家园，许多人住在地下的洞穴里。2 300万头猪中有2 000万头损失了；65 000公里的铁路被毁坏了；工厂、水坝、桥梁、拖拉机——一切都损失了。正如斯诺所了解到的，这只是本世纪内苏联受到的一系列打击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进攻和布列斯特条约那种耻辱性的和平，使苏联丧失了生命和领土。战后，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帮助白军向苏联领土发动了攻击。1920年，波兰入侵乌克兰，实际上占领了基辅达六个星期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拖延开辟第二战场达两年之久，使苏联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没有消除苏联对西方的疑虑。某些西方人士争辩说，苏联共产党人同德国纳粹分子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极权主义者。然而，从斯大林的观点看来，纳粹分子同西方盟国有许多相同之处，因为他们都构成对苏联的资本主义包围。

斯诺认为，苏联在其边界上所进行的各种的活动，并非是为了达到扩张的目的而进行扩张，而是力求收复失去的领土和保卫自己，以避免今后受到攻击。斯诺对李维诺夫说：“照我看来，战后俄国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喘息的时间，一个补偿其失去的地位的机会。”他认为，美国不能利用这个弱点去迫使苏联让步。

苏联理所当然地在东欧存在着某种势力范围和利益，正象美国在拉丁美洲一样。战争期间，美国领导人很少注意到战后的问题，从来没有以某种方式“明确地声明他们的政治目标，来使俄国人认为这是能代替他们建立稳定秩序的方法”。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承认苏联在东欧布设警戒线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去惹起苏联那种对西方的传统的怀疑；向苏联提供财政援助和寻求合作的领域。斯诺最后说，“一旦克里姆林宫觉得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合理的有安全感，俄国人民也许可能在苏联的经济体制下，同时享有政治民主方面的自由——这种民主与我们自己最好的传统是更加一致的。”

1944年10月与李维诺夫的一次私下交谈，并没有给斯诺以鼓舞和使他对未来具有信心。李维诺夫胖得圆滚滚的，容易激动，但又是个开诚布公的人，他是居住在苏联的外国人中所喜欢的人物。他曾当过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又担任驻美国大使。按他自己的话说，现在他是被束之高阁，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副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实际上是苏联官员中唯一在私下里会见记者的人。记者们一般从外交部的旁门进去找他。他的观点经常是与政府观点不一致的。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李维诺夫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苏联对西方报界的敌对态度，妨碍了为使美国更好地理解苏联的目标和愿望所做的努力。居住在伦敦的那些反苏的波兰前领导人为什么未能重新掌权，苏联人对此没有明确表示看法，这是犯了错误。与此同时，李维诺夫认为，西方还在继续采取老一套的办法，企图孤立俄国。“波兰必须对苏联友好，必须放弃它可以成为反对俄国的跳板，从而恢复它在16世纪时期的帝国的那种思想。”除非德国是一个小国，并实行一项再教育的计划，以保证德国人是不伤害别人的、和平的，否则苏联不能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李维诺夫预言，“在为德国制定一个共同纲领的问题上，我们不可能取得一致。”这一切似乎都太困难了。外交手腕

也许能一时避开这些问题，“但现在已经太晚了，双方的疑虑已经很深了。”

这次谈话历时三个小时，以前，李维诺夫从来没有这样坦诚地与斯诺交谈过。他的悲观论调同当时流行的乐观词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斯诺要求把李维诺夫的意见转告哈里曼。李维诺夫的确曾一度告诉过哈里曼，苏联简直不能允许再一次出现流血。他说，斯诺只能把这些意见转告罗斯福。圣诞节后的三天里，斯诺回到了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并给罗斯福写了一封私人信件，通报了他和李维诺夫的这次谈话。

战争期间，斯诺曾与罗斯福通过信。除了别的东西以外，他送去过一项关于促进苏美谅解的计划和—一个作为镇纸用的甘地半身像。对斯诺最近这封信，罗斯福回信说，他发现李维诺夫的意见“非常有意思”——虽然罗斯福不久又明确表示，他不认为这些意见特别重要。

3月初，罗斯福向国会报告了他和邱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见的情况，声称美国必须“承担促进世界合作的责任”。当时正在华盛顿的斯诺，写信向罗斯福表示祝贺。罗斯福回信时要求斯诺去白宫一趟。两人继续讨论前一次（也就是斯诺两次被派到俄国工作之间的那次）见面时所谈论的问题。罗斯福断言，他在向斯大林解释美国的制度时取得了进展。斯诺发现，罗斯福的“乐观主义非常感染人，从而消除了我的大部分恐惧心理”。

罗斯福说：“虽然俄国人将会在他们占领地区按照他们的方式行事。”“但他们不会建立（独立于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单独的行政当局，来与盟国为整个德国所作的安排相对抗。……我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现在很满意了，我们可以在一起解决一切问题。我深信我们会友好相处。”

这次谈话，反映了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议的喜悦心情，也掩盖了他反战后欧洲的看法的不稳定性。在有的场合，罗斯福对于俄

国人对被包围的恐惧心理表示担忧；他也担心由于英国人在欧洲划分的传统势力范围而可能加剧这种猜疑症。有时他似乎对波兰及其他东欧小国不抱多少同情。但是远远不能肯定，罗斯福对苏联在东欧的霸权，是否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下来了。仅仅在会见斯诺几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和邱吉尔就违反雅尔塔关于波兰的协议向斯大林提出了抗议。斯大林要求，由苏联支持的领导人来决定应当让哪些波兰人参与关于建立临时政府的协商。罗斯福对斯大林不愿派外交部长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表示忧虑。

形势的发展将证明，罗斯福的矛盾心理将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付出高昂的代价。没有一个人能肯定战后的美国政策将会是什么样子——斯大林不能肯定，美国人民也不能肯定。由于当时军事上的问题完全占去了罗斯福的时间，所以他就把明天的问题推到明天去解决。要是美国对它在波兰一类地方希望看到什么，能给予明确的信号，也许斯大林不会改变他的行动。但是，美国对苏联人作出合乎实际的估价，对于制定政策以应付和防止日后美国公众突然产生的过分强烈的情绪，是至关重要的。李维诺夫对斯诺的讲话是一种警告：掩盖棘手的问题会带来危险。虽然这位苏联外交官试图通过斯诺以外的人，将他的信息转告罗斯福（没有取得成果），但为时已经太晚了。

斯诺相信，罗斯福“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会在他的权力和想象力的范围内，进行各种尝试，”来与苏联达成和保持某种协议。斯诺可能是正确的。罗斯福有一种寻求解决紧迫问题办法的天才。正如斯诺所相信的，他可能已经为各殖民地民族制定了一项“有秩序地但又是迅速地实现民族平等”的办法。然而，罗斯福虽然废弃了限制他只能连续担任两届总理的民主传统，却无法抗拒自然的力量。在和斯诺谈话后不到五个星期，他就在佐治亚州温泉他的休养所逝世了。似乎并不比一般人更伟大的人们接下了一项他们没有多少思想准备的任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罗斯

福把未来束之高阁，就象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们对李维诺夫所作的安排一样。

对俄国抱有过多的希望的情绪在美国弥漫开来。同苏联工作关系密切的官员们抱怨官僚主义拖延时间，抱怨莫斯科拒绝交换军事情报。而公众几乎听不到这方面的情况。正如赫尔在德黑兰会议前夕在国会所说的，“今后将不再需要象过去不愉快的年代那样，各国力图通过划分势力范围，建立联盟，达成权力平衡或者作出任何其他特殊安排，来维护它们的安全或者获得利益。”在1940年总统竞选中被罗斯福击败的对手温德尔·威尔基，于1942年访问了“我国的盟国俄国”。他明智地希望在战后实现相互了解，但是却为达到这一目标选择了不明智的战略。正如他对他的俄国主人所说的，他将不谈论可能在美国造成不好印象的任何事情。

威尔基写的《一个世界》，是1943年书店里最畅销的书籍。与此同时，公众对苏联的态度明显变得积极起来。1945年初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认为美国将与俄国人相处得比以往更好的美国人，比过去多了一倍还多。当询问到美国能从这种友谊中得到最多的好处是什么时，首屈一指的答复就是“贸易、商业和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诺写过两本书，每到苏联一次就写一本。《人民在我们一边》谈的是他在印度、中国和苏联的经历和他对这些国家的印象，该书于1944年夏天出版。《苏维埃力量的格局》全是涉及苏联的事情，于1945年年中问世。这两本书都是用廉价的灰白色纸印制的，同其他战时出版的，收集了歌颂盟国的现场采访报道的书有着同样的特色。这两本书，同斯诺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的各篇文章（这两本书就是由这些文章汇集的）一样，对苏联人可能做的好事抱的希望太大了。但是，这两本集子不属于“逃避现实的人和幻想主义者”一类的书，象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对战时电影所做的描述那样。两本书都

具体地谈到了苏联的东欧政策可能产生的严峻现实。象广为报道的那样，《苏维埃力量的格局》曾暂定名为《俄国入侵欧洲》。此外，斯诺扼要地提出了在战后鼓励非殖民化的现实纲领。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斯诺力图忠实地了解事件的真相。他们对斯诺关于苏联行为的预测给予了突出的评价。虽然评论家们对书中不同程度的牵强附会和某些观点进行了指责，但他们采取的一种典型做法是：对斯诺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预测，既予以注意，又不完全相信。一位评论家在《哥伦布电讯报》上评论《苏维埃力量的格局》一书时写道，“斯诺先生所写的某些事实，证实了那些怀疑苏联意图是否善良的人的担心。”“但是对那些保留看法的人，对那些真诚相信俄国是维护和平的建设性力量的人，也有某种鼓励和安慰的作用。”由于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战争，美国人没有仔细研究斯诺所说的为保持和平所必需的相互让步。

《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书也是用同样沉着镇静的心情写的。在这本书中，斯诺报道了印度人对日本的威胁并不太关心和蒋介石把宝贵的资财浪费在打内战中的情况。《芝加哥太阳报》的一位评论家写道：“书中关于苏联的唯一目的的那部分内容，……给我们提供了我们想要从我们的盟国听到的东西，”“而有关印度和中国的那些章节，则显示出我们阵营里的弱点，要不是由于美、英、苏的团结一致而有所弥补，这种弱点会严重危害战争的胜利结局。”对于斯诺关于在战后使用英、美资本在以前的殖民地建立独立、繁荣的国家的那个简略的计划，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斯诺把这看作是这本书的论点。

这两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对这两本书的评论是斯诺整个记者生涯中所得到的最好的评价。罗斯福说，他在去雅尔塔的途中，用了半宿阅读《人民在我们一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罗斯福不大愿向邱吉尔提出挑战，所以他唯一的批评就是斯诺故意不用力打英国人）。“本月最佳书俱乐部”选择了《人民在

我们一边》作为获得提名的书；战时书籍委员会将该书选定为“必须的”读物，这种殊荣同时也给了威尔基的《一个世界》。斯诺的这本书还被专门印刷了20万册，分发给美军各部队。《苏维埃力量的格局》一书也成为文学喜爱者协会入选的书。兰多姆出版公司的贝内特·瑟夫极为高兴地给斯诺寄去一张秀兰·邓波儿在膝盖上“舞弄着”一本斯诺的书的照片。

“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政治记者之一”斯诺，成了一棵走红的摇钱树。虽然他仍然是一个极不善于演说的人，听众还是挤满了多伦多的枫叶公园去听他讲话；电台也经常请他去担任特邀节目主持人。要求他腾出时间的请求源源不断，难怪他曾评论说，也许史密斯兄弟公司要请他为该公司的咳嗽滴剂作推销广告呢！

不只一位评论家提到，斯诺代表着《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这份保守的出版物上最左倾的观点。然而，斯诺同《邮报》的关系却是双方都满意的。斯诺将一些较大的问题贯穿在他的报道中，而不偏离《邮报》所喜爱的那种有血有肉的人物描写（该报的编辑们宣布要刊登一篇报道：“《邮报》的一位曾与红军一道生活过的记者，生动地描写了那些喝着伏特加酒的热心肠的常胜将军们。”）。读者喜欢他们所看到的那些报道。据《本月最佳书俱乐部新闻》称，《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对该刊的读者作过一项调查，读者最赞扬的《邮报》战地记者中，斯诺名列“第一，处于领先地位”。

《邮报》的编辑们在关于该杂志工作人员的定期专栏“作者动态”里高兴地宣布，他们经常不知道斯诺到什么地方去了。事实上，他们愿意让斯诺不断地走动。在斯诺两次访苏之间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派他回印度呆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从那里他又短途飞越喜马拉雅山到了中国。之后，他们又派他在伦敦驻了一段短时间，在那里他写了一篇关于空战的报道。斯诺把《苏维埃力量的格局》一书献给本·希尔斯和马丁·萨默斯这两位编辑，因为

“是他们给了我这项使命和写报道的充分自由”。

斯诺是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他那所用玉米仓改装的写作室里完成《苏维埃力量的格局》这本书的。此后不久，他和佩格同意正式分居，这是造成完全隔阂的又一步。在斯诺的新书付印之前，《邮报》又让他再次飞了出去。4月间，他赴西欧采访这次战争的结束。5月7日即德国人投降的第二天，他到了萨尔茨堡，在那里采访了包括赫尔曼·戈林在内的纳粹战犯。斯诺对象弗里茨·索克尔这样“黑暗的小人物”的眼泪不表任何同情，此人作为（第三）帝国的人力动员头目，曾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他手下从事强制性劳动。斯诺驾驶一辆从军方找来的德国福特牌汽车，第一个到达了毛骚森集中营。

红军已经开入奥地利，封锁了维也纳。凭借一张地图和由一名毛骚森集中营以前的囚犯提供的致维也纳反纳粹地下组织的介绍信，斯诺和《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杰克·贝尔便前往维也纳。他们用向苏联士兵这些战时盟国兄弟敬威士忌酒的疏通办法，通过了一个俄国哨所。俄国占领军粗暴地对待奥地利人。斯诺报道了在盟军占领区，“农民和新近被释放的犯人在耕种田地和宁静地放牧的情景。而在俄国占领区那一边，如果你的牛过了线，就会被牵走并看管起来，以满足那些渴望吃肉的布尔什维克的食欲。”俄国人把赔偿的东西装上每一列向东的行驶的列车。在维也纳，斯诺采访了临时联合政府的成员，他们似乎全都希望恢复民主。他和贝尔在维也纳大学医院生发现了4名美国飞行员。用甜言蜜语从一位红十字会的代表那里骗到了宝贵的汽油以后，这两位记者便把虚弱的飞行员装上汽车，开回了美军控制区。斯诺和贝尔向美国军官谈到了他们此行的详情。这次旅行体现了美国记者的进取精神的最好传统，甚至在他的杂志规定延长的时限内，写出了一条独家内幕新闻。

斯诺把这辆福特汽车保留了下来，从马赛到布鲁塞尔，他驾

车穿过欧洲，度过了“棒极了的”一个月。他在路上那种无所顾忌的精神状态在巴黎时表现的更为突出。用《邮报》另一名记者科利·斯莫尔的话来说，作为“历史上最糟糕的司机”，斯诺在巴黎的名气更大了。有一个星期天，斯莫尔坐在斯诺开的那辆车上时，斯诺在20分钟内连续发生了三次行车事故。在旺多姆广场，他硬是撞上了唯一遇到的一辆车。最后，斯诺把那辆福特车卖了，以偿还在玩扑克牌时欠下的800美元赌债。

7月底，斯诺经斯德哥尔摩和芬兰去俄国。他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他认为，哈里·杜鲁门最困难的任务将是“在罗斯福与约瑟夫·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关系中”，如何取代“这位已故总统的地位”。然而，斯诺在写信给兰多姆出版公司为他的书担任编辑的萨克斯·卡明斯时说，美国人会同俄国人友好相处的。现实的考虑会迫使美人接受斯大林为安全所提出的要求。

然而，斯诺再不会比这更错了。

根据逻辑推理的历史辩论，以后会集中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即美国力图孤立苏联并对它施加压力，是否激起了苏联的不安，并破坏了战后相互让步的基础。但是，对一件事情是没有争议的：美国人对所发生的事件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失误的责任不在政治领导人身上，不在报纸，也不在广大公众方面，而是这三者共同造成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学会注意外界事物的国家必然会产生失误。面对这种失误，美国人并没有给斯诺以荣誉，尽管斯诺一向是个理想主义者，正是他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付强有力的现实主义的药剂。历史上的迫切需要以前曾迫使美国人陷入孤立主义，现在由于又必须按照同样的历史需要行事，美国人正沉溺于一种无法控制的内部相互指责之中。这种情况表明，在美国人心目中，斯诺的名声一直是扎根不深的。

第六章 荆棘载途

在战争年代里，斯诺的朋友们历尽艰险。他将《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书，献给曾在太平洋指挥一支海军陆战队时受了重伤的埃文斯·卡尔森。这位胸前挂满勋章的军官由于受伤被迫退休了，1947年死于心脏病，享年51岁。贝特兰在香港被日本人拘留，并在香港和日本当苦力近4年之久。战争开始时，斯诺与《下午报》记者本·罗伯逊重温旧谊，罗伯逊是斯诺在密苏里大学的同学，是描写他在南方如何度过少年时代的小说《红山与棉花》的作者。1943年，罗伯逊因飞机失事在里斯本丧生。

30年代中期，国民党人将《密勒氏评论报》的创办人密勒赶出了这家周报，因为他那煽动性的反日情绪违背了蒋介石的绥靖政策。密勒快70岁了尚未结婚，他觉得呆在中国和呆在任何地方一样。密勒在上海一直逗留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即他在美国俱乐部门前摔倒时，摔断了肩膀为止。此后他回到西雅图养伤，和亲属们住在一起，再也没有回到上海。1942年夏天他死于癌症。

J·B·鲍威尔仍留在上海未走，尽管他受到了种种威胁并遭阴谋杀害而未能得逞（凶手没有完全拉开手榴弹上的弦）。他在拒绝日方收买《密勒氏评论报》的多次要求的同时，秘密地经营了一座广播电台，直到1941年12月日本人将他和其他密苏里人

投入监狱为止。这批被捕的密苏里人中，有《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托·基恩和美联社的莫里斯·哈里斯和吉米·怀特。鲍威尔第一次与其他40名犯人一起被关在臭名远扬的提篮桥监狱的一间12米宽、18米长的牢房里。由于经常挨打，得不到有营养的食物，每天被强迫作数小时日本式的盘坐，冬季里没有正常的取暖设施，鲍威尔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体重比平时减轻了一半，坏疽病发展到了双脚。这个身体极度衰弱的记者于1942年下半年乘交换俘虏船格里绍尔姆号回国前，双脚已部分做了切除手术。

斯诺算是运气不错，但也经历了磨难：他在印度得了登革热（蚊子传染的热带病），1943年抵达伦敦时又患了疟疾。在俄国由于饮食不佳引起轻度坏血病，但他一直坚持工作。1943年他离开苏联时，因患流行性感冒身体很虚弱，而且，据卡拉奇的一位军队业余牙科大夫的诊断，他得了战壕口炎。于是，他启程回国治疗牙病。当他途经西非时，一位真正的牙科医生诊断为拔掉牙的地方发生脓肿。于是，斯诺又登上了去印度的飞机。所有这这些年，斯诺可以接近《邮报》的读者们。由于读者为数众多，在战争期间难以找到足够的有盖货车在全国各地运送这份期刊。

给斯诺带来真正困难的不是战争年代，而是战后的岁月。对斯诺所预测的将会在东欧和亚洲发生的事件，美国人并没有思想准备。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是孤立主义者。虽然在战争年代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兴趣增加了，但根据一项估计，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对国际上的大事根本不关心。1945年8月，即日本投降的那个月，《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推出《美国的城市》系列报道，并以一篇关于堪萨斯城的文章作为开头。该文作者在漫不经心地概括国人的心情时说，堪萨斯城“在美国大城市中也许是最典型的”，也“是你在美国能找到的最远离战争的城市。”记者

约翰·根室在周游全国时，列举了中西部的特点：教堂晚餐和乡村俱乐部；崇拜维生素、高尔夫球和弗兰克·西纳特拉。（50年代的著名歌星。——译注）根室评论道：“威尔基先生的‘一个世界’的思想的确不存在”，“更确切地说，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美国。”

因此，当海外的情况发生了美国人从未预料的逆转时，他们陷入了惊慌迷惑之中。他们以前想象那里的共产党人是和善的，现在只看到邪恶了。作为他们要责怪的人士之一的斯诺（他们就是不责怪自己），虽然从战争年代幸存下来了，可却成了和平时期的受害者。

当两颗美国的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时，斯诺已经回到了苏联。在获得和平之后，美国记者自我新闻检查的主要动力消失了。尽管难以让苏联人谈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政治观点这个老问题仍然存在，但斯诺已经能够比以前更深入地工作了。一个憎恨共产党的乌克兰熟人帮他找到了一个战后勉强度日的典型莫斯科家庭。在因此写就的（他发往这个国家以外的）采访报道中，斯诺描写了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艰难生活：这个家庭居住面积狭小；还得与别家合用厨房；买食品杂货须排好几小时的队；他们对很快获得充足的食物或衣服丧失信心；他们还得为一个被送往西伯利亚的亲属操心，因为“他不幸在一家拖拉机厂工作，据说在1938年清洗期间这家工厂是收容叛徒和怠工者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斯诺报道了美国人私下表示的不满，这些表示不满的人有，主张取消对苏援助的外交家乔治·凯南和驻苏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恩将军。斯诺报道说，苏联人只是在对他们有利时才给予合作。苏联人不允许军事观察人员或外国记者去参观他们的军事单位，并且限制美国人使用机场。苏联官员们经常设置“官僚主义的障碍物和采取拖延手段”来阻碍美国人进行工作。斯诺特别提到敢和美国人交朋友的普通俄国人有潜在的

“灾难性后果”，这表明（他们）一直在怀疑美国人。更糟的是，在斯诺看来，苏联领导人支持对美国采取进攻的态度，因为美国自从有了原子弹之后，它的力量似乎具有了威胁性。

艾森豪威尔将军访问莫斯科时，斯诺曾私下问他关于原子弹对苏美关系的影响，艾克回答说，“我不知道”。“人们普遍感到惊慌和不安。”

然而，在列宁墓前的观礼台上，艾克和俄国将军们并肩观看游行场面的情景，提供了有希望的征兆。斯诺在一篇略述美国人沮丧情绪的文章中指出，由于美国提供了援助和两国间进行了有限度的文化交流，普通苏联人对美国人怀有“真正的敬意”。

在文章结尾处斯诺写道：“上述已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就似乎并不能说明罗斯福的政策具有生命力的信念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罗斯福已决定将‘租借法’所规定的援助扩大到俄国。”“不过，这些因素与国际上发生的其他事件交合在一起，给人们留下了希望：苏联政府会及时把口子开得更大些，目前，它允许其公民与国际大家庭接触了。”

斯诺在苏联停留期间，正好碰上美国国会代表团1939年以来第一次访问苏联。在花了几天时间在莫斯科陪这4位议员。议员们在报告中要求“在我们自己进行谈判和与苏联的关系中立即放弃任何类似的姑息和迁就。”虽然这份报告中并没有提到斯诺，但该报告也强调了斯诺关于两国之间需要“增加人民、商品和宣传材料的交流，”和尽早举行一次杜鲁门和斯大林的会谈，“以消除苏联对美国的目的和意图的怀疑。”

9月，当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沙特阿拉伯时，他们提出请斯诺随团。斯诺有一份去沙特阿拉伯的无固定期限的特别签证，这是他几年前从一位给沙特国王伊本当矿业顾问的熟人那里获得的。只有另一位记者曾到过这个与世隔绝的沙漠王国。早就计划

要回到亚洲的斯诺，欣然接受了国会的这一邀请。

在这次旅行的头一阶段，斯诺跟随代表团乘C-47型飞机轻快地走了，他帮助南达科他州共和党众议员卡尔·蒙特在报告中拼写苏联的人名和地名。抵德黑兰时，迎接他们的是一位神经极为紧张的美国外交官。这位官员是准备陪伴议员们去沙特阿拉伯访问的，他认为，在代表团中安排一名妇女，即俄亥俄州众议员弗朗西丝·博尔顿，以及安排一位记者随行不大合适。妇女议员和记者都可能触怒国王。代表团则拒绝去掉任何一位，蒙特还任命斯诺为名誉新闻专员。

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停留了3天，其中一人在利雅得与国王伊本·沙特在一起。这位国王身高6英尺4英寸，身穿大袍，戴着头巾，确实是威风凛凛的。团员们在星光灿烂的室外与国王共进晚餐，羔羊、鱼、蔬菜和家禽等食品堆积如山。然后，国王提出，在该国的石油财富被开发之前，给予经济援助以改善人民生活。当议员们鱼贯而出时，国王将斯诺拉到一边进行了私下交谈。他以阿拉伯人的方式，将斯诺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重申他在晚宴时所谈的另一观点：西方国家必须承认所有中东国家的完全独立，而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要试图将西方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是欧洲人而不是穆斯林迫害过犹太人；巴勒斯坦现在不应该接受所有的犹太人难民。

斯诺断定：“这里不仅蕴藏着无数的财富，而且在这附近充满着未来国际历史中的潜在危险。”“在这段历史尚未完全写成以前，美国人可能会象熟悉他们自己国家一个州的地图那样熟悉阿拉伯的地图；而阿拉伯人则将去掉他们与世隔绝的面罩，被工业化的世界所同化，不论情况是变好还是变坏。”

斯诺离开利雅得时，穿着阿拉伯服装，戴着一块金表，携带着一支镶有宝石的剑，这些都是国王赐给代表团每个成员的礼物。与代表团分手后，斯诺去印度呆了三个星期，还顺便越过喜

马拉雅山访问了昆明，然后再去曼谷和西贡，了解西方大国打算如何运用它们打败法西斯后所赢得的权力和道义上的资本。他很快便得出了结论：它们会滥用这些资本。

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泰国，为了自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竟成了日本的一个不热心的盟国。斯诺承认泰国应该赔款，但同时他也反对英国要求控制泰国的商品出口和享有军事基地权。他感到英国的要求类似老牌殖民主义的做法。同样，他也不喜欢英国的印度支那政策。英国人被越南临时政府请来帮助其恢复社会秩序，却在实际上使法国人恢复了他们原来在越南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为了使这个国家不落入本地人的手中，他们重新武装了日本军队，好象日军还不够坏似的。

美国对这些事件不大感兴趣。斯诺沮丧地写道，美国的这种默许与它在战争年代对海外广播时宣扬自由的调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点以及其他的原因，才使得某些曾到过这里的观察家一直这样说：在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威望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要高，而其威望下降之迅速，也是历史上任何国家无法相比的。”

斯诺报道了美国驻印度支那为数不多的军官和军士中有一人在越南人和殖民者的交火中死亡。一场新的冲突已经开始了，斯诺写道。独立“就象过去通常解决从奴役获得自由的问题一样，将取决于能动员起来的奴隶武装力量的数量，取决于他们反抗的狂热程度，取决于支持他们斗争的道义和政治力量，而最终取决于革命者所作的准备工作；与其说是为成立自治政府，不如说是为了维护他们不可剥夺的作为自由人的权利而准备挨机关枪、炸弹或者原子弹的攻击或轰炸。”

斯诺旅行的下一站是马尼拉。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这个城市毁坏得面目全非，他几乎都不认识路了。他住在当年为工会在菲律宾募捐时认识的一个中国朋友的家里。在等候《邮报》外事编辑

马丁·萨默斯同他在菲律宾会合并一起去整个东亚地区旅行时，斯诺象往常一样继续闲逛，其中有一段时间与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在一起。这位军官是一个星期天下午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说时认识的。一直对这个岛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感兴趣的达罗尔德·贝克曼，表示愿意将斯诺介绍给路易斯·塔鲁克和曾抵抗过日本人的由工人农民组成的共产党游击队——人民抗日军的其他领导人。路易斯·塔鲁克后来回忆说，斯诺在邦板牙省的圣费尔南多采访人民军时，讲的主要是政治理论。

斯诺邀请贝克曼加入他和《纽约邮报》记者达雷尔·贝里根去碧瑶的旅行。贝克曼对此行的回忆构成斯诺性格和观点的生动的写照。看来，斯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和威望。他乘一辆由司机驾驶的军车旅行时，与贝克曼在一块口袋大小的木板上下棋，并谈论着农民在山上修梯田的技巧。在碧瑶，他和贝克曼同住在一间双人房间，每张床都有一张薄薄的垫子铺在一架弹簧上。当斯诺熄灯上床时，床垫突然发出“当”的一声，他又赶紧下地。原来，床垫两个对角的弹簧翘起来了。再打开灯，他和贝克曼试图将床上的弹簧铺平，他们把一个角上的弹簧压下去，另一个角又砰地一声翘了起来，他们都歇斯底里地大笑了。斯诺说：“现在我知道人们为什么称之为弹簧床了。”

抵达碧瑶之后不久，斯诺给贝克曼一张20美元的支票，请他买一瓶威士忌酒。他们拿了酒去采访前日本傀儡官员。他们自己已经喝得迷迷糊糊，以致于无法搞清傀儡总统是如何从日本人手里“逃脱”并与麦克阿瑟接触的详细情节了。第二天上午斯诺和他的同伴顾不上因醉酒引起的头痛、恶心，又回去重新进行采访。

斯诺找到了他和佩格在碧瑶曾居住过的那所精制的旧房子。伊哥洛人将原来的奈良木镶板拆了下来，在住处内盖起了六间本

地的茅舍。斯诺富于哲理地将这件事看作是以本地的方式来替代西方影响的一个象征。他观察了一个伊哥洛人家庭全家在一起雕刻木头人后，评论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他对贝克曼说，这一品质比竞争更能使人类成为高级动物。

在《邮报》的一篇文章里，斯诺谈到他在曼谷和西贡遇到的同样问题：美国应该做些什么。斯诺不相信，随着明年菲律宾独立（即1946年7月4日）之后，美国的责任就结束了。他指出：

“对一个小国来说，除非有经济和军事上的保证，否则政治上的独立只是一种幻想。……在未来几十年中，这些岛屿注定仍将是美国事实上的保护地。”

斯诺在对具体步骤提出建议时，并未对美国在这个岛国保持军事基地的政策表示异议。但是，他要求美国将这些战略性的利益，与支持菲律宾人进行土地改革和给予经济及财政的援助结合起来。他最后说，“不幸得是，对菲律宾的复兴计划，我们除了让一切照旧之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这种局面可能引起另一场游击运动。

这个重要信息并没有在华盛顿引起注意。到头来，斯诺倒是 对菲律宾人民军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塔鲁克于1946年被选入国会后不久就被剥夺了议员席位。对他的指控说，他与另一些人民军成员曾利用恐怖手段夺取政权。塔鲁克坚决否认这一点。他说，他的“罪行”是反对政府那些可憎的政策，“包括美国强加给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协议。”人民军又回到了山区。虽然塔鲁克否认与中国或苏联有任何直接联系，但他却承认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斗争给他们提供了重要的鼓舞。他说，人民军将《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他们游击活动的教科书。

1944年，兰多姆出版公司的现代图书馆出版了一套丛书，其中包括再版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当时曾说，《红

星》所描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抵抗活动的故事，有着一股感人的力量。印度人、缅甸人和马来亚人以及他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偶然碰见的俄国妇女游击队三人小组都告诉过他，他们都采用这本书作为游击战的指南。

贝克曼注意到，谈论红色中国问题对斯诺有很大吸引力。的确，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诺心中总是想着中国。一天，他在巴黎遇见他以前在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当时也在欧洲当记者。他们在一家旅馆的酒吧间里泡了整整一个下午，谈论在北京的往事；斯诺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而且，斯诺感到忧虑的是，战争并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如同没有解决泰国、印度支那或者菲律宾的问题一样。

自从1939年斯诺访问延安之后，蒋介石紧紧地关闭了进入红色首都的门户，以致西方记者再没有一人能进入延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种策略却阻止了记者们对毛泽东的严厉的整风运动的了解。这场整风运动是在党员人数日益增多，加上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压力日益加强的时刻，为严肃纪律而采取的政治措施。作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知识分子的历次运动的一次预演，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作家丁玲——在斯诺的《活的中国》一书中出现过她的作品，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她失去了编辑的职位，在承认错误之后，到农村和农民一道“学习”了两年。但是，即使记者亲眼见到整风运动，它与斯大林的血腥清洗毫无相同之处。在那时，公民的诚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仍是共产党人所掌管的地区的主要特色。在那些访问过红色根据地的非记者人士中，美国银行家G·马特尔·霍尔带回一份众所周知的报道。虽然他早就讨厌共产党，但他得出结论说，共产党人在中国创建了一个最近乎民主的政府。不管真正的记者对这样的报道可能有多大的怀疑，但他们了解重庆。每天展现在眼前的腐败和无能，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感到厌恶。

斯诺尽可能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在1942和1943年间到那里作短暂的访问，并与霍尔那样的人进行联系。周恩来在写给斯诺的信中说，由于统一战线的解体，“自从你离开我们以来，中国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斯诺认识到，虽然内战破坏了抗日斗争，但未必有损于共产党人。正如他1938年预测的那样，“随着战争一天天延续下去”，……共产党人巩固和加强了他们对“中国农村地区的控制”。共产党人深入敌后活动，避免打正面遭遇战，并向中国农民提供一种免受租税压榨的生活，因而逐渐扩大了势力范围并保存了实力。在1937年至1943年之间，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面积增加了五倍；人口从150万激增至5400万。斯诺和其他观察家来中国看了三个乡村地区——一个是由国民党人统治的，一个是日本人统治的，一个是共产党人统治的。

斯诺继续亲自参加一些活动。1942年他不辞辛苦地为了一本关于中国抗日的爱国小说的英文版写了一篇引言。他以独特的姿态，通过埃文斯·卡尔森向中国孤儿赠送了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为工合这个事业热忱工作的佩格·斯诺回忆说，斯诺对工合要求占用他的时间表示不高兴，而且随着战争持续下去，他“变得非常悲观。”然而，斯诺从很远的地方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使工合成为“中国未来的关键”。他觉得，作为对立的各派之间的桥梁，工合可以阻止内部互相冲突的流血战争，并能“建立一种坚实的经济基础，以便按照民主、和平的方针，使中国的未来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还认为，合作社为其他地方的民主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组织形式。“美国人必须开始认识到，工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真正的替代方式，使我们可以通过继续实行目前经济干预的办法，而不去参与对殖民地国家进行奴隶式劳动的剥削。”

结果表明，1940年是合作社发展到高峰的一年。美国人在一个月内的捐款就达5万美元，但是这个组织却同统一战线一样破

裂了。重庆要求垄断工合的资金，不仅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且是为了排除可能对共产党人给予支持。艾黎等人要求将资金直接用于实际的、没有党派色彩的、现实可行的项目，但无法战胜国民党的压力。1942年，政府以停止任命艾黎担任工合的技术顾问的方式，来限制他的影响。艾黎虽然继续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发挥的作用更加有限，工合蹒跚不前。战后，整个工合仅仅有三四百个合作社幸存下来，和1940年的水平相比，不及当时的四分之一。

斯诺认为，工合在共产党管辖的地区搞得更好得多。据他估计，延安的补给站是1942年全国最大的地区性总部，拥有工人的数目同中国所有其他地区拥有的工人的总数一样多。几年以后，斯诺认为，共产党给予工合独立自主的支持，“成为他们最后取得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种说法是过分了一些。斯诺注意到，国民党人未能利用工合运动建立起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支持，这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成功的原因。斯诺的这一看法倒是比较接近真理。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在战争的头几年时间里，形势的紧张并未被美国公众所了解。常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们将他们的抱怨仅限于大都会旅馆的餐桌上，而驻在重庆的记者们则采用同样的办法，把报道消极面的新闻稿扣下来不发。赛珍珠及其他少数人在1943年对国民党人进行了温和的批评，几乎不足以影响人们对蒋介石的信任。斯诺对国民党人批评得最响亮，但他也抑制了自己的一些评论的调门，希望避免造成裂痕，从而不利于将战争努力进行下去。

1942年8月，罗伯特·巴尼特在“太平洋学会”会议上所作的一次“不供对外发表”的谈话中，对当时带有普遍性的看法作了概括。在谈到最近一次中国之行时，巴尼特抱怨说，编辑们所作的新闻检查和表面化的询问，使得来自中国的重要新闻极其短

缺。他还说到，他不打算去反这种潮流。“我要说的在重庆几乎都不是什么秘密，然而我要说的几乎也不是供发表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斯·惠里了。他在战争一开始时曾向欢呼的人群宣称：“我们要帮助上海发展起来，再发展起来，一直到它象堪萨斯城一样。”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在战斗精神和抱负方面同真正的美国人一样——《纽约时报》在社论中将中国称作：“我们忠诚的盟友中国”。1942至1943年期间，蒋夫人在美国访问达半年之久，国会对她报以暴风雨般的欢呼；17000名美国人聚集在麦迪逊广场公园聆听她的演说。威尔基在撰写《一个世界》一书时，曾与蒋委员长一起度过了几天。他很肯定地说：“现代中国领导人的经济目标是要发展他们的国家，正如当年我们开发我们的国家那样。”威尔基回忆起那位“沉默寡言、真心诚意的”路易·艾黎时说，“当我见到他时”，他在工合方面遇到了“困难”。威尔基没有详细说明这些困难是什么。

由于人们决心要缩小对中国的看法上存在的分歧，指向斯诺的零零碎碎的批评也就听不到了。

1941年，约翰逊大使在给华盛顿的一份电报中抱怨说，中国共产党人比国民党人更善于进行宣传。他指出：“在以赞许的态度描绘和解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原则和宗旨方面，斯诺也许是比任何其他他人做得更多的一位美国人。”不久之后，欧内斯特·海明威访问了中国。刚一回国，他就给国务卿亨利·摩根索写了一封信谈他的印象。他认为美国不应当对共产党人在战争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那么高的评价。“他们很擅长于宣传，并欢迎斯诺那样有才华的作家们到他们所管辖的地区访问，因而美国对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夸张的看法。”

约翰·佩顿·戴维斯当时在国务院的远东司工作，对约翰逊不那么尊重，因而很容易将这位大使的批评置若罔闻。戴维斯在

约翰逊发回的那份电报上附的一张纸条上写道，由于共产党运动具有“从事改革的号召力”和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人拥有强大的拥护者。国民党对新闻技巧所作的改进，即使对那些比较趋向中立的记者，也没起多少作用。海明威把自己的意见隐讳起来了。由于他得知“我们的政策是不鼓励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打内战，”他对摩根索说，他并非在写任何会“鼓励两党进行内战”的东西。

就象蓄在一座有毛病的大坝后面的水一样，美国人的不满情绪随着对国民党人的错误的假设而悄悄地积累起来了。从一开始，美国之所以帮助蒋介石就是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为的是需要加强抗日。虽然罗斯福政府并没有给亚洲战场以欧洲战线同等的优先地位，但还是给了国民党人大量的财政和物资援助，作为道义上援助的补充，以提高蒋介石的威望。罗斯福终于放弃了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并邀请蒋参加他与斯大林和邱吉尔的会谈。在1943年圣诞节前夕，罗斯福宣布：“今天，我们和中华民国在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目标方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密无间了。”

蒋介石不愿使用他那壮大起来的力量去反对日本人，而是在贪污腐败和打内战方面浪费精力，随着蒋的这种表现逐渐变得明朗起来，在美国引起了深切的忧虑。罗斯福私下忧郁地说：“我现在正想搞清楚：中国军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去打仗？怎么似乎日本人想把他们往那里赶，就能把他们往那里赶？”

1944年，罗斯福政府开始对蒋施加压力了，要求他与共产党人重新团结起来，而这时共产党人似乎决心与日本人作战，并控制了日本企图入侵的重要地区。为便于实现这一目标，罗斯福要求蒋介石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指挥所有在中国的军队，并有权武装和使用共产党的军队。蒋故意拖延对这一要求的执行，同时派他的一些代表在华盛顿进行幕后活动，想把史迪威搞掉。10月，这

位委员长成功了。由于罗斯福搞了个提高国民党人形象的运动，他不大可能再开始独立与共产党人打交道了。而且，他也不能逼着蒋介石接受史迪威这个“乖戾的家伙”。罗斯福召回了这位好斗的将军。

在史迪威被召回之前，由于当时国民党人地位虚弱，只好屈从了记者们不断提出的访问延安的要求。记者们得到了积极的印象：共产党人确实与国民党人不同，他们抓到了日本俘虏，可以表明他们的战果；在他们关心爱护下的士兵，谈论起夺取战争的胜利时充满着热情。随着史迪威的去职，以前被报界压抑着的一切沮丧情绪，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使美国人大吃一惊。《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首先披露了重庆的违法乱纪活动。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他从中国以外的地方发出了一篇报道，将史迪威的被召回描绘成“一个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其他记者随之写了一些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进行对比的报道。蒋介石再次禁止新闻界去延安访问，但已经为时太晚了。从前看起来和谐平静的地方，现在出现了尖锐的对立。

克拉伦斯·高斯大使同史迪威不相上下，他不受蒋介石的欺骗，对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绕过他处理问题的作法感到厌倦，愤然辞职。由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接替他出任大使。赫尔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雄，石油公司的律师，曾任胡佛总统的国防部长，最近担任过罗斯福的特使。起初，他来中国是为了帮助史迪威同蒋介石搞好关系的。他对中国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作为大使，他很快就陷入了蒋介石的谄媚和许诺的罗网。他坚决不同意他的下级寻求与共产党人打通关系的主张。当这些不同意见传到华盛顿时，还是赫尔利——和蒋介石——获胜了。被赫尔利认为是参与反对他的阴谋的美国官员被调回了国。几年后，斯诺评论道：“毛病完全出在罗斯福那里。”

在1944年这一年里，斯诺站到了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一边，这些人承认共产党人拥有战略上有价值的潜在力量。在对《红星照耀中国》的增补中和在《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发表的文章中，斯诺主张，美国应该同这些“失去的盟友”建立直接的联系，象那些被召回的国务院外交官那样，斯诺受到了尖锐的攻击。第一个同他较量的就是老朋友林语堂。

林语堂曾经赞扬过《红星照耀中国》和《为亚洲而战》这两本书，后一本书的护封上还印有林对该书评论的摘引。尽管斯诺批评了蒋介石（和孔子），当时林还是认为斯诺“一向是客观的”。到了1944年，林已不再容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正面描写。在同年出版的《一个民族的警醒》中，他把中共描绘成犯有暴行的苏联走狗。他指名道姓地说斯诺是中共的主要宣传家之一，并说多数中国人厌恶共产党。他说，中国人“不是由于读了《红星照耀中国》，而是通过千百人生死的代价”才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中国真正极权主义的政权和真正彻底的一党专制是在延安，而不是在重庆。”

林语堂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两位作家怒目切齿，把自己的情绪写成白纸黑字，此时，他们完全忘乎所以，”“往往不能体面地从上述情况中摆脱出来”。斯诺在《民族》周刊上评论《警醒》这本书时也是这种情况。他指责林语堂诽谤“我们在中国人民中最好的那些盟友”，指责林使用不可靠的第二手材料，而对国民党的弱点不予充分注意。他担心，“林的激烈的反共言论将被美国国内无知和反动的集团所利用，这些集团一般是不关心中国的福利的。”林又发表了一篇措词尖锐的答复，斯诺再次以书信回答。两文都发表在《民族》周刊上。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林感情用事地说，斯诺将中国人的名字PANG拼错了，掉了一个字母“G”，俄国人就会这样干。斯诺答复说，那是《民族》周刊无意中漏掉了一个字母。还说，

要是人们寻找不吉利的信号，那就是林把中国人名字的送气音符号“’”，包括他自己的名字YU—T’ANG中的那个送气音符号“’”也给丢了，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

林语堂把中共归于极权主义一类（他报道了共产党整风运动反对知识分子的某些情况。）但是，由于他从来没有到过红色地区，并具有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对古代中国的东西又不那么尊重（在这一点上，斯诺与林持不同观点），所以他对中共在中国得到群众的支持无法理解。林曾有过一次生动的评论：“要是毛泽东得过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要是朱德将军是一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我怀疑他们两个人中是否会有一个人能那样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科学’的最新真理。”林在哈佛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懂得如何开辟美国的文学市场。在中国人中间，他是一个比多数共产党领导人更加引起异议的人物。

这场争论并非完全对斯诺有利。斯诺堕入了几个月前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陷阱，而林语堂却利用了这一点。斯诺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进行了多年审慎的权衡，他将共产党的纲领和最终目标区别开来。尽管他称中国共产党人为平均主义者，但他嘲笑那些说中国共产党人只不过是对于土改有兴趣的人。他严谨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美国术语中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人对时机的选择是独具匠心的。他说，从理论方面看，建设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从实际方面说，他注意到，共产党人希望尽可能快地获得政权。虽然斯诺意识到共产党人会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但他认为在近期内获得无可争议的权力还是成问题的。这也是延安许多共产党人的看法。斯诺谈到了蒋介石对目前局势的反应，他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控制局势，或许会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但这种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各自的力量。

1944年，斯诺改变了他的立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不

偏不倚的态度。他开始更加无保留地将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描述为一个民主的“自由中国”。他在一次集中阐述当时局势的演说中说，“他们现在实际上是农民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人是愿意与国民党共同掌权的。在《邮报》文章中，他把中共描绘成一个重要的潜在的同盟者，并刻画出了游击队员的形象；而将革命的共产主义的目标摆在不重要的地位了。斯诺对林语堂指责共产党人不能反映中国人民的愿望的说法深表愤怒，他甚至在《民族》周刊上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恰恰在几年前就放弃了要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的意图”。

斯诺没有阐明他改变想法的理由，而事实上他的想法究竟改变了多少；也不是很清楚的。斯诺在《红星》一书的新版后记中写道：那种物质、精神和智慧的力量“最先使‘红星’升起在中国的上空，它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即使没有这个有争议的象征本身优势的话。”就在林语堂对他进行攻击的前几天，斯诺曾告诉罗斯福，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农民改革者。放弃中间立场也许仅仅是由于斯诺自己当时的心境：过于急切地想使美国人相信，共产党人比国民党人更民主，美国政府应当迫使国民党人同意团结一致进行抗战。也许是因为斯诺注意到了，经过了几十年，苏联还未能能在他们的国家里建立共产主义。

无论如何，这一失误给林语堂提供了一个大的攻击目标，他利用斯诺自己以前写的关于共产党人的目标的话来反对他。在最后一次回击林时，斯诺继续以抨击的语气，称这位中国学者“有点神经过敏”。斯诺仍然和过去一样，承认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它要在中国完成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

几个月之后，在为《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写的一篇文章中，以及在大约与此同时出版的《苏维埃力量的格局》一书中，斯诺进一步澄清了他的观点。他写道，共产党的纲领是一种“具

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温和的土地改革的政纲……不过这里要提醒一点，认为这些共产党人并不希望最后完全取得政权，那是错误的。虽然他们很可能会实行某种民主的平均主义，如同目前在他们的控制区所实行的那样，但是认为他们会比国民党更可能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自由化民主国家，同样是错误的。”

斯诺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人看起来比国民党人更民主一些。国民党是“通过把农民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来维持其政权的。“……而共产党人必须采取各种方式让农民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采取人民群众的支持，以便维持和壮大他们自己。”

象以前一样，斯诺强调指出，美国应当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他承认，这样做将会增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虽然美国在欧洲甚至几乎没有帮助苏联。但是，通过要求他们以共产党的普遍纲领为基础联合执政，美国和其他的盟国，包括苏联在内，就能防止在战争结束后出现一个部分地区布尔什维克化的、分裂的中国。

国务院里许多中层外交官持与此相同的观点，他们认识到，这种办法也许能抵销苏联在战后的影响。要是决策者们真正试一试，这种策略的成功与否顶多是前途未卜。尽管斯诺意识到：

“国共两党所代表的中国内部这两股势力，似乎变得更加不可调和”；但是，这种看法比现行的看法更现实，而且表明斯诺在继续考虑，如何挽救国民党人，而不是把他们赶走。

在预见共产主义在中国会得到发展的同时，斯诺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人继续维护其政权的能力。然而，美国大多数领导人的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典型的看法，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人看成是不同于红色的另一种色彩。直到1945年，赫尔利还说，“这些共产党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人。”史迪威把中国共产党人描绘为“农业自由主义者”。罗斯福称他们是“所谓的共产党人”。斯诺和罗斯福交谈时告诉这位总统，中国共产党人是真

正的共产党人，而罗斯福说，这些共产党人的目标是实现土地革命的纲领，而不是实现共产主义。随着中国内战的形势日趋明朗，对共产党人的失望情绪出现了。斯诺退出与林语堂之间的窘困局面，使那些追查是谁使美国对共产党人产生错误看法的人们得到一个错误的判断——斯诺发现，人们向他发起了第二次攻击，这次是他的老朋友J·B·鲍威尔。

战前斯诺访问上海时，经常去见鲍威尔，有时还住在他家里。虽然两人确实亲密无间，但他们争论起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问题时，激烈得使第三者根本插不上嘴。鲍威尔的长辈身位，使斯诺在与他私下交谈时比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更大胆。鲍威尔出狱后，在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医疗中心长期休养，但他那人民党的情绪不减当年。一个银行家集团请他去讲话，他拒绝了。他说，这些人就是想看他跛着上楼。他对蒋介石的尊敬如故，蒋曾送给他一张1万美元的个人支票，这是当时许多捐款中的一项。鲍威尔一争论起中国政治问题来，还象从前那样性急。他的儿子比尔回忆说，另一位老朋友史沫特莱也经常来访，她总要带给鲍威尔一瓶白兰地酒或者一些其他礼物；坐下来不到五分钟，他们就要对中国政治问题互相嚷嚷起来。

每当结束一场争吵之后，史沫特莱总要问鲍威尔：“明天我来访时还有什么能带给你？”到战争结束之前，要消除意见分歧已经不可能了。鲍威尔帮助建立了“美华政策协会”，该协会对促进亲国民党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鲍威尔还同前共产党人马克斯·伊斯门一道，在《读者文摘》月刊发表文章，说美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选择代表美国民主的国民党人，还是代表俄国极权主义的共产党人。这两位作者列举了向美国人进行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各种欺骗宣传，同时重提了斯诺与林语堂之间的那场交锋。这两位作者写道，斯诺是“最出色的宣传亲共观点的人，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恰巧在几

年前的现在就宣布放弃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的意图’。”

鲍威尔的儿子在战后又恢复出版了《密勒氏评论报》。原本没有打算复刊的。1946年，鲍威尔曾在东京战犯法庭作证，但没有去中国。他于1947年2月28日回到华盛顿后，在密苏里大学同学会的一次午餐会上发表演讲，刚一就坐，就突然晕倒并与世长辞。

日本投降后几个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开赴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杜鲁门政府仍然坚定地站在国民党人一边。9月和10月，美国飞机将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满洲，希望能拦截共产党人。大约调动了5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帮助国民党人去占领港口和机场，在有些地点，实际上与共产党军队发生了冲突。在《邮报》的外事编辑马丁·萨默斯到了菲律宾和斯诺一道工作之后，上述情况的新发展是成了斯诺要求再次去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埃德加·斯诺是国民党人最不愿见到的美国记者。1942年访问重庆期间，他就向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抱怨国民党对他的采访工作设置障碍。之后他发出的新闻特写，报道了国民党不愿同日本人作战和浪费美国的援助的情况。蒋介石夫人认为斯诺是共产国际的成员，禁止他进入中国。斯诺简直成了国民党人所不欢迎的新闻报道的象征。因此，在他们终于让一小批记者于1944年访问延安时，官员们担心，他们不得不对付“11名埃德加·斯诺”。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国民党的一份秘密报告的名单中，这份报告是调查人们为什么对国民党态度不好的原因的。报告认为，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1944年版，附和了那些要把美国的援助转给共产党人的论调；这就证实了斯诺是一个重要的敌人——而且是一个有影响的敌人。该书重印了6次，总共销售27000册。这对一本“旧书”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史沫特

莱在为该书的新版本写的一篇评论中高兴地写道：“它仍然是掌权的国民党身上的一根刺，这是它的光荣。”

到了1945年晚些时候，国民党人禁止入境的记者中有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文森特·希恩以及斯诺到碧瑶旅行的同伴达雷尔·贝里根。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理由来阻止美国人来华的话，帕特里克·赫尔利突然在11月下旬辞去大使职务提供了新的理由。赫尔利指责说：“我们国务院里有相当多一批人正在极力在总体上支持共产主义，特别是在中国支持共产主义。”在赫尔利断言有美国人从事罪恶活动之后，国民党人通知斯诺，他不可能得到采访海军陆战队的活动，或者采访任何其他情况的签证。

斯诺对此提出了抗议：“这是一个盟国政府严重违反基本新闻自由的行为，这个政府由于许诺有这种自由而得到我们的同情；为这个国家的独立事业，许多美国人献出了生命，我国纳税人提供了数以亿计的美元。……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作为一个多年来主张取消治外法权的人，在重庆政府完全恢复主权之后，现在竟然成为第一个被排斥的人。”《邮报》的编辑们向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提出了抗议。这段插曲引起了报界相当大的注意，《时代》周刊提到了社会上日益流行的说法，斯诺“在向美国兜售（共产党人的）主张方面，干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据重庆官方透露，禁止斯诺入境并非最后的决定。2月，前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成功地使这项禁令解除了。马歇尔是去中国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继续进行调停活动的。

当时，斯诺已经去日本和朝鲜采访了，他自己对访华问题也有了新的考虑。几个月之后，在写给希布斯和贝特兰的信中，斯诺表示放弃中国之行。他写道：“看来中国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內战”，“如果我们继续以武力支持国民党，要是我去中国的话，那我必须倾向于支持我所不同情的政权和政策”。他最后说，《邮报》还是派别人去吧！

12月中旬，斯诺到达日本之后不久，在记者俱乐部偶然碰到了贝特兰。大战以后多年不见了，这是一次愉快的久别重逢。他对与占领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邂逅相逢，倒不怎么热情。麦克阿瑟将他在日本的计划称为“实际上的革命”。斯诺对此表示怀疑。妇女享有选举权以及进行其他的政治改革，裁减军队，推行促进土地改革的政策，清理大财阀的产业以及有些农民表示愿意发表意见等，这些都是一些积极的征兆。问题是日本的改造将会进行到什么程度。

斯诺曾向日本工业合作协会提供他从事工合活动的经验。他从该协会了解到，由于缺乏信贷，使工人们难于购置固定资产。农民也谈到获得土地的困难，因为需要支付补偿费。斯诺曾和裕仁天皇一道参观过一些住满了难民的快要坍塌的房屋，他为天皇感到难过。斯诺和被采访过的共产党人同样认为，这个“农民仍称之为天子的可怜小个子人物”是部分问题之所在。彻底的经济改革的失败，伴随着为了保留天皇及围绕他所形成的传统权力结构所采取的步骤。斯诺认为：“迄今为止，日本的权力并没有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并没有进行经济革命。”在这种条件下，大财阀的公司会重新出现。贝特兰和欧文·拉铁摩尔也同意他这种观点。看到资本家和工人界线分明的世界，斯诺预测：在美国计划占领的5年时间内，日本的政治变革可能产生一个由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的左翼联合政府。

朝鲜问题也使斯诺感到麻烦。1942年罗斯福曾令人迷惑地告诉斯诺，在战后他不打算实行托管朝鲜的计划，当时斯诺非常高兴。但实际情况比斯诺所想象的要糟得多——朝鲜由两个国家托管，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分裂了。在三八线（斯诺曾在那里度过除夕）的一侧是美国人，而另一侧驻扎着苏联人。要使朝鲜成为统一的国家，实现公平的商品分配，似乎是遥远的事情，就象日

本统治朝鲜的年代一样。

斯诺和萨默斯曾与约翰·霍奇将军一起吃过饭，霍奇对担任美国驻朝鲜的占领军司令这个职位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美国没有支持朝鲜的左派人士（斯诺认为这些人士在朝鲜拥有强大的支持力量），却去支持那些没有深厚群众基础的人物。美国军队没有去促成土地改革或者重新分配其他的财产，其实在朝鲜进行这项工作比在亚洲其他地方都要容易，因为这里绝大多数土地和资本不归朝鲜人所有，而是属于日本人。

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上写道：“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美国占领朝鲜在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是：我们在这里阻止了一场革命。”斯诺继续写道：苏联占领军“对治理朝鲜也并不是（比美国占领军）准备得更好。”虽然它把“有产阶级”从政权中清除掉了，但也带来了相当大的混乱。尤其是，苏联人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且“把最高指挥大权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斯诺担心，除非美苏双方撤出各自的部队并让朝鲜人举行全国性选举，朝鲜的分裂状态将会固定下来。他写道：“讨价还价的时间越长，两个地区会越来越分道扬镳，各自会更多地反映出具有占领国特征的社会模式。”10年之后，朝鲜战争粉碎了实现统一的任何希望，斯诺认为苏联人为此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责备，因为假如苏联人能让朝鲜人通过政治方式取得政权，社会主义早就胜利了。“除了他们自己那一套外，任何其他比赛也学不会。他们不相信议会如同国际象棋一样在这个国家是可以直接进行比赛的，而且对他们自己有利。他们赛输了，因为他们不相信美国是想离开的，并不想留下来建立一个殖民地。他们坚持认为，我们是‘帝国主义’，坚信他们了解帝国主义者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满洲提出过下面这个问题；我们在东欧、在达达尼

尔海峡……提出过；我们在波罗的海、在巴尔干提出过；我们在波兰……提出过；我们在日本提出过；有时，甚至在涉及我们美国本身发生的事情时，我们也提出过：俄国现在究竟要干什么？”

1946年初共和党的阿瑟·范登堡在参议院所提的问题，就是许多怀有恐惧心理的美国人开始提出的问题。希布斯评论道，苏联是美国人感到非常担心的问题，因此，一篇文章只要使用了“俄国”或者“苏维埃”的字样作标题，就会“吸引大量的读者”，有时可以使读者增加50万人。

3月间，坐在杜鲁门身旁的邱吉尔，对苏联人的意图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的答案。在密苏里州富尔顿所作的著名演说中，邱吉尔形象地指出：“铁幕已从欧洲大陆降下来了。”他说：莫斯科想要“无限制地扩张他们的权力和主义”。斯大林意识到，某种反苏的英美联盟正在形成，他针锋相对地反击说，邱吉尔的讲话是“号召向苏联作战”。在此后的几周内，苏联从满洲撤走，好让中国共产党人收检起那些留下来的日本军事装备。在国内，斯大林更加紧张地工作，把苏联同外国的意识形态隔绝开来。美国也放弃了同苏联解决问题的希望，采取步骤将德国的三个西方占领区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独立工业中心。富尔顿演说几天之后的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对苏联人的态度“太软了”。美苏在朝鲜的对峙很快成了全球对峙的模式，各自在地域上实行冻结，各自宣扬对方的恐怖和侵略意图。

忧心忡忡的美国人对清除外国意识形态的兴趣也不亚于斯大林。7月，众议院文官委员会发动了一场调查，以便发现不效忠的文职官员。所谓不效忠者，该委员会指的就是那些据称有共产党倾向的人。多年被罗斯福的新政所惹怒的共和党人，发现他们发动进攻的机会到了，提出要把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作为在“共产主义和共和党主义”之间的一次选择。渴望在众院获得议

员席位的理查德·尼克松和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以反共作为他们的政治纲领，建立了竞选的讲坛。他们获胜了。19世纪的政治家们把自己描绘成劈木建篱笆的边疆开发者，从而证实了他们作为美国人的资格；同样，当前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正在学会怎样以憎恨共产主义，憎恨渗透到政府里的阴险的红色祸害作标榜，来证明他们是效忠美国的。共和党在国会获胜之后几天内，杜鲁门成立了一个“公务员效忠临时委员会”来肃清共产党分子。杜鲁门和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其他人，比那位来自威斯康星州蛊惑人心的麦卡锡本人（这个时代以他的名字命名），对人们所说的麦卡锡主义的出现，负有更大的责任。

麦克阿瑟控制下的日本，预展了国内、外共产党人相互支援是多么害怕——以及他们是如何牵连了斯诺的。麦克阿瑟这位殖民地总督，坚定地站在中国国民党人一边，并密切注视着俄国对日本影响的种种迹象。负责审查在日本印刷的新闻的新闻检查官们，利用他们掌握的大权，扼杀了对美国不利的报道。麦克阿瑟总是想方设法表白，他与他的工作人员给美国记者设置的日常障碍无关，所以这些美国记者总以为是负责公共关系的那批人“顽固、傲慢、不合作和唯我独尊”。而私下里，麦克阿瑟却在咒骂记者们。在一份密电中他向华盛顿解释，他为什么反对美国报界访问日本，并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同共产党办的《工人日报》的代表相提并论。当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访问日本时，麦克阿瑟抱怨左翼记者违背他们本国的利益，去做促进共产主义的事情。

1945至1946年斯诺在日本停留期间，发现当地对他很感兴趣。贝特兰很少在东京记者俱乐部见到斯诺，当时他并没有被日本出版商们围住要求提供他的著作的版权。1946年春，斯诺回到美国。几个月之后，斯诺的版权问题被麦克阿瑟的反复无常的书刊检查缠住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记者从东京报道，共产

党宣传人员利用了“一场版权纠纷”。日本禁止将资金汇到国外去，所以日本出版商很难买到美国书籍的版权。苏联人对付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放弃版税。使用这种不根据前提的推论（这种推论后来成了那些给人戴红帽子的人的一种艺术形式），《论坛报》的记者注意到，仅有两本美国书籍得以出版，即《瓜达尔卡纳尔日记》和《苏维埃力量的格局》。前一本曾被非法翻印，显然排除了作者有何不良意图的嫌疑；而斯诺“作为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报界的主要代理人”，亲自安排了这本书的出版。然而，没有一个人提到斯诺曾指定将出版该书所得的部分收入交给了中国的一所孤儿院。

斯诺出版书籍所遇到的麻烦并未就此了结。他从一位日本朋友处获悉，麦克阿瑟的城市新闻和教育部门将他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两卷本中的第二卷，扣压达三个月之久不让出版。后来美国作家联盟在一份报告中说，麦克阿瑟的工作人员阻挠了斯诺的四本书以及约翰·赫西的《广岛》的出版。麦克阿瑟则声明这与事实不符，这是“恶意进行虚假宣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报道并未引起公众对言论自由受到威胁感到担心。与此相反，这些报道在许多人心目中似乎证实了所谓斯诺的作品有害的说法。

随着斯诺在日本的问题的逐渐平息，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国内关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辩论中去了。1946年年中，他除了写成一篇大受称赞的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传略之外，没有写多少东西。此外，阿奇博尔德已从莫斯科调任英国驻美大使。那年秋天，希布斯鼓励斯诺撰写关于苏联的系列报道。由于斯诺深深担忧着美国对苏联采取越来越不妥协的态度，因此这个题目正合他的心意。难办的是《邮报》。虽然它以前对苏联的看法同斯诺是合拍的，但当时站到了担心“我们在雅尔塔会议上非常愚蠢的投降”的那些美国人的前列。斯诺认为，《邮报》此时

不大可能发表他对这个题目的观点。但由于希布斯向他保证，他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斯诺还是同意了。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星期，他就在纽约市东56街的住所和纽约州萨拉托加温泉的雅多写作区的小湖和树林旁，从事这个系列报道的写作。

这次写作是具有非凡的勇敢的行为。在美国人不希望看到苏联观点的时刻，斯诺却以“揭开伊凡·伊凡诺维奇的头盖骨”作为他的这些文章的中心论题。同样勇敢的是，斯诺使用了强烈的讽刺手法，有时近似挖苦，并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没有考虑这是为了一本美国的家庭杂志写文章。

斯诺并没有赞扬社会主义，也没有为苏联人辩护。他注意到了苏联存在的一些违法和无知，并且说，“我并不喜欢在俄国的制度下生活。”然而，他指出，苏联人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经验来看世界的，因而美国不应当期望克里姆林宫会接受美国的制度或者美国的议事日程。斯诺接着写道，由于在战时美国人对战后需要优先处理的事项并没有明确表态，所以美国人应对由此造成的误解承担责任。

斯诺的文章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国的将军们和政治家们从不认为，任何盟国之间达成的协议要求我们去支持在我们占领区内的共产党”，“那么为什么俄国人就应该认为，同样的协议要求他们在他们的占领区内去支持资本主义的政党呢？”

斯诺从早些时候起就把不安全感作为苏联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苏联在战争中吃尽了苦头，需要时间重建；它的东欧政策旨在使其今后免受攻击，而不是扩散共产主义。斯大林最需要的就是和平。这次世界大战表明，同苏联人合作是可能的，无论共产党的修辞学中资本主义是什么。“虽然说服克里姆林宫或者要他们改变信仰是不容易的，但他们的确可以接受讨价还价。”斯诺认为，可行的办法就是：了解苏联人需要什么，了解他们将在他们的区域内拿什么来换取较低的补偿，换取政治合作

和裁军。

斯诺说，不幸的是，美国选择了一种使苏联人感到更不安全的政策，无论如何，设想美国真会去东欧作战，是不符合实际的。斯诺对“遏制”政策的形成直接提出了挑战，他写道：“由于先天的近视，（伊凡）（伊凡〈Ivan〉是常见的俄罗斯男性名字，这里泛指俄国人。——译注）无法理解，在苏联国境线外边存在着美国的势力是为了给他增加安全感的”。“这位可怜的笨蛋被弄得晕头转向并绝望了，所以开始认为他自己被包围了。”

斯诺找来了一个论点，作为他讨论共产党中国问题的最终基调：他认为美国对建立互相让步的气氛负有更大的责任。虽然他是根据美国军事力量较强大而作出的论断，但他也是在说另一回事，说明他感到美国政治体制的优越。“如果在解决外交上最严重的问题时，舆论在决定政策方面能起明智的作用的话，我们的群众对俄国的基本情况一无所知就更没有什么借口了。”

当斯诺将这个系列报道送到费城的《邮报》办公室时，编辑们争论不休。有些人喜欢这些报道，另一些人则要扼杀它们，其理由是，任何对苏联人持原谅态度的文章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作为一种惯例，最后还是由希布斯拍板决定。在征得斯诺的同意，作了一些编辑上的修改之后，希布斯决定发表这组文章。这份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系列报道中的第一篇于1947年2月刊出。希布斯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一期杂志中，写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及〈邮报〉其他读者的信》。信中写道：“我认为，没有传统偏见的美国人民有权采取批评的态度来看待任何问题的各个方面，同样也可以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俄国问题。”“……其次，我认为，这些文章完全可能为促进对俄国的了解和争取我们大家所渴望实现的和平，起一定的作用。”

在这个系列报道发表之后几个星期，兰多姆出版公司将这些

文章汇编成薄薄的一册，以《斯大林需要和平》为书名出版了。由马丁·萨默斯写的引言，对斯诺所提供的“争议性的材料”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斯诺在该书的末尾加了一章，更加明确地表明他对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不要以核武器威吓盟国，放弃“漫无目的和临时凑合的”旧政策，这种政策过去曾屡屡失败。“我所设想的就是这样一种政策，随着孤立主义的重要性被否定，要吸取这样一个明确的教训，即外部的和平与其他国家的繁荣，是同我们自己国内的和平和繁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应当寻求与苏联讨论问题和交换看法的途径，寻求提供贷款以帮助苏联重建其经济，重新获得相互进行贸易的机会和相互信任的途径。

斯诺意识到，人们会把他的办法称之为对俄国的软弱，而且是不现实的。他承认：“任何人都不能事先保证这个办法行得通。”“我们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唯一的别无其他选择的办法是肯定要失败的。”

大约在他陆续写完这些文章时，斯诺要求采访杜鲁门。为了说明会见的原因，斯诺声称，他是来自密苏里州的一位民主党人，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略知一二”，在下次出国访问时，“愿为总统效劳”。虽然在杜鲁门总统的文件中对何时会见或者谈了些什么内容并无记载，但不久之后显然斯诺是和这位总统见面了。无论如何，杜鲁门已经下了决心要采取的方针，是斯诺所无法改变的。

斯诺的文章在《邮报》发表几天之后，杜鲁门提出了一项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计划。杜鲁门没有强调这一计划在经济上和人道上的理由，而是鼓吹这笔援助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个途径。杜鲁门主义完全适应并强化了当时美国人的反共情绪。斯诺对萨默斯说，杜鲁门的计划是“小市民的思想”，表明“政府在战后没有任何真正的计划，对显而易见的事情也缺乏预见，到现在仍

然没有任何计划，明天是否会走到另一个极端，也很难说。”

斯诺在采访总统之后回忆了杜鲁门临别时的讲话。“你知道，我并没有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罗斯福知道什么时候死去合适。你想当英雄，就要死得其时。要是罗斯福还活着，他自己也会发现他和我的困难处境完全一样。”

在当时那种气氛下，斯诺发表在《邮报》的系列报道如同引火烧身。涌向《邮报》的信件数量之多，是这份杂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开始时，赞成和反对他的文章的比例为四比一。《新共和》周刊在对这组系列报道的一篇评论中写道：“随着内地一些坚持早已过时的观点的信件开始寄来，批评的意见增多了。”在两个星期之内，不同意斯诺意见的信件几乎占了一半。有些信件，包括J·埃德加·胡佛在美国军团（美国退伍军人组织。——译注）最近一次讲话中说：“共产党的影响已经打入某些报纸、杂志、书籍、电台和银幕中了。”

有一封信与众不同，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写的。斯诺曾以这位前任大使作为美国误解苏联的例证，他曾提到，赫尔利在1945年4月与斯大林会见之后曾经认为，苏联将继美国之后来领导中国。赫尔利对此事非常生气，给希布斯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斯诺在“亲共产党的文章”中散布的谎言。他声称，斯诺对情况的歪曲来源于一些机密报告，这些报告是“国务院的官员送给或者卖给共产党人的”。

希布斯站在斯诺一边。他说：“一位谨慎的记者很少会犯错误”。只是在赫尔利将他那空洞的反对意见压缩成一封较短的信时，这位编辑才将这些意见转告斯诺。那时斯诺已经在法国了。斯诺写了一份答辩材料，但希布斯没有将其转给赫尔利，因为这位前任使节威胁说要采取法律行动，但实际上他并未这样做。斯诺在答复中提出，在这些文章汇编成书时，他将删去涉及赫尔利的那些内容，但他拒绝否定他所谈到的情况——他有充分的理

由。

历史研究将会表明，赫尔利在同苏联人打交道时是受骗上当了。有意义的是，当这位外交官会见斯大林时，表示他记得这位共产党领袖早些时候曾声明过，中国共产党人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人（斯大林很可能曾持此观点，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赫尔利在向华盛顿发回的报告中说：“在交谈中，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方所简要介绍的美国对华政策。”埃夫里尔·哈里曼、乔治·凯南以及其他官员了解这一段插曲，但并不同意赫尔利所作的解释。斯诺通过那些直接了解那次赫尔利同斯大林谈话的人掌握了许多有关的细节，他小心谨慎地加以综合后，写成了那篇报道。

《斯大林需要和平》成为“好书征集俱乐部”入选的书。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著文称赞这本书为“迄今出版的书中对苏联进行了最精辟的分析”的一本。有些报刊如《特伦顿时报》认为，这本书需要给议员们读一读，而另外一些报刊如《芝加哥论坛报》则“高兴地松了一口气”，认为斯诺的政策在国会的会议厅里不会受到欢迎。正如斯诺向一位朋友所说的，只有采用《斯大林需要和平》这个名字，这本书才能成为最畅销的书。

在为《邮报》撰写文章的同时，斯诺收到两封标志着态度有所改变的信。其中一封是马丁·萨默斯写来的，告诉他这样一个消息，国防部给斯诺颁发了一份奖状，表彰他作为一名战时驻外记者所表现出的“爱国热忱和为我国的武装部队提供了杰出而显著的服务”。通过兰多姆出版公司，斯诺获悉犹太妇女全国理事会开除了一名倍受赞扬的社会工作者，理由据说是她使理事会偏离方向去按共产党的路线办事。理事会发现，在这位社会工作者所推荐过的书籍中，有斯诺写的《苏维埃力量的格局》和《人民在我们一边》这两本书，并以此作为她同情共产党的证据。

虽然赫尔利给《邮报》的公开信未被广为流传，一家名为《实话》的刊物（该刊是一些支持国民党人的极端反共的顽固保守分子的喉舌）说，背后大有文章。在这封信见报6个月之后，这家刊物抛出了那篇早就宣称要发表的揭露斯诺的文章，题目是《红星照耀独立广场：埃德加·斯诺与〈星期六晚邮报〉的奇怪立场》。该文的作者弗雷达·厄特利已经完成了她向右靠的历程。除了攻击斯诺在《邮报》发表的关于苏联的系列文章之外，她还对斯诺关于中国的报道，煞费苦心地理拼凑材料进行批判。她曾指责斯诺采用一半事实一半影射的手法，此时她自己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她利用斯诺在与林语堂辩论时所发表的声明，说斯诺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所作的修改，是他屈从莫斯科的例证。她还将斯诺对共产主义的错综复杂的想法笼统地贬低为一个险恶的同路人所做的荒谬可笑摹仿。

这篇文章所要传达的信息是清楚的：斯诺欺骗了公众，诱使他们相信那些共产党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斯诺甚至设法愚弄了那份很好的保守的《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她在文章结尾处说：斯诺“无疑是克里姆林宫所争取到的人中最聪明、最圆滑和最阴险的鼓吹者之一”。她问道：当“本·希布斯先生本人保证，斯诺告诉他们的情况，都是以经过几个月的辛勤研究的成果为依据的，人们为什么还要怀疑斯诺的报道呢？”

一场反对斯诺的运动，使得厄特利的文章所产生的影响不受《实话》这份刊物有限的发行量的局限。曾一度为《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写过小说的罗斯·怀尔德·莱恩，将厄特利这篇文章的复印件送给全国各地的知名人士。在一封亲笔信中，她要求收到这些复印件的人对《邮报》施加压力，“清除这个共产党人”。莱恩的这一行动使得希布斯和萨默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答复陆续收到的信件。

然而，最奇特的事件并不是象弗雷达·厄特利所设想的那

样，发生在费城的独立广场，而是发生在莫斯科的红场。克里姆林宫拒绝发给斯诺重访莫斯科的签证。斯诺从苏联官员处获悉，他在《邮报》发表的系列报道，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斯诺不能肯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后来他猜想，也许这些文章暴露了苏联的弱点，或者暴露了南斯拉夫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

厄特利的文章发表时，斯诺正在西欧，他对于自己所受到的攻击，以及《邮报》怎样坚决为他辩护的情况知道的不多。不过他也弄不明白，他同《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保持联系还有没有意义。他感到自己对欧洲的情况不熟悉。他向马丁·萨默斯抱怨说，他对自己不会讲多少法语而感到沮丧。要在新闻同行中胜过其他人就更困难了。因为《邮报》的其他记者早已是熟悉这个地区情况的权威了。此外，他的肾病又犯了，他在中国时就得过这个病，当时曾用膀胱镜取出了一块结石。到7月，《邮报》已经拒绝发表他从欧洲发回的头两篇文章，斯诺对希布斯说，他“觉得下篇文章也将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由于担心他在《邮报》已不受重视，斯诺提出了辞职。

希布斯立即复电说，“肯定不能让你辞职”。在随后发去的信中，希布斯说，斯诺应该休息一段时间。《邮报》将停止给斯诺支付年薪，但仍将他的名字保留在报头栏里，并在他恢复工作之前，支付他的开支。当斯诺再次坐在打字机前重操写作旧业时，希布斯劝告他，应该在他的作品中多一点人情味，而不是象关于苏联的系列报道那样“太着重研究抽象的东西和广泛的政治倾向”。

希布斯的信最后说：“对我们来说，你一直是那么珍贵，那么一个了不起的人，那么一位好朋友，因此，我希望尽一切可能把你留在我们这个班子里。请相信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

斯诺差一点在巴黎一家医院里把肾脏切除了，幸而当时一位同行劝阻了他去开刀。不久，斯诺穿上外出的服装到瑞士的伯尔

尼去了。在那里，医生叫他住院 6 个星期，进行药物治疗而不动手术。到了年末，斯诺恢复了健康，又写了一些关于瑞士、法国和英国的可供发表的文章。12月中旬，他又去了印度。斯诺、萨默斯和希布斯都希望，这块熟悉的高原也许会更加硕果累累。但是，正如斯诺在几年之后所说的，他踏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第七章 以实玛利在自己的祖国

(以实玛利基督教《圣经》中人物，被其父亚伯拉罕摒弃——译注)

埃德加·斯诺与《星期六晚邮报》之间发生的奇异事件，是一个阴暗的长篇故事中的一部分。这个长篇故事，曾将美国一个极不寻常的繁荣时期，变成了正派美国人的活地狱。“奇异”一词已成为当时的口头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详细叙述“约翰·P·戴维斯案件”时使用了这个词。它说：“这个奇异案件自1945年以来就在调查，而他依然是外交官。”“奇异”这个词既有“令人怀疑”之意，又没有进行直接指控的责任。它使美国人不知道究竟哪个阴暗角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叛国事件。而缺乏证据更使人感到，这种叛国事件愈加阴险狡诈。《当你睡觉时》一书的作者允诺将对“斯大林的朋友和代理人”，为掩盖共产党的真实意图而进行的“控制思想的奇异试验”作详细描述。

“奇异”这个词及其背后的意图无疑毁掉了许多人的前程。

国内共产党的活动是早已被觉察的、世界性阴谋的一部分。前共产党员和前《工人日报》总编洛伊斯·比登兹，在《柯里尔》双周刊上写道，共产党对中国的征服（现已接近成功）早就是莫斯科在创立一个苏维埃美国的道路上，周密策划的一个主要

里程碑。

受惊的美国人把注意力转向他们自己，转向普通的人们：图书管理员、教师、科学家、海员、电工、纽约城市公共交通职工等。一个19岁的西雅图洗碗工人，当她的丈夫和父亲在1952年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被点名后，就失掉了在一家医院厨房的工作。威尔柯克斯建筑公司董事长亨利·威尔柯克斯，1952年到共产党中国访问两个月。董事会因为担心失去与纽约房建局的合同，于是趁他不在，使他落选。《纽约时报》和《纽约每日新闻》的一些记者，由于在国会听证调查委员会面前运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而失掉了工作。而纽约报业公会却作出决定不为他们辩护。

美国人和他们的代表们对公众造成的混乱，对美国同胞生活的破坏以及对美国人价值观和制度所起的颠倒作用，要比斯大林大得多。这是斯大林在其国家尚虚弱时就希望通过苏联的行动来达到的目的。而美国人和他们的代表则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干出了这些事。

埃德加·斯诺的真正悲剧即将公诸于世：这场许多人宣称的悲剧，不是斯诺对美国人了解共产党意图进行了错误的引导，而是美国人既对斯诺以前所写的东西未予密切注意，恰恰在极需其见识、经验和对外联系时，又对他的存在漠然置之。

1946年暮春，斯诺走进沃尔多夫旅馆的旋转大门时，一只狗缠住了他。他发现这只狗正由记者文森特（吉米）·希恩的妻子牵着。戴安娜·希恩邀请斯诺参加在她演出之后为苏联灾民募捐的招待会。斯诺接受了邀请。那天夜晚，他遇见了洛伊丝·惠勒。这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是5年前获得“邻里戏剧学院”一项奖学金后从加利福尼亚来纽约的。她设法找到了演员剧场，并在1946年演出了《亲爱的鲁斯》一剧。在阿瑟·米勒的《全是我的儿子》一剧中，也有一个角色等待她去扮演。洛伊丝在还是小

姑娘时就看过《红星照耀中国》，遇见斯诺时，她刚看完《苏维埃力量的格局》。在初次见面的晚上，斯诺就邀请她外出，她接受了邀请。

1946年斯诺在美国度过的其余日子里，与洛伊丝频繁见面。翌年，她到欧洲与他会合。当斯诺因肾病在伯尔尼住院时，她留下了。当时的驻瑞士大使约翰·卡特·文森特是斯诺在中国的朋友。文森特的妻子贝蒂感到这一对已堕入爱河。

斯诺个人生活改善的同时，冷战的乌云也在弥漫。洛伊丝在遇见斯诺的当晚，就意识到这对斯诺隐含的问题。她虽然熟悉斯诺的著作，但对他的生平了解尚少。当她得知他在《星期六晚邮报》任职时，感到出乎意外。她问他为何替这样一个保守的出版物工作？

斯诺不悦地回答说：“《邮报》登载我想要写的文章，不删改我写的文字，薪金优厚而且派我到我想去的地方，许多家庭订阅这个刊物。”

1947年下半年，当斯诺去印度时，这个回答还有道理。尽管1947年他在对欧洲的报道中遇到了麻烦，《邮报》编辑们对他仍能信守诺言。在南亚，他出色地表现了一个记者的长处。斯诺很快就发现东、西方之间的敌对情绪压倒了一切。洛伊丝向他提出的问题成了他更经常地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了。

南亚的局势似与斯诺的想法相吻合。他长期厌恶的英国统治于1947年8月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印地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从印度的东、西两侧切割出来的一个分裂为两部分的奇特国家。新年刚过，缅甸也宣告独立。斯诺差不多在20年前首先看到发生农村革命的这个国家，宣布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一个不依靠苏联的政府。

斯诺对他在这三个新生国家里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欣喜。虽然他看出了缅甸的民族团结不稳定，但他还是赞许地报道土改、外资

企业国有化和缅甸对中国共产党的明显的关切。他访问了卡拉奇并得出结论说，被分裂为两部分的巴基斯坦是能够生存下去的。在孟买，他看到气派的泰姬旅馆的侍应生优先为印度人服务时，感到异常高兴。这家旅馆紧挨印度门——一座英国人很早以前为纪念他们的帝国而建造的、高大的滨水拱门。斯诺愉快地报道了尼赫鲁关于不结盟的印度要集中精力于国内改革的远见卓识。

斯诺认为，大不列颠因放弃了在亚洲的统治而得到了道义上的资本。但是他又认为英美对次大陆的责任并没有终结。他断定说：“低估巴基斯坦，或者拒绝将美国的友谊和技术援助（这是巴基斯坦进步人民期待的）给予巴基斯坦，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当斯诺尚在新德里时，困扰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维持民族团结问题，令人震惊地发作了。1月30日晚，在甘地前往比尔拉大厦祈祷公园途中，一个因对印、巴分治和巴基斯坦的创立不满而发狂的印地教极端分子，走上前去用他的伯列达手枪向甘地赤裸的胸部开了三枪。甘地遇刺身亡的消息传遍了全城。斯诺在帝国饭店听到消息后，立即前往比尔拉大厦。他在那里见到了吉米·希恩。吉米离发生悲剧的现场只有10英尺。希恩和斯诺能够看见甘地的遗体躺在他卧室的草席上。次日，斯诺坐在朱木拿河畔甘地葬礼台的一端，向火葬堆抛撒檀香木。

希恩喜欢将个人的感情带到工作中去，他声称，甘地去世时，他的手出现了圣痕。他呆在旅馆的房间里，闭门不出。虽然斯诺没有陷入这种感情的渲泄，但这次刺杀事件使他确实感到，过去他对甘地过于苛求了。抵达印度不久，斯诺曾采访了甘地。这位年高德劭的领导人指责他说：“你最近那本书里对我不是很客气哩！”他握住斯诺的手说：我知道，“你现在比较愿意听我的意见了。”这些话打动了斯诺。斯诺说：“我明白当时他指的是原子弹和更坏得多的细菌武器，以及‘把世界任意地分为两个

不可调和的阵营’，甘地认为，这些东西就是在战争中所得到的回答。这场战争甘地是不主张打的。”

斯诺在《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甘地遇刺经过的报道。他在报道中没有对甘地推崇备至，也没有自命对甘地很了解，对甘地玄奥的哲学或他亲自与神对话到了能够理解的阶段。但在当时人们压倒一切的激动情绪中，他在甘地的精神世界里终于发现了一种行动主义（行动主义——一种强调行动如为了政治目的而使用暴力的学说和实践。——译注）“这次访印，他使我清楚地看到，他随时随地都与被压迫、被践踏的人们站在一起。”斯诺写了甘地反种族歧视和反种姓歧视的斗争，写了他致力于帮助贫病无援的人们，写了他超过人类其他领导人，努力以最少的血的代价为最广大的人民赢得民族独立。斯诺在文章结束时说：“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充满了对所有人的热爱，其影响超出了印度，也超越了时间。”

新闻记者比尔·夏勒认为，斯诺的这篇报道是“美国新闻写作中的经典作品之一”。然而，当斯诺在孟买收到这篇已经发表的文章时，却不以为然。斯诺写道：甘地“是一个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他从来都不反对国家是取得社会民主的必要工具”的理论。对此，《邮报》的编辑们作了补充：“一定不要将甘地了解的民主与克里姆林宫统治的那种警察国家相混淆。”

斯诺迅即致信本·希布斯，对《邮报》“将我文章中没说的话变成了我说的”这种作法表示“吃惊”。他辞去副总编辑的职务。斯诺说，如果《邮报》坚持那种作法，他将按合同办事。正如斯诺所指，问题不仅仅是添加的词句“玷污了个人的正直品质”，它的影响还在于对按照《邮报》的方针玩弄反共词藻起了鼓励作用。在随后寄自罗马的信中，斯诺显得比较冷静了。他承认，对野蛮的苏联外交政策的幻想已经破灭。数天前，莫斯科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政变，镇压了东欧唯一的民

主政府。因此，斯诺同意说苏联是一个警察国家，并担心莫斯科的政策在煽动敌对情绪。与此同时，他在信中又说，他不想使用“陈词滥调”来加剧紧张局势，以避免把他列入“艾尔索普兄弟这类”专门撰写顽固反共文章的人之中。

“这种做法也会使我有别于这类记者：他们试图客观地进行工作，寻求与双方有关的事实真相，不偏不倚地选择事实，这样总能发现对方是完全错误的。”

希布斯也同样烦恼，感到他的苦心被辜负了。他最初的反应是接受斯诺辞职。他在回信中发泄了他的感受。希布斯准确地指出，斯诺既没有认识到反共分子对他攻击的程度，也没有认识到《邮报》为保护他所作的努力。《邮报》有权修改原稿，当斯诺使用“公众不懂的学术名词和论述时，修改常常是必要的。举例来说，当一般公众对甘地所说的社会主义与克里姆林宫所说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不了解时，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希布斯说，编辑们是喜欢向作者说明他们所作的改动，但在记者驻外的情况下，进行这种说明很难，对斯诺，这几乎就不可能了。”希布斯又说：“你没有像我们其他大多数记者那样，细心地将你的行踪告诉我们。例如，萨默斯曾连续几天向印度发电报，试图与你联系，但联系不上，我们发现你早已去了罗马。”

然而，希布斯还是提议他们继续保持合作关系。他说，斯诺回来时，他们可以谈谈全部情况。由于希布斯作出了强硬反映，由于斯诺了解了“对我的攻击达到这种程度，这是我原来不知道的”，斯诺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他仍为他对编辑所作修改的态度进行辩护。他承认，他与《邮报》共同度过的岁月是愉快的，《邮报》对他是支持的。他认为反共分子对他的攻讦，可能是希布斯欲辞退他的原因；否则，他会挽留他的。这样，双方的关系再次得到了挽救。

编辑与驻外记者间的关系发生紧张的部分原因，通常是由于

彼此在交换意见中针锋相对。斯诺犹如一个工匠，煞费苦心地制作出精美的作品；希布斯尊重这一点，但他要考虑读者。促使双方分歧超出正常程度的更复杂的问题，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和《邮报》不了解斯诺处事的方式，尽管《邮报》给了他发表作品的一席之地。耐人寻味的是，希布斯对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的观点是深感合意的。他每季度付给他们每人500美元的聘任费，由他们提供对文章的看法，刊物还优先采用他们写的适合杂志容量的文章。

《邮报》和艾尔索普兄弟属于不同于一般的反共人士。他们对麦卡锡主义者的手法表示愤慨。当麦卡锡指责《邮报》时，希布斯进行了反指责。他对这位参议员说，本刊“反对你所提出的那些轻率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希布斯还说，麦卡锡的“所作所为，不配当一个美国参议员”。虽然约·艾尔索普二次大战期间在中国服兵役时，就是蒋介石的顽固支持者，但他瞧不起令人厌恶的厄特利和前共产党人洛伊斯·比登兹。艾尔索普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一篇题为《洛伊斯·比登兹奇异案件》的文章中，揭露比登兹对外交部官员的指控是无耻的谎言。同样，他也从不怀疑“史迪威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们的忠诚”。

尽管如此，艾尔索普与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认为“苏维埃政权的挑战是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且认为史迪威和戴维斯是“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的牺牲品。这种自由主义把共产党人田园诗般地描绘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美国国内确实存在共产党的威胁。他和他的弟弟在《邮报》专栏上研讨过产业工会联合会是否“能摆脱共产党”的问题。《邮报》渴求这类文章，为此，它在1952年付给前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写的分为10部分的连载文章75,000美元的高价。像艾尔索普兄弟和《邮报》那样的报人和刊物，虽然富有胆识，但对国内这场政治迫害却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他们既模糊了国外共产党的复杂性质，而且对制

定现实主义的对策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斯诺回美国后写了 2 篇文章，对共产党作了细致的区分。他认为这种区分很重要。

归国途中，斯诺重新评价了他对苏联的东欧政策的看法。萨默斯写道：他在苏联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停留时找到了极好的消息来源，归来时“对俄国的整个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斯诺掌握了批评苏联的东欧政策的充分材料。是夏，南斯拉夫发生的变故，使他的文章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南斯拉夫在具有独立意识的铁托统治下，抗拒了苏联的控制。斯大林未能像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推翻这个政府，于是指责铁托犯了民族主义的罪行，并于 6 月份将南斯拉夫开除出东欧集团。强硬的铁托用类似的指责予以反击说：苏联使用世界共产党人大团结的动听语言来掩盖其欲达到的民族主义目的。斯诺赞成这种说法。铁托的反抗“为反对名为共产主义扩张，实为俄国民族主义的扩张，设立了第一个有效的屏障”。但斯诺没有据此推断东欧集团的其他国家也会很快分裂出去。这些国家没有铁托那种“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正如这篇有远见的文章所指出的，如果苏联让其他弱小国家自行其是，必然会使其国外共产主义路线的正确性及其国内统治的合法性引起怀疑。苏维埃制度正陷入它本身无法解决的困难之中。它已不再能声称它是一种解决力量了，甚至不得不为维护安全而担心，更谈不上扩张控制了。斯诺细心的观察到，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力量已经分崩离析”。共产主义的基础是民族主义，不依赖其他国家。这一点，斯诺在论述中国的第二篇文章中就已提到。

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辞职，数星期后撤到台湾。4月在《邮报》刊登的一篇文章里，斯诺总结了他几年来提出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尽管实现共产主义还需时间。虽然他们认

为苏联是一个同盟国，但不会听命于莫斯科。莫斯科对中国的革命缺乏预见，更谈不到给予指导。中国共产党胜利在望。这个胜利是以民族解放和国内社会改革的许诺为基础的。斯诺写道，中国是亚洲政治变革的范例，它标志了殖民制度的结束。

这些文章象斯诺写的其他文章一样清晰明白。它们认为，无论共产主义可能怎样兴旺发达，它不是铁板一块的全球性运动。美国人有运用策略的余地。但是舆论却背道而驰，不为之所动。希布斯和萨默斯对斯诺这篇关于中国的文章，看法有保留，因而在刊出该文时附言表示：《邮报》决不象斯诺先生那样预计“共产党中国能处于苏俄势力范围之外”。

这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是该刊物1949年刊登的斯诺写的唯一一篇文章。次年，斯诺的作品多了，虽然比他的高峰年代仍低很多；而且大部分题材是他不感兴趣的。他为《邮报》撰写了有关美国城市的连续报道（这些确实是出色的旅游文章）：包括费拉格斯塔夫、亚利桑那、墨西哥城和阿卡普尔科。斯诺写的其他两篇文章是有关纽约市的联合国总部大厦和在国内旅行演出的一个剧团。只有一篇登于《邮报》的文章涉及政治问题，即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的小传。斯诺写这篇文章时感到有些棘手。

苏联的行为越来越使斯诺感到恼火。当苏联于1949年逮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将她作为间谍逐出莫斯科时，斯诺退出了远东左翼的民主政策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没有替她辩护。他和其他一些人在致苏联大使的抗议信上签了名。他没有为美国助长冷战紧张局势的责任进行开脱，与此同时，他认为苏联对此应负更多的责任。正如1951年斯诺就其改变看法一事对调查人所作的回答一样，他认为，“美国的罪过大部分是应为而不为。相比之下，克里姆林宫的罪过是不应为而为之”。因此，斯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安德烈·维辛斯基没有好感。而且在斯诺

眼中，这位“犬儒学派（犬儒学派，此派人自命不凡、玩世不恭，不信他人的所作所为出于诚意，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待一切。对世界一切都看不顺眼，不相信人类的进步。）的天才”，曾帮助斯大林策划1930年的大清洗审判。但在此时撰文攻击维辛斯基，对斯诺来说，又有些做作。斯诺对萨默斯说：“如果一个麦卡锡式的机会主义者，可以对忠实而有才华的公务员的品质进行诬蔑、玷污和中伤，对忠实的学者和忠诚的公民进行践踏而完全不会受到任何指控；那末，我又为何要选择这个时候来谴责维辛斯基这种同类性质的行为呢？维辛斯基对他这种行为已进行过逻辑推理。”斯诺曾考虑废弃这篇文章，但后来又继续写了下去。在他送交《邮报》的第一稿里，很明显，有几行文字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苏联类似麦卡锡主义的做法感到忧虑。即使如此，《邮报》编辑们还是将文章打了回去，要他重写，且在后来刊出的文章中，有关麦卡锡的内容没有出现。

1950年10月，斯诺统计去年的登稿记录。他写了25篇报道，《邮报》采用了其中的3篇。他说：平均成功率是0.115。对比之下，《邮报》提出要他写的5篇文章，他只同意写2篇。

斯诺曾表示，他比《邮报》更加灵活。这种提法使人产生误解。诚然，希布斯和萨默斯有意促使他脱离开政治题目，他们反对他的左倾观点。他们也想使他从他的“自我”中摆脱出来。但是，斯诺不是一个甘当顺民的人。当哈里森·索里兹伯里来《邮报》午餐，讨论委任自由撰稿人时，萨默斯吐露了他保护斯诺的难处。

把埃德加当英雄崇拜的索里兹伯里，对斯诺的倔强态度简直不能理解。索里兹伯里最大的能力是具有灵活性。当他为《纽约时报》去苏联旅行回来时，编辑们决定稍微杀杀他的威风，于是要他写一篇关于纽约的垃圾的报道。索里兹伯里在《时报》史上最完满地处理了这个题材。索里兹伯里认为，如果斯诺能走出

去，写二三年关于棒球的报道，他可能保全了自己，也可能保全了他与《邮报》的关系，从而他的一些长篇报道也能被刊登。

一天傍晚，斯诺向一位朋友吐露他不能理解西奥多·怀特这样的中国问题老手。正如许多报道过中国共产党的人一样，怀特在办理护照延期手续时遇到了麻烦。在向国务院表白他无罪后，他许多年都没有再写有关中国的文章。很久以后，他不好意思地承认，“对外交政策和国防动态，他是故意视而不见的，因为那里潜伏的危险太多”。斯诺认为这种办法不足取。他为自己能预测政治事件，尤其是涉及左派政治事件的发展进程而感到自豪。无论是在他对战后共产主义潜力进行过调查的西欧，或是在独立给大规模经济改革开辟了前景的南亚，他所关切的和要报道的就是这些问题。1950年，正当《邮报》试图使他处于免受攻击的境地时，斯诺写文章建议实行一项新的美国外交政策，一个可以称之为“杜鲁门新政”的建议，即接受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的事实，拒绝资助“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同时还建议对殖民地和新兴独立国家予以慷慨援助。他将此文售予了自由派的《民族》期刊。斯诺由于具有独立的见地而发展了他的专长，因此，他是不会去写关于垃圾的报道的，无论他为之工作的刊物有多么高的声望。1953年，当国务院对延长斯诺的护照有效期犹豫再三时，他提交了一份宣誓书，声明“我现在不是，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并且一再声明这一点。

对斯诺来说，《邮报》能否与他的观点共处要比他能否与该杂志的见解共处的问题小得多。同样地，希布斯认为，缓和斯诺的“极端主义”是他的职责，斯诺则认为，《邮报》的社论和文章损害了他的声誉。他对哥哥说，“我不能再告诉他们什么了”。他认为把他的名字作为副总编辑登上报头使他感到难堪。

1951年2月，斯诺与《邮报》的关系又出现紧张。由于对意见分歧一事萦绕心头，他第三次提出辞职。希布斯真不愿意辞退

人员，即使有理由辞退。何况他对斯诺是有感情的，斯诺去费拉德尔菲亚时常在他家过夜。其他在职人员也有同感。萨默斯素以对记者关怀备至闻名。一位记者回忆说，当得知有个记者不称职时，萨默斯满脸通红，涨得象牛蛙一样。众所周知，萨默斯是斯诺在《邮报》最好的朋友。总编鲍勃·富斯也许是这伙人中最固执的，也认为斯诺是他所了解的驻外记者中“最完美的正人君子”。并且认为斯诺是当代记者中最熟悉远东情况的人。如果说富斯和萨默斯不似希布斯那样保守的话，他们也不似斯诺那样左倾。他们三人都认为，如果他们使斯诺相信他是《邮报》的重要成员，他会留下的。但是这种摩擦使三人都已精疲力竭。这种摩擦一方面来源于保守派，他们企图施加种种压力，包括依靠期刊的老板；另一方面来源于斯诺，他在观点上丝毫不让步。因此，他们三人一致同意希布斯接受斯诺辞职。

鲍勃·富斯回忆与斯诺在“商业俱乐部”的令人痛苦的最后一次聚会。俱乐部位于俯瞰独立广场的“克迪斯出版公司”顶楼餐厅里。编辑们每天都到这儿吃午餐，常常和短期聘任的记者在此共进午餐，午餐的谈话内容通常是，展望一下这位记者在以后数月报道的内容，以及在哪些方面为《邮报》写些精彩生动的报道。但在这次午餐会上，大家因回首往昔情谊而感到心情沉重，午餐的气氛显得压抑而令人伤感。结束的时间终于到了。

即使这样，希布斯仍然希望以某种方式保持联系。他提议斯诺作《邮报》的自由撰稿人。希布斯认为，斯诺很勉强地接受了，而且后来又认定这也是一个错误。斯诺不断抱怨说：“这些文章很少能显示他卓越的才干。”一篇关于斯大林的左右手、冷酷而工于心计的乔治·马林科夫的很难写的小传，很顺利地登载了。而斯诺写的关于周恩来的内容不偏不倚的小传，却遭到了不同的待遇。斯诺原想使用“戴红帽子的达官贵人”这样的标题。而那些作家们常常醉心于对标题的创造性，则使用了“红色中国

的道貌岸然的打手”这样的标题。斯诺担心使用这种引人误解的标题，将会破坏他作为中、美两国间的一个客观的记者身份。

斯诺与《邮报》关系的破裂发生在其困难时刻。此时，他已有妻子和家庭负担的人了。

1949年5月中旬，他和佩格终于离了婚。离婚的法律程序，使他们数月来陷入与许许多多律师进行费钱又激烈的争辩中。至此，他感到这次婚姻对他来说似乎是一场“不堪忍受的恶梦”。在某个时期内，佩格还雇用了侦探，离婚9天后，他从市政厅领到了婚姻许可证，立即和洛伊丝·惠勒在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一个朋友的老式乔治亚房屋里举行了婚礼。这幢房屋座落在纽约市哈得孙河对面的一个名为斯涅敦·兰丁的社区里。史沫特莱以她一贯的热忱，安排了一个小型仪式，房子里摆满了人造桔花。斯诺的哥哥霍华德在婚礼上充当男傣相。

在斯诺离开《邮报》还差几天即满2年的时候，他的女儿珍妮弗·西安出生了，此前，他已有了一个儿子克里斯托弗。这时斯诺已不再有《邮报》的报销帐单，也不再有《邮报》付给他每篇文章2,000美元的数目可观的支票。同时，他得付给佩格赡养费，佩格照料在麦迪逊的房屋，未再结婚。斯诺和他哥哥在纽约市街上散步时，曾大声说，他正为如何支撑他的家庭发愁。

但是，感情无所寄托、缺少正常温暖和爱情的寂寞岁月终于过去了。斯诺在婚后不久写给他姐姐的信中说：“我感到在度过一个漫长的黑夜后，生活突然又变得美好了。”

婚后，斯诺和洛伊丝去了加利福尼亚。洛伊丝和苏珊·霍厄德、达娜·安德鲁斯一起演出一部电影，他则在亚利桑那的弗拉格斯达写文章。大约在斯诺离开《邮报》时，他们从纽约市第9街47号西的一套公寓里迁到斯涅登·兰丁。起初，他们租住被尊称为约翰上尉府的俯瞰哈得孙河的房屋。第二年，他们用他在《邮报》时的积蓄购买了一幢高大宽敞、外观粗笨的石砌房屋。

这座原是荷兰人的农舍，经过改建后，现在有了30根圆柱，有了围廊和棕色的屋顶。房屋位于新泽西州的罗克莱通向斯涅登·兰丁的公路对面。它占地30英亩，还有一座谷仓和一条小溪。

斯涅登·兰丁的居民不到100户。他们散居在高耸入云的树林和石砌的围墙里。斯涅登·兰丁和森林绵亘的罗克莱社区提供了养育孩子的宜人环境。洛伊丝还可以去纽约的舞台和电视台演出，包括演出一个名为“指路明灯”的连续喜剧。这个社区也提供了一个摆脱麦卡锡主义的避难场所，该社区的居民有演员、画家、作家和音乐家。在天气暖和、窗户洞开的日子，可以听到屋里传出来清晰的打字机的嗒嗒声。这儿也是孩子们听着热烈的政治辩论成长的地方。一天，幼小的克里斯托弗激怒中冲着他的父亲脱口喊出：“你，麦卡锡，你”。

虽然洛伊丝比斯诺年轻15岁，对斯诺的经验、学识和客观性十分钦佩，但她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一个有造诣的演员，她对国内、外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她发表意见时具有自信和幽默感。一次，洛伊丝笑着说：“我反对死刑。很久以来我就反对死刑。”

“但是，我愿意看到基辛格被绞死。”无论洛伊丝是站在一部停在纽约街头的卡车后面，代表一个国会议员发表演说，还是非常严厉地批评斯诺不该让一位朋友送给克里斯托弗一支玩具手枪，这些都不会使斯诺感到不安。斯诺喜欢直言不讳、有独立性格的女人。虽然洛伊丝的激情比他更易形之于色，但两人的根本信念是相同的。他们的热情诚恳和协调一致的鲜明性格使他们夫妇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年近半百的斯诺，魅力犹存。年龄使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下额的浅凹也愈加明显。头发虽还厚密、卷曲，但已红中带灰。浓眉使他褐色的眼睛熠熠有神。尽管斯诺个子不高，但看来健壮，他嗜好户外活动。朋友们奇怪，他是如何通过国民党防线到中国共产党地区去访问的。若说他的外表有何改变，那就是随

着经验和成就的增长而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威严端庄。他仍然得人喜爱，正如一位编辑所说，他的下级“敬慕”他，因为他对他们显得很关心。当洛伊丝为和她同台演出的年轻人举行招待会时，年长的朋友们认为，这些年轻人似乎没有认识到斯诺的才能，因而对他很随便。斯诺对此并未感到不安。住在斯涅登·兰丁的侦探小说作家多萝西·索尔兹伯里·戴维斯回忆说，“埃德加从不考虑自己”。“即使房里没有人知道他，他也不在乎”。弗雷达·厄特利批评斯诺最多，但仍然认为他是个好人。

活泼秀丽的贝蒂·文森特，是一个生性果断的女人，她后来说，除了她丈夫之外，斯诺是唯一她愿嫁的男人。这是女人们共同的赞词。马德琳·格基尔，一位嫁给与洛伊丝同台演出“指路明灯”一位男演员的瑞士艺术家，说：“他是一位有学识的人，一个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人。”一天晚上，罗克莱有一个大型招待会，斯诺请人来家照看孩子，并邀请格基尔同去。当他们回到家时，已坐在车内谈了一个小时。他们讨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哲学家米诺万·吉拉斯，主要是斯诺发言。格基尔感到这种讨论似很浪漫。斯诺行事的方式就是这样。

斯诺在小型集会上常常表现得比较出色，一旦走到麦克风后给大群人讲话时，他作品中所闪现的戏剧性火花就消失了。洛伊丝的反复指点，总也改不了他说话慢慢吞吞和表现拘谨的毛病，他太认真，不善于灵活地进行妥协，他从来就不会谈笑风生，他也不是会说妙语警句的大师。但他具有马克·吐温的幽默感，喜欢通过隐语和诡辩来剪辑情节。他特别欣赏在印度时发生的一件轶事。吉米·希恩的手表在采访甘地时停过；甘地被杀害时又停过。对此，吉米·希恩感到很神秘，这种情况，在尼赫鲁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出现。当时，希恩和斯诺两人的表都停了。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斯诺问尼赫鲁他如何解释这种怪事，尼赫鲁说：“你们需要的是新手表。”

斯诺有“漫不经心”的特性。这种特性，人们在他父亲身上也曾见过。他曾把咖啡杯藏在沙发下面。有一回，他将窗帘点燃了还没有看到。演员诺曼·罗斯曾将他纽约的公寓房间借给斯诺；罗斯回来时，房间热得像热带丛林。原来斯诺忘了关电炉。斯诺看望他在波士顿的哥哥后，到达巴克湾车站已经迟了。他看到一列火车即将开出车站，便跳了上去。不幸的是，列车不去纽约而是去芝加哥。他只好在列车抵达斯普林菲尔德站时才下车。有个朋友认为，斯诺驾驶他破旧的绿色普利茅斯旅行车，就好像“他要弃之不用了”。

洛伊丝常说，她丈夫离开《邮报》时，从未想到询问在《邮报》继续保持健康保险的可能性。出版人常常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和何时干完。他不注意纳税。有时将无需归档的材料归入案卷；有时又粗心大意地将政府的信件掷入抽屉。豁达的哈利·戴维斯是住在斯涅登·兰丁的演员，他介绍斯诺结识一位会计师，他对斯诺的著作很赞赏。这次会面使斯诺和会计师双方都感到无甚收益，因此很快就结束了。一个朋友说，斯诺应投胎于一个律师家庭。斯诺移居斯涅登·兰丁前，在康涅狄格河边盖了一幢房子，建筑商把钱取走了却留下一堆未付款的票据和一半未完的工程。工程质量很差，后来不得不重新浇灌地基。斯诺和洛伊丝在50年代初出售此房时，建筑还未竣工。

斯诺的青年时代是幸运的。1927年他在股票市场获得一笔利息，于是他有钱周游世界。在北京，他赛马又赢了钱，因此他不必去美联社工作。他看不到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斯诺一直是个冒险者。他乐于在人与未知事物的对抗中考验自己。他的罗克莱住宅附近有一个马厩，他骑着各种马匹奔跑驰骋，跳越栅栏，毫不胆怯。一天下午，他与朋友们在哈得孙河畔休息，他跳入河中游泳。不理睬洛伊丝的抗议，游出很远，最后不得不迎着汹涌的浪潮拼命地往回游。兰多姆出版公司的编辑玛莉·霍斯

科特，在50年代就认为，斯诺身体里有一部陀螺仪，因此，即使他接近危险也不会摔倒。

斯诺喜欢在房子附近干点木工活或园艺。头天，他可以像内行人一样，做出一个雪松木的壁橱或松木碗柜，可第二天又会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他最拙劣的一个主意即是买羊来吃草，以免去割草的麻烦。这种汤姆·索耶式的想法，结果是事与愿违。因为羊把一切，连同果树在内都吃掉了。

斯诺为他有这样一个家庭而自豪。他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在为孩子们精心安排生日招待会，在他们罗克莱房后的谷仓内举行的舞会上，在制作蜜饯罐头和编织毛衣方面，她都显示了她演员的精彩演技。一些人认为她一定从不需要睡觉。斯诺一贯喜欢孩子。他在20年代采访一个不足10岁、自称是孔子后裔的孩子时，斯诺答应送给这位小圣人一些电影刊物。作为叔叔，斯诺不愿听到他5岁的侄女留在家里由保姆看护，而大人们却去法国餐厅吃饭。她应该一同去！作为父亲，他显得很有耐心，从不用教训的口吻与孩子们说话。有了孩子后，他对霍华德说，圣诞节总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

斯诺也有感情激动的时候。朋友们感到外表漫不经心、悠闲自在的斯诺和内在的动脑思考、理智处事的斯诺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他常常叼着烟斗，不知不觉地把它咬断了，他有失眠的毛病。他坐在打字机前，拧着头发，陷入沉思。他长时间地阅读，在书的空白处作札记。斯诺性格的两个方面常常同时起作用。他是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对工作非常专心致志。但在50年代，他也遇到了新的压力。其中之一就是他已成了一位头发斑白的父亲。他认为，按理说，他还不能算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对一位怀孕的朋友说，“谢天谢地”，“有些朋友宁愿他们的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出生得还晚一些”。当一些年龄与他相仿已为人父的人，正处于赚钱的高峰期时，他却挣扎着去做“计件工作”。洛

伊丝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没有挨饿。但他们决定将斯诺想用作摄影工作室的谷仓出租。他在消息灵通的地方生活了多年，现在倒成了局外人。在一某晚的招待会上，多萝西和哈利·戴维斯见到斯诺和一位从中国来的老同事在交谈。这次谈话使斯诺又显得生气勃勃起来。他们认为，这强烈地表明，斯涅登·兰丁已不是使他满意的居处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斯诺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而华盛顿官方的部分机构则已悄悄地建成了绞架，准备在50年代用来绞杀斯诺的声望。

戴斯委员会（因该委员会主席系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参议员马丁·戴斯而得名）在战前多年就一直关注着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在听证中，斯诺的名字曾简略地提到过。一个女人作证说，华盛顿的援华委员会受共产党控制。她回忆说，证据就是与该委员会有联系的某人曾推荐她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其间，联邦调查局遵照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命令，对“在美国的颠覆活动，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美国的活动”，进行了调查，并完善了它的监视和档案保存技术。虽然戴斯委员会的重要性在战争时期有所减弱，但在埃德加·胡佛管辖下的联邦调查局却不受其限，为所欲为。1941年，斯诺从中国回来不久，联邦调查局将斯诺收到的一份据说是邮寄来的中共刊物一事记录在案。1944年1月，战争结束前17个月，联邦调查局人员就整理了一份23页、单行打字的关于斯诺的材料送交纽约的办公室。在材料封面上，胡佛签署的附文说明：“仅向你们提供有关斯诺的一般情况，供积累有关斯诺背景材料之用”。

战后，现场的密探监视着斯诺的一切活动。一密探报告说，1945年下半年，斯诺抵达东京的当天即访问了“日共总部，会见了日共中央委员，向他们提出了有关日共现状和前途的各种问题”。在调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等

人的报告中，也出现了斯诺的名字。上海市警察局有关斯诺自1920年后期开始在亚洲活动的跟踪报告，也放进了联邦调查局的斯诺档案。50年代，密探们在斯涅登·兰丁和罗克莱都讯问过斯诺，斯诺的态度显得恳挚、合作、坦率。他谈了所知道的情况，但对被盘问到的朋友和熟人，他是忠诚的。

联邦调查局搜集的斯诺档案材料，大半是靠不住的。档案中有许多是一些清单，例如，斯诺护照的几次延期；从人名字典和其他一般刊物中摘出的背景材料；从斯诺的文章、演讲、书籍（包括印有宣传性材料的书的封皮）以及他人文章中大段摘引的材料。事实上，该局不断地、不时地将1944年的第一份报告增加一两件新事实后重新油印或打印出来。保守的埃德加·胡佛虽然缺乏社会的想象力，在那些日子里，却给他的一大堆秘书们提供了照像复制的差使。

总之，斯诺的案情归结为：在其他可疑分子的通讯录中有他的名子；共产党嫌疑分子读过他的著作；他在战时支持过促进苏美和平的组织；他是引起一小撮告密者怀疑而进行监视的目标。最早的一个告密者曾隐晦地说，埃德加·斯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但共产党“懂得如何利用他”。一个前共产党员说，斯诺是“按照党的纪律”进行工作的“隐蔽的共产党员”。但他承认，他从未见过斯诺，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过他。另一个告密者说，斯诺在1950年去墨西哥旅行期间，曾将他纽约的套房租给几个“蓄留长发的人”，这些人看来像共产党分子。

联邦调查局对斯诺的注意是肤浅的。密探们对一些线索并没有寻根究底。档案记载了1941年美国作家代表大会宣布斯诺为大会开言人。显然没有人发现，由于斯诺不愿附和当时莫斯科与纳粹德国结盟的苏联外交政策，拒绝修改其发言稿时，大会就撤销了要他发言的邀请。

根据他认识谁，或者谁看过他的书来判断一个人的政治态

度，这会引出可怕的循环推理。如果共产党嫌疑分子看过《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必定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如果斯诺是共产党同情分子，那么看过《红星照耀中国》的人也必定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同样地，如果《工人日报》对某书发表一篇赞成或者甚至中立的评论就意味着该书是同情共产党的话，那么，保守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一篇积极的书评，反倒会被人认为“证明”该书作者的技巧是何等狡猾。

联邦调查局对它的对手的了解是如此肤浅。一个联邦调查局官员对1945年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所写一文作了分析。该分析人称，斯诺得出的结论“看来根据不足”，因为它们偏离了已公开宣布的美国政策和赫尔利大使的讲话。这是对新闻事业的一种简单而具有决定性的试验，因为它类似令人厌恶的苏联制度，认为只有国家才了解真实情况。胡佛的一位高级助手在该文下面写道：“斯诺是一个机灵的同路人”。

这种“证据”在法庭上是站不住脚的（虽然法庭也免不了被扣上红帽子的威胁）。但是，大多数案件从未交法庭。审判仅在宣传媒介和国会听证会的房间里进行，没有采取正式起诉等司法程序或其他的法律保护。事实上，只要将人置于被告席上就有理由说他犯了罪。正如某天晚上约·麦卡锡向一群照例到他办公室去的记者们吹嘘的，“如果你们反对麦卡锡，你们就是共产党或笨蛋”。

斯诺的许多朋友和熟人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外交官柯乐博和约翰·卡特·文森特被迫退休。谢伟思被外交机构解职后在纽约经营凝汽阀，直到6年后才重新被安排一个低级的职务。约翰·利宁是个英国人，曾任《民主》月刊主编，后在美国的太平洋学会工作并建立了家庭。当太平洋学会遭到攻击时，利宁也未能幸免。斯诺帮助他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利宁最后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所私立男子学校威尔布拉厄姆学院任古典文学系主任。J·B·

鲍威尔的儿子比尔，将《密勒氏评论报》维持到1953年。他经营的《评论报》批评过美国远东政策，突出报道了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鲍威尔回国时，他、他的妻子和一名副手被指控犯有发表煽动性言论罪。政府虽于1961年撤销此案，但鲍威尔的新闻事业被毁了。他把房子整修后，便和妻子在旧金山的密辛区开设了一家古玩店。

1949年初，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人员，发表了一份长达54页的报告，宣称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战前就参加了苏联在中国的间谍网。为躲开严密监视，史沫特莱盖上毯子，躺在汽车后座上，悄悄地离开了斯涅登·兰丁。斯诺帮助她在纽约找旅馆住下，并在《民族》双周刊上发表文章为她辩护。尽管关于她是特务的指控撤销了，史沫特莱还是去了伦敦等待赴华签证。1950年5月，她在动过胃溃疡手术后猝然去世，葬于北京郊区的国家革命烈士纪念陵园。她的遗作《伟大的道路》，是一部关于中国朱德将军的传记。斯诺指导出版了此书，并充当了她的遗产管理人。该书的版权归朱德将军。

院外援华集团这个包括纺织品出口商、《老实话》刊物创始人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等蒋介石支持者在内的组织，将欧文·拉铁摩尔列入出卖中国的人名单之首。易受煽动的国会曾两次对拉铁摩尔进行查询。之后，司法部指控他犯了作伪证罪。这是一种拙劣的手法，即根据在旷日持久的作证中所讲的含糊的错话，使受害者就范。联邦调查局向斯诺盘问过拉铁摩尔的情况。1952年圣诞节前，审理拉铁摩尔案件的华盛顿大陪审团传唤了斯诺。在让斯诺走上证人席之前，大陪审团给了他一份指控书。指控书根本站不住脚，拉铁摩尔也从不出庭，尽管司法部3年来力图对此案施加压力。

斯诺从未去任何调查共产党活动的国会委员会出庭，然而他的名字一再被提及。证人被询问关于斯诺对苏联的看法，关于

《工合组织》和《民主》杂志（麦卡锡称之为共产党刊物），关于1937年帮助菲利普·贾菲去延安，关于陆军战时使用《人民在我们一边》作教材事。由民主党议员帕特·麦卡伦任主席的参议员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对象斯诺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特别有兴趣。在它发表的50至60年代的听证记录和报告索引中，有120多处引证中提到斯诺的名字，而且许多引证多达数页。在调查太平洋学会时，麦卡伦委员会将中国问题专家分成两类：反共的A类和亲共的P类。成为后者无需很多证据，只要有一人宣誓作证说，某人与该委员会列举的一个或几个“共产党控制的组织有关”就行了。除了其他种种事情，斯诺还为太平洋学会的出版物《太平洋事务》季刊从《红星照耀中国》中摘写过一篇文章。自然他就是P类了。

前共产党员洛伊斯·比登兹在参议员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将斯诺也包括在曾经是共产党员的人名单中。比登兹暗示，自从斯诺与佩格（她也被怀疑）离异后，斯诺与赤色组织的关系可能有变化。后来，在关于太平洋学会的听证会上，比登兹又将弗雷达·厄特利的陈腐谎言挖了出来。他说：“我记得，斯诺修改某一版《红星照耀中国》是应共产党的要求。”至于他自己是参加了党要斯诺修改此书的讨论会，“还是以后检查此事的讨论”，比登兹表示他已完全想不起来了。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认为，比登兹的证词足以重申委员会总结报告中关于斯诺的主要论点：“埃德加·斯诺顺从地修改他这本书以后的版本，是为了掩盖他说过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小组委员会特别提到1937年署名为“亚洲人”的对《太平洋事务》季刊登载的《红星照耀中国》摘文的批评。小组委员会最后总结说，这就是证据，证明共产国际为了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士传播正统的共产党路线在中国运用的信息，利用了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季刊的版面。

斯诺在约翰·佩顿·戴维斯以及“黄鹳”的奇异案件中也受到牵连。“黄鹳”是戴维斯1949年在国务院政策设计司的乔治·凯南手下工作时，拟定的一项行动计划的代号。戴维斯向中央情报局提出的这个计划，即在“冷战”中“利用”斯诺、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哈佛大学教授杰明·施瓦茨和费正清以及费的妻子威尔玛等人。“黄鹳”计划在提出的初期就被中央情报局否定了，可是国会听证室里的人们却不放过它。

戴维斯曾向其鼓吹过该计划的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向麦卡伦委员会作证说：戴维斯想让这些所谓的共产党同情分子向政府提供“材料和提示”。戴维斯根据其上级的命令，拒绝在听证会上讨论此项计划，因为该计划“所涉及到的部署其敏感性稍次于原子能”。他断然否认，他曾向中央情报局建议雇用斯诺和其他人。该委员会既抓不住戴维斯，于是就进行广泛的查问，在某个时候甚至提到斯诺40年代在莫斯科的“女朋友”。戴维斯形容她为“可爱的小妞”，内务人民委员会（政治警察）的某些人可能“企图把她用在我们身上”。戴维斯坚决认为，她与斯诺的关系的的确确是“非政治性的”。

该委员会曾迫使司法部指控戴维斯犯有伪证罪，因为他的说法与中央情报局证人的说法不符。但指控从未提出。此后不久，历经忠诚复审委员会4次洗清罪名的戴维斯，又受到一次审查。这次审查包括帕特里克·赫尔利的胡说八道的证词在内。忠诚复审委员会建议，由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执行，将戴维斯开除出外交部。忠诚复审委员会没有找到不忠诚的证据，但作出结论说，戴维斯“缺乏判断力、处事能力和可靠性”。

有人后来告诉特迪·怀特说，戴维斯的计划是“将中共认为‘友好’的美国人安插在北京，然后从他们那里套取我们需要的报情”。无论该计划的内容是否如此，除了进行直接报道的工

作，要斯诺搞其他任何合作都是令人怀疑的，这点戴维斯无论怎样应该能想到。“一个可爱的小姐”，即使完全怀有政治目的（显然她不是这样），也不可能对斯诺的报道产生超过戴维斯的影响。虽然胡乱猜测的后果是令人咒诅的，然而怂恿那些肆无忌惮的证人任意进行猜测，结果更糟。

在这方面，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博士就是一个可以得奖的人。象弗雷达·厄特利和比登兹那样，威特福格尔由一个马克思主义左派变为一个麦卡锡右派；像他们那样，他也对斯诺修改《红星照耀中国》说了一些话。有些话确实很离奇。这位德国出生的教授就30年代在北京结识斯诺一事作证。那时，威特福格尔对苏联的幻想正逐渐破灭。威特福格尔说：“对该书第一版中关于苏联官僚主义的不友好批评，我应负部分责任。”

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事实上，斯诺曾将《红星照耀中国》的部分草稿送给他征求意见，虽然威特福格尔的证词中从未提及此事。而且，草稿中已有了“不友好的批评”——原因是斯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旅行时就听到了这些批评意见。这时正是国会像联邦调查局一样对威特福格尔的说法感到满意的时期，正是证人们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时期。30年后，威特福格尔见到本书作者时，透露了他是如何得出斯诺效法他的结论的。他说，在与一群朋友野餐时，他和斯诺在附近散步。威特福格尔谈了他对斯大林担心。事情就是这样——或者说，威特福格尔那样作证，是出于一种十足的个人利己主义。

在《远东是如何丢失的》这本保守派的书里，在《美国被出卖》那类小册子和《美国退伍军人杂志》的文章中，斯诺的名字和有关他著作的捏造的谎言，成了定期的专栏内容。作者们不时挖出土改的神话和斯诺与《星期六晚邮报》间的“奇异”关系。约翰·弗林的《当你睡觉时》一书称《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亲共文章胜过《新群众报》或《工人日报》10年所产生的破坏性。

在《中国情况》一文中，弗雷达·厄特利在批评斯诺的反苏文章《论毒如蛇蝎的维辛斯基博士》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论题。她说，斯诺有感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于是完全改变了自己对苏联的看法，而没有向他的读者说“一句道歉的话”。她写道，斯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种批评方式一般说来不受欢迎，然而厄特利并不放弃这种看法。20年后，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对斯诺的怀疑渗透到了整个新闻界。阿奇·斯梯尔，一位尊重斯诺工作的谨慎而客观的记者，从一个“我认为绝对可靠的人士”获悉斯诺是一个社会党党员。虽然斯梯尔没有再传播此事，其他人却说出来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作者在报上讨论“外来的主义”时，提到了斯诺的名字。他说，一位报界同仁“写了一篇揭露共产党向工会渗透的文章”，而《星期六晚邮报》被说服拒绝刊登此文，因为斯诺是该报的一位编辑。“黄鹳”事件揭露后，斯诺发表声明说：“凡是有关我是共产党或亲共分子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声明。数月之后，《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在头版报道中，将戴维斯在“黄鹳”计划中考虑利用的斯诺和其他人，说成是“一帮共产党和自由派的大杂烩”。

洛伊斯认为，她的丈夫应该起诉。斯诺尊重赖斯顿，对《时报》发表的关于麦卡锡的社论，总的来说也是赞同的，但仍给该报编辑写信表示抗议。斯诺问道，谁是赖斯顿提到的共产党人？

出版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致函斯诺表示道歉；赖斯顿亲自登门造访斯诺，并在《时报》上公开答复，对含糊之处表示遗憾。赖斯顿说，他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斯诺、费正清夫妇或施瓦茨“曾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关于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的问题；赖斯顿没有答复斯诺。但是，他谈到了更大的问题，即如果一个记者只简单地叙述别人的讲话，这就等于“传

播了参议员麦卡锡的言外之意，即戴维斯先生力图将共产党和间谍人员安插在中央情报局的关键位置上”；但如果一个记者要对这些指控作出判断，那他就不仅仅是一般的记者了。

就斯诺而言，赖斯顿提出的这种两难处境的说法是个莫大的讽刺。因为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言论这一事实。而麦卡锡和其他恶意攻击共产党的人之所以猖狂起来，完全是由于报纸只报道了他们的言论，对他们的荒谬指责未加评论所致。在日后的岁月里，记者们常常非难“客观性”这条新闻工作者的常规，说它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查尔斯·塞布50年代时采访国会山情况，后来又为《华盛顿邮报》专门负责听取批评，搜集批评意见。他回忆说，超越这条常规的记者有受到报刊出版人质询的风险，而报刊出版人中有许多是麦卡锡的支持者。无论《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们对共产主义的感想如何，他们不会低估新闻界权贵们为了意识形态的和自身的利益宣传他们观点的能力的。因此，虽然他们明显地缺乏证据，但是他们仍怀疑针对斯诺的谣言来自他们的竞争对手——《时代》杂志的当权派亨利·卢斯。卢斯敌视无神论，敌视反对自由企业经济的中国共产党。

认识斯诺已成了老朋友和熟人的不利条件。1950年国务院安全部门从外交官档案中搜集斯诺的材料。在进行忠诚调查中提出的诸如你现在是否是共产党或你过去参加过共产党吗这类问题中，又提到了斯诺的名字和活动。

哈里·普赖斯这位帮助过斯诺创办《民主》周刊的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需要办一个安全证明以出任联合国驻尼泊尔的经济顾问。几个月过去了，证明还未拿到。一直到他对其档案中的不利评语（包括与斯诺的关系和办期刊一事）解释清楚，证明才办妥了。斯诺在中国时的老朋友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战时领导过驻华战地新闻处的工作。后来，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新闻官员。1951年1月，忠诚安全委员会向费希尔提出一份长达18页共有

49个问题的调查信。其中有这样一些问题：

- “你认识埃德加·斯诺吗？”
- “如果认识，说出你们接触的性质和次数，最近一次接触的日期和地点？”
- “你是否了解他的被宣称为亲共产党的同情表现和活动？如果了解，到什么程度？”
- “如果你了解这些同情表现和活动，你对此是什么态度？”

在问到费希尔与其他美国人和费希尔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时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是否了解斯诺的被宣称的亲毛的共产党的同情表现和活动？如果了解，到什么程度？）

约翰·阿利森，这位曾在东京为斯诺和佩格安排婚礼和最后出任驻日大使的外交家说：“我常常感到奇怪，不知道我是怎么逃脱（麦卡锡）注意的，要是他知道了我在上海曾与斯诺共住一套房间，他会说些什么呢？”

质询的程序迫使许多被调查人产生了逆反心理。费希尔对调查者说，在30年代期间，他“对斯诺的记者才能和敏锐性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必须承认，在40年代，他对斯诺对共产党的积极估计就不同意了。“目前我的态度是：不有意回避与自己的老朋友斯诺见面；同时，仍然采用自战时以来的一贯作法，不讨论涉及美国政策的问题。”约翰·佩顿·戴维斯承认，在莫斯科时，他对斯诺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怀疑，但认为，由于斯诺对铁托的评论，他的怀疑消除了。约翰·卡特·文森特也遭到了攻击，但他坚定地站在斯诺一边。

看来斯诺在各方面都有难题。1953年初，2名麦卡锡的工作人员到欧洲旅行，在美国政府主办的图书馆里寻找亲共书籍。那些受到恐吓的外交官，在执行国务院制定的明确指示中，销毁了一些书籍，并从海外图书馆清除了更多的书。斯诺得知《纽约时

报》报道的被取缔的书的作者中有他的名字后，他便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参议员卡尔·蒙特和《纽约时报》写信表示抗议。当年蒙特去沙特阿拉伯时，斯诺曾作为其非官方新闻秘书随行。蒙特否认他为之工作的麦卡锡调查小组委员会特意挑选斯诺的书作此处理。国务院也否认禁止他的书，但承认“在某些地点，你的书从书架上取下来了。”他们向斯诺保证，他的书将重新放回书架上。在此期间，舆论调查表明，书禁得到广大公众的拥护。

50年代中期，洛伊丝·斯诺竞选罗克莱教育委员会的职位。该城市委员会主席提出了赖斯顿的“黄鹳”事件的文章，奉劝人们不要投一个共产党员妻子的票。她因得票稍差一点而落选。本地的律师查尔斯·约尔逊认为，斯诺在整个选举期间是镇定自若且说话简短的。但在投票结束后，斯诺勃然大怒且出言不逊。他要约尔逊提出起诉。约尔逊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斯诺平静下来，在市政厅会议上口头表示收回所说的话。

洛伊丝也尝到了电视网黑名单的味道，这与她的丈夫没有关联。她通过演员哈利·戴维斯（他也遇到黑名单问题）见到了电视网的爪牙。在洛伊丝的催逼下，这位行政官员问她以前是否在布鲁克林居住过？她是否用过假名？她说，她的艺名叫洛伊丝·惠勒。

他问道：“你不是米里亚姆·奥本海姆吗？”

她回答说：不是，真的不是。那是她在“第五个旺季”一剧中所演的布鲁克林人的名字。就像戴维斯遇到的情况一样，电视网黑名单是认错人的案件。

正如《明星报》在40年代中期指出的，斯诺在堪萨斯城已不再是一个英雄，“一个精通自己业务的人”了。斯诺的父亲已于1958年去世，由于他身体虚弱，头脑经常不清，因而避免了许多烦恼。米尔德丽德和丈夫克劳德·麦基听到了种种传说，无疑地更感痛心，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者。斯诺少年时代的一

位朋友，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副经理主动对他们说：“喂！我听说埃德加是一个共产党员。”当地的一位法官在一次招待会上走近克劳德·麦基时说：“我和你妻弟到学校去了，霍华德不错。就埃德加而言，我对他没有用了。他已成了共产党员。”克劳德表示同意他的说法后，这位法官蹬蹬地走开了。

鲍勃·朗（斯诺少年时期和他一起去加利福尼亚旅行过）到纽约时看望了他的老朋友阿尔·斯蒂恩。斯蒂恩是斯诺帮助创办的《中学生互助会报》的编辑，他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50年代任电影刊物《票房》驻东海岸的编辑。朗认为他们应该去看望斯诺，重叙友情。斯蒂恩拒绝了。他不喜欢斯诺的政治信仰。

霍华德·斯诺深知弟弟的问题。霍华德在全美制造商协会波士顿办事处工作。他定期地去看望小罗伯特·H·W·韦尔奇，这个极端保守的马萨诸塞州商人，在全美制造商协会董事会任职，在50年代中期创建了约翰·伯奇学社。该社保存了它自己的有关埃德加·斯诺的档案。它出版的刊物《一个人的意见》第一期就指出，在过去20年里，《星期六晚邮报》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登载现已臭名昭著的埃德加·斯诺写的关于中国的一系文章……这些文章对美国人起了强大的洗脑作用，因而使我们中间的共产党势力能左右一切，将中国出卖给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韦尔奇还不知道霍华德是埃德加·斯诺的亲属。

霍华德将韦尔奇的诽谤之言告诉了他弟弟，他认为，麦卡锡主义是“世界上散发出一股令人憎恶的势力”。全美制造商协会每年投资数百万元用于反共宣传，还拥有一个委员会（一度由韦尔奇任主席）在各学校宣传自由竞争哲学。象该协会一样，霍华德对资本主义的优势有传统的看法。这使兄弟关系产生了龃龉。霍华德对他弟弟说：“你在著作中从未批评过共产党。”第二天，斯诺就写信反击。斯诺是“有些恼火，因为我听到我的

哥哥也鸚鵡学舌般地谈论我的一些最险恶的敌人毫无根据的指责”。

斯诺说：“我知道你将告诉我的第二件事是，我说过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土改者’，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斯诺告诉姐姐说：“我偶尔听到霍华德的消息。他给我写了许多长信，告诉我美国的制度是极好的东西，我应如何感激艾森豪威尔先生和杜勒斯先生。当杜勒斯不在写焚书指示时，看来他和艾森豪威尔主要在忙于相互争斗。”

斯诺的生活成了无休止的反击。他直接给韦尔奇写信，威胁要起诉。比登兹在他的《共产主义的技巧》一书中称斯诺是一个“苏联间谍”，斯诺要求出版人修改该书。出版人便在书中加入了勘误表，实际上，这样做愈加引起人们对斯诺的注意。

对那些向《星期六晚邮报》或出版其著作的机构写信重提土改神话陈腐谎言的白痴们，斯诺极端厌恶，他感到必须对付他们了。当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们来斯涅登·兰丁时，他设想他们是来查询他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的。与之相反，密探们向他调查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另一位记者罔瑟·斯坦的情况。尽管如此，正如密探们报告中记载的那样，斯诺主动表示，他不是共产党员，“他在过去15年中所写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不是土地改革者，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人”。

1950年以前，斯诺对其著作的清样从未校阅过。他总是奔波不停，校阅在当时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可这一切在50年代起了变化，他有充分时间校阅清样了。问题是寻找可写的东西和可为之写作的出版机构。

在50年代，斯诺的新闻作品减少到只剩下点点滴滴：他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过少量文章，1956年以后连一篇都没有了；1959年他给《星期六文学评论》写了1篇书评；他给《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纪事》双月刊写了1篇论中国的讲话。如果他想

在象《纽约时报》这样的主要的美国报纸上，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好战和“遏制”的对华政策发表意见，他只能在给编辑的信中表达。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英国、瑞士以及印尼的出版物对他的著作的兴趣比美国人大得多。现代图书馆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似乎从未摆上书店的书架。

唯一的例外是《民族》周刊。该刊编辑，凯里·麦克威廉斯主张改革，憎恶麦卡锡和冷战，他敬佩斯诺，称他是“一个伟大的、有洞察力的、精明的、具有极好的社会想象力的记者”。斯诺为《民族》周刊作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写了论述1955年非殖民化意义的分为三部分的连载文章。该文在劳伦斯·S·迈耶主持的第二届和平竞赛中获得五等奖。麦克威廉斯请斯诺出任外事编辑。斯诺谢绝了，也许是他看出该刊物没有能力使他通向世界。因为《民族》周刊在景况最佳时发行量也有限，预算很紧。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分子将《民族》周刊清除出了纽约市和纽瓦克的学校图书馆。斯诺为该刊物所写的文章其实不是报道，大多数情况下，他只写书评和编辑部评论，如获奖的论非殖民化这样的连载文章。

斯诺既然得不到新的消息，只好埋头研究他过去的材料了。他为《每月评论》月刊写了他采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文章，分两部分连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聘用他当副研究员。在此期间，斯诺集中整理了尚未发表过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笔记。斯诺将这些材料送交兰多姆出版公司，但该公司认为这本书的发行量不会大。霍华德于1957年将该书作为平装本专著出版，名为《1936—1945年，红色中国杂记》，专供学者们参考。

公开讲演对斯诺也同样困难。1951年，斯蒂芬斯学院，一所邻近哥伦比亚州密苏里大学的女子学院，邀请斯诺去讲演并答应提供费用和500美元酬金。斯诺没有接受这个提议。1954年斯诺写信给该学院重提此事，他抱怨学院对此未予答复。原先要斯诺

参加他们讲演团的代理人说，他是一个太好争论的人。

斯诺的创作才能常常超出写报道的范围。自从《自由》季刊1930年登载了他尚不成熟的故事以来，他经常考虑写小说。他当记者时没有时间校阅他的著作清样，出于同一原因，他过去也很少在非报道性的计划上花费精力，尽管他脑子里时常有这些想法。50年代，由于没有正式工作，而且急于挣钱，他有时间实现他的创作激情了。这似乎是真正的机缘，不幸的是，这种激情很少取得成就。

1951年，他写过一个短篇故事刊登在《邮报》上。依据30年代在北京的一次经历，故事描述一个美国人企图把一个中国姑娘从她的悲惨境遇中解救出来。这个故事是他的小说中唯一的成功之作。他给《纽约人》周刊写了另一篇。他也曾考虑与文学代理人合作，把他的某些著作改编成电视剧本，他与侦探小说家多萝西·索尔兹伯里·戴维斯谈论过合作写间谍题材的惊险小说，但这些打算都落空了。斯诺向他的朋友，兰多姆出版公司的编辑萨克斯·康明斯承认，他写小说只是一种练习。

其他的设想在进行中的某个阶段就夭折了。柯蒂斯出版公司的《假日》杂志刊登过他的一篇游记。但他的密苏里游记却没有引起该杂志的兴趣。与他友好的克兰家族委托他撰写查尔斯·克兰传记。查尔斯是一个美国下水管道制造商，曾出使中国，与密勒关系密切。斯诺对这样的工作热情不高，原稿一直没有出版。斯诺还写过一本儿童读物，书名《蓝天的源头》，他的朋友、画家马德琳·盖克尔为该书画了插图。起初，出版人似乎是认真的。几年以后，谁也想不起什么原因使这部原稿未曾付印。斯诺一度想利用一个有创造才能的年青人已取得专利的一些发明赚钱。

斯诺在斯涅登·兰丁最好的朋友之一，萨姆·津巴利斯特是一个爱开玩笑，对作曲有兴趣、有造诣的音乐家。他们在一起消

磨时间，一起做饭、调酒，共同发挥创造性，他们设想在哈得孙河上建立浮动餐厅和剧院。津巴利斯特为斯诺的儿童故事配乐。他们还根据伏尔泰的《老实人》谱曲。斯诺对书中的“老实人”有一种亲切感，他这位不走运的、喜欢徒步游历的理想主义者，学会了怀疑“所有可能的事物中最好的东西”，并决心只照管自己的花园。斯诺连续几个小时地坐在津巴利斯特的小起居室里，这位音乐家弹着那架黑色的钢琴，斯诺写抒情诗。津巴利斯特在50年代中期去世时，斯诺很悲痛。

斯诺的一条出路就是著书，但这也变得很复杂。兰多姆出版公司在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后，与他签订合同撰写毛泽东传记。为此，斯诺需要搜集有关中国领导人的新资料。最初，他未能得到中国的邀请。后来毛解释说，当时他正忙于朝鲜战争。1952年中国邀请斯诺时，他又未能接受邀请。因为他不再和《星期六晚邮报》合作了，而过去由于这是他的正常写作任务的一部分，该报资助他旅费。斯诺又不愿作为中国的客人前往访问，他感到这将对他的著作无益。美国政府限制去中国旅行后，这个计划就更成问题了。此时，斯诺已着手撰写一部半自传体的他自己生平事迹的书。

斯诺从1951年开始考虑写这部自传，他以为“只要我能连续工作几个月，写作不会有困难”，他又估计错了。斯诺不愿将自己写成该书的中心人物，所以起初想用第三人称来写。到了1952年10月，他已写出10万多字，但对草稿有些担心。萨克斯·康明斯也有同感。他认为这本书不是很有条理，而是太冗长和松散。斯诺告诉他的朋友达雷尔·贝里根说：“我感到（这本书）已使我动弹不得。我已经动用了预付款，而且现在又没有现成的东西可替代，所以我不得不继续干下去。”直到1958年，斯诺在最后阶段与康明斯合作，康明斯帮助他删减了一些材料，这部著作才写成。产生麻烦的部分原因是经常更改书名，包括曾经取名《荆

棘载途》和《其他都是传闻》这个辩护式书名。

尽管斯诺在写这本书的早期遇到了一些问题，最后书名定为《复始之旅》，书写得很好。书的副标题为“对当代历史的个人看法”，书的内容重点是历史而不是斯诺的生平。他把自己的生平自然地揉入本书的某些部分，以推动情节的发展。书中没有为自卫而对麦卡锡主义者的指责进行过份的反击。斯诺为他过去的报道进行了辩护；他在叙述30年代记事部分将厄特利写了进去，并尖锐地指出，她象其他人一样，早期写过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但却制造了土改的神话。书中没有讽刺挖苦，相反，在那个时代，表现了惊人的客观性。斯诺在描述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表示他对苏联已不抱幻想，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寻找与两个政权合作的途径。大部分文字是抒情的散文，这本书是斯诺的最好的著作之一。总之，《复始之旅》是关于个人新闻事业历史的最佳作品。

萨克斯·康明斯在这本书出版前不久去世了。他的死冲淡了该书出版的喜庆气氛。兰多姆出版公司在该书出版当天安排了一个小型午宴。出席午宴的有兰多姆出版公司的玛丽·希思科特和唐纳德·克洛普弗以及几位新闻界人士，包括安纳利·雅各比。希思科特认为，这几个相对说来不很重要的人物来参加午宴表明了斯诺当时的地位。

该书是在一个不吉利的时刻问世的。美国人一如既往、一成不变地阅读有关中共暴行的第二手报道。加之，共产党开始炮击金门岛，蒋介石三分之一的地面部队驻守该岛及其附近的马祖群岛。艾森豪威尔发誓要保卫这些岛屿。斯诺在戴夫·加罗韦主持的上午电视节目中谈论该书时，以为这位采访记者会提些别有用意的问题，但是这位记者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在采访结束时说：“……这是一本非常值得我们推荐的书。”

这种风格的书看来是成功的。报纸对该书的介绍并不全是消

极的，但也不似对以前的著作那么热情洋溢。安纳利·雅各比和斯诺的其他同事们在《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星期六晚邮报》上推荐此书，但只给予适度的赞许，同时批评此书写得粗糙，有时使人感到乏味。对中国共产党当前政策的判断，斯诺谨慎地避免正面答复，说自从他们取得政权后，他尚未亲眼见过他们。评论家们批评他“对中共那些颇不体面的地方，不是直言不讳的”。《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员、外电编辑菲利普·福伊西认为，斯诺在1936年发现赤匪后“已不再干他的本行了”。福伊西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看法：斯诺的记者生涯告終了。他说，斯诺已失去了作为记者的活动条件：“他或许永远不能对‘新中国’再作‘进一步的报道’了”。

为推荐此书，斯诺出席了纽约海外记者俱乐部的一次晚餐。在这次晚餐上，查尔斯·范·多连走到他身边。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是个神童，曾在电视台问答比赛中频频得胜而引人注目，但很快就暴露出那些胜利是欺骗性的。他告诉斯诺，他如何地喜欢斯诺的著作。斯诺未带任何讥讽地回答说：“好吧！我很高兴看到我的著作没有妨碍你的生涯。但愿我对自己也能这样说。”

《复始之旅》仅仅叙述1949年以后的生涯。除了说此书献给洛伊丝和孩子们外，他在书中没有再提到他们。这本书是斯诺对50年代他在美国处境的默认。他的意见犹如石子坠入深井，掉到井底也不会溅起水花。

美国的对外政策与斯诺的建议恰好相反。斯诺在此书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中指出，打败红色中国是不可能的，遏制它也需要庞大的经费。因此，在外交上承认这个国家相当必要。国务卿杜勒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偶然遇到周恩来时竟拒绝同他握手。纽约的一位专栏作家气吁吁地说，在“法庭作出判决”前，埃德加·斯诺竟能在纽约广播电台节目中，为他对“赤色蠢汉、匪徒和杀人犯”的认识和了解作争辩。

斯诺反对完全用东西方的措词来划分世界。他说，虽然构成第三世界的几十个新独立国家不会仿效美国，但美国应支持这些国家自己作出的决定。相反，美国却指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力量。它向这些国家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那只是出于反共的消极考虑，不是从积极的意义方面，根据受援国自己的历史和愿望促进它们的经济的发展。美国并未加强联合国下属的负责非殖民化和经济发展的机构。

斯诺在1957年评论说：“这些国家全神贯注的首要事情和问题，不是在军事上防止假想的共产党的外来侵略，而是在内部防止由于极度贫困、工业和科学落后以及缺乏资金和技术等等产生的政治后果。然而，‘美国的政策’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向这些国家提供什么帮助。”

当法国于1954年开始谈判撤出越南时，斯诺就劝告美国不要从中干涉，干“取而代之”的蠢事。美国并不懂得如何与胡志明和他的越南独立同盟军打一场游击战，美国“在这个国家人民的心目中并没有“可靠的基础”。美国人所能看到的“前景是白白地耗费掉数量惊人的物资和无数的生命”。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三个月内拒绝承认法国、中国、苏联、英国和越南独立同盟签订的国际协议。到1959年，美国给它的越南傀儡政府的援助已超过10亿美元，而这个政府看来是决心疏远而不是去感化越南人。

在少年时代曾与鲍勃·朗和斯诺同去加利福尼亚旅行的查尔斯·怀特博士，1958年到纽约参加一个医学会议。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见到斯诺。怀特告诉斯诺，堪萨斯一所教堂发布的新闻他是“共产党员”。怀特问斯诺有何感想？斯诺笑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从哲学上说，我感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这是斯诺的典型反应。斯诺是一个非正式作家团体的一员，他们时常聚集一起，讨论新闻媒介反击麦卡锡的对策。凯里·麦克威廉斯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埃德加对黑名单给他带来的不

愉快后果采取了逆来顺受的容忍态度，这使他感到惊异。斯诺的个人问题，包括经济上的拮据，大多只有他自己和亲密的朋友了解。

然而，斯诺苦思冥想的是他在美国的位置。在写《复始之旅》时，他探究了自己家庭的根。他用暂新的眼光和使人感到不安的独特见解阅读历史，重读马克·吐温的作品。他发现了这位密苏里作家的阴暗面，特别是他的《致坐在黑暗中的人》。这部才华横溢的讽刺作品，谈到了信奉基督教的美国，如何为了它自身的利益教化不信教的中国人。斯诺很早以前就认为，美国已变成了一个他既不了解也不完全赞成的国家。数年前，斯诺在国外工作时就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了，“一个在异国土地上的以实玛利”。在50年代，谢伟思就看出，斯诺已成了一个自己祖国的以实玛利。他称自己为世界公民时，表露的是自从离开密苏里之后所产生的疏远感和世界观点。

斯诺告诉哥哥说：“发生变化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不是我自己。”埃德加·斯诺眼中的密苏里，仍旧是他学生时代促进农民利益的密苏里，是个体农民和中间商的密苏里。美国已成了全国制造商协会的企业热心支持者活动的密苏里。而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在50年代，象摩天楼一般耸立于全国。在此10年间，500家最大的公司兼并了3,400个小公司。自1939年至1964年，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杜邦公司的销售量分别增加了5%、12%和900%，工资总额则象征性地增加了一倍或两倍。霍华德用他的密苏里价值观解释这种变化。他在与他的弟弟进行的一次颇为认真的交换意见中坚持说：“任何公司(包括政府在内)都不能长时期支使个体的公民，都不能做错了事不受后果的牵连。”埃德加·斯诺从霍华德的谈话中领悟到，“个人主义的老口号现在已被大垄断财团、托拉斯和公司的物质财力所打败”。公司打断了每个个人和这个国家的脊梁。

斯诺理想主义地告诉他哥哥说：“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不是公司”，“而是象杰斐逊、索罗、林肯、罗斯福以及那些认为人高于财产和人的价值高于公司的人。”

斯诺受到过得克萨斯历史学家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的影响，他给霍华德的信中曾多次引用普雷斯科特的话。斯诺观察到，公司在兴起的同时，美国边疆也不存在了。普雷斯科特说过，边疆会给人们提供可利用的丰富资源，只要人们有才智。边疆的开拓者们通过创建适宜于个人活动的制度证明了自己的才智。但是，随着边疆的消失，这些制度也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斯诺总结说，公司不象边疆的开拓者那样与大自然竞争，而是相互竞争。公司“成为超越和脱离组成它的个人的某种事物”。

斯诺对经济企业和经济进步的低估无异于其哥哥对个人权利的贬低。但是正如他所看到的，随着电视机和洗衣机的激增，50年代出现的惊人的繁荣有一部分是错觉。总的经济数字表明，人们的实际收入在1947年和1960年间增加了29%；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在1939年和1955年间增加了三倍半；股票市场跃回到1928年斯诺前往中国时的水平。但是，这种繁荣并没有惠及每一个人。种族歧视，教育的不充足等社会弊病依然存在。根据联邦劳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40%的人生活在最低水平以下。个人靠自己是一寸步难行的，公司在向人们提供终生保险的同时削弱了个人的主动性。在土地开放的边疆，每个人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在边疆由开垦土地转为开发新技术后，个人的力量很难与公司的大量资金竞争。斯诺对哥哥说：“对众多的人来说，这些‘新边疆’充其量意味着能获得工资或薪金的新的职业，或者说是对公司的更大依赖。”

斯诺描述了他自己在大公司的美国谋生的困难，他说：“伟大的繁荣时期继续发展，而拼命搜寻就业机会的朋友和熟人也越来越多——应该承认，他们大部分人属于各种脑力劳动者；但缺

乏远见，没有为充当工程师、药剂师、会计，尤其是推销员所作的准备。这些职业只需要脑力而一般不受思想的影响。”

就象了解一些国家选择共产主义的原因一样，斯诺“没有设想俄国的共产主义方法会在美国行得通，或者说，即使行得通，也最不受欢迎”。斯诺要政府将经济和经济利益用来遏制公司。相反，艾森豪威尔的国防部长总结说，人们的普遍心情是：“对我国有利的东西，也就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东西，反之亦然”。斯诺不满地说，政府对不种地的土地所有者给予补偿，建立由政府购销的军备市场，而且“将在牺牲消费者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全部成果转交给私人控制的公司”。他没有多加思索就看出，“‘自由企业’存在于这个国家，并且只能靠国家的大量补贴而存在”的说法，无论如何动听，都是自相矛盾的。它实际上是“为私人利润支配的、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

斯诺同意韦布的论断：“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即认识到小公司是个危险的东西，它对那些反对它或尚未参加的人来说是危险的”。麦卡锡主义似乎就是这个新阶段的组成部分。正如斯诺对哥哥所说的：“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自由的概念，或者说我们认为在少年时代就已懂得，或被教导说我们事实上已赋有的自由的概念就是，人人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或公开讨论任何想法。这个概念在这个国家里已不存在了。”“我们被强制着，越来越象是政治生活中的一颗颗的棋子，谁也不敢反驳大的保守报刊或反动报刊发表的套话，在这方面，我们也越来越象俄国的机器人了。”

斯诺在《民族》周刊发表的2篇文章中，公开地谈到这些问题。一篇文章谈到美国的“对外援助”，他认为这是美国说服其他国家相信自由竞争制度的好处所不可少的开路先锋。另一篇是讽刺性作品，斯诺借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合著的《镀金时代》一书中不中用的商人贝利亚·塞勒斯上校的口吻写的。在

该书中，乐观的塞勒斯企图依靠政府的慷慨赏赐来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塞勒斯主张私人企业不受约束，企业可以拥有公路、图书馆、国家公园和武装部队。对此，斯诺不无讥讽地为塞勒斯上校辩护说：“从社会主义的或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或者一切所有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99%的人民，与俄国无神论制度下的人民绝对相反，拥有享受绝对平等的绝对自由。”

斯诺有一篇对商业持肯定态度的文章，证明他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他在青年时代，相信原子能的商业化价值。1947年，他购买了生产铀的公司股票，在股票涨价前又不得不售出了。斯诺认为，发展中国家能从这个新能源中受益。听霍华德说，通用动力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约翰·杰伊·霍普金斯也相信原子能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服务。虽然他不能接受霍普金斯好战的反共态度，但却为这位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就的、精力充沛的高级官员写了一篇赞扬性的小传。这是他为《星期六晚邮报》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斯诺在文章结束时说：“重要的事实是，美国要在原子工业化方面作出榜样，以取得向贫困的世界发起有力冲击的主动权，但时间剩下不多了。”

时间将证明，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搞原子能商业化既不经济又危险。象马克·吐温一样，抱着希望进行投资，但一再消耗殆尽。在斯诺身上也能感觉到一点儿塞勒斯上校的极大希望。

如果说这是出于斯诺在密苏里所受的教养，那他固执地不放弃他的独立自主也是出于他所受的密苏里教养。他离开《邮报》正是因为他不情愿把自己的观点淹没在一个庞大的宣传机构之中。虽然他经常为钱发愁，可他不欠债。他自主地培养了自己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把他的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和他在国外从观察摆脱西方控制、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中所学到的东西相结合。这种有效的结合提出了新的希望。1949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宣布控制全国前数天，斯诺在会见《堪萨斯城明星报》记者时推断：

自由市场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正朝着两种社会制度中最佳的可行原则的综合体迈进。他在1954年告诉他哥哥说：“我们现在生活在各国进行区域性联合的阶段，这种联合是走向世界联合的开端，因为民族主义作为权力机构的主要形式，除了导致人类的最终毁灭外，已再不能妥善处理人类的问题了。”

写完《复始之旅》后，斯诺认为，“浪费的10年”已过去了。由于这本书的出版，他的命运稍有改善。这本书在欧洲也出版了。麦卡锡死了，红色恐怖机器上的活塞消失了。在美国国内，人们对斯诺的看法似乎比较积极了。1957年，在华盛顿州立学院世界问题研究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惊奇地发现，他自己“被称为主要节目”。这次讲演，他获得750美元酬金。他对哥哥说：“这是我迄今干得最好的一次。”

1959年，凯里·耶格打来的电话带来了一个大的转机。耶格是一位富有的哥伦布机器制造商的养子，也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行事怪诞、兴趣广泛而无专长的人。他曾考虑创建一个模范教育机构，他选择的地点靠近圣安德烈斯断层地带的一座核电站。耶格一方面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教育硕士，一方面了解20年代一次为期一年的学生进行世界旅行学习的实验情况。那次实验出了问题，最后以在巴黎举行集体婚礼结束。这个事实没有妨碍耶格决定为大学年龄和接近大学年龄的学生，创建他自己的旅行学校——美国国际学院。他打电话给斯诺，问他是否愿意在这只有5个人的学院中担任社会学教授。斯诺到哥伦布与耶格会谈后，同意签订自1959年9月至1960年5月的合同。表面看来，他的实际工作不多，但这次旅行使他有与国外重建联系，或者甚至能找到去中国的途径。斯诺和洛伊丝曾考虑去欧洲访问，并决定她和孩子们在瑞士定居。他们在日内瓦湖旁租了一位内科医生的一幢房子。这个医生曾在1947年为斯诺治疗肾病。

耶格的日程颇似斯诺1928年周游世界的日程；纽约、美国首

都华盛顿、旧金山、檀香山、东京、香港、曼谷、新德里、开罗、伊斯坦布尔、罗马、佛罗伦萨、日内瓦、柏林、巴黎和伦敦。正是这次旅行，最终使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和他的“赤匪”，这次旅行的结果使斯诺重新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一次，斯诺的报道不仅没有使他的声望有所提高，相反引起了人们的敌视。

第八章 展望远景

1943年，斯诺曾乘格利弗Ⅱ型飞机前往昆明访问。他没能说服驾驶员埃迪·里肯巴克和机组人员到城里去吃顿中国饭。没有人愿意舍弃扑克牌游戏和“美国佬神聊的吵闹声”。

1960年就是这样。从根本上讲，美国人对中国并不怎么关注。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是传统的孤立主义的副产品。对杜鲁门来说，中国构成了美国国内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如果中国未介入朝鲜战争，他或许会对共产党政权给予外交承认。此后，杜鲁门毫无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攻击红色中国魔鬼，并发誓要保卫厦门和马祖，但它无意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至于在外交政策上，两届政府都把同欧洲的关系看作真正重要的轴心。

两位总统都跟公众舆论步调一致。1950年初，美国人担心中国共产党人可能要侵犯台湾，但民意测验表明仅仅有18%的公众愿给蒋介石财政和军事援助；仅有13%的人赞成使用美国军队保卫台湾岛。作为公众态度晴雨表的国会，拨给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经费，比拨给外交委员会的经费高出两倍多。美国对中国的感受，并非受任何实际的强迫命令而定，而是由感情支配。由于美国人得不到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消息，半真半假的消息和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惧怕，把人们的感情激烈地煽动了起来。

1960年斯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除了此时美国的气候绝

然不同于30年代之外，他重新创造了1936年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戏剧性的发现。在30年代，美国人要的是对他们中国共产党盟友的好消息；60年代，他们要的是坏消息。似乎是报道越坏越受欢迎。斯诺逆舆论潮流而上，他的反抗如同他所报道的在中国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邪恶的一样不被人接受。

“我经常说，如果国民党本身含有自我毁灭的种子，那么肯定地将被打败，而不用等待其他人来反对”，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曾这样预言。“否则，任何对我党的反对或破坏都不可能奏效。”

斯诺赞同这一观点。“革命不是由革命者或他们的宣传所造成的，”1955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革命是由于在恶劣、无能和腐败的政府领导下，不能容忍的条件所造成的。在中国，共产党人也赢得了胜利，那是因为他们使更多的人民相信，他们有某些东西值得为之奋斗和牺牲，而蒋介石则永远不能使人民信服。”

但是，打破陈旧、腐败的秩序，同建立新的、公正的政权是不相同的任务。从理想变为现实的进程中，产生了其本身的不公正。

中国共产党革命在速度和深度上，超过了国民党人可能达到的程度，即使对内战结束后实现的稳定来说也是如此。通过解放乞丐和妓女、清除肮脏病和未受抑制的病，中国克服了过去的灾难。血腥镇压了地主阶级和那些反对新政权的团体，改造了农村。从拥有土地的农民开始的土地改革，很快就走向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又成立集体农庄，旧日的乡绅不再统治中国了。

共产党人制定的婚姻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使妻子同丈夫处于同等地位。群众教育计划使1949年到1958年间小学的入学人数增加3倍，中学的入学人数增加7倍（到1980年，识字的人从全国人口的20%跃升到66%）。卫生保健状况得到改善。1949年至1957年间，估计寿命从36岁上升到57岁。1953年至1957年间，中国的国民收入每年增长8.9%。“农村电气化、地

方发展工业、技术培训以及出版的普及，把现代科学技术带到两亿多户家庭的门口”，专家们后来总结说。“中国最显著的成就是……”世界银行后来也觉察到，“使低收入的人群在基本需求方面上，远优于多数其他穷国的相同阶层的人”。

居住在中国的路易·艾黎回忆起“一位高个子面带阴郁的俄国”顾问，他之所以能来中国，是靠50年代初就读于过时的“工合式”的学校，却看不起训练人民发展小型工业的见解。中国农民无力承担这种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也不能为他们自己和城市的同志们生产足够的粮食。由于渴望推进“永久革命”，解放农民群众的创造力，毛在1958年通过发动“大跃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跃进根据人民党的观点，回避了专家的忠告。中国的农民被组织在24,000个人民公社里，他们深耕土地，用当地的锅釜炼钢。这个规划破坏了土地，生产出的是劣质钢。1959年，当传统的、无常的气候降临时，国家面临着可怕的粮食短缺。1960年和1961年天灾再度降临，估计死亡达数百万人。

毛的错误促使他把以前并肩革命的同志推向对立面。1958年后期，他把共和国主席的职务让给了刘少奇，虽然他还保持着党主席的职务。翌年，深受众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1936年斯诺曾同他一起畅游西北平原，为“大跃进”的错误批评了毛。虽然彭强调忠于毛主席，而且政府也是不可动摇的，毛还是解除了他的军队首脑的职务。彭移避到北京的郊区过着简朴的生活。刘少奇和邓小平登上舞台，他们联合起来改变了毛的经济战略，代之以推行“个人责任制”和依靠专家。

使问题扩大化的不仅是恶劣的气候。中、苏之间持久的不和已经恶化，并且成为毛、彭争论的一个焦点，彭认为中国军队需要苏联的支持。为了向共产党领袖们的惯例挑战，毛没有出席1953年斯大林的葬礼。他后来由于宣称中国一定会先于苏联达到共产主义而激怒了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理；而且正当苏联探索和解的时

候，他却对抗美国。1960年的中期，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技术顾问。

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判断的。但是，美国人恰恰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在整个50年代，他们提问“是谁把中国丢失了？”而不是以客观的口头询问“共产党创造了什么样的政府来替代老的政权？”

普通美国人的理解是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周围修筑了竹幕。但对两国之间的障碍来说，单单中国一方是不能负全部责任的。在推翻了国民党之后，毛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国站起来了。”由于不愿再忍受帝国主义的侮辱，他的政权赶走了一些外国记者，他们是代表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新闻媒介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为表示对共产主义的强硬态度，于1952年限制所有美国人到共产党国家去旅行。1956年，巴尔的摩《非洲裔美国人报》的记者威廉·沃西，抗拒了这一旅行限制，前往中国访问。国务院劝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要播放沃西发自北京的消息。下半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一个机会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中国人提出准许美国记者访华，如果美国给予互惠的话。杜勒斯草拟了一张可以派遣记者的美国新闻机构的名单，同时却拒绝让任何中国记者进入美国。长期的僵局继续拖延下去。

新闻机构以及国务院在香港建立了广播监听站，它们企图在太平洋以及其它所有地方，搜集中国的情况；同在中国的非美国的外交官和其他人建立秘密联系，力求补偿看不到这个国家的第一手材料的损失。在比尔·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该周刊在1949年后继续出版）工作的朱利安·舒曼伤心地说，心怀不满的中国难民变成了美国获取中国情报的最重要的来源。

在30年代，不光彩的美国新闻媒介片面刊载狂妄的国民党关于赤匪的报道（与美国报道1917年俄国共产党革命的情况类似）。自50年代早期和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当中国农民获得创记录的丰收时，新闻媒介却反复报道

中国发生大饥荒。想象中国人正在采用俄国人的模式，传播毛死去或者那个政权快要垮台的鬼话。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准备了一个“井冈帝国”的系列报道。1956年，《时代》杂志一篇文章报道“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计划的大屠杀”。“龇牙咧嘴的恐怖分子”，《时代》这样描绘中国的公安部长，“他比谁都清楚，在共产党中国将永无和平——永远不可能有和平”。舒曼和鲍威尔曾读过的一篇美国报道说，上海一家中药铺的业主毒死自己、他的全家和7个伙计及他们的家属。不久以后，这两位先生发现报道中说的这位商人和其全体职工仍在工作。

记者们不得不面对舆论提出的问题，而且对中国强烈的、普遍的怀疑，把记者们的报道局限于讨论中国的反美言词之内。约翰·斯特罗姆是位农业编辑和出版商，是50年代取得国务院和中国方面允许只身访华的记者。他写的一系列文章，1958年通过报纸发行人协会同时发表，着重讲“共产党中国是一个被组织起来去劳动和仇恨的国家”。斯特罗姆所目睹的“一股憎恨的、冷酷无情的疾风”，使他提供的有关新中国的观感失去了光彩。举例说，他感到不需要锁上旅馆房间的门，因为忠诚似乎遍及这个国家。他根本不去解释仇恨美国的各种运动的动机，更不必说这种好战的情绪与许多美国人从中国人的国家得到的感觉类似。

“我对报纸感到不耐烦了”，一位有观察力的加利福尼亚人告诉报人阿奇·斯蒂尔。“第一天中国还正在走向崩溃，而第二天对我们的安全又成了威胁。你能相信吗？”

斯诺自己变成了一位远距离的中国观察者，他在纽约郊区自己的监听站里，努力地工作以跟上形势。他同其他迁居至此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交换看法和消息，阅读中国报纸报道的翻译材料，查阅有关中国的新书，试探着从一些人，如他的老朋友路易·艾黎那里探听消息。他跟一位妇女说过话，她在中国曾被当作间谍逮捕并经历过思想改造（他认为这位妇女非常客观地思考这段经

历)。《时代》杂志刊登出有关共产党“大屠杀”的报道后，他追查消息来源于“一位上年纪的国民党外交官”，于是给编辑寄去一封抗议信。

他公开说：“这是一场革命，一场带有大量镇压和流血的暴力性质的革命”。他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刊登过一篇有关周恩来的报道，他描述这位温文尔雅的领袖有善于掩饰的本事，具有“机敏、冷酷、高效率、冷静分析问题和足智多谋的头脑”。然而，斯诺并不认为忽视中国存在的政策是有意义的。中国人有着长期的独裁主义政权的传统，路易·艾黎曾经写信给他说：“现在各处充满着新的稳定和信心。”对美国来说，问题是同中国开辟和平合作的大道呢，还是欺骗自己说中国共产党将自行垮台？1959年，斯诺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纪事》双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争辩说，这一步将会承认美国过去的政策是有缺陷的，而在第三世界同共产主义有效竞赛的唯一方法是，制定积极的政策去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

斯诺虽然想在所有有关中国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但对这个国家的描述还是谨慎的。艾黎曾说，斯诺需要自己亲眼看看这个国家。斯诺的表述是：不幸的是，看来风向经常是错误的。50年代初期，他不能访华为毛的传记搜集资料；1957年又不能不拒绝一次邀请，因为他还没有完成《复始之旅》的写作。后来，斯诺再度试图访华。为寻求经济资助，他考虑同英国广播公司拟定某些安排，他曾出售他1936年拍的影片给这家公司。为此他也跟老雇主伦敦《每日先驱报》打过交道。他微妙地向中国人提出，收回中国出版他的书的版税，以便得到适当的访华经费，他就不会成为官方的客人。从中国人方面得到的回答只是问题难办。艾黎说他真的不能帮什么忙。斯诺寄希望于在耶格的环球旅行学校的工作收入，这或许可作为他在中国境内旅费。

当青年学生的教师几乎受不到尊敬。斯诺够喜欢这些学生的

了，其他教员都作不到这样。耶格认为他不是一位卓越的教师，学生的评价也没有把他描绘成一位威严的教师。或许对学生们来说他太老于世故，斯诺的观点在美国学校里并非普遍适用。他用来向青年人挑战的典型问题是讨论殖民主义的性质和演变，讨论社会和技术革命对西方的挑战。教学的要求使斯诺沿途写作的希望落了空。但是他能够因此而恢复同国外的联系，包括同尼赫鲁的联系，尼氏也同意会见学生。斯诺还观览了他从未见过的那部分世界，其中有古城特洛伊。进入中国的事仍是个问号。在进入中国的第一站香港，他探索了访华的可能性，如果成行他便可以搜集材料写一本书。在他和学生们西行之前，没有得到中方的答复。毫无疑问，他在盘算一旦旅行结束如何保持繁忙的工作，其中包括以学校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然而，当他到达欧洲，旅行接近尾声时，时来运转了，他接到了中国人的邀请。

因为中国不准许美国“记者”访华，斯诺必须以“作家”身份申请签证（周恩来后来坚持称斯诺为历史学家）。然而，取得国务院批准的唯一办法是，作为已取得获准派遣记者到中国的某一新闻媒介的“记者”去旅行。斯诺首先去找《星期六晚邮报》，该报是获得认可的。本·希布斯想，这是一次去看看“壮观景象”的机会，很长时间来，他一直在物色一名能派往中国的记者。他被吸引住了。但是，希布斯、弗斯和萨默斯同样感觉到，斯诺的观点不适合《邮报》。老的争论将会再度出现。希布斯认为，他的拒绝“最终不愉快地结束了我与一位老朋友的关系，尽管在许多方面我对这位老朋友都非常钦佩”。在贝内特·瑟夫的帮助下，斯诺同《展望》杂志联系，瑟夫还预付了根据这次旅行写成的书的稿酬。斯诺得到《展望》杂志的赞助后，又受到了国务院的阻挠。一位公共事务部的高级官员私下说，“斯诺不行”，他们应当告诉《展望》杂志，斯诺是个“不守规矩的人”。“当我们制定这项计划时”，一位发言人公开说，“我们要求有深度

的客观报道，而现在，（《展望》的编辑和所有者加德纳·）考尔斯同某个我们认为不可能客观的人走在一起了”。国务院以及参议员们试图通过同考尔斯的谈话使他打消这一决定。《展望》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丹·米奇告诉斯诺说，考尔斯对赞助斯诺的决定的支持，使他疏远了交往了几十年的共和党朋友们。《时代》杂志在其消息版登了一条关于拟议中的旅行的消息，标题是：《斯诺的差事》。

国务院于6月中旬批准斯诺访华。6月28日凌晨，乔居瑞士的洛伊丝和孩子们到日内瓦机场为斯诺送行。

当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时，从各方面讲，斯诺都有理由感到高兴。这是10年来第一次，他开始从事一项连续性报道，也是20年后第一次，他回到中国长住。

他的到来带有一种节日的气氛。到机场欢迎他的有老朋友路易·艾黎、北京外文出版社的编辑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内科医生马海德，1936年他同斯诺一起到达共产党的西北地区并留下了，1949年以后，从事根除性病的工作；当年的学生领袖黄华，他1936年担任过斯诺的翻译，现即将成为驻加纳的大使；还有其他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前领导人。汽车驶入北京市区，斯诺注意到他们行驶在一条改造过的马路上，道路两旁绿树成荫，住房、学校、研究所和工厂等新的建筑拔地而起。

斯诺利用到北京的头两天，熟悉环境和作为休息。他对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有一种新鲜感。他最后拟定的采访计划是百科全书式的。他的采访涉及艺术、卫生事业、政府机构、领袖人物、教育、婚姻（和离婚）、军队、少年劳教所、工农业以及娱乐。他参加天主教教堂的礼拜活动。他调查针灸疗法，虽然他从未留心过中国的传统医学。他第一次会见了刘少奇，得知就是刘少奇在1936年批准把那封隐显墨水信送给毛。斯诺还会见了写信的那个人，他就是现任上海市市长。

在此后的五个月里，斯诺每天早起采访和参观中国的各种设施。晚上汇集和重温笔记，一直工作到深夜。在陪伴他的中国人看来，斯诺完全是一位专业人员。他在采访农民时轻松自如，象农民一样蹲着边喝茶边聊天。而一旦到了他面对官方人士询问事实的时候，他的提问又很认真。他经常多次提出同一个问题，每次提问的角度稍有不同。他精心作笔记，详细地记下他所采访的人物的传记，花上几个小时研究“百花运动”时期的批评意见。他感到了疲劳，肾病又发作了。他对北京医学院的光顾，为他的书提供了一个章节的材料。他总共参观访问了中国22个省中的14个省、19个主要城市和11个公社。

斯诺同周恩来有两次长谈，并花了一天的时间同周坐火车到北京北部的密云水库游览。在他们的交谈中，周强调，同美国谈判的门是敞开的，虽然不是没有条件的。美国首先必须同意分歧“应当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而且美国应当“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其武装力量”。这强硬的第二个条件突出了中国的担心；美国或许终于开始设想把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永久分离的两个国家。但是，周也显露出灵活性。他在谈话中没有威胁要解放台湾，而说美国“什么时候和如何”撤退其部队的具体步骤可以留待以后讨论。

周描述苏联专家的撤离是一件“自然的事。既然来到中国，他们总有一天要回去的”。那天晚上，当斯诺回到旅馆重温自己的笔记时，他认识到，采访的重要部分不是周所掩饰的不同点，而是他所承认的终究存在着的那些不同点。中国总理的谈话使他获悉，北京第一次“正式承认两个主要的共产党领导之间存在着分歧或异点”。

10月1日，在他到达中国近4个月之后，斯诺在俯瞰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同毛泽东迎面相遇。时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纪念大会，有50万人的游行队伍通过广场。斯诺提醒毛，

他俩自1939年之后就没谈过话，那次谈话是21年前的事了。毛说他们应该会一会，此后的两周内，斯诺两次会见毛，总共谈了近10个小时。

第一次而且是最长的一次会面是在10月22日晚上，毛在中南海里他的住所庭院中迎接斯诺。两人首先谈及他们早年的会见。毛对他们的重逢显得十分高兴，他告诉手下人把艾黎和马海德找来。这位主席了解斯诺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纪事》双月刊上发表的文章，该文要求美国承认中国。他不了解其他事情。他不知道斯诺离婚了，而把斯诺的女儿西安当作佩格所生，以为西安实际上是出生在那座同名的中国城市。他跟路易·艾黎自1954年以来就没有长谈过，跟马海德自1952年以来也没有长谈过。得知马海德一直在根除性病运动的第一线，他似乎感到很吃惊。斯诺细心地记下毛的健康情况（“很好，但不是太好”；他不再能骑马了）和毛的习惯（他吃得很简单）。在会谈中斯诺虽然并不想排斥马海德和艾黎，但也意识到是他自己在主宰着谈话。他在笔记里这样记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要涉及如此众多的问题和如此广泛的内容”。

毛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中国仍然是贫穷的。这是中国官员的标准口头禅，以此来保持中国传统的谦虚美德，使人得到更多启示的是，毛明显流露出他对继续进行中国革命的本能的渴望。“他对肉体享乐的增加超过了合理的基本需求是件好事的说法表示怀疑”，斯诺这样记道，“他认为，灵魂深处的变化比外部所有的享乐更为重要。”毛说：“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斯诺重复他早些时候向周提出的建议。他的建议是，如果中国人认真地培养对美国人民的善意，中国的报纸应当广泛地从美国的新闻媒介里吸取东西，而不要简单地重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论，那些评论是为加深敌意和猜测服务的。毛赞同斯诺的观点并告诉一位手下的人照办。

1937年，周恩来曾在武汉对一位记者说：“对我们来说，斯诺是最伟大的外国作家，是我们在国外的最好的朋友。”当时斯诺在场，毫无疑问意在赞扬斯诺，他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享有特别待遇的关系。在1949年解放以前就了解中国的美国记者中，他是第一个回到中国的。他的其他特殊关系也是明显的。毕竟是他，在1937年迅速而神秘地把周夫人带出北京城。1936年他给毛拍的那张照片已经很有名了，毛当时是带着斯诺的帽子照的。中国人在书刊里和招贴画里广为复印这张照片。在北京期间，斯诺向革命博物馆捐赠了30年代他在中国拍摄的影片和照片底版，其中包括摄有周、毛和其他人的第一部影片的全部镜头。斯诺还给朱德带来一只金表，它是用阿格尼丝·史沫特莱遗产的钱购买的。

到机场迎接的一行人，仅代表很少一部分老朋友和老相识，他们现在在政府中是有地位的。当年同周夫人一起被斯诺护送出北京城的另一位中国妇女，现在是北京妇女联合会的主任。她的丈夫徐冰教授，1936年把毛的那封隐显墨水信带给斯诺，现在是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廖承志和斯诺曾经一起在孙夫人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工作，早就认识，他领导着侨务委员会。其他的人从事对外贸易促进和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研究局里工作。斯诺1936年在西北采访过的人，如林彪和邓小平，已成为部长和副部长。当年彭德怀营地的少年传令兵，现已成为医生、癌病专家，同马海德医生在一起工作。斯诺来得太晚了，见不到俞启威了，1936年是这位身体削瘦的中国学生带斯诺到保安，他后来成为青岛市市长，1958年死于心脏病。姚依林在1935年作为学生去过斯诺家，1960年成为商业部长。龚澎当年在“一二·九”运动时和她姐姐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曾当过周恩来的首席秘书，后来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斯诺同毛谈话时，她也在座。除了斯诺认识的许多人之外，事实上，更多的中国人通过阅读《红星照耀

中国》而知道斯诺其人。

斯诺对毛的采访，是自1949年来毛第一次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1959年，生活在中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非正式地出席了毛与黑人激进派学者W·E·B·杜波依斯的谈话。毛直率地对她说，她在那里是主人而不是新闻工作者。虽然最初毛坚持他对斯诺的谈话绝对不许发表，但允许引证某些内容而且默许他从别人那里引用而不加以标明。当斯诺向毛抱怨说他得不到许可去参观军事设施时，毛干预了此事。毛告诉斯诺说，按常规中国人是不让记者参观或拍摄军事设施的，但军官们忘记了他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斯诺是近几年内被准许在军事设施内部照像和拍电影的第一位西方人。自从30年代延安作为共产党西北的总部以来，他是第一位返回延安的外国参观者。

虽然北京有一个强大的、集权的中央政府，但时常是地方官员们在实际上限定外国人在国内旅行的范围。为了不让报道他们地区的坏消息，干部们会限制记者们只参观模范地区。斯诺与北京的高层领导人的关系，使他获得了特殊的许可。有些一般干部在他们中间称他为斯诺同志。1960年，按毛的指示，上海市市长下令让斯诺参观了该市最贫穷的地方。

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斯诺说，他的访问对别的记者们来说是没有先例的，这使斯诺感到不安。斯诺认为不管美国的政策如何，中国应当促进美国记者的来访。但说实在的，斯诺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旅行结束时，斯诺处于一种常有的左右为难的境地。应当留下来收集更多的资料呢，还是回家并着手写作？他曾考虑要从他在中国的最后一站昆明，乘公共汽车到仰光，但不太认真。如果是这样，他就可能重走1931年他与罗克博士所走过的路。最后，毫不拖延地离去的想法战胜了。斯诺面临着英国记者与制片人费利克斯·格林的竞争，格林与他自己的中国之行部分巧合。虽然

格林不像斯诺那样是一个中国问题的老手，也没有广泛的接触，但他为制作电视节目而采访了周，他一心要为美国观众写一本书，而且已回到了美国。当斯诺仍在中国时，曾写了一封短信给周说：

“在这么多年完全没有（被中国共产党人）接见之后，恰恰在现在以这样一种形式进行，似乎很有趣”。11月中，斯诺乘飞机到仰光。他估计，他的行李中大约有50万字的笔记、采访记录以及日记本等，4,000英尺电影胶片和大约50个柯达彩色反转片胶卷。

斯诺在上海访问时，没有见到老朋友孙中山夫人。在一封说明她的健康不太好不能接待来访者的信中，孙夫人满怀深情地指出，中国在共产主义指引下已经走了多远。她劝斯诺：“写远景也是为了当前”。

斯诺不需要别人来激励。这是他天生的秉性。50年代，他曾对一位朋友评论道：“民族性比政治更为重要”。中国人正走在现代化的长征道路上，这将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斯诺在他的长篇报道中说，必须“把中国的今天，看作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从远古时代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在时间与空间上所达到的一个顶点”。

除此而外，还有斯诺个人的远见问题。这次旅行与他1936年去共产党西北地区的开拓性旅行相似。象以前一样，他打破了封锁；象以前一样，毛对苏联面临着抉择，而且与同志们争夺控制权；象以前一样，斯诺为他所发现的东西而振奋；象以前一样，他迫切地要在与他人的竞争之中拿出自己的报道；象以前一样，他所提供的消息使一些问题得到了阐释，因为这些问题太朦胧了，有可能使人产生最荒唐的推测。但有件事是不同的，这是斯诺第二次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斯诺在一块充满记忆的画布上描绘。当向导们带他参观北京监狱时，他相信他以前曾到过那里——1935年访问“一二·九”运动中示威的学生。斯诺想要再看看他以前了解的地方。当他到达一个熟悉的地方时，他的脑子立即按过去来评价其不同之处。在延

安，毛的旧窑洞使他产生的感触是现在窑洞里有了电灯。满州钢的生产并没有给他留下特别的印象。20年代，日本人在那里发展了重工业。昆明给他留下了印象，那座城市“在战前，任何类型的汽车都没生产过”，现在，中国人造出了吉普、公共汽车和发电机。在昆明，孩子们不再嚼吮涂裹着鸦片的甘蔗，他们舔冰棍。从前肮脏的重庆已铺上马路而不再是泥泞小道，还有250英里长的下水道。在上海，斯诺参观了闸北贫民窟。一些旧的草屋还在，但它们有“屋顶、玻璃窗和干地板”。沿着清洁的小道和水管道两边，栽着树木。他住在上海第一流的古老的华懋饭店，现称和平饭店。出于怀旧，他在第一个晚上租用了有写作室的套间。这过分讲究的房间就象当年外国租界时代那个样。斯诺几乎难以入睡，他脑海里涌现出早年他在那里生活的回忆。

与斯诺的远见同时产生的，是他与中国之间的个人利害关系。1936年，当他骑马进入保安时，他年轻而且相对地不受约束。他一直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不明白社会主义，对象中国那样国家将会有何益处。到1960年，他已经与中国共产党人连接在一起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发展了个人关系。他与高层领导人的特殊接触，有助于他早期的成功。同任何记者一样，保持那些接触使他心情沉重。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预见也形成了他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中国今日生机勃勃的景象，证实了他过去的报道。

然而，远比个人考虑更为深远的东西紧推着斯诺。如果他以前的经验培育了感情与理智的联系，这种经验也使他在衡量中国的成就上有一个正确的标准。而且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抵达中国后不久，斯诺碰到了费利克斯·格林。格林给人的印象是，他不是个知道在中国会发现什么的人，而是个对中国干得这样好感到惊奇的人。如果是个人考虑强烈地驱使着斯诺，只要他写一本贬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那他在自己的国内在职业方面将会大为改善。

斯诺懂得，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赋予了他特殊的责任。他一直在试图理解别的国家行事的原因，特别是在中国。他在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的历史观，同时保持了他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念。1960年的形势似乎更为需要这种方法。美国人对中国普遍的仇恨和恐惧的心理，使之不能制订出对这个国家的合乎实际的政策，因此，斯诺感到他必须运用他与中国的接近和多年的经验为中国辩解，而限于报道中国的失误，虽然他确实看到了而且报道了这些失误。斯诺在他的名为《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用个别章节写了美国人头脑中的问题，比如中国存在着奴隶劳动。在发自中国的一封信中，他告诉贝内特·瑟夫，他对克服美国人对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怀疑感到多么忧虑。想使美国观念的天平倾斜到平衡的愿望推动着斯诺。这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的立场，而且他报道的手段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但这提供了一个为美国人所迫切需要的看法。

很久以前，斯诺就解决了个人卷入他所报道的事件中去的问题，虽然个人的卷入给他造成麻烦。在他向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报告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消息之后不久，他写道：中立是一个神话。“在这个由法西斯主义者带来的国际大变动中，对任何人来说，要保持中立简直是不可能的。好比一个人被淋巴腺鼠疫所包围，而要他对老鼠群保持‘中立’一样。不管你是否喜欢，你的生命作为一种力量必定是，要么帮助老鼠，要么阻挡它们。没有人能免遭历史细菌的感染。”

如同对待那些早期的卷入一样，斯诺没有回避1960年的中国难题。他仍然报道他所看到的事物。他的书充满了诚实感。他在《今日红色中国》里小心翼翼地省略了警告，并对陈述加以斟酌，以说明他的知识与调查的有限。他说他讲中国话的才能是有用的，但不象以前那样了。由于书写中文的简化，许多中国字他认不得了。他告诉读者在采访中官员和翻译一般都在场，而且

“没人向任何人暴露他的灵魂，尤其是当身边有一个外国人在场”。他按自己的愿望到处逛，但也只是看到这个国家的部分情况。他报道说，通过旅行接受教育是有限的，他说他象一个“旅游者”那样参观了一个特别繁荣的公社。官员们筑起一堵难以穿透的、只讲积极面的墙。他说：“我不能回忆起在参观任何矿山或工厂时，完不成（生产定额）计划被预计到了的情况。”他承认想到他应当提问，但当时忽略了。他说到放弃提问是因为他不愿使一个女犯人为她自己致力于引诱男人的细节感到窘迫。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注意到，斯诺对中国政府的新闻机构新华社感到失望。每件事都是正式安排的，不像早先，斯诺能“出入毛的窑洞”。官员们告诉斯诺那是在延安。在他的书里，他描写了在他能使一个公社领导人敞开心扉之前，要倾听“几小时的通常是倾泻而出的事实、数字、日期，对毛泽东的‘总路线’，对‘农业八字宪法’的颂词和对公社的称赞”。他说，“很难找到一个训练有素的中国共产党人来答复这样的问题，即假设他知道一个情况是改革造成的不正确的后果”。斯诺对一个官员尤其感到厌烦，该官员陪同他和艾黎到西北去。这位向导是个“纪律严格的人”，不摆架子。满口共产党的陈词滥调，就象斯诺在苏联所见到的官僚主义者一样。斯诺形容该官员穿了一件“紧贴身的，纽扣一直扣到下巴的蓝色哗叽套服而且脑袋里……充满了篡改了的历史，错误的消息，总路线，不正确的引用毛的讲话，并在他的右胸口袋里插着三支自来水笔”。

尽管人们想象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是尊敬的，但斯诺也提出了疑问和批评。在上海一个公园参观时，他发现一个孩子的牙齿黑得很厉害，便问保姆这是为什么。她回答说因为吃糖太多。斯诺调查并了解到，人们由于配给而得不到大量的糖。他在书中报道了这件小事，其结论是这个孩子实际上是缺乏维生素。他认为在“百花运动”时期冒出来的抗议，“听起来并不象是人民在寻求

‘团结’，而是人民由于被强加以审查而对团结感到厌倦的时间太长了。”他说中国决定把记者关在门外是“不明智的”。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中国官员夸大了“大跃进”的统计数字。斯诺说，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镜头来看世界，使中国人误解了西方。斯诺推测，中国人可能由于他对朝鲜战争的起因的看法与北京不一致，以致在5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拒绝给他签证。但他后来也并没有背离那些观点。斯诺在《今日红色中国》中说：“北京政府坚持——而且中国的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是南朝鲜在美国的煽动下发起攻击的，我看不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不相信它，而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它”。

正如斯诺在一封信中对比尔·鲍威尔说的，他认为虽然有事实证明缺乏维生素，但“中国贫苦人民的大多数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已大为改善，那是没有问题的”。他生动地写到，在钢铁学院里妇女与男人并肩学习工程学。他解释说，与普遍的印象相反，共产党人并没有毁掉质朴宜人的家庭生活。举一个例说，国民党人曾通过许多法令，比如取消对祖先的礼拜，然而至今才开始实行。此外，旧式家庭通常是邪恶的渊藪，其标志是殴打妻子，童养媳，出卖儿童，一夫多妻，包办婚姻，公婆暴虐。斯诺评论说，共产党人提高了国家的作用，但公社制度“可能在实际上更接近于达到家庭‘互助互利’的古老理想”。传统的中国戏院的消失不是一个大损失，因为舞台是为那些高贵者，而不是为那些既买不起票又看不懂戏的普通人提供文娱节目的。在现代的中国，每个工厂都有一个戏剧俱乐部。“尽管当代的主题通常以粗糙的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处理（带有很少的中国传统绘画的暗淡的细微的差别），它们至少使人（社会主义的人）充满了活力、青春和肯定的希望。”斯诺看到整风运动的积极方面和益处，它制止了一个新的官僚主义（阶层）在红色伪装下的发展。

他报道说，工人们的利润份额仍然很小。政府把剩余资金再

投回到经济中去。虽然如此，政府提供了教育和保健津贴，这些福利也仅仅是在私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后期才有的。此外，“工人和农民，他们十分清楚地懂得他们是怎样和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被减少了劳动收益的，他们满足于知道没有任何个人或无产阶级靠着他们的劳动成果致富，也知道这是为了整个社会，尤其是为了他们孩子的利益而把资金收集起来并投入生产的”。

斯诺在书中始终贯穿着对比，这使记叙文具有有一种辩解的色彩，虽然他的论点常常是重要的。比如：当苏联人杀害罗曼诺夫斯时，中国共产党人让那个曾与日本人勾结的满洲皇帝在科学院植物园里劳动；比如：“在中国几乎每个人，从教授到苦力，都有责任去干一些体力劳动”，但“在中国不再有童工”；比如：“中国人对外国居民的监视是平和的，不引人注目的，而且可能是有效的”；但美国有它自己的技巧。“我所收到的来自中国的信，从来没有一封是不曾明显地被拆开过和耽误了的”；比如：国家的控制深入到社会；但它有其好处，例如严厉地取缔了卖淫与犯罪。斯诺说，回到“富有的和思想自由的纽约”，犯罪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除了在电影里看到的東西之外，中国的领导对美国不大了解；但周恩来讲英语。斯诺问道：“美国曾否任命过一位讲中国话的国务卿呢？”

自从获胜的红军1949年挥舞着饰以毛的肖像的标语牌耀武扬威地进军北京以来，对毛的个人崇拜成为一个永久性的附属物。斯诺憎恨崇拜，就象20年代他早年在中国憎恨神化孙中山一样。中国共产党对斯诺的最初吸引力之一就是毛和其他领导人的纯朴，他们与人民吃得一样，穿同样朴素的、带补丁的衣服。颂扬一个统治者的做法与斯诺的观点背道而驰，他认为老百姓处于历史事件的中心。斯诺对崇拜的愤恨经常流露出来。吃早餐时，他在中国官员面前抱怨毛的普遍存在。他告诉爱泼斯坦，他关心新一代领导人的发展。斯诺向毛提起崇拜的问题，这用中国标准来

说是提问的一个大胆的界线。离开中国后，斯诺在讲话中表达了他对毛的崇高地位的同样关心。

斯诺用许多篇幅谈到崇拜，这是他对崇拜有成见的一个标志，而且他表达了对它的厌恶。斯诺小心谨慎地说：“迄今为止对毛的崇拜使人想起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对他的虚假的祝福”。

“这对任何西方人来说，是相同程度的、令人恶心的”。他还更直截了当地报道说，毛有权力而且运用权力。斯诺深刻地指出：因为他是“一个进行了开创性事业的人”，因此，毛“要求国家要绝对顺从。他象所有在世的有教养的领导人一样好斗”。鉴于他的书是辩解的工具，斯诺抑制了谴责。他说，神化领导人在中国不是件新事。“多少世纪以来由集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可以扔掉一张皮再捡起另一张皮，在一代或两代人里他们不改变染色体、氏族和肉体。”从积极的方面说，毛把他的权威用于为老百姓服务，因为他认识到老百姓是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他才取得了权力。斯诺用他的方式去记述毛朴素的饮食习惯和他那垂落在脚踝上的袜子。

斯诺旅行归来之后，曾对哈佛大学的一小群教师和研究生讲话。一个学生认为，这位记者似乎对彭德怀的命运担忧。那不会使人感到意外。在30年代，斯诺对这位粗鲁而朴实的指挥官产生了感情，而且彭的被撤职在今天被认为是毛主义时代的最大的不公正之一。在《今日红色中国》中，斯诺用他的方式形容彭是能干的、无畏的，并在“每一次考验中”都是忠于毛的。书中描写被开除的党员是如何被剥夺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那段话，可以说是对彭的被放逐提出了含蓄的批评。这段评论似乎既是说给中国人，也是说给他的美国读者听的。他在书中仍然控制他的感情，把彭的失宠形容为一个政治上的又推又拉，而且推测，如果与苏联的关系改善了的话，彭可能再次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这种妥协中，斯诺的长远观点暴露了其软弱的易受攻击的

部分。时间已改变了指导他早先判断事务的某些标准。他把以前批评的蒋介石独裁统治，现在用来作为一个先例去解释毛的独裁统治。中国有一部赞美其领袖的历史。问题是这个方法削弱了斯诺的直观能力。斯诺应当倾听他自己内心中对毛的崇拜的嫌言怨语的声音。正如斯诺所指出的，毛在党内没有“枪杀其反对派”。但是，正如斯诺也知道的那样，群众的奉承导致大量的滥用权力。他太期望毛吸取50年代的经验教训了。最坏的还在后头呢。虽然有些领导人，象斯诺所希望的那样，关心彭的复位，但这从未发生过——至少直到1978年。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发生并已经过去，而彭如同毛的许多革命同志那样由于毒打和其他的暴行已经死去。

当斯诺在中国时，重大问题之一是粮食短缺。长远的观点帮助他估价这个问题，虽然这并没有使他免犯错误。斯诺并没有人云亦云地谈毛主义的路线，说“大跃进”的失败只是由于气候的恶劣和苏联的背叛。他明白其中有计划上的错误，包括过急的执行和不采纳专家的劝告。党“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即以“政治统帅”取代实地农业统计工作者。斯诺认为至少毛应当受到部分谴责。他估计，农业生产将大幅度下降，1960年中国的生产总值是“较少的——而且可能相当地少——与1957年相比”。那意味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退步，“使整个经济停滞”。

斯诺煞费苦心地进行粮食生产核算，核算出1960年粮食产量达1.52亿吨。这个数字比此后的几年里所收集到的最低的、普遍被接受的数字，仅高出6%，而某些其他的客观的计算结果又比这个数字好得多。然而，他低估了粮食短缺的影响。他曲解了他所看到的東西。比如，他与艾黎旅行到某些地区，1929年他们曾在那里第一次目睹了残酷的饥荒。如今，那里没有出现乞丐或骨瘦如柴的人们，而是沿途新近种植的遮荫树和果树，这些树在过去的饥荒中会被剥去树皮当作食物；然而，这些都不能完全说明

问题。“我所能断言的几件事之一就是，中国在历代政权统治下几乎每年都发生的大饥荒不再发生了。”斯诺是对的，人们不再象以前那样明显地衰弱，死亡率也不象过去那样高。是营养不良，而不是彻底的饥饿导致许多人的死亡。斯诺仍然没有看到大量死亡的现实。正如他所说的，旅行是有局限性的。

斯诺不很正确的感受与共产党领导的失误是一致的。农场产量的降低并不能完全说明饥荒。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粮食的分配。由于受到他们领导人的革命愿望所鼓舞，地方党的干部为了讨好他们在北京的受崇拜的领导人，不仅在他们所制定的指标上，也在他们的报告中夸大了粮食产量。由于没有认清第一个错误是在他们的追随者中造成了过份的热情，领导者又犯了第二个严重错误。他们根据不正确的粮食统计，作出了政府的收购决定，并从农村抽调太多的粮食去支持他们在城里的工业化运动。结果是，饥荒悄悄地发生在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中。艾黎曾到各地旅行。在离开中国后，斯诺继续敦促他通报粮食形势。艾黎一封接着一封地写信报道粮食短缺，但没有提到饥荒。他谈到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说：“昨天，在北京的周围，你绝对看不到脸色较为健康的老百姓”。对周给斯诺的不确切的数字来说，最清楚的解释是他没有说谎。周可能并不了解情况。

作为“大跃进”之后致力于研究粮食问题的第一批外来者之一，斯诺曾遇到过巨大的障碍。他事实上没有可靠的数据。困难非常大，致使学者们不理解“大跃进”对后来数年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到70年代后期，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费子智争辩说，在1960年至1962年期间的粮食短缺，比起共产党政府所拯救的生命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公社制虽然笨拙，而且要靠更有效率的合作社，但却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这不过是因为资源被集中控制了，而且才有可能按定额进行分配。”虽然今天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而且许多学者估计总的死亡人数是2,000万，关

于死亡人数的争论还在继续进行，他们的估计是大为不同的。

如果斯诺对“大跃进”的报道说明了从内部报道中国是如何困难，那它也说明了从外部报道这个国家是如何不可能。其他记者在那时所报道的饥荒，几乎什么也证明不了。当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高纪录时，记者们传播了这个弥天大谎。1960年，某些预测在他们的夸张中变得稀奇古怪。在《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文章中，约瑟夫·艾尔索普推算假如毛继续掌权的话，毛的政策将付出1.5亿人生命的代价，即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艾尔索普认为，这个政权或整个共产主义制度可能要首先垮台。大约与此同时，《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的封面报道，在9页多的文字和图片里，有一段描述了在这个政权统治下所取得的进步。

美国的新闻界没看到斯诺从他在中国的长期经验中所推测出的重要真相。共产党人不是接近于倒台。毛虽然有权力，但他不是斯大林。这是更为复杂的事。斯大林在集体化过程中任意残酷地对待农民。毛可以，也会滥用他的权力，但当他认识到为取得样板伤害了农民时，他就从不好的政策中退了回来。粮食短缺是来自共产党的失误，而不是因为领导背弃了农民。在这长期的非难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是在走向进步，尤其在粮食产量稳定的地区不是毫无进步的。如同世界银行在1983年的一个报告中指出的：“在一点上，没有哪个大的发展中国家象中国做得那样好。”

斯诺懂得，中国的粮食危机不是“革命的总结”，在所有反华宣传的背后，“有千百万无名的和默默无闻的男男女女，他们成功地而且献身于贯彻一项真正的工作，即从世袭的、极度的无知和迷信、广为蔓延的疾病、文盲以及普遍的贫穷中解放了5亿人民。这项任务还没完成，但却在很少的外来援助下奠定了一个现代文明的基础，并且克服了许多障碍，而为设置这些障碍，美国人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一进步，加上他与毛和周的谈话，与他自己的感觉相符：

中国不会迷恋莫斯科。“近几年历史所揭示的是，在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预示着它至少像阶级团结一致的联盟那样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社会主义政权将从理论上使之牢不可破。”没有苏联的帮助——这个帮助一直是极微小的，不会阻碍中国的发展，甚至在核武器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而且斯诺准确地预见到，1964年以前中国可能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访问结束时，斯诺仍象到来时那样用富于哲理的态度看待中国。在与几个中国的天主教牧师谈话之后，他向他的向导承认，他不大喜欢基督教。斯诺说：“我分担每个人的极度无知和他对死后被遗忘的凄凉的恐惧。”“组织起来的教堂为了它们自己的荣誉并为了一个常被滥用了的权力，利用了上述这两个方面”。他在《今日红色中国》中解释说，他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同样感到不安。时间像某些信徒们一样热情，伴随着所有的宗教信仰。重要的问题是：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比较好，而在某些方面则超出了教堂和国家在承认人的兄弟般的关系上的严格规定，这正是蕴藏在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两者内部的一种理想。体现在斯诺信念中的这种感情，使他相信时间会消除障碍。他相信中国将会再次产生出伟大的文学。

斯诺写道：“正如所见到的那样，结局经常比预见到的任何计划都要复杂。”“而且综合物肯定是个妥协物，十分不同于那些甚至最强大的国家所自觉愿望的东西，有时是正好相反的东西，这些国家调动各种力量去抑制或指导历史”。

斯诺没有否认中国通过封锁美国记者访问和广播反美宣传来制造问题；但他也相信，假若美国首先采取行动的话，中国人愿意考虑改善关系。“在我看来合乎情理的事是，我曾强调，就目前两个人口总数几乎是人类三分之一的国家互相孤立的问题来说，美国人比中国人更负有责任。美利坚合众国更为富有得多而且更为强大。1949年，美国的政府和社会生存在安定和最大限度的安

全之中。美国并没有遭受一个世纪的侵略，而这种侵略由于革命和剧烈的受迫害感达到了顶点。是美国发起正式的绝交。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有一个不能矫正的倾向即期望美国稍稍成熟些”。

斯诺相信，美国向前迈进的时候到了。当他在中国时，美国人选举了年青的自由主义的约翰·F·肯尼迪为总统。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的理查德·尼克松被击败，“一些有能力和想象力的人”来到华盛顿，正如斯诺所指出的，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斯诺认为，美国能够“长高大”。它可能同意从金门和马祖撤出军舰，取消贸易封锁和旅行限制，邀请中国访问者如毛泽东到美国来，向中国人延长长期商品信贷，并宣告它愿意“看到通过在台湾与北京之间进行直接谈判而达到一个和平的结局”。

由于急于施加点影响，斯诺正与其家庭短暂团聚之后赶到纽约市。贝内特·瑟夫安排他去会见迪安·腊斯克，此人是洛克菲勒基金的主席，刚被肯尼迪任命为下一任国务卿。约会在上午8点，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由于找不到一部出租汽车，斯诺从他所住的柯乐博的里弗赛德·德赖弗公寓，步行到腊斯克的纽约办公室。因此，斯诺按时到达，腊斯克却迟到了。在斯诺讲话时，腊斯克匆忙吞咽着早餐，还接了几次电话。在几分钟之内，这位已被任命的国务卿突然结束了会见，也没有提到安排另一次约会。这位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设计师说他很抱歉，因为他要赶时间。

斯诺经常向朋友们重复谈起这件小事。不久之后，谢伟思在瑞士见到斯诺，他认为：“这是我没见到过的，他几乎要发怒了”。

斯诺于12月份在纽约完成了给《展望》杂志写的文章。他认为付给该文15,000美元稿酬是“出乎意料的慷慨”，并相信他解决了对编辑其他文章的误解：他会同意对草稿的所有改动。斯诺告诉朋友们，他钦佩《展望》的“勇气和对我的支持”。第一篇文章共12页几乎全部用于记述他对周恩来的采访，这篇文章是在1961年1月中旬斯诺回到瑞士时登出的。《展望》的编辑们在自

我保护的前言里说，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认为（斯诺）是他们的朋友”，而且“同样明显，他们所说的大部分事情可能易于被标以‘红色中国的宣传’……然而我们感到对美国人民和政府来说，尽可能地去了解这些人和他们的态度是极端重要的”。《展望》同时登出了一篇由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写的文章保持平衡。

即便如此，《展望》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因为当时在共产党的报纸上不会刊登一个美国人的评论，而它却给一个中国官员保留了篇幅。国民党政府火上加油。国民党人在一个声明中说“没有人比埃德加·斯诺更适合被称为一个同路人。人们必须打着折扣来对待斯诺关于中国的观察。”鲍大可认为，周的声明没有火药味，值得“认真地研读”。《堪萨斯城明星报》登载的美联社消息说，国民党人描绘周的讲话为“威胁性的咨文”，而不是妥协性的。

文章登出3天之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共和党成员的煽动下，开始推测新政府对此是否有不同的观点。时值切斯特·鲍尔斯的任职听询会，他被任命为腊斯克的副手。鲍尔斯是民主党自由派中善意的成员，他赞成以联合国投票解决世界问题，并开始懂得了共产主义的复杂性。在选举之前，他为《外交》季刊写了一篇文章，呼吁重新评价对华政策。鲍尔斯对蒋介石统治全中国的神话表示异议。他说有两个中国，一个在国民党人领导之下，一个在共产党人领导之下。为了不在公众面前走得太远，鲍尔斯强调由于中国人的强硬态度，谈判不大可能立即进行，以此为他的立场作掩护。肯尼迪看过这篇文章的草稿。他相信，鲍尔斯所提出的纲领为重新制订政策提供了有用的方法。大选之后，当鲍尔斯去国会山作任职答辩时，总统给他一个新的信号。肯尼迪要求鲍尔斯强调他的立场与大多数国会议员的相似之处，而不提打破新的禁区。苦恼的鲍尔斯照办了。虽然他完全可以利用《展望》上发表的周恩来对斯诺的谈话作为一个和解的象征，但他却以此证实中国人可能何等难以对付。在座无虚席的听询室里

作答辩时，鲍尔斯指出周批评了他的两个中国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不承认中国关于台湾的要求。鲍尔斯指责周对斯诺的谈话时说：这个“攻击”表明，美中之间不可能进行任何讨论。他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当在受到攻击时撤退。”

斯诺与《展望》的关系恶化了。他对该杂志放弃为他的文章作序感到不高兴。好几个月以来，他和《展望》的编辑们就编辑部对他随后的几篇报道所做的更改问题争论不休。斯诺认为妥协抹掉了对平衡的描述起重要作用的细微差别，而《展望》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见解。6月，丹·米奇写道：《展望》决定不登载斯诺旅行的另外两篇文章。米奇说：“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对许多事实和数字很有怀疑，而且太关切其明显的倾向性了”。斯诺认为这个解释令人费解，尤其是该杂志已经作了投资。斯诺高雅地，或许带一点讽刺意味地，把《今日红色中国》献给兰多姆出版公司的瑟夫和克洛普弗、路易·艾黎、周恩来、毛泽东和加德纳·考尔斯。

《展望》的决定打破了斯诺想抢先在费利克斯·格林之流竞争者之前出版书的愿望。格林恰好正开始写书，而且根据《展望》的材料来写，从而把斯诺远远地抛在后面。1961年5月，当斯诺正在考虑他的笔记并决定写些什么时，格林的书已开始排印。斯诺意识到，不仅格林的书可能转移人们对他的书的注意力，而且事件发展速度可能使他的材料过时。兰多姆出版公司也感受到了这个竞争，便敦促斯诺完成该书。8月，斯诺把他已经写完的部分书稿送往纽约。他建议作某些修改后，书稿便能很快出版——如果这正是兰多姆出版公司真正想要的东西的话。但斯诺不希望他们这样做。斯诺不坚持他原先要写一本约200至250页小书的说法，他宁愿写一本更长的书，即使更晚些再出版。他认为，《展望》惨败的教训，就是需要尽可能充分地提供事实与数字。无疑是由于认识到无论如何赶不上格林了，兰多姆出版公司同意了他的意见。

斯诺写信给朋友们说：“做弥补大量偏见的工作而又没有兴趣呆在家，”是“可怕的”。他不止一次地写信给他的出版商，告诉他们说，每天的惯例是在打字机前工作10到12个小时。他患有痲感染，伴随着头痛，这使他住进了医院，虽然是短期的，但耗费掉他更多的时间。他是个对新闻着迷的人。离开中国后的几周内，他写信给以前的学生、现在在外交部工作的龚澎，索要关于粮食生产的详细材料。他从瑞士打电话给兰多姆出版公司的编辑玛丽·希思科特，请她查找资料证实一个白薯含有多少卡热量。他用这些资料论述饥荒问题，这个问题在新闻报道中仍占有支配地位。1962年初，当斯诺写出了一稿后，便带着书稿在全美国进行了15周令人精疲力尽的旅行演说。在演讲旅行结束时，书稿已排在活字盘上——这时不能再作大的改动了。斯诺又加上更多的材料，重写部分章节以回答演讲时听众提出的问题。他写信给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说：

你能送给我的用以解释当前形势的任何材料都是最有价值的，即使是一个单独的有粮产量的、钢的、工业概况的全国数字。是否农业中等学校已经被放弃了（如报道的那样），是否农村公社几乎全不见了（如报道的那样），是否现在普遍可见的现象是：小孩膨胀着肚皮、黑牙齿、佝偻腿，是否彭德怀肯定地被踢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因为他反对公社化而（同毛）争辩，又站在（赫鲁晓夫）一边，是否民兵夹杂在逃入香港的难民中，是否干部士气退落，而且腐败现象现在广为盛行，是否外国人现在被禁止（到某些城市）旅行……是否工业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二（据阿尔索普说）？如果不是，那么下降了多少，等等……一定要给我搞一点事实。

书的护封印出后，斯诺把书名《今日红色中国》改为《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布莱斯·帕斯卡尔的诗句引起斯诺的共鸣：“不可思议的公正，以河为界！一个人有权杀死我，就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荒谬呢……”（在后来的几个版本中，斯诺更改了书名，从销售意义上着眼，正如玛丽·希思科特注意到的，使图书管理员都着迷了。）

1962年11月13日，斯诺收到了第一本装订好的《今日红色中国》。兰·多姆出版公司希望借圣诞节抢购热，推销该书。“我的书的第一版非普通开本（13,500册）在（正式）发行前一周就卖光了，第二次印刷本很快又被订购一空”，斯诺写信告诉他姐姐，兰多姆出版公司在努力把书送进书店。

贝内特·瑟夫承认，最初选择的时机看来如此美好，但似乎很快要遭到“不幸”。12月初，印刷工人开始罢工，使纽约的9家报社关闭3、4个月，因而削减了原计划的广告宣传运动。除此之外，该书的问世与印——中战争巧合。虽然时间将表明是印度人挑起了这场短暂的界线不明的边界冲突，普通美国人对中国人好战的推测，使斯诺的预言貌似愚蠢，他说：“既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国会热衷于计划使用大规模的军事手段，在广阔的、无人居住的、对任何一国都无真正价值的荒原上赢得“地图上的胜利”；毛领导下的中国不会屈服于军事征服。

《今日红色中国》是一本难以评论的书。第一个问题是这本书的部头。这是斯诺写的最厚的一本书，包括补遗共有800页。他渴望解释每一件事情，把大量的事实和数字堆积在读者面前；他大段引证历史和摘引以前的报道；他容忍自己根据观察陈述，使得某些内容是无必要的，以至于脱离主题，例如，有大段滑稽的词句摹仿马克·吐温的《致坐在黑暗中的人》。斯诺的朋友谢伟思认为，《今日红色中国》并未表现出斯诺往日的火花。然而，当这本书应当被删节时（在后来的几个版本中做了删节），

斯诺又不能删得太多，以免使自己遭受另一种批评——认为他太肤浅了。无论如何，这本书的部头是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本书的说服力——斯诺目睹中国的特殊机遇——也是这本书最大的不利条件。由于到中国旅行受限制，评论者一般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家。不能根据个人的经验讲话，又要经常留心倾泄下来的反共宣传洪流，因此，没有人真正知道斯诺哪里是对的，哪里是错的。好意的评论不得不承认某些疑惑。斯诺提供了“大量事实的堆积”，《纽约人》周刊说，“如果我们能猜出哪些是事实就好了”。一位评论家在《每月书刊俱乐部新闻》中用另一种方法评论说：《今日红色中国》这本书“突出了我们的不幸，那就是不能有许多记者自由访问中国，以提供更多的第一手材料来评价一个统治着人类近四分之一人口的政府”。该俱乐部对这本书给予极好的评价，但并没有使它入选。

尽管有这些问题，但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赞赏意见，有些可能是匿名的。虽然保守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日常评论持否定态度，但有更多人阅读的该报周日的书评专栏却称赞这本书。许多其他学术刊物，如《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纪事》双月刊，称这本书为“斯诺的第二部伟大‘特稿’……毫无疑问，对所有想了解今日大陆中国的人，无论门外汉还是专家，都是一本必读的书”。但是，也容易招来纯粹的批评。在30年代，没有人责怪斯诺长篇引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实质上是给他们以机会证明他们的立场。但这种手法搬到1962年则近似乎背叛。《芝加哥论坛报》称《今日红色中国》：“至多不过是非常聪明和巧妙地撰写的宣传”。《公共福利》周刊称这本书：“如此偏见和天真，以至于构成了一种公共危险”。《时代》杂志高兴地嘲笑斯诺把毛描绘成一个“穿着旧布袜而那袜子有趣的垂落在脚踝上”的人。

最富有伤害性的评论来自《纽约时报》。如斯诺所知，该报的书评编辑拒绝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评论《今日红色中国》的

要求。索尔兹伯里给斯诺的印象是他对这本书是“热心的”。这个任务由林迈可接替了。林迈可当时是华盛顿美国大学的美国教授。他几乎不是个适宜作客观评论的人。林迈可——伯克尔的林迈可勋爵——30年代曾在燕京大学教书，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共产党人的顾问，架设广播电台，训练中国人。这些使林迈可在40年代对共产党有特殊的内心看法。象许多人一样，他对共产党的改革印象很好，也象许多人一样，他藐视赤色分子的革命意向。1949年以后，他对共产党政权的幻想破灭了，变得好斗和吹毛求疵。1940年，林迈可在重庆见过斯诺，那是一次亲切的会见，当时，两人对共产党人都有着积极的看法。但此后几年，林迈可对这个记者产生了怨恨，就象几年之后为写这本书采访他时，他失口说出的那样，他猜想是斯诺拒绝了他和40年代投给《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文章，该文预言为什么共产党人会在中国获胜。

林迈可的评论跟斯诺书对中国的评论很相似。他严厉批评双方。虽然一位客观的评论家曾指出斯诺同情共产党人，但要平衡至少必须叙述斯诺所看到的东西，有些人承认毕竟他曾到过其他访华者未曾到过的地方。而林迈可却说，斯诺“对其他外国观察家所做的报道，提供的见证材料太少了。”林迈可不是把斯诺对毛和周的长时间采访视为这本书的长处，而是视为短处。他这样写道，共产党人不会认真地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因为他们会在艾德礼（英国工党领袖，曾任首相。——译注）和也曾访问过该国的“其他英国工党领袖们”身上花费三倍于用在象斯诺这样的同情者身上的时间。对于斯诺表现出的所有同情，他没有给予那怕是极微细的说明。这本书含有值得重视的平衡——的确，远远超过了林迈可的评论。

《纽约时报》的评论给这本书的经销者和购买者都带来很大的影响。由于希望修复被中伤的威信，斯诺针对林迈可的评论写了一篇长文章进行反驳，玛丽·希思科特把它压缩后送交《纽约

时报》的书刊编辑。斯诺批评林迈可没有报道“我自己列举的许多（共产党人）的弱点；包括这个政权不能接受对它本身的批评”。他也指出了林迈可的偏爱，其中说到林迈可对艾德礼同共产党领袖的短暂会晤的抱怨，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对学术的兴趣。林迈可曾是艾德礼集团的成员。同这些观点一样，斯诺想清算旧帐的特殊愿望是个错误。在刊载斯诺来信的同时，《纽约时报》书评专栏连载了林迈可的反驳文章，该文比斯诺的长两倍却只能使读者思想混乱，除非有人肯费心把这两封给编辑部的信全部读完。

斯诺写信的意图之一是刷洗过去的记录。他抗议《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否定性的评论。他抗议《堪萨斯城时报》报道他在当地的一次谈话。为保证准确性，斯诺曾预先写好有关中国“10个常见的问题”的答案。然而，当地记者还是误解了他的评论。

“我说在中国没有真正的饥荒，但是有严重的食品短缺和农业危机”。1963年初，斯诺作又一次演讲旅行，以推销《今日红色中国》一书，并且他不止一次地写信给兰多姆出版公司，建议出广告本和提出反击诋毁评论的策略。

到1965年初，所有的评论都登出来了，斯诺所有的演讲都发表了，美国人购买了21,000多本《今日红色中国》。这是个相当可观的销售量，特别是因为这本大厚书售价10美元，当时非小说类文学作品一般每本售价5美元。早些时候，《出版者周刊》打算把这本书列入最佳销量书的候选名单。但是，这本书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斯诺注定要象他谈论50年代那样，把60年代说成是“没有努力将几则有用的信息渗透到制定政策的各个最高层领域中去的10年”。

斯诺认为，肯尼迪对中国的不妥协政策，归因于“军事工业的复合体”，它相信的是力量，而不是妥协。一种更为深刻的理由深藏于狭隘的幻想之中，它指导着美国这整个一个世纪的外交政策。美国人用简单的黑与白的关系看世界。他们拒绝检查他们

的错误估计，即共产党政权在中国人民中间不可能得到支持。因此，美国人自信，蒋不仅是大陆合法的统治者，他也能胜利地返回大陆。鲍尔斯的“两个中国”政策就是从这个泥潭里脱身的创造性的计划。但是，因为共产党中国不能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一概念要求政策制定者寻求艺术手段为每一方保存面子。正如鲍尔斯的作证所泄露的，避开对华政策比改变政策较为更容易。此项任务没有政治报酬，却有许多政治风险。斯诺在《今日红色中国》的特别节录版里，用挖苦的言词归纳了这个问题，这本书完成于肯尼迪开始执政两年之后。那些需要改变对华政策的貌似政治家的领袖们，“只能在约翰·肯尼迪的《英雄略传》里找到”。

缺少对中国第一手材料的报道，不能说明美国对中国一无所知的程度。1964年年中的一次调查表明，28%的公众不知道一个共产党政府控制着中国，在知道谁统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些人中，有39%的人想不起在台湾岛上还有另一个中国政府。美国人极少关心中国。由于惧怕中国潜在的核力量和同印度的短期冲突，使他们对红色威胁有一种模糊的概念。1961年到1963年间，民意测验表明，公众舆论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超过了来自苏联的威胁。1964年的民意测验表明，只有比例很少的人，即10%的人赞同帮助国民党进攻共产党。但是，政治领袖们可能逐渐把公众引向一场东南亚的战争，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阻止扩散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斯诺在1962年的演讲旅行中，认为许多人愿意接受他的观点。他们只是对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迫使当局改变对华政策显得不那么感兴趣罢了。

组织良好的集团利用舆论的无形和混乱，对政治决策施加了特别的影响。参议员麦卡锡的去世并未能使亲蒋介石的顽固派黯然失色，这些人形成了院外中国活动集团。1964年当一本批评院外中国活动集团的书出现时，该党羽强迫出版人销毁掉4,000多本。已发行的8,000本中有许多被从图书馆里偷走了换上相当数

量的名谓《红色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书。1961年，“百万人委员会”拿到100多万人在请愿书上的签名，该请愿书反对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反对任何其他可能同该政权进行交往的步骤。代表两党的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员，当年在请愿书上签了名，1965年再次签名。

亲蒋集团仍然坚决反对斯诺。约翰·伯彻斯在斯诺旅行演讲过程中，在几个场合搅扰他。1962年当斯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作演讲时，“真理委员会”的36名成员向他挑衅。一幅标语写着：“弗雷斯诺没有斯诺的事儿”。“泛希腊公会”散布谣言说，斯诺是个在警察局立案的共产党，此后，伯明翰南方学院撤销了请斯诺作演讲的邀请。联邦调查局担心所谓情报来自该局的秘密档案，最后找到谣言来自一位妇女，她说她用的是报刊资料，包括图书馆的材料。联邦调查局继续收集有关斯诺的材料，在整个60年代一直监视着他的行踪，尽管不总是搞的很紧张。1966年4月，《今日红色中国》一书出版三年多以后，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指示纽约局“小心地搞一本”送交华盛顿的研究单位（由于很少考虑公众意见，美国支持的朝鲜中央情报局猛烈攻击一位编辑，因为他刊登了一篇斯诺的特写，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崇敬毛）。美国右翼报刊对判断问题不感兴趣。“好吧，相信毛是一位土地改革者的信念已经刮起一场旋风，把6亿中国人卷入奴隶般的劳动，埃德加·斯诺——为了面子，现在必须闭上你的嘴”，《世事》周刊这样写道。“但是，哎呀，不要这样”。1968年，“约翰·伯奇协会”的《左派人名词典》里用一整页多的篇幅记述斯诺。

肯尼迪要求鲍尔斯避免把对华政策问题夸大。肯尼迪以流言击败了尼克松，仅仅多10万张选票。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他从对华政策这个政治上难以把握的问题上后退的话，艾森豪威尔以发誓再度出山作为要挟同等重要的是，对华政策问题并未使肯尼迪深深地陷入麻烦。他并不是没有暗示，而是经常暗示那个政策修订

本已准备就绪。但是，肯尼迪是在一种狭隘的选择方案之中思考问题。象许多更为自由派的政治家一样，他是一位有充分资格的冷战舆论者。作为一位年轻的议员，肯尼迪曾参与批评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在大选期间，他提出是共和党把古巴“输给”共产主义。一旦执政，肯尼迪并没有发现中苏分裂可作为一个契机向中国打开门。象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肯尼迪把中国视为更加危险的威胁着整个东南亚的一头红色猛兽。大约在《今日红色中国》出版的时候，肯尼迪增加了在越南的顾问人数，从5千人增加到1万人，并授权他们参加战斗。

肯尼迪任职期间，在国务院工作的人中，有与斯诺能谈得来的人比如罗伯特·巴尼特。50年代，他受右翼中伤，当时曾担任好几位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代表。他要求彻底检查对华政策。有一段时期，埃夫里尔·哈里曼领导远东司。哈里曼40年代在莫斯科曾向斯诺询问过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斯诺在笔记本里写道：“似乎对他们不太友好”。哈里曼仍然愿意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在他负责远东事务司之前，他花费了一星期天的部分时间，在瑞士斯诺乔居的寓所里同斯诺讨论中国问题。多亏有巴尼特的帮助，哈里曼同斯诺在国务院里再次相会。当一位下级外交官写便条给哈里曼批评《今日红色中国》为使人沮丧的“争论”，哈里曼征询巴尼特的意见。巴尼特说他不同意这种说法。哈里曼认为，斯诺是个非常有希望并有用的消息来源。1963年，哈里曼同斯诺还有其他人出现在电视纪录片《中国与原子弹》中，哈里曼说政府欢迎就对华政策进行“公开辩论”。

但是，主管国务院的人没有这种安排。国务卿腊斯克，是一位不好争论的、强硬的、献身的公务员；他在杜鲁门执政时期曾作为助理国务卿负责远东事务，并多次获得无可指责的“冷战”证书。1951年，他把北京列为“殖民地的俄国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推荐他作洛克菲勒基金会

的主席。60年代，腊斯克轻易地凭幻觉描绘出“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10亿（团结的）中国人”正威胁着世界的画面。腊斯克知道如何同国会相处，他也不是那种向白宫挑战的人。巴尼特说，在大选后，他听到流传说肯尼迪告诉腊斯克：“我会听信你的忠告，但看在基督的面上，不要告诉我该对中国做什么。”腊斯克不想象肯尼迪疏远艾克那样疏远肯尼迪。

对那些想与过去决裂的外交政策专家们来说，最大的胜利之一是放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但是，他们用了5年的时间去劝说政府给医生和卫生官员们准发护照。1963年底，哈里曼的继任者罗杰·希尔斯曼勇敢地作了一次讲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可避免地、永久地存在下去。虽然被许多人看作是个重大突破，一位了解内幕的人士后来评论说，这个讲话“是官僚主义政治中的偶然事件”。希尔斯曼的上司们，包括腊斯克，都太忙了以至于没能在澄清这些观点之前仔细地阅读他的批评意见。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66年写信给斯诺说的，坚冰开始沿河下流，但流得很缓慢。

腊斯克在即将成为国务卿之前，主持过一个小组委员会，该会的总结说：“需要全面了解中国正在干什么这件事太重要了，不感兴趣和不关心的态度应当消除，以保证美国人在现场充分地报道。”腊斯克就任国务卿数月后，在一次午餐会上偶然坐在拉里·胡斯顿旁边。胡斯顿是位年轻人，他第一次见到斯诺是在罗克利，后来成了可靠的朋友，他羞怯地问腊斯克，是否认为听取斯诺对中国的看法是有用的。腊斯克回答说，不。美国对那些好斗的中国人需要知道的每一件事都已了如指掌。

肯尼迪遇刺后，林登·约翰逊的对华政策没有作任何彻底的改变。他自愿地继承了肯尼迪的国务卿和他的政策。“这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在人们常讲的一个故事里说，“在对华政策上永远不会采纳你和我可能要他采取的步骤，除非他的国务

卿敦促他这样作。而这位国务卿是永远也不会敦促他这样作的”。

周恩来1960年对斯诺讲的论点证明是有预见的。首先，周同美国谈判的公式变成必然发生的中、美和解的框架——10年之后尼克松访华。其次，周认为肯尼迪政府顺应全国的意见，阻止了对艾森豪威尔的对华政策作任何重大的修改。周曾说：“我们的看法是，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没有根本的不同。”

《今日红色中国》出版后，预想不到的荣誉降临到斯诺的身上。纽约专栏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埃德·沙利文写文章说：这本书“为全世界提供了光辉的服务”。沙利文以个人的名义请世界银行董事乔治·伍兹注意这本书。斯诺对这一注意感到高兴，但他不认为他的名望多么高。

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在成长之中。斯诺告诉他的老朋友马丁·萨默斯：“当我被卷入任何记者招待会时，在为数不多的场合中，我很难遇上一个以上我认识的人。”老的评论家继续忽视他，或者更糟。1965年，艾尔索普在一专栏里草草地驳斥《今日红色中国》为“含糊不清的赞词”。“我们有关农业的中国的所有一切有用的证据”，艾尔索普说，都来自香港的难民。1964年，一项调查要求美国各新闻机构驻在南亚和东亚的91名记者，提名该地区杰出的文学家或新闻专家。或许有一两位响应者提名斯诺。公布的结果仅开列出被提名两次以上的记者。表上列出10个人，斯诺不在其中。

几年后的一个夏日午后，斯诺和一位编辑朋友特鲁迪·谢弗坐在格林威治一家很小的农村饭馆里谈论中国。一位坐在他旁边的青年男子说，他禁不住要偷听他们的谈话。

“你是一位中国专家吗？”他问斯诺。

斯诺耸耸肩，说他知道这个国家一些事情。

“你是鲍大可吗？”这位男青年问。

不是，斯诺简单回答，没有展开谈。

斯诺继续发生开支困难。他抱怨兰多姆出版公司把他自己的16,000美元投入到《今日红色中国》的地图、索引、衬页上,以及更多的投入到照片上。到1962年12月书出版时,他实际上已经花光了兰多姆出版公司先期付给他的钱和《展望》杂志付给他的大部分稿酬。当兰多姆出版公司不能付给版税时,斯诺想从卖书中赚钱的愿望被打消了。斯诺无法继续付给佩格抚养费。佩格认为他现在赚钱了,她向兰多姆出版公司索要属于斯诺的钱。法律纠纷开始了,斯诺起诉佩格,说她从他30年代拍的照片和影片里提取利润。直到1964年底,斯诺才同她商定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根据商定的条件,佩格得到总额相当于《今日红色中国》版税的大部分钱,斯诺不再付给她抚养费。佩格归还了照片。斯诺抱怨说,他需要用大部分剩余的版税去支付法律上的费用。

斯诺不知不觉地陷入20年代和30年代他在亚洲思念美国的同一模式中。他计划回国,或许在几个月之内,但不是现在。首先,洛伊丝欣赏瑞士,她学习语言,在西安和克里斯身上花费时间,在一所小的私人学校里教英语,周游欧洲,招待她接触过的客人。后来她终于失去好多的演戏机会,以致她不愿再进剧场。孩子被安顿在学校上日课。斯诺认为,他们的法语语法程度比英文还要好。洛伊丝与孩子们于1966年夏去过美国。越南战争在激烈地进行,报纸报道了在芝加哥发生的可怕的理查德·斯佩克谋杀案,还有一个学院学生从得克萨斯大学的水塔上阻击人的惨案。然而,侨民们宁要美国而不要和平的瑞士。

生活在瑞士比在美国开销少,东西便宜些,而且斯诺在这里比较接近需要他工作的听众。英国广播公司使用了他1960年中国之行所拍摄的影片。《今日红色中国》出版了以色列、德国、瑞士、法国、英国、日本以及意大利的版本。外国期刊向他征文,题材不仅限于亚洲,也有美国的种族关系紧张问题。可能文字翻译的不准确令人失望,但至少他的报道是受欢迎的。这已经超出

了他对美国所能讲的情况。在1960年和1964年之间，他写了一篇文章值得在《期刊文学读者指南》中提及。那就是在《展望》上的那篇大作。

一方面，斯诺自称相信“从长远看，美国人民将会更成熟地理解在世界这块贫穷的土地上，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各阶段所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他抱怨美国宣传工具一般“拒绝刊登目睹者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除了那些肯定它们自己痴心妄想和自欺欺人的文章之外。”

年复一年的留居，拖着这一家人连续地迁居！他们第一个寓所在日内瓦湖边；又在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建造的山上别墅住了一年；在同一村庄圣塞尔格租过一所大而老的房子；1965年住在里昂靠近儿童学校的一所公寓里，斯诺经常谈起要在遥远的地方新汉普郡或佛蒙特买一块地。一次去华盛顿时，他和拉里·胡斯顿驱车到西弗吉尼亚看一块山谷地产。斯诺走在这块25英亩的土地上，想象着他们怎么能把这地分割成小块。这个念头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在出租了他们在新泽西的罗克利居住了多年的房子之后，斯诺一家又把它卖掉了。1967年去美国时，斯诺找到另一所靠近纽约市的房子。他为此打电话给洛伊丝，并寄给她照片看。她是热心的。

“你搞到那房子啦？”斯诺返回瑞士后，她立即问。

“让我们商量一下，”他说。“你真想要那房子吗？”洛伊丝真想要。他们给美国挂了一个长途电话。那房子已售出了。

1968年，斯诺最终买了一所他们自己的寓所，在艾森斯村外，一所老农舍，他们加以修复。“这是我们瑞士的家，”斯诺对洛伊丝说，“但我们最终要回到美国去”。

虽然斯诺在美国再次受到欢迎，但瑞士的农舍却成了他最终的家。

第九章 光荣的结束

在20世纪的整个60年代中，中美两国都未能各自向前走出一半路程；运用埃德加·斯诺在瑞士的这个家作为接触的前沿阵地，因而这里始终是寂寞冷清的。从这儿朝东走4,900英里是北京，那里的领导人正将他们的国家紧套在文化大革命的绞索中；朝西走4,200英里则是华盛顿，那里的领导人却卷入一场东南亚的战火中，原来企图以此来提高美国的身价，而实际结局却使美国投入深重的迷惘中。也许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观察家会深表疑惑，是什么逻辑驱使这两个颇关注自我民族利益的国家，这么长时期推迟和解的进程——或者说是那一家的正义，却要以这位为两国搭桥，可以说是孤军奋斗了这么多年而长期饮恨的老人的去世来标志两国新的一页的开端。

斯诺认识到他的处境极为微妙，他与中共的接触带来许多美国人对他的怀疑；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记者，他又要冒触犯中国人的危险，还有可能加剧中国人对美国政策的怀疑。他对每次被人采访均十分谨慎，因为“凡是该我负责的，我都要负责。”有一次他对错误地引用过他的话的一位菲律宾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

要维护独立自由的地位，这是斯诺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太了解这一点了。她居住在中国一直到她1970年去世。她具有充分的胆略在如“毛泽东思想”等这样一些

重大的问题上采取决断。但同时，她也有某种丧失信心的矛盾心情，尤其是她作为中国的贵宾时。1960年，中国方面明显是出于礼貌的考虑，在给斯诺发签证前征求了她的意见。她同意了，但她告诉斯诺的朋友，中国和大主席和侨务委员会的主任廖承志说：斯诺有一个“不安份的毛病，他喜欢一字不漏地公开引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如季维诺夫、宋庆龄的一些不公开的谈话”。斯特朗不想让斯诺知道“我在这里是如何享受免费待遇的，因为斯诺只要能写出一条好的新闻报道，他对素材的取舍是不够谨慎的”。斯特朗还打算在中国逗留，而她在与美国人打交道和施加影响上的成效还不及斯诺。

斯诺在50年代曾有一次考虑过，将他过去摄的影片卖给中国人作为他来中国的旅费，当然，他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在1960年他访华时，他将这部影片送给革命博物馆，而中国方面坚持要付费。在他离开昆明上飞机前，他将一包用报纸包的东西送给中国官员，那是托他转给路易·艾黎，里面包的是钱，他说明是退还给革命博物馆的。

在当年，中美双方还没有官方联系时，斯诺自然成为一个中介人，协助那些想亲自去中国看看的美国人。斯诺曾对艾黎说：“我常常被那些想去中国访问的要人们纠缠着为他们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几乎是除总统以外的所有人都写信或打长途电话找我。”斯诺认识到他与中国方面的关系及其影响，如果说还没有达到危险的地步，也接近边缘了，因而他在这方面也是十分谨慎小心的。尽管有人抱怨他在协助他们向中国说情上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斯诺有时也出现奇迹，有一次他的名字竟为别人打开了访问中国之门。他曾告诉他的朋友K·S·卡罗尔，一个为英国《新政治家》周刊撰稿的波兰前爱国人士，他无法为他访问中国弄到签证。但不久以后，卡罗尔碰巧在阿尔及尔与周恩来同时参加一个宴会，卡罗尔因为提及斯诺，而赢得总理的注意，进而与

总理交谈，从而获得访问中国的签证。斯诺认识到他的影响有限，这一点还是基本准确的。当他认为某事重要，因而运用他的影响时，常常不起多大作用。卡罗尔这一插曲事件也可以看出，从中美两方面的平衡来沟通双方的联系时，常常是问题重重，几乎总是令人沮丧。

在那些求斯诺帮忙者中，还有一个叫格伦维尔·克拉克的，他是一位富有的纽约律师，也是一位终生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士。他曾率先提出一个大胆设想的方案，要美国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让美国人先秘密地接受军事训练；后来他又提出要组建世界联合政府。1930年，克拉克要斯诺为艾森豪威尔的著名的私人医师保罗·达德利·怀特，弄到一份访华的邀请信。斯诺除了写信给马海德外，还写了一封长达5页单行打字的信给毛泽东，说明怀特是一个自认为对中美双方都负有责任的人。斯诺劝毛允许一些美国科学家、医生、商人来华作私人访问，这样可以平衡一些消极的舆论媒介。斯诺说，怀特之行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斯诺还向毛保证，怀特访华无需美国国务院的批准。中国在1963年末让怀特成行。后来，怀特也就成为推动美国国务院两年后松动去中国旅行限制的契机。1964年斯诺终于使怀特本人访华成行。

乔治·普拉特是斯诺童年时代在堪萨斯城的朋友，后来成为一名国际知名的工程师，他要求斯诺帮助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弗朗克·莫斯和欧内斯特·格里宁去华参观水利工程。但是，1963年斯诺在华盛顿作短暂停留期间，曾第一次试图访问这些参议员们，却受阻于他们的秘书。这次他鼓起勇气将这些参议员们的要求向中国方面提出，但他也意识到中方的疑虑。他曾在一次午餐会上告诉参议员莫斯，中方需要一个绝对的保证，即中方一旦发出邀请，这些美国参议员们必须接受。对此，莫斯答应写出一封保证信，但是，这封信始终未收到。普拉特猜想“大概时机尚不成熟，华盛顿方面在政治和行政手续上发生了某些疑虑

和故障。”

斯诺同意用他的名字与俄勒冈州前国会议员查尔斯·波特共同发起组成一个研讨对华政策委员会。但他个人倒更愿写些有关中国的东西，而不愿在中美之间作正式调处人。在完成他的新著《今日红色中国》之后，他考虑再一次访华的可能性：要想让国务院发给护照就是第一个问题；如何筹措路费又是一个问题；还有，中国方面是否让他再度入境也还是一个问题的。1960年斯诺访华后，还没有另一个记者访过华。中国方面对他希望得到邀请的信未予答复。斯诺猜想他对中共的激烈批评，特别是针对他们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其原因。路易·艾黎在1963年夏写道，斯诺也许还要等若干年，而那也许就是他的最后一次访华了。斯诺后来写信给中国外交部的龚澎（斯诺在燕京时代的学生和朋友）说，那就要等15年了，“我恐怕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从1963年12月起，周恩来开始了他的非洲10国之行。这时，斯诺在巴黎《老实的新人》周刊的赞助之下，也在非洲采访，并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会见了这位总理。这一颇为罕见的、在一个晚上长达5小时的接见谈话，自然引起了新闻界同行们的嫉妒，斯诺甚至还怀疑有人洗劫了他在旅馆所住的房间。《纽约时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后来购买了他的这次采访记录。周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承认，北京和莫斯科已达成就边界纠纷进行谈判的协议。斯诺注意到，中国过去没有承认过存在着边界纠纷。周还重申中国“毫不动摇地”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政策”，这是一个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声明。这次接见后不到一星期，中法正式宣布双方关系正常化，此举导致近50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斯诺“猜测”法中的全面外交关系并不妨碍法国仍在台湾保留一名代表。斯诺还突出地报道说，华盛顿的某些制定政策的人认为这种模式将是一条使“美国越过尴尬困境的出路”。

后来的情况是，法国与台湾的关系全面破裂，美国仍徘徊在

同以往一样的困境中。而斯诺的处境则优于以前，有所进展。在那次非洲的采访接见中，周指出斯诺在1960年那次访华后他所写的报道没有再导致他在中国不受欢迎。

斯诺后来不得不推迟访华的安排，那是因为4月初他的膀胱结石需要动手术。手术后的感染使他直到6月才能下床。7月他去美国，在华盛顿，他与哈里曼详细商谈国务院批准他访华问题。在一再拖延之后，终获批准。（令斯诺不愉快的是，直到他离开中国，他的夫人洛伊丝始终未获批准与他同行。）斯诺的友人玛丽·希思科特就任编辑的麦克米伦公司与斯诺签订了写一本书的合约。虽然没有一家美国刊物愿意资助斯诺之行，但法国的《老实的新人》、德国的《明星》和意大利的《欧洲人》却都预付了斯诺一部份钱。斯诺于1964年10月下旬，经过香港再度进入中国。

虽然耽搁了这么久，斯诺仍然认为他来得“正是时候”。自1960年后，中国经济得到恢复的迹象“到处可见，而且颇为激动人心”。他放弃了收集材料写长征历史的打算，而决定写一本小册子，报道当前中国的现实，还打算拍一部记录影片。

虽然好多重要的统计数字不易弄到手，而且这次旅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促并局限于城市，但斯诺准确地断定：粮食生产已明显恢复到1950年的水平，干部们有了信心，也比较实事求是了。斯诺虽然仍未否定中共统治的粗暴和将来仍可能再犯错误，但他预期20年后中国的青年们“在科学教育、文化和身体素质方面所达到的平均水平将不会低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实际上，丢掉了苏联的援助，中国不但没有衰败，相反倒更繁荣了。这种自力更生精神使斯诺想起了一句密苏里的格言，1928年他在早期为《密勒氏评论报》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引用过。当时他突然发现“一种精神，或者说至少有一种看起来很有希望的精神，‘把中国从泥淖之中解救出来！’”斯诺这本书中一章的初稿就题名为《跃出泥淖》。

他在《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略似缅怀往事地写出了他的论据：“如果我刚刚从我自己的祖国出来，面对此情此景，也许我产生的是另一种反映。”“我不是从美国这一基础出发，我是以我在东亚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贫困、肮脏、野蛮、压迫和普遍绝望这样一种背景来衡量，来判断红色中国的。”

斯诺在周恩来的府邸正式采访周两次。1月中旬离华前一个晚上，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作了长时间谈话，龚澎和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外交部高级官员）参加了这次晚宴谈话。毛告诉斯诺他们的谈话有录音时，颇令斯诺吃惊。斯诺相信自1949年以来，毛与外国记者的谈话，准备公开发表，这还是第一次。

毛的谈话颇富哲理，当然明显地都是有的放矢。他说中国青年人没有革命经验，他们“没有打过仗，也没有见过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当时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气氛，深深印入斯诺的心目中。他在1936年见到的毛的像片，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30英尺高的庞然大物了。斯诺问毛，是否有批评个人崇拜的基础。毛回答说，赫鲁晓夫（当时刚刚失势）倒是根本没有个人崇拜，如果他有的话，他就不会垮台。谈话转向另一个话题。毛暗示，他认为他在位的时间不长了，这位72岁的领袖说，他快要去见马克思了。

斯诺后来曾对美国国务院中国观察员艾伦·怀廷承认说，当时毛和周对美国情况如此强烈的垂询颇使他感到困惑。他们两人都向斯诺提及他当年说过肯尼迪对华政策会有一个大的变化是如何的错误。虽然他们对他掌握的内幕情况有明显的怀疑，但仍然比以往更迫切地征询他的意见。这也许可以视为他们正在寻求打开美国的通道。但是，当斯诺问毛是否有信要向约翰逊总统转达时，毛说没有。毛认为关系的进展还需要时间，不要急。关于越南，毛注意到腊斯克说过，美国无意将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去；而中国方面，中国也无意越过国境去作战。毛还说，中国只是在

美国侵犯它时，才予以还击。当然，越南北方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周还告诉斯诺，如果美国不撤出越南，中国反对召开日内瓦会议。毛倒是说撤军不一定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毛送给斯诺带回美国的是中共的第一次官方声明：中国军队不会卷入越南战争。这个声明所针对的是美国一个广为传播的说法，即中国将深深地卷入越南事务之中，而且这个声明正是在美国政策有所松动之时发出的。在这以前的8月份，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一个关于东京湾事件的决议，授予约翰逊总统以合法权力，可以增加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但是，几个月后，在美国的总统大选中，约翰逊以主张和平的总统候选人面目出现，决定性地打败了具有疯狂的战争贩子形象的巴里·戈德华特。约翰逊保证不将美国青年送到亚洲战场上去。

斯诺相信，毛关于越南的谈话主要是针对美国人讲的，其次才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然而，通常的情况是，关于中国的新闻在美国人中是颇难处理的。斯诺曾告诉爱泼斯坦：他对毛的采访报道，被用显著位置登载在所有报刊上，“从英国到澳大利亚，在法国、意大利、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非洲、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等，世界各地，我想，除了苏联和美国”。他找了《纽约时报》两次，两次都失败了，又转而向《星期六晚邮报》探询。该报新上任的编辑，近几个月来曾发表社论主张与中国开展贸易活动，然而，该报也拒绝了。考虑到美国报纸如《纽约时报》在摘录外国出版物中刊登他的采访报道时有部分歪曲不实之处，斯诺授权他的代理人，可以将他的采访报道卖给《华盛顿邮报》，但不允许删节和转卖。但实际结果是，《华盛顿邮报》却将这两样结合起来，不但把这篇报道大大改写了，而且到处兜售。《华盛顿邮报》将这次毛对斯诺的接见谈话，改写成“两个老朋友之间的谈心”。斯诺由于仍希望他这篇毛接见的报道文章完整地在美国刊载出来，他又将它卖给了《新共和》周刊。斯诺决定不在美

国发表周恩来接见他的谈话记录，希望“这篇谈话记录只用出书的形式完整无缺地在美国出版”。但美国报纸却不受这一限制，他们从法国周刊《老实的新人》转载了周对他的谈话记录。

在斯诺这些谈话记录刊登的整个过程中，简直充满了矛盾和混乱。《纽约时报》全国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来告诉斯诺，该报因他索价过高，因而未要他的毛接见谈话的稿件。斯诺与该报第二次商谈时，又没有说明他不在手稿费的高低，只集中强调说明了该稿为什么特别重要。日本新闻界给斯诺找的麻烦是，《朝日新闻》将发表的日子提前了。只是在斯诺同意写出另一份补白材料，《朝日新闻》才同意中断刊登。德国的《明星》则埋怨它们刊登的日期晚于法国《老实的新人》4天。

但是，斯诺的通讯报道还是超越了电信往来上的遥远阻塞以及文化代理商办事上明显的随意不负责任等困难，而且，在另外的某些情况下，当斯诺所写的新闻报道在刊出上没有什么困难时，又有其他刊物转载他所写的东西，这应视为成功的标志。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纽约时报》对斯诺所写的报道评价甚高，“只要其他报刊登出来，《纽约时报》就予刊载并登在第一版上。”由于美国方面与中国直接打交道的只有斯诺一人，因而斯诺的记者业务活动增添了某些外交尺度的难点，这迫使斯诺在他的新闻报道上更加谨慎，必须保证不发生任何曲解误会之处。斯诺避开了《生活》杂志，因为他不相信这份刊物，虽然该刊对斯诺的中国之行所写的东西颇感兴趣。斯诺也拒绝了《新闻周刊》要买他摄下的有关毛的影片中的一个镜头作封面用。因为对这个镜头如何写标题称谓，周刊不给斯诺审核权。

“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你垄断的专利品了！”索尔兹伯里曾这样恭维祝贺过斯诺。专利品这个词，如果意味着是经济上大为发财的话，那就不大贴切了。斯诺曾发牢骚说，他的新闻报道在美国所赚的钱还不够付他打远洋电话的费用。单独采访独家新闻对

记者说来，可以为其创造一个黄金机会；但与一个明显的敌人的单线联系，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也无大用处。斯诺是无法与专栏作家如乔·艾尔索普之类相比的，他们可以促使约翰逊总统进一步扩大战火。

毛的谈话在2月发表，与此同时，在国务卿腊斯克的同意下，约翰逊总统下决心轰炸越南北方。约翰逊在解释他的政策时，谈及“中共深入的阴影”，他还看到了“老敌人的新面孔”，他不愿意象杜鲁门“丢失”中国一样，再“丢失”越南，因而他不愿暴露出他的弱点，哪怕它只是一小点。虽然他也希望缓和对他的好战政策的批评，但是“协商”这个字眼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大的让步。除非越南同意“无条件谈判”，否则他宁愿诉诸战争。约翰逊手中拿的这根橄榄枝，看起来却象是用来打击越南人的一根棍子。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走她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斯诺感到，毛对个人崇拜的评论还暗示了国内的紧张形势。当然，具体何所指，斯诺不知道。但斯诺告诉他的朋友们，从所有把毛捧得高高的人当中，也可以看出某些人却是想把他拉下马。此外，斯诺也对毛驾崩的临近有所疑虑。当然，斯诺也报道过，看不出毛有什么深感疲倦的迹象。毛的保健医师也声称，毛的健康状况良好。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讲话的含意也就越来越明白了。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与斯诺的谈话表明他内心真正关注的是国内的敌人，而不是国外的敌人。也许毛是为了迷惑他的对手，使其搞不清他的打算，才让中国新闻界公开发表了他对斯诺的谈话。

斯诺回到瑞士时已精疲力竭了。3月，他病倒并住进了伯尔尼医院。他实在力不从心，不能再应付一场春季巡回讲演了，这事只好打消。他打算集中精力写他的书《原子弹爆炸后的中国》以及剪辑他的一部记录影片，用的是他在30年代以及1960年和

1965年拍摄搜集的资料。对这部影片，格伦维尔·克拉克给予了慷慨的投资，这帮助他弥补了亏空。斯诺告诉他姐姐，他写这本书时不发愁费用了。这次他只打算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而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预付的稿费又是他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一笔，“所以，我尽可神泰安祥地写完这本书。”

事情并非如此。他没有在他预计的1960年12月写完这本书。因为他和麦克米伦公司对这本书包括哪些内容各自考虑不一样。麦克米伦公司要的是关于中国这场革命的一本权威性的巨著，而不是只包括已发表过的、斯诺最近几次采访报道的纸皮小册子。那部记录影片的剪辑工作比预期的进展得更慢，斯诺花了大量时间在伦敦与制片人打交道，费用也超过了他的预计。这部名叫《人类的四分之一》的片子在1966年末完成时，他是很不愉快的，这部长达74分钟，大部分为彩色的影片在最后编辑过程中却出现许多属于技术上混乱的电信号，这一点也使斯诺很生气。

在1966年夏揭幕的文化大革命，使所有一切事物变得更复杂起来。为了重建平等的革命精神，毛号召中国人“炮打司令部”。到11月末，有1000万红卫兵参加了北京的六次大集会。革命波及到全国，年轻人夺取了党的机构，向固有的权力挑战。问题较小的官员们要下乡去接触群众，这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很少有人赞成这种所谓的平等精神，相反倒是悲叹：在这无政府主义横行的几年间，种种指控凌辱，而同志式的爱却大大沦丧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人们究竟应该相信什么是很难掌握的。外界只知道刘少奇是1966年垮的台。但是，他于1969年死的情景却长达10年之久很少被人知晓。外界只知道在派别战斗中，那些城市被围困了，但搞不清这一派那一派的派别归属系统。虽然，狂暴的高潮时期是从1966年至1968年，后来毛也不得不号召军队来节制他发动起来的这一批洪水猛兽。但是，这些暴力行为

持续至70年代。1974年，根据一条中国的消息说，在成都的一场派战中，死了1500人。有那么一天，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会平静下来，那就似乎说明全国已恢复了秩序。1973年丁玲的一位朋友估计，她因为住在乡下，可能还好，而实际上，她是被单独囚禁在北京的一所监牢里（在农村时，红卫兵打了她，并烧毁了她的小说草稿。）60年代搞得稀里糊涂的美国新闻界，也多次报道毛已去世。

艾黎的一些信件为当时席卷中国的狂热和混乱情况提供了含糊不清的情景介绍。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艾黎告诉斯诺：“我们都支持毛主席”。1967年9月，他却写道：“工合”也成了一个靶子，因为“有时说‘工合’就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也成为一种时髦，因为它要控制中国的工业”。1968年9月，艾黎隐晦地告诉斯诺，他已无法给爱泼斯坦写信了。艾黎不知爱泼斯坦的下落（爱泼斯坦和他的妻子都被监禁了，他被关了4年半，罪名是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

斯诺的看法与许多其他局外人不同，他不认为是领导上动员红卫兵去越南参战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他认为这是1949年以来领导层的一次最大的危机，是爆发在老一代革命家和新一代政府精英之间的一场斗争。无论如何，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平衡。由于并不准确细致地了解这场变革，斯诺不打算修改他那部记录影片，也不打算继续将那本书写下去。他写信告诉艾黎：“事物变化得太多太快，而掌握的确切消息又太少。”1967年1月，格伦维尔·克拉克在死前不久告诉斯诺，他资助他拍《人类的四分之一》的钱，要斯诺不要担心还的问题。斯诺可以忘记那部片子的事，他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

对斯诺来说，注意力转移就意味着要想办法重返中国，但这种可能性不大。虽然，文化大革命重点关注的是国内形势，但也展示了一个排外的形象。红卫兵烧了英国和印尼的使馆，使其排

外情绪发挥到了极点。他们袭击了他们自己的外交部。有一段时期，只剩下黄华这个唯一的驻外大使了。他最后也被从他的开罗任上召回，去一个“五·七”干校锻炼一段时期。这种干校建立在乡下，是为了拯救一批腐败的官僚主义分子而设的。1966年夏，斯诺写信给龚澎，问他重返中国行不行，但没有接到回信。第二年初，斯诺写信给艾黎说：“正是这个时候，我应该呆在中国，因为了解它的过去的人，一定会与现实联系来澄清目下广为流行的对中国的种种误传。”斯诺后来给周恩来写信也未达目的，信中要求返回中国再拍一部份镜头，以充实他那部记录影片《人类的四分之一》。或者，中国方面能否送给他一些胶片资料。第二年，斯诺在一次颇有意义的旅行之后，来到香港停留。虽然，他知道他不能正式访华，但他想，他也许可以途经莫斯科回国时，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就是这也被拒绝了。深孚重望的中国通艾伦·怀廷告诉斯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还从未如此与西方隔绝过。

斯诺后来了解到，在中国他也是受到攻击的对象之一。一个流行的对他的指责说他是一个特务。斯诺写信给爱泼斯坦说：“很明显，我已得罪了某些有权势的人。我非常信任的一些人告诉我，某些能裁决这方面事务的人判定我已不再是中国的朋友了。这使我太悲哀了，这个消息如果可靠的话，我被如此判定和谴责却是以这样的流言诽谤为基础，那我倒要对过去的友谊予以重新估价了。不管怎么说，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都记录在案，谁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的写作也可能有不少错误，但它不是阿谀奉迎之作，它是一个诚实的独立的新闻记者在探求真理……。我不是那种随着风向标，见风使舵，轻易改变自己政治观点的那种作家。”

路透社的安东尼·格雷曾在他的中国所寓所被软禁两年，获释后曾写信给斯诺，提及中国方面没收了他的一本《今日红色中国》，并说该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友好”。中国官方还建议

格雷就此事可以写一篇新闻报道。为了不让这种批评广为传播，斯诺回信给格雷说，他对此建议深感吃惊。周恩来曾经说过，他认为该书“真实”，而且“评价甚高”。虽然，斯诺要格雷在他即将出版的书中不要使用这个材料，但这位英国记者仍将其作为一个生动的事例写进该书中了。

正如斯诺开玩笑地说：他自己写的书《原子弹爆炸后的中国》“由于我等待中国的动乱及越南战争有某种结局而搁置于未成品状态中”，就在这个时候，斯诺却变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在斯诺的1964年之行以前，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的版权中止了。格罗夫出版社予以再版。在1967年和1968年，斯诺比较空闲，他为格罗夫出版社修订了这本书。开始部份他只作了小的修改，后来有些章节，他都重写了，而且加了很长一部分，那是从他笔记本上摘下来的一些传记片断，费正清为该书写了序言。斯诺将这本书“献给格伦维尔·克拉克，他是那个时代伟大的人”。斯诺最后结束了与麦克米伦公司的契约关系，另与兰多姆出版公司签约，编一本《毛的文选》，该书终未完成，以及修订美国版《今日红色中国》，1970年予以再版。

斯诺继续为国外市场著作编撰，他在一个瑞士摄影师的帮助下，将《今日红色中国》中的一小部分编成一本关于中国的画册。他在欧洲新版了他的《今日红色中国》。他摄制的有关中国的记录影片在欧洲各地都放映了，这超出他的预料。1968年，斯诺在朝日出版社的赞助下，在日本作了两个月的旅行演说，他去了7个城市“采访和被采访”。他告诉他的哥哥霍华德，“……外国部长请我吃饭，我要学会吃日本饭菜”。他的讲演加上翻译，时间订为3小时。第一晚在东京，在2,500个座席的会场里，挤满了10,000名听众。影片《人类的四分之一》在日本电视上播放了两次。朝日出版社出版了斯诺的讲演和谈话集的精装本，斯诺还为该书写了结束语。

斯诺对文化大革命写得很少。在为《今日红色中国》的欧洲版写的序言中，他对这场大动乱作出了一些答复，也有意地提出了同样多的问题。他还为《新共和》周刊写了林彪和刘少奇的传略，将他们作为毛的接班人。林彪传略的内容主要是根据斯诺在1936年对林的一次长时间的采访。在《红星照耀中国》新版增加的一些人物记载中，斯诺暗示他颇为关注的是“毛分子”们所打击的一些忠诚干部——其中有：刘少奇和他的妻子，“战功显赫的英雄”外交部长陈毅以及吴晗，斯诺第一次认识他是在30年代，他当时是清华大学的讲师，后来他成为中共的干部以及剧本《海瑞罢官》的作者。这是一本描写因批评皇帝而被错误地罢了官的明代官员的剧本，该剧后来被说成是攻击毛罢了彭德怀的官。斯诺在30年代批评蒋介石的严厉的书刊审查制度，判定的罪名是影射攻击当局。斯诺现在指出，在中共领导下也同样有这种倾向，不过语气较缓和，没有那么直接了当。“这些文学作品，如吴晗的这个剧本等等在被‘毛分子们’批判之前，没有一个研究中国的西方专家们看出有什么影射现代的政治意义，像《伊索寓言》似的。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演绎罗织罪名的事实更使西方研究中国的专家们增加对中共的不满和误解了。”斯诺也在《红星照耀中国》的修订版上列出中共领导层的变化。他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名上都注上星号，他们都是“没有经过公开的党的正式手续而被逐出的”。

斯诺虽然没有发什么财，但还是挣够了维持家计的钱。除了一点版税收入外，斯诺没有其他年俸，也无其他积蓄。他两个十多岁的孩子都该上大学了。他认为他搞一些现金储备的可能性不大。他还向他的哥哥诉苦说，他刚搞了小小的一点投资，股票就跌价了。《商业周刊》称他为一个“年长的众所周知的左派记者”，斯诺也就诙谐地运用这个“年长”二字来描叙自己。朋友们如马丁·萨默斯等都相继谢世。斯诺常常要他的哥哥霍华德寄

一些药水来染他那已完全灰白了的头发。1969年，斯诺在64岁生日前几个星期，写信给他的哥哥说：“我们剩下的日子太短促了，实在令人心惊胆寒。”

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越南战局。斯诺写道：“我怀念20年代的美好时光，我们那时只管我们自己，自得其乐，没有现在这么多麻烦，如用炸弹开路来布道以及其他等等。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这么快变成了管别人事的上帝了。”

许多美国人认为越南和中国之间有某种联系，斯诺也是如此。但是，他们所理解的联系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美国人认为，北京与河内是一种伙伴关系，它与民族主义无关，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关系。而斯诺则认为主要是由于美国对中、越两国的政策而引起的相互联系。他说美国在重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付中国的错误，不承认民族主义的力量，或者说美国对民族主义的敌视态度导致这些国家都走向共产主义。而其间的区别——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差别——则是美国直接投入他们的军事力量以对付越南，使他们在越南不失去地盘，以避免在中国曾发生过的事情重演。约翰逊总统后来曾缅怀追忆说：“我认为从中共夺取政权之日起，哈里·杜鲁门和迪安·艾奇逊就丧失了他们的主动性。”

斯诺经常谈及越——中相连的一些问题。1965年年中，他写信给正在台开的美国讨论对华政策会议。他写道，美国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使用武力，同时却要中国“承认美国武装卷入这样一场战争的合法性……要求越南放弃使用武力推翻一个外国支持的独裁政权，同时却要求越南承认美国干涉并在越南使用武力是合法的。”

斯诺认为，这样一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美国人卷入愈深，脱身就愈困难。“也许这是美国对亚洲心理认识上的一个极为深刻的错误。它看不到任何一个外国如果攻击掠夺越南任何一块土地，那只会说使一个越南人公认的领袖把整个越南及其全体

人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爱国主义事业上，以反击人们看得非常清楚的唯一的外国侵略者。”

斯诺认为，最大的悲剧远在于，美国企图征服一场他们并不了解的运动，并运用先进技术和武器来摧毁他们公开主张承认的自决的价值观念。斯诺较早地向格伦维尔·克拉克总结了这个问题。克拉克曾就由一个全球联合会发表一项宣言号召世界裁军之事征求斯诺的意见，斯诺答复说：“我们不能这样设想，那些在我们国家里认为是真实的、合逻辑的、可行的”，在其他国家也会这样看。而且，一个全球联合会也许可以防止战争，但它不能阻遏人们反抗不能忍受的腐败政权的武装起义。斯诺不同意搞这样一个组织，因为“还存在着革命的问题”，它“不能为世界带来安宁”。

正为埃哈伯船长追捕一条名叫莫比·迪克的白鲸的故事（这是美国作家H·梅尔维尔的名著中的故事，这条白鲸后来吃掉埃哈伯的一条腿。——译注）一样，斯诺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美国人也在制造这样一个只会导致自己毁灭的故事。早在60年代初期，斯诺就曾预见并写道，美国既不能靠那些受过游击战训练的美国军队，也不能依赖“在这样贫困的土地上给一些廉价的小恩小惠，或为那些雇佣军搞一些什么改革等。”美国只有用支持土改和其他一些提高教育和健康水平的积极措施来竞争。他为《新共和》周刊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有一篇是这样写的，他同意沃尔特·李普曼所说：“我们是在为了避免承认失败而战，这一点是主要的。”

斯诺在个人札记中，概括他自己的心绪说：“越南问题日甚一日地窒息着我”。洛伊丝的许多封愤怒的信刊登在《先驱论坛报》巴黎版上，其中有一封这样说：报上头版刊登的狞笑着的美国士兵往吉普车蓬扔尸体的一张照片真使她“感到耻辱”。“请继续刊登这种照片吧！只要这种滥炸杀戮仍在进行，也让我们继

续受辱吧！”

斯诺在圣诞节日的札记中写道：“好呀！正为任何一个美国人在今年的圣诞节都会愉快一样，人们也都会为约翰逊总统以我们的名义在灾难深重的越南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针对约翰逊总统声称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谨慎的和颇为节制的”，斯诺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批评得最为尖锐，他的这篇批评文章《巴尔克森关于轰炸的法律》，登载在《哥伦比亚大学论坛》，这份反映校友意见的刊物上。他的这一讽刺手法是从D·诺思科特·帕金森那儿得到启示的。但是帕金森还带着某种幽默风趣，而斯诺却是在极度悲愤和失望中写出来的，那更象是乔纳森·斯威夫特在17世纪20年代为了解决土豆饥荒所提出的“温和建议”（斯威夫特认为，孩子们如果被用来作为有钱人的食品的话，他们就不会成为国家和他们父母的负担了），斯诺认为，限制性的，目标有所选择的轰炸，不可避免地要走向饱和轰炸。不管他们公开说得如何冠冕堂皇，聪明的领导人都懂得总是由人来作靶子的。“帕金森在这方面非常地明白无误：是人，而不是武器，在制造战争。越南共产党是什么呢？是人！人是从那里来的呢？他们是从小孩长大的。生这些小孩的又是什么呢？是女人！”斯诺说，上述逻辑推理就是要从士兵手册中删去禁止军人违反人道主义犯罪和战争犯罪等等的条款。斯诺还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这些帕金森的信徒们就是这样看法的。”

1966年春，斯诺去华盛顿时，拜会了美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富布赖特感到他与斯诺的几次见面彼此相处不错。他与斯诺年龄差不多大，生于密苏里州（虽然长在阿肯色州），他的母亲也象斯诺的父亲一样，对铅字有种特殊爱好，她办了一张周报。富布赖特也象斯诺一样，不修边幅。富布赖特还认为，他们两人都不是属于东部地区的。按参议员的标准要求，富布赖特是独立的，也是颇具胆略的。在引导总统有关1964

年东京湾事件的决定在参议院通过（对此，他颇为追悔）后，他越来越多地抨击目前的这种外交政策，“面临目前新的实际”，却仍紧紧地抱住共产主义威胁“这种古老的神话”不放。富布赖特将他与斯诺的会见视为他正在建筑的反对战争之墙的又一次添砖加瓦的机会。富布赖特还邀请他那位颇具声望、受人敬重的同事佐治亚洲的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参加他们的会见，和他们一起坐在他那宽大、光线暗淡、堆满各种书籍的办公室内。拉塞尔似乎对他支持越南战争的态度有所动摇。富布赖特告诉他的助手理查德·穆斯，只要他能说服拉塞尔反对总统，他就可以争取一大批参议员与他站在一起。

斯诺首先谈及中国问题，他不用鼓动煽惑之词，不动感情，不带偏见地呈述中国的前途，穆斯颇为动容。后来富布赖特却将他们讨论的话题引向越南。他要斯诺谈谈越南的领导集团。斯诺解释说，越南人已下定决心要统一他们的国家，并肃清西方影响。拉塞尔问能否找出一个合理方案来解决美国与河内的分歧。拉塞尔还说，否则，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就很难制止住那些轰炸的狂热分子们，他们将会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投下去”。

“我们的全部希望只能有一条，那就是光荣地撤退。”拉塞尔说。

“光荣？”斯诺回答时反问道。

“是，就这一点，光荣。”

斯诺停了一会儿，说：“不可能，我看不行。”

富布赖特后来说，斯诺“比我们哪一位领导人都接近于承认现实”。

1968年11月，美国人选举理查德·尼克松为总统。几天之后，北京电台在这几年中第一次广播提出中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举行谈判。悄悄地，几乎无人注意到，和解的种子开始植根于这两个国内都动乱不定的艰难的土地中。

对这一和解，双方各有其本身原因。毛清除了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后，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虽不像大跃进那样摧毁了中国经济，但它也没有得到发展。此外，中国的领导还担心苏联，随着他们摧垮了捷克有分离倾向的政府后，他们威胁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中苏边境，莫斯科屯兵一百余万，敌视的火花随时可以在那儿引爆。为了减轻来自外部的威胁，1969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也提到了“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随后不久，斯诺在《新共和》周刊上撰文说，“现在，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一两条缝了。”

美国也同样对其在世界的地位不那么有信心了。选举尼克松为总统，也就是说选民否决了破产的越南政策。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还没有过像这次越南战争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使幻想破灭。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问题，美国拖了很长时期后不得不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对美国人来说，原来辩论的问题，从打击红色共产党人转变到与他们和平共处；从信任美国政府转变到怀疑美国政府。这是那些反战分子非常冷酷地总结出来的变化。这些反战分子还赞扬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置根基层群众活力的范例。

上述这种转变的例证之一是美国人能接受《红星照耀中国》的修订本了。诺斯说：“美国沉睡了这么多年后”，这本书也终于畅销，“这明显地是由于那些开始探询扔了这么多炸弹究竟是为了谁的青年们，他们已开始进行政治上的考古研究了。”“美国人接受这本书几乎仍把它作为新出版的，而不认为它是再版。这本书导致了一连串的思考。虽然也曾不止一次地有人用“古老、经典”这种字眼来描叙过这本书，但具有现代心理的评论家们仍视这本书为反映“越出困境的道路”的一张跳板。一位加利福尼亚评论家也许用的就是斯诺的原话，这样写道：《红星照耀中国》给我们上的一课就是“战胜贫困、无知和不公正的计划，虽然也要花钱，但它却比用战争的办法便宜而优越”。一些热切期

望建立中美关系的中国青年学者称斯诺为“中国记者之王”。斯诺1967年在美国军事学院、圣母大学以及芝加哥外事委员会讲演。《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他在哈特福德（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译注）的讲话说，中共不会派部队去越南。1968年有750人来听他在堪萨斯大学的讲演，那儿离他的家乡不远。

1969年7月，斯诺写信给毛泽东，打听他能否通过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打开的一个小小的开放的口子去到中国。“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打算利用我与您过去的友谊来写这封信给您”，但是“……让我来与您重温旧谊，并让我亲自目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会有什么危害吗？”当斯诺在等候答复时，他遭受到一系列病痛的折磨，这些都是源于过去的宿疾。他因疟疾病倒了，这种病他已有几年未犯了。后又发烧到42度。在犯疟疾前所感到的过度疲乏，开始以为是心脏病所致，后来确诊为膀胱炎复发。斯诺追溯到30年代在北京从膀胱镜下取出肾结石时的故障。他取消了在美国的一次旅行巡回讲演。第二年春，他又动了切除肿瘤的两次手术，以后又经历了发烧等手术后的一些麻烦。

1970年6月，正当斯诺拟赴罗马参加一个电视节目时，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突然打电话给他，要马上会见他。他在罗马稍作停留后，即去巴黎，在那里他被通知可以和他的夫人一起去中国。斯诺婉拒了也拟提供给洛伊丝的费用。斯诺说他身体太差，不能马上成行。几周后他获得了意大利《时代》周刊（《生活》杂志的意大利版）的资助，还可以预支作为旅费，而且“还可以略多一点儿”，交换条件是斯诺提供六七篇非北美版权的文章。

中国方面仍然坚持称斯诺为历史学家，而尼克松当政时期的法规变更使得新闻记者和某些特殊行业从业人员去华旅行的护照可以自动生效，但是斯诺夫人洛伊丝仍需通过正常申请程序。她等了几年，访华仍未能成行，因而决心不让国务院挡她的道，不等它的批准了。他们夫妇于7月31日登上一架瑞士航空公司的

DC 8 型飞机启程。斯诺到达香港后十分疲倦，几天后因痼疾再度发作而住进了医院。直到 8 月 14 日，斯诺和洛伊丝才进入中国。他们乘空调火车，穿过一片绿色稻田去广州，从广州再飞北京。

文化大革命前，斯诺是留在中国的最后一个美国记者，现在又是他第一个回到中国。《华盛顿邮报》的中国观察家报道说，斯诺这次访华发出了一个信号，中国有兴趣与美国开展接触交往。美国驻香港的领事电告华盛顿，斯诺之行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好兆头”。

一群熟悉的朋友，其中有路易·艾黎和黄华，在北京机场上迎接斯诺和他的夫人。黄还是从五七干校请回来安排斯诺的访华之行的。斯诺心中有两个问题。他要求迎接他的人们给他一份这五年来他们经历的简况及其解释说明。两天后，他得到对后一问题的解答——这个答案他多少也是猜想得到的。

与朋友们在颐和园共进晚餐后，斯诺夫妇很突然地被带去见周恩来。这位总理正在主持一场乒乓球竞赛活动，在一间侧室内接见了斯诺。开始进行的是“家庭式的聊天”，周建议他去北戴河海滨避暑胜地休息，斯诺谢绝了。后来周很仔细地向斯诺问及美国的情况。当斯诺问到新的中美关系开始的契机时，周回答说他们请斯诺来就是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周承认，他们对苏联的威胁颇为关注。斯诺后来回忆说，仅就邀请他参加这场球赛活动这一点，也许会意味着“要给那些也在场的外交官们一个深刻的印象。”

不久，中国方面又给他一个更加明确的信号。斯诺在东北渡过了 9 月份的大半时日后，回到北京准备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21 周年的 10 月 1 日庆典。中国方面邀请斯诺和他的夫人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国领袖们在那里主持这一庆典。在这城楼下，成千上万的人手舞彩旗，驾驶彩车，游行通过北京这个主要的广场。使斯诺和他的夫人感到受宠若惊的是，他们的位置紧靠

城楼的中心，而不是远在边上。正当游行通过时，斯诺感到他的手臂被周恩来拉了一下，周领着他 and 洛伊丝通过贵宾的行列，来到站在庆典中心的毛泽东身边。

寒暄谈谐一阵以后，毛说他收到了斯诺问能否访华的信。

“该你埋怨发脾气的。现在你总算来了。”

“我发脾气了吗？”斯诺问道。

“是的，他是发脾气了。”毛回答说。毛说一群“极左分子”反对斯诺，也就是他们烧了英国大使馆，“现在他们都被清除了”。毛读过斯诺的文章，包括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批评，而且认为“这些评论都无可非议，我们并不要求你同意我们所作的任何事情，你有权保留你自己的看法。还是维持你的独立判断比较好。”

斯诺说，他认识到他在解释文化大革命上也有错误。正当游行队伍举着毛的塑像和毛的语录牌通过时，斯诺问：“下面的这些情景，你有何看法？”

毛说，比过去好一些了，但仍还不够满意。在斯诺停留在毛身边的几分钟时间内，毛还问到美国情况和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

在这次庆典活动后，在城楼上的一间房内，斯诺还和周恩来一起喝了茶。斯诺回到住所时，旅馆工作人员几乎将他们拥抱起来，他们刚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活动情景。斯诺和毛肩并肩的照片已登载在圣诞节那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上。斯诺被描述为“友好的”美国人士。

这一姿态是中美关系外交舞步中的一部分。在1970年初的大部分时日里，这还是为此神秘和复杂，因为要对舞的双方，谁都不清楚对方是否能跟着起步伴舞。1970年初，中美谈判在华沙恢复了。在这个地方，几年来中美会晤了一百多次，也没有什么结果。中国表示他们欢迎一个美国特使到北京来，这是对美国的一个提议作出的反映。但是，这第一步并无任何结果，因为当时尼克松已将战火扩大至柬埔寨，而美国的一些官僚们，很可能也包

括中国的官僚们，都仍在顽固地拒绝和解。双方也只是有些很小的动作，比如，7月，当斯诺由瑞士启程赴华访问期间，中国方面释放了一个美国战俘；美国方面则同意一家意大利公司向中国出售一批装配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发动机的自动卸货卡车。

中国领导层在与斯诺会谈中也反映了这种外交局面的不稳定状态。在斯诺与周恩来的第一次简短会谈中，周说中国方面由于柬埔寨问题，对尼克松主动的表示未能作出反映。在11月5日的会谈中，周承认中国方面愿意接待一位美国特使，但美国方面也没有反应。周还说，改善关系的门始终是打开的，但情况似乎是“尼克松并未认真对待”。一周后，他们这一会谈的文本发来时，斯诺发现周的谈话中关于尼克松并未认真对待那一段被删去了。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华期间，他从尼克松那儿捎来一个信息，美国重申他们对派特使访华感兴趣。

随后几周，双方又向前走出了几步。正如尼克松的特使、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后来透露得非常清楚的，对华盛顿新的主动表示，周作了肯定的响应。这一答复通过巴基斯坦大使于12月2日转到了华盛顿。12月16日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大使又传回了这样一个信息：不论台湾介入，美国希望安排一个日程表。正当尼克松等候对这一信息的答复时，他又收到中国方面另一个信息，说欢迎尼克松本人访华，这次是通过罗马尼亚大使。

当上述消息尚未透露时，12月18日清晨，一位中国官员叫醒了斯诺，说毛要见他。斯诺匆忙穿上一条便裤，披上一件毛线衫，及时赶到与毛共进早餐，而且一直呆到下午一点钟。在这次涉及范围很广的谈话中，像通常一样谈到对毛的个人崇拜，毛仍然是早些时候说过的那样，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满意。他说，到处的武斗和虐待俘虏破坏了革命精神。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双方已有多次信息往返，一个美国特使也许要来北京。他说，中国方面正在考虑美国人入境的办法。在这方面，毛说他很愉快地邀请

尼克松“作为一个旅游者来可以，作为一个总统来也行。”在结束谈话告辞前，斯诺提出爱泼斯坦的处境问题。毛说他不知道爱泼斯坦被囚禁，斯诺说他决不认为爱泼斯坦会不忠于中国。

斯诺周游了全中国，还参观了保安，他是1945年以后到这里来参观的唯一的外国人。他在10月1日节日观礼上还见到林彪，这也是1939年以来第一次。但是，他们未进行交谈，也许是这位军事领袖反对毛与周倡导的对西方开放政策。斯诺与孙夫人一起进过餐，与周则在许多场合见面，并进行过两次长谈。斯诺与夫人洛伊丝在10月1日庆典上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几星期后，斯诺还与这位流亡在国外的柬埔寨领导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交谈。斯诺认为，西哈努克智慧、勇敢、感情充沛。西哈努克说，尼克松轰炸柬埔寨导致柬埔寨产生了共产党。西哈努克送给斯诺一把银汤勺和一套烟具。11月，斯诺会见了一个加拿大代表团，代表团中的一个青年代表要斯诺用三个词概括他对中国的印象。斯诺的答复是：“稳定、和平、有生气。”

保安这个地方，斯诺在1936年参观时，还是一片穷困，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人，现在可以看到由于群众性的集体开垦计划人民得到的收益，河流两岸，树木成行，过去只有一家铺子的地方，现在成了一家有许多商店的街道了。以前这里没有工业，现在却有了13家手工作坊、一家机器修理厂和一家发电厂。在参观其他许多地方时，斯诺感到消费品较之1936年丰富多了，也便宜一些。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用西方标准来说，虽然仍然贫穷，但为“在革命前的中国组成中国农民大多数的那些没有土地，终年劳累，缺衣少食的文盲们”所提供的机会，远远“超过了他们过去所能梦想到的。”

在采访期间，各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和激动的心情常常在斯诺的心头翻滚。参观一个医院时，他采访了一个烧伤极为严重的病人，他的半边脸都被烧掉了。这个医院的宣传队连续几个星期都

陪伴着他。这个病人极端痛苦的情景和为使他活下来所尽到的人道主义的努力深深地打动了斯诺的心，他哭了。但是，斯诺在心里暗自思量，这个宣传队竭尽全力抢救，也许不是出于无私的目的，他们是为了毛和他们自己赢得荣誉。但是，他又想，不管他们这么作是为了什么，效果总是好的。

领导层在革命的年月里，虽享有爱情生活，但行为举止似乎是庄重的，而在全国过清教徒式生活的气氛也仍在增长。斯诺对他们服装一律，印象极深。“随处你都看到毛”——毛的像片挂在车内，立在公路旁，傍着水边河岸，粘贴在各个工厂商店的墙壁上。斯诺还认为，那些公社或工厂的领导总发表那种“千篇一律”的长篇大论实在让人腻味。斯诺在一个火车机车制造厂采访一个人时，他是这样说的：“毛主席救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爹亲娘亲也没有毛主席亲。”一个年长的人还说，他得益于思想改造，可与年青人竞赛。斯诺听到这个人报出他的年龄后，斯诺在他的书中写道，他是老了，“累了，也烦人了”。在西安，斯诺还编了一曲小调：“毛泽东是一个伟大著名的诗翁，他活着就是为了写东西让别人引用。”对这种现象，似乎无人觉得可笑。

在采访中，斯诺感到很费劲。有一次，一个钢厂的负责人讲出来的一些数字，加起来就对不上了。斯诺说：“数目字本身不会说谎，而是说谎者在报数字。”斯诺曾问过毛，那些最勤于引用他的语录的人，会不会可能就是最反对革命精神的人。斯诺通常是想了解另一方是如何看的，因而后来他也认为这种套话也不见得都不好，对一些工作人员来讲，能表达他们对自己的工厂、商店和农场的自豪心情，也还是一种新鲜事物。斯诺对城乡相互交流方面还是颇为欣赏的——赤脚医生为那些从未看过病的人提供某种医疗措施；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了解粮食来之不易。军队废除了军衔军阶。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要求自我批评但允诺宽

容——比斯大林发动的审讯和处决强。同时，他也和一个中国朋友争论，没有通过宪法程序撤掉刘少奇是否妥当。路易·艾黎后来回忆，斯诺“听到他所尊敬的一些老同志的遭遇和被处理的情况，深感痛心悲伤”。他认为，五七干校的生活条件太艰苦，太简陋原始，而且迫使家庭瓦解分离。斯诺还知道，爱泼斯坦不是唯一受到影响的外国人。艾黎的住处似乎更加破败凄凉，他和马海德两人还十分担心自己的中国亲属的安危。

如果说，斯诺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象有所了解，他也没有认识到它的问题存在的深度。他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太大，难于深入了解。他曾向一些老朋友，如黄华和其他人，问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总的伤亡人数。斯诺得到的答复倒还坦率，但不是关键性的。黄华告诉斯诺，他曾参加过设在湖北的五七干校，种过水稻，在汉水上装卸过船货。他告诉斯诺，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分到另外三个地方去了。他还说过文化大革命还是不错，是对思想的改造，这是大家普遍的一种抑制感情的说法。人们一再翻来复去地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事物”。再说其他就不太稳妥了。当斯诺最终离开中国时，他感到他与洛伊丝参观所到之处，他一直未能突破这种模式。

斯诺引用《艾丽斯奇遇记》来描述赞扬五七干校，这是不足为奇的。他是这样摘引的：艾丽斯说，“我不相信是那樣的。”白色皇后回答说，“你不相信？我敢说那是由于你缺乏实践经验。当我还是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经常是这样一天干它半小时。而且有时候，我仅仅在早餐前就可以相信这种不可能的事达6次之多。”因为斯诺无法鼓舞起他采访对象的热情，他只能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对让一些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专门人材去种水稻是否明智；表达了他的疑虑；还指出人们一般不会从失败者而只会从胜利者那儿听取意见；最后——自然也 and 通常一样——探索一下文化大革命的缘起。

洛伊丝很珍惜这次与丈夫一起研究、探讨中国的机会。在这以前，中国一直是她心目中最为关注而又遥远的主题。虽然在这次访问中，她自称是他的一个“伴侣秘书”，但她仍有自己的兴趣所在。她为她自己将写的第一本书《中国舞台》及其他文章搜集资料。洛伊丝也同样不害怕公开谈论她此行的感受。她不喜欢中国人在他们乘坐的官方轿车上挂上窗帘，这使得这些轿车象皇帝的重垂帷幕的御轿一样。洛伊丝坐车时总把窗帘拉开。她告诉她丈夫，她宁愿和大家一起坐小面包车，就象他们去北京郊外的长城和明陵时那样；而不愿坐在一长列官方小轿车里。她丈夫建议她向周恩来提出来，她也就向周认真地提出来了。周说他同意。问题是他们有许多小轿车，却只有三辆小面包车。

洛伊丝于12月20日离开中国，及时地赶回美国，与其女儿一起共度圣诞。她女儿是安蒂奥克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斯诺仍留在中国，继续进行研究，并等候周恩来再一次接见。他的计划几周后与洛伊丝在加利福尼亚会合。1月中旬，他与周作了彻夜长谈。为了等候这次会谈记要的正式文本和补充整理他的笔记，把时间拖下来了。斯诺原打算只在华停留3个月，但实际上，却呆了5个多月，直到1月底他还在中国。

斯诺感到自己作为“友好人士”的身份，包含有“善待此人”之意，这种境遇既具有某种幽默感，有时又让人感到某种腻味。当他和洛伊丝拟去寒风凛冽的西北访问时，周恩来一定要为他们定制大衣。斯诺过去在访问时，乐于借一件大衣来穿用。这次他却埋怨说：他各方面都被当作“贵宾待遇，一直要当到死”。他要求一切付费，每次都要经过斗争。有一次他去北京大学（以前的燕京大学）访问，有一位女干部致欢迎词，说他是“毛泽东的老朋友”，这一评价颇使斯诺生气，好象没有毛的批准，他就无法生存似的。

斯诺知道他在中美间负有传话调处的特殊使命，也无补于

事。当黄华通知他，他可能会见毛时；黄还加了一句，是毛要采访他，而不是他采访毛。斯诺在日记中写道，他无法给予“实质性的回答”。他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讲话；他回避权力。然而斯诺又这样写道：“但谁也不能完全回避权力的责任，我因一生未解决好这个矛盾，而感到非常不安。”

斯诺回绝了中国人让他留下来，在中国居住或从事写作的建议。他想，那会迫使他也参加这个行列。随着他在北京停留时间的延长，他愈感到自己也陷进去了。健康状况的恶化也加剧了他沉重的心情。这次旅行中，他已病了几次。一次是支气管炎严重发作，他咳血了。1月，因冬季特别干燥，加下室内太热，斯诺严重脱水，再加上其他医疗上的问题，他产生了小便困难。马海德要他看中医，他拒绝了。他不希望发生什么事使他再羁留在中国了。他还感到经济上要发生困难，他必须开始写些东西。他与在加利福尼亚的洛伊丝之间的通讯也发生了困难。他认为谁也不了解他。他向黄华抱怨他等候的时间太长——后来后悔他还因此提出过抗议。2月初，他等不及拿到与周的会谈纪要，就离开了中国。这份材料还是以后送到瑞士给他的。

香港新闻界迫切地要知道斯诺中国之行的各方面的信息。记者们到处追踪，使他见到他们时感到厌烦。香港《虎报》的一个记者这样写道：“开始时，斯诺对他的中国之行什么也不说，后来他被人提醒了，他也曾是一个年轻的记者，也会有过要采访那种不愿说话的人的经历。”当问到中美关系时，斯诺干净利落地回答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关系”。为了找一处躲避烦扰的安静之地，也检查一下他的身体状况，斯诺在香港的两天停留期间，还进了一趟医院。回到瑞士家中后，他感到十分疲惫，也有某种抑郁，对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也有所疑虑。他高兴的是，他儿子克里斯在家帮助他挡驾那些想采访他的记者们。

斯诺在瑞士从事写作的时候，令人迷惑的中美之间的外交剧仍在继续演出。尼克松谨慎小心，不想显得太急切，他没有对罗马尼亚人带来的邀请他亲自访华的信息作出反应，而是决定要等到中国方面同意他的会谈日程。尼克松取消到中国旅行的各种限制，是与南越在美国空军支援下攻入老挝同时发生的。3月初，斯诺写信给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他与戈麦文以前就有交往，麦戈文在下一届总统大选中，将与尼克松竞争。斯诺告诉麦戈文关于尼克松和北京接触的情况，并说麦戈文或许能在尼之前第一个访华。

斯诺在中国访问的时候，《纽约时报》要他对中国之行写一篇报道。虽然他在中国时，什么也没有为《纽约时报》写，但他认为，该报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是一个登载他与周恩来谈话及这位总理“门户开放”评论的理想地方。洛伊丝回瑞士的途中，在纽约停留了一下，确认了该报对刊载斯诺的采访仍有兴趣。斯诺发出了他的稿子。此后不久，在一天的清晨两点，《纽约时报》来了电话。斯诺由于有失眠毛病，刚刚吃了一片安眠药，正要睡去。该报编辑说，对不起，《纽约时报》不能用他那篇稿子，斯诺接听时，如堕五里雾中。斯诺曾承诺过，不对周的回答问题进行删节，当然也不是要他刊载所有的问和答。因此，斯诺坚持未获他的同意前，该报对他的报道不能任意编辑加工。该报编辑说他们报纸没有这么大的篇幅载完他的全文。《纽约时报》对想出一个办法来使斯诺的文章见报，似乎兴趣不大。

洛伊丝从未看到过丈夫发这么大的脾气。当他告诉洛伊丝这个电话的内容时，多年来他的报道、文章等等想与美国公众见面而总是受到种种阻难的愤怒一下子迸发出来了；他不停地在房内走来走去，并骂人。后来，洛伊丝回忆道：“这么多年，在华盛顿不被接受，不予承认不当作桥梁，也不予任何重视；这次是最后一次全面的否定。”“他所经历的一切就是：与迪安·腊斯克

屈辱的会见；当中国方面认为他是一个能给华盛顿带去基于实际的某些启示和某些思考时，而美国方面却任意地把他扔在一旁，置之不理。”

这次是斯诺与《纽约时报》的最后一次接触。他告诉他的经纪人，以后不要再与《纽约时报》打交道了。该报专栏曾拟采用洛伊丝写的一篇关于北京街道的报道文章，也被洛伊丝抽回了。后来，斯诺与周恩来的会谈纪要分成五部分，从3月开始在《新共和》周刊上连载。

4月初，中美外交关系发生了突变。中国方面发出了一份令人震惊的邀请。一个参加日本国际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可以访问中国。根据斯诺与中国方面达成的协议，斯诺可以分几次逐步使用他与毛的谈话记录，但不要直接引用毛的讲话。经过一段犹豫之后，他认为这个“乒乓外交”，正是他报道毛关于尼克松访华，“作为旅游者或作为总统”均欢迎的谈话的最好时机。尽管斯诺曾答应过不报道毛说及的中美之间有信息交往和美国可以派特使来北京等内容，但是，按新闻界的规矩，如果他能从另外的渠道获得同样的消息——这点他可以做到——那他还是可以报道的。斯诺找到《生活》杂志，《生活》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好机会，配合这篇报道，《生活》还登了21页照片，那是随美国乒乓球队一起访华的摄影师拍摄的。这本刊物，在1967年卢斯（《生活》杂志创始人——译注）死前，一直是极端反共的，这次也发表社论说，现在是改善中美关系的时候了。

对斯诺说明中美已逐步接近的清楚明白的文章，某些政府部门的反应却是“不予评论”。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虽了解双方秘密协商的情况，但他在公开场合却仍声明，他不太相信这件事，并说毛泽东对尼克松的邀请不是太认真的。

7月16日，谣言和猜测结束了。理查德·尼克松出现在电视上，他正式宣布：基辛格已秘密访问北京归来，中国方面邀请尼

克松访问北京。总统说，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消息宣布后的第二天上午，斯诺家的电话响个不停。美联社要发一篇评论，斯诺为美联社写的一篇刊登在《芝加哥论坛报》上，该报与斯诺也有宿怨。电视台也打电话来说要采访斯诺，他们派记者来日内瓦。《生活》杂志在7月份刊登了斯诺的第二篇文章，《生活》杂志的姊妹刊物《时代》在它的下一期，也刊登了该文的摘要。该文论及尼克松对其访华的应有估计。斯诺告诉艾黎：《纽约时报》配以整版广告来抬高这篇文章“给了我一点精神食粮”。“乒乓真了不起，现在美国也感到吃不透，吃不够了。”在两个月内，《红星照耀中国》新的纸皮本一下子卖出11,500册。

斯诺当然希望能报道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他打算在总统一行之前先期到达。他拟于2月中旬飞抵北京，而不与随行的一大群记者搅和在一起。4月份曾派专人乘飞机来夺取过斯诺文章的意大利《时代》周刊，要斯诺代表他们。《生活》杂志也要斯诺代表他们。当某些误会出现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时，《生活》杂志的代表经营编辑拉尔夫·格雷夫斯写了一封信给斯诺。格雷夫斯说，如果斯诺的经纪人确切说明他想要什么，“他可以毫无困难地为你办到，《生活》将不惜代价。”

斯诺的家有点像大使馆了。住在斯诺家附近的琼·耶格，卡尔·耶格的前妻来斯诺家帮忙接听电话；那些想访问中国的人的信也如雪片似地飞来。他们是记者、学医的学生、参议员，还有一个想写一本有关中国儿童书的人。有些人建议斯诺把中国的音乐家请到瑞士来；另外也有人愿与斯诺共事来安排美中体育交流事宜。斯诺想要在美国医疗组织之前为马海德安排一次巡回旅行讲学。对大多数咨询，他都用一封打印好的信来回答：他没有什么影响，无能为力。

1971年4月，乒乓外交开始以后，斯诺和洛伊丝作了一次意

大利海岸之游，为时两周，在那布勒斯港附近。然后，他们回到他们在埃辛斯的家，开始他们辛勤的写作，洛伊丝的一篇文章刊载在法国《世界报》的头版。紧接着，她就投入她那本书的初稿写作中。斯诺预计年底可以交出书稿，兰多姆出版公司打算利用尼克松访华的好时机及时地推出这本书。挚友玛丽·希思科特前来帮助。虽然斯诺迫切地希望往前赶，但却经常感到疲倦。10月初，这种疲倦感发展为剧痛。他在打字机前坐不到20分钟就感到背部痛得可怕。他追溯病源是腰部风湿痛，或者是关节炎。为了得到他所需要的休息，斯诺到摩洛哥作了10天的休假旅行。在那里，他躺在海边休息，一边阅读他和洛伊丝的书稿，并与他在海滨遇见的一个年轻人下棋玩。

斯诺回到家时，发现忘了带回书稿。不久以后，还是那位与他一起下棋的年轻人给他送来了。斯诺到家时，洛伊丝已卧病在床，她的身体状况也恶化了。医院诊断她患的是传染性肝炎，需要休息。斯诺想他老是感到疲倦，也可能是同一病因，于是不得不搬到洛伊丝的那间双床位病房中去作检查。斯诺觉得医院规矩繁琐，等检查结果也等得很不耐烦。一天早晨洛伊丝还没醒，他就突然离开了医院。但不久他就得知了检查结果，他的肝脏严重肿大，这是胰腺癌导致的结果。

12月，在瑞士洛桑，大夫们为斯诺动了4个小时的手术。他于圣诞节后不久离开了医院。大家在讨论如何让斯诺恢复健康，也许化疗有效。然而此时的斯诺，从他住的农舍走到附近的村子里都感到很困难了。斯诺不可能去中国报道尼克松之行了。

在尼克松宣布他访华之前，约·艾尔索普曾与斯诺有过不愉快的交往。斯诺和洛伊丝曾写信给《国际先驱论坛报》的编辑，批评艾尔索普使用第二手的夸张的材料报道中国五七干校的野蛮情况。斯诺说，五七干校也许不是克服官僚习气等的好办法，但他会见过许多从那儿毕业出来的人，他们身体都很好。艾尔索普

回答说，他在1941年去中国前曾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但他在抵达中国24小时后，就发现斯诺描绘的景象是错误的和“严重失实的”。斯诺教训了艾尔索普一顿说，艾尔索普所说是“在作某种自我暴露”：“没有一个新闻记者认为远在海外异域写的那种时髦的观察分析会有多少真理存在……我没有亲自去看过的话，就不会去写那种对外国形势的报道。”在回答时斯诺还写道：如果艾尔索普也遵守没有亲自看到的東西，就不作报道的话，他怎么能报道五七干校呢？

尼克松在1972年打开中国门户后，艾尔索普也访问了中国。进入中国后，他修正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如果对斯诺的看法还没有改变的话。艾尔索普从南京写回报道说：“真的，在中国任何事物都在变，只有那永远心情愉快，辛勤劳动而又聪明的中国人没有变。生活的意义也在变，过去是为统治阶级，现在是为每一个人。”大跃进最后留下来的东西，“根据我在中国的观察似乎就是要好好努力工作……同样，过去4年（文化大革命中）表面上的动乱，也被明显夸大了。”大约与此同时，艾尔索普打电话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哈里”，艾尔索普使用了索尔兹伯里并不喜欢的昵称，“只有你和我才是真正了解中国的人”。

理查德·尼克松说，当他和周恩来在北京握手时，“一个时代结束了，而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情况也似乎就是这样。长期以来，艾尔索普和与他类似的其他人对红色中国的恐惧，一夜之间消失了。50年代被鄙弃的老中国通们，现在又变成了英雄。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他的专栏文章中推荐约翰·佩顿·戴维斯作为第一任驻华大使的候选人（《民族》杂志选择了柯乐博）。埃德加·斯诺的文章也列入尼克松“需要仔细阅读”的呈阅摘要材料中，这同基辛格准备访华时一样。曾经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尼克松，准备与中共达成协议。正为一位历史学家

所指出的，这个协议“原则上维持了中国从1949年以来一直主张的立场”，这包括从台湾逐步撤出军事力量和承认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 在“上海公报”中，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声明是值得在此加以摘引的：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在斯诺活着的最后时日里，虽然证明斯诺主张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已是显而易见，确定无疑的了，但斯诺本人则仍有疑虑。

尼克松具有特殊的、可能改变的素质。他是一个共和党人，不象民主党人持有那种“失掉了”中国的偏见。他比他的前任们对世界的观察具有更敏锐、更新颖的看法。他懂得，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而是分裂的。亨利·基辛格持同样看法。当周恩来首先提出台湾问题一定会是谈判的焦点时，基辛格明白“这是一个标准程式”，他更明白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谈了。

然而，无论是尼克松，还是他的幕僚们，他们描绘的蓝图，都没有和过去完全决裂。尼克松在当选总统以前，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一篇庆贺文章《越战后的亚洲》中，勾画出在冷战条件下对亚洲的新政策。让中国进入大家庭中来；这是走向“认识到共产党中国现实和潜在的危险，采取既定的方针来面对这一危险”的第一步。这也是对苏联施加压力的一项策略。尼克松，这位最高的现实主义者，也许他所写文章中的观点是为了制定一项新的政策，而这项新政策是与美国的设想相符的。如果是这样的

话，则只能说明，美国向前迈了多么小的一步。

美国人对他们失败的越南政策并没有搞清楚；他们也不问一问他们打的这场战争其正义性究竟如何。如果他们真搞清楚了，他们这位比较讲实际的总统就早该从东南亚脱身，而不会再计较什么体面礼仪了。不但如此，尼克松还扩大这场冲突，继续轰炸，在柬埔寨搞什么“秘密战争”。在1971年1月巴黎和平协商期间，尼克松还大谈其“我们坚持光荣地获得和平，终于使光荣的和平成为可能”。为获得这个光荣的和平又添上了50万越南人和2万美国人的生命作为额外补偿，而其结局是这时的越南形势和尼克松当选的那天一模一样。战争结束了，和平示威者在白宫南侧的拉斐特广场（原文为Lafayette Pas反应为Lafayette Sguart之误。——译者）举行了庆祝胜利游行。他们谈论着似乎美国全面改革的这一天来到了。而实际上，尼克松所依靠的“沉默的大多数”却遭受了一场悲惨的失败。他们脱身的这场战争，只是由于代价太高，而他们却认为它还是正义的。他们是没有得到多大教训的。

斯诺的文章《越战后的亚洲》，刊载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于尼克松那篇文章后几个月之内。斯诺在这篇文章中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他说，和平的进程刚刚开始，似乎就要走向如同40年代中国的国共矛盾一样的结局。“双方一直打下去，一直打到美国的调处努力萎缩到仅仅只是空谈，打到最后面临共产党胜利的现实。”斯诺最后归纳说：“在河内和北京，人们可以看到合乎逻辑的预期，美国很快就会被迫无条件地撤出越南。”斯诺还告诉霍华德，尼克松所为造成了自胡佛以来对总统的最为敬重的信任危机。

中国人明确主张的自决原则，正是已经感到非常厌烦的美国人很愿意听到的，美国人并不想花费大量投资来保证别国去塑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美国对待发展中国的政策或多或少仍然是过

去那样,软弱和不那么重视。对美国人,也如同对中国人一样,呼吁自决原则的正确性就在于保持世界其他地区在一定的安全距离内。和解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共同努力降低彼此间的敌对情绪,其重要性仅次于双方建立关系,正如尼克松所说,推动他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要防止再派美国去亚洲作战。由于美中双方都面临领导继承上的危机,双方领导人都不忙于跳出他们自己挖成的陷阱——台湾。直到1979年,中美正式外交关系才建立起来。

美国人的观点和斯诺看法的交叉还只是表面上的,正如30年代曾有过的那样。虽然尼克松,这位现实主义者,比其他许多近期的政界领导人都更接近斯诺的观点。白宫也认为是斯诺,而不是其他人,能给予他们指导。尼克松说,斯诺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证实了我们所收到的有关中国兴趣所在的私下信号”,史学家们称之为“不容误会的信号”。但是,远在斯诺到达中国之前,尼克松就已下定决心要探索与中国的关系。即使没有斯诺这篇文章,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几年后亨利·基辛格的评论更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中国人“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敏感性,他们送出的信息(让斯诺与毛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是如此曲里拐弯,我们这些粗鲁的西方人竟完全没有理会而失之交臂”。

斯诺并未陷入过度的兴奋之中,悠长的令人沮丧的岁月教育他,对任何期盼都要留有余地。当约翰逊的总统职位开始动摇和他开始探求和平的可能性时,斯诺在堪萨斯城附近的讲演中,告诉他的听众们,想要有什么真正的变化,还需待以时日。1969年斯诺看到美国也许有回到让中国自决的考虑时,他提醒说,30年代时政府负责官员们也发表这样的声明,但并未付诸实际行动。斯诺说:“每一代人都注定要从亲身经历中学习,新的印记根本不可能遮盖基本的‘老的误会’。”

在他1970中国之行之前,他告诉欧文·拉铁摩尔,他是一直相信美国的“例外论”这一观点的,搞垮了其他一些大工业国家

的灾难美国都豁免了。斯诺说，麦卡锡没把美国“例外论”给完全毁了，而越南问题却整垮了它。“现在，美国数百万人民似乎觉醒了——虽然他们也不一定承认和想要推翻美帝国主义。”斯诺还说，至于他自己，曾是例外，“因当时仍被当局所欺蒙，所以能容忍于一时。”

斯诺的上述评论并不是一个想标新立异的人的表白，而是一个与他自己国家有巨大分歧的人所遭受到的苦恼的内心流露。斯诺在期待变革时，不能不认真地回顾他青年时代在密苏里州所获得的价值观念。尼克松的行动也无补于这一疏远隔膜的心态。

曾经帮助斯诺修订过《红星照耀中国》的特鲁迪·谢弗，在7月份尼克松刚刚宣布他即将访问北京之后，他与斯诺正共进晚餐。这时，响了一整天的电话铃声奇怪地在他们进餐时一直安静无声。他们吃完后，洛伊丝才发现，电话摘下来了。斯诺说，他们在吃饭时应该有一会儿安宁。

尼克松计划中的中国之行，10月份投票同意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这些都是朝正确方向走的几步，虽然不是全面的转变。斯诺对一个采访他的丹麦人说，对尼克松要访问中国，他起初也是惊异的，因为他对尼克松不得不从否定的方面看。他还想到美国将被过去对台湾的保证所困扰。美国WCBS电台采访斯诺时，他总结概括了他在中美关系上的心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尼克松的态度。他说：“先生，简而言之，也许与其任何变化也没有，还不如让尼克松先生口袋里装着台湾问题去访问中国为好。”

斯诺用另一种方式对他姐姐说：“现在‘他们’都给我写信或打电话，嗨！他们都要去中国，像通常一样去做生意。他们还有不少要学习了解的呀！”

1972年2月初的一天，斯诺感到病得特别难受，从华盛顿来了一封信，洛伊丝读给他听：

亲爱的斯诺先生：

我想要你知道，我一直在思念着你，也一直在为你的康复而祈祷。我知道，对你这么一位充满活力而又热情奔放的人，将会感到医院是如何狭小而又窒息啊！我只希望那会更促使你了解到你那卓越伟大的事业是如何广受尊敬和景仰。我永远祝福你。

你的诚挚的

理查德·尼克松

洛伊丝问斯诺是否要回信，他诙谐地笑着说：“不要麻烦了。”

斯诺在他的癌症动手术之前，还没来得及写完他的这本书，后来当他能工作时，他就与夫人一起在楼上卧室隔壁他的书房内写作。与斯诺在摄制《人类的四分之一》时合作过的一位朋友布兰森·奥卡西，这时也来协助他。实际上，斯诺也从来没有写完的时候。洛伊丝后来在玛丽·希思科特的协助下准备那本《漫长的革命》的出版事宜。她对她丈夫关于刘少奇会有个什么说法不敢肯定，而对在1971年9月乘飞机飞越蒙古时摔死的林彪，则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孙夫人曾劝斯诺对林之死的背景不要去猜测，“甚至他们内部的人也并不十分了然”。了解内幕的人告诉斯诺，林陷入一个反对毛的阴谋中，这一说法直到1972年7月才公开揭露出来。斯诺则认为这一斗争的高峰是在希望重建政府的人们如周恩来等和林彪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总政部之间进行的。斯诺在他的《漫长的革命》中没有提及林的消失，他对毛与周在1964年至1965年之间的采访记要（虽然在美国尚未全部发表）占了这本书中很大的份量。这本书中的某些章节特别简短，看来似乎是，斯诺如果将来有时间的话，一定会把材料加以充实的。

这本书似乎是针对正在掀起的一股中国热的浪潮，斯诺似乎在担心这样大的规模将引导至另一个错误的方向。虽然他强调他年轻时代刚从密苏里州出来时所认识的中国，现在已有多大变化，走得多远了。但他仍然比他1960年时要有更多的疑虑。他提醒说，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许经过多年仍理不清所有的线索，或者说对所发生的事态仍然揭示不出一个简明清晰的图式来。”他写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上最后的几句话，是他经验的概括，不但展望了中国的前景，也给美国人敲了警钟：

其危险在于，美国人也许认为中国人已抛弃了共产主义——和毛对世界的看法——变成了可亲的农民民主派。一个比较现实的前景确实已经在望。但是，如果大家都幻想这个前景是由各种思想甜蜜温柔地揉合在一起的，中国再也不使用革命的手段了，这就只会使将要到来的灾难更加深重，一旦这个幻想破灭时。……在国与国之间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对中国，如同对美国一样，是必要的，再要期望更多，就只会导致迷误。

斯诺在与死亡临近的现实搏斗。他在送给为他作手术的大夫的书上歪歪斜斜地题签：“献给拯救我的生命的人……”。孩子们也都回来了，西安从安条克（弗里吉亚古城，位于土耳其境内）归来，克里斯从英国回来，他正在那里读书。世界各地的朋友都聚集在他身旁，也只能为他的楼下房间里的壁炉添两块木材，再静静地溜出来，洛伊丝写信给马海德，请他为她丈夫动手术，马海德回信要斯诺到北京治疗。接着，周恩来及其他官员也向斯诺发出了同样邀请。1月24日，洛伊丝得知中国的一个医疗小组——4位医生，包括马海德，还有护士和一位麻醉师——将于当日到达，护送斯诺去中国。瑞士当局也没有坚持要斯诺办理

通常的签证手续。

中国方面对斯诺的关注是特别优厚的，中国在其国境外肯定还没有为其他美国人作过如此安排。斯诺虽然受宠若惊，但他不打算离去，他对周的邀请的答复是，他现在正在化疗的过程中，不能中断，而且他还要完成他那本书稿，他要与他的那些材料在一起。当3辆中国使馆的黑色轿车在斯诺的家门前刚一停下来，中国的医疗小组就发现现在已不是去北京的问题了。医疗小组在他们组内作了简短的讨论后，决定留下来，就在斯诺的埃辛斯村农舍中参加诊治。日后，洛伊丝·斯诺感激动情地在她的《庄严之死》里叙述了她丈夫弥留的最后时光，由于中国人为此关怀备至，使斯诺不需要再搬到医院里去，他就住在家里，生活在亲情和友谊之中。

2月初，黄华也来了，他受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任代表，在去纽约的途中经过这里。他随马海德来到斯诺的卧室。斯诺在惊喜中说道：“啊！我们三个老家伙！”不久，他就又昏迷过去了。

2月15日凌晨2时20分，埃德加·斯诺离开了人世。这天正是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在这之后62小时16分，尼克松的座机从安德鲁斯基地起飞，飞往北京。

第十章 会纠正错误吗？

尼克松总统及随行人员乘坐的飞机在北京着陆之前，中国人正在人民大会堂追悼埃德加·斯诺。在这座大会堂里为一个外国人举行追悼会，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向洛伊丝·斯诺发去了唁电。宋的家里保存有一张斯诺的两个孩子的照片，她在给洛伊丝的唁电中说：“埃德加·斯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对于斯诺过早地去世，《堪萨斯城明星报》发表社论指出：“埃德加·斯诺在他自己的国家里终于成了一位享有盛誉的预言家。”《纽约时报》称斯诺“有先见之明”，因为他在30年代曾预言日本的侵略将导致一场全面战争，在后来关于非殖民主义化以及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预言，都被以后的历史所证实。前不久还尖锐批评斯诺的《芝加哥论坛报》也发表文章说：“斯诺没有活到毛和周与尼克松总统所进行的历史性会面之后，为美国人报道他对毛和周的直接印象，真是太可惜了！”《新闻周刊》说：评论家们一直错把斯诺看作一个辩护者。斯诺通过勤奋报道的“艰苦方式……”，达到了“其他新闻记者不可超越的地位”；他“常常以同样的方式谴责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时代》周刊随声附和说：“斯诺对北京独裁主义者的暴行所作的批评，有时似乎调子太低。原因也许是，他把自己看作是改善北京

和华盛顿之间关系的促进者……无论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美国人。”美国人沉浸在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的幸福感中，只有由种族主义者杰拉尔德·L·K·史密斯创办的极右报刊《十字架》月刊和《旗帜》周刊发出了微弱的批评。

斯诺的存在使随同尼克松访华的87名新闻记者相形见绌。他们中间，没有几个人对那个国家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知识。《底特律新闻》负责报道白宫新闻的杰拉尔德·F·特尔·霍斯特说：“坦白地说，在报道华盛顿和国家政策方面，我们的对外政策与美国政治中的红色中国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你必须作的就是，记住每一位总统都是反对红色中国的，他们解决了许多政治问题和澄清了新闻界的许多疑问。”在动身去中国之前，记者们阅读了斯诺的著作，这些著作是在华盛顿特区五月花饭店举行的行前情况简介会上由中国问题专家推荐的。但是，没有对每个记者进行充分的训练，这次采访以失败告终。从中国返回后，许多人所诉说的遭遇与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广播记者约翰·钱塞勒一样：他们一生中从未如此努力地工作过，但他们的大部分活动还是被限制在“那些在华盛顿的拉斐特广场或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正对面工作的人所编排的电影剧本”之中。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工作会谈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特尔·霍斯特就连对毛的住宅的方位的描述也无法得到。基辛格的一名工作人员让他使用斯诺书中的描述。《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则依靠斯诺描述旧上海时的“敏锐的……目光”。

记者和编辑们回国后，对在此行间写就的报道的肤浅感到惋惜。他们虽然没有斯诺所具备的洞察力，但其中许多人也感受到了这位先行者在早年的访华旅途中所经历过的忧虑。《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查尔斯·贝利后来写道：新闻工作者们“发现他们自己正在扮演一个不习惯的角色；它是……整个外交进程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这个进程的观察者。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角

色。”

在中美恢复友好关系后的几个月里，洛伊丝·斯诺一直在为她的家庭问题牵涉进国际事务中而感到烦恼：她丈夫的骨灰安放在何地。这个决定将给斯诺的一生作出结论，可是他的一生不仅涉及许多国家和历史事件，而且也深深地蒙受了社会的误解，洛伊丝不希望这种误解再继续下去了。她征求了孩子们的意见，女儿给了她一个极微妙的答复。西安·斯诺在回信中写道：“爸爸或许引用过一条合适的马克·吐温语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她懂得，难办的是尽管她父亲“热爱密苏里和密西西比河”，但是在美国设一处传统的墓地似乎是不适宜的。她父亲也热爱中国，但是“我知道他对受到款待和给予特权感到多么不自在，他多么想首先作为一个普通人而活着。他不想要任何恩惠，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因为那可能使他的作品蒙羞。”

到了1973年的夏天，斯诺去世一年多之后，问题解决了。洛伊丝找到了她丈夫杂夹在书信稿件中的一张字条。斯诺在上面写道：“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象活着时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一部分被安放在哈得孙河畔，在它汇入大西洋流到欧洲和人类的所有滨岸之前，我感到我是人类的一员，因为我见过几乎每块大陆上值得尊敬的人。”

中国人提议把斯诺的骨灰安放在埋葬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国家革命烈士陵园（即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译注），洛伊丝不同意。她认为，她的丈夫既不是革命英雄，也不是烈士。依照她的请求，斯诺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那里是旧日的燕京，斯诺教过书的地方。地点于1973年10月选定，位于湖畔人们常走的小路旁。周恩来草拟和书写了简短的中文碑文，在白色大理石纪念碑上，用英文和中文刻着：“纪念埃德加·斯诺，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1905—1972年”。

第二年春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由斯诺的家人、朋友和仰慕者们组成的另一个小组，把斯诺的另一半骨灰安放在纽约斯内登斯渡口的萨姆·津巴利斯特的院子内（据洛伊丝·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前言》，他是斯诺夫妇的一位朋友；此处位于哈得孙河畔。——译注），旁边是一座陡峭的山崖。在一块刻着E. S.（埃德加·斯诺英文姓名的第一字母——译注）的小花岗岩石板的周围，他们种植了一株山茶花，这是密苏里的州树，也是斯诺所喜爱的树。

埃德加·斯诺的报道比他本人长寿。他去世前，《生活》杂志曾委托他，一旦毛泽东去世，立即写一本毛的传记。当毛于1976年去世时，由于《生活》杂志的停刊，《时代》周刊出版了斯诺对这位中国领袖的卓越的总结：他“能同时运用时间和空间、策略、正确和错误这些相互矛盾着的概念；他能用行动表达出合乎现实情况的判断，似乎这才是唯一的真理，因为他始终知道对立面是真理的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当人们猜测邓小平很可能是毛的接班人时，记者们都期待斯诺提供背景材料。斯诺曾于1936年在去保安途中采访过邓。

《红星照耀中国》是80年代中期已经用英文出版的斯诺所写的四本书中的一本，在它写成之后50年，仍然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入门书。美国国务院把这本书列为有用的背景读物。世界银行总裁A·W·克劳森在首次访华途中，要求自己翻阅《红星照耀中国》结尾部分的中国领导人的传记。黑人激进主义者安杰拉·戴维斯在被监禁期间，发现这本书是在“备有最无聊的书籍”的监狱图书馆里少量图书中的一本。在菲律宾，一名美国和平队队员偶然见到了这本书，便发现自己被吸引住了。她认为，这本书不是谈论共产主义的，而是“关于人民正在做的事情”。1978年，中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新版本，到1982年，已经售出了165万册。甚至斯诺在《活的中国》中使用过鲁迅一张照片这样

简单的事情，也仍旧有重大的意义。这张照片被放得非常大，悬挂在上海一条短小里弄的尽头那所鲁迅的欧式住宅中。向导们都很热衷于主动讲述斯诺与这张照片的关系。

在人们给予斯诺的过时的认可中有他应得的赞扬，但这决不是他的胜利。斯诺重新开始受到的欢迎，与他非常讨厌的在对毛和其他人的个人崇拜中的那种美化逐渐接近。中国人把斯诺与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提，成立了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他们简称这个研究会为三S研究会。他们发行了一枚纪念斯诺的邮票，把他的像片和1936他给毛的一顶红军军帽放在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陈列。在美国，密苏里一堪萨斯城大学于1983年授于斯诺名誉博士称号。这所大学开始进行“埃德加·斯诺聘问教授”活动，合作收集斯诺的有关资料。不久，这些资料就堆满了校园内一所楼房的顶层。斯诺的名字和形象被用于划分政治观点。在一般情况下，注重庆祝活动的中国人，每年都举行精心筹备的仪式纪念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签订10周年。1982年，里根政府打算向台湾出售喷气式战斗机和武器装备一事激怒了中国人，美联社注意到，中国领导人把精力改用于纪念斯诺逝世。

追求保持独立自主的斯诺，却成了他人所使用的符号。他死后许多年了，可他一生中每个关键时刻都出现的问题依然存在：美国理解他和他的作品吗？他们是否认识到，他们对斯诺态度的转变喻示着他们自己无力理解20世纪世界上各种力量的自由发展？

从密苏里少年到世界公民，斯诺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程。他不仅亲眼目睹了这些年来发展中的历史（无论是甘地被刺杀时那个激动人心的片刻，还是亚洲发生革命的长期过程），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卷入了大多数重大的历史事件。1928年他离开美国时，对于这个国家和它的社会道德准则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只有

不清晰的政治理论和经验。亚洲使他接受了实际的教育。其他人报道这个地区的商业、政府或宗教，而斯诺的研究方式不同。斯诺绝不因职业而作任何让步，他甚至不让自己受任何一家新闻机构的约束。通过自己所希望的自由探索，他逐渐明白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要走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像帝国主义一样，对于崇尚独立和经济自由的积极的美国社会道德标准，是一种邪恶的扼杀。因为如此以及他的天生的宽容，斯诺培养了自己对他人如何看待世界的理解力。

斯诺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国人。美国对于彻底的革命变革没有真正的经验。18世纪领导独立战争的美国人，并非寻求改变社会制度。而仅仅是要使社会制度中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得到确认。美国传统的形成，是暴力变革的结果。美国人虽然对向海外政治扩张仍然感到不自在，可他们并非热衷于摧毁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亚洲和非洲所建立的稳定秩序。正如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于1930年所指出的，美国人在要自由还是要帝国统治的问题上煞费苦心，而一旦他们获得了前者，便自然而然地发现后者更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在美国人的语言熏染下长大的斯诺，却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被教育成为向往激动人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又没有既得利益需要保护的人。他成了一个真心追求革命的美国人。

斯诺童年时代的朋友查尔斯·怀特博士说过这样一句话：埃迪·斯诺“象我们大家一样长大。他只是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20年代中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最终升到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在斯诺去世后会见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罗伊·费希尔，“我们希望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都能像埃德加·斯诺那样”，薄说，他赞成这所新闻学院重新开始关注中国事务。

中国共产党的记者不久就会发现，要超过斯诺是不可能的。新闻机构意味着为党服务，而不是抑制它的权力。而斯诺则尽可

能为美国人提供了更多的教益，即使他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已经消失。

对把自己的行为幻想成理查德·哈利伯顿的浪漫航行的美国人来说，世界已经同过去不一样了。像斯诺一样的小伙子和像他的第一个夫人佩格那样的姑娘，会从容不迫地跳上轮船，躲在船舱里偷渡，受雇当甲板水手或是作买了船票的乘客。美国人的冒险带有一种自信感，即使美国煞费苦心企图实现其在全球的影响力，它还没有犯下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列强长期以来所犯的罪行。它也不像日本人那样野蛮。血腥的越南战争今后将会持续半个世纪（美国于1973年被迫从越南撤出全部美军。——译注）。

居住在各通商口岸（对帝国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可喜的产物）的花费是低廉的，而付给自由撰稿人文章的稿酬则比较高。刊登文章的报刊激增。报纸合并的过程还没有开始，然而这个过程将使关心国际事物的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接受它的挑战。杂志如《星期六晚邮报》、《亚洲》双月刊、《柯里尔》双周刊、《文摘》、《星期六评论》、《生活》和《展望》，也注定要消失，转而企求分析和预测外国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的文章。斯诺所厌恶和企图避开的大公司的世界，在新闻界才刚刚起步。在今后的时代里，每个新闻记者象其他行业的职工一样，不得不认真考虑没有一张公司健康保险单的生涯的各种风险。斯诺具有一种非凡的独立倾向。但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依靠自己的机智生活得愉快和自由比现今更为容易。

同样，令人兴奋的革命年代事实上也已经过去了。在本世纪的前半段，民族独立运动在世界各地显著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间，这些运动成功地创建了这么多新的“第三世界”国家，使联合国的成员国增加了两倍。随后，独立进入了一个新的

复杂的发展阶段，其标志即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统一。

斯诺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密切联系，肯定将仍然是举世无双的。他对国民党的某些怨言，也适用于共产党。1986年12月，大学生在几座城市的街道上游行。虽然大学生游行的原因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爱国抗日学生不尽相同，然而，30年代和80年代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效果不同。共产党政府控制住了局面。共产党人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以国民党人所不曾用过的方式，在人民大众中间建立了基础，他们不仅更有效地指导新闻报道，而且更有效地控制住了他们自己的市民以及外国记者。1986年，《纽约时报》记者约翰·伯恩斯和两个朋友一道骑摩托车沿乡间便道游历，这些便道实际上是华北地区内外国记者的禁入地区。这三个人沿着斯诺当年用了50天才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到达保安的路线，行驶了几百英里。在斯诺曾经成功的地方，伯恩斯却失败了。中国当局逮捕了伯恩斯，说他是间谍，并把他驱逐出了这个国家。

斯诺是他那个时代的男子汉，他所热情关注的现代大事件塑造了他。他讨厌统治着国家的伟大领导人的观念，但事实上，那些似乎是变革先驱的超群人物如毛泽东、富兰克林·罗斯福却吸引住了他。在他的成年时期，主要敌人法西斯主义朦胧出现的时候，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贫穷和压迫的必然回答。尽管斯诺逐渐看到斯大林“用皮鞭”维持其暴虐的统治，但他仍然信仰社会主义，认为它是有希望的。在《复始之旅》中，他特别提到：“仅仅是俄国社会主义没有立即使人类精神得到解放这个事实，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意大利、日本、德国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必然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注定消失。”斯诺早期的导师和密苏里同乡密勒和J·B·鲍威尔转变成为了国民党早期的支持者，而斯诺却逐渐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期望。

而且，斯诺超越了他的时代。

对于所从事的事业，斯诺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曾对一个向他提问的中国人说：“我的看法是，如果作品最终对人类的知识作出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贡献，那它就有存在的理由；我还认为，不去报道穷人和被压迫者所感兴趣的事，就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斯诺又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有一段论述阐释了理解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兴趣事实上的重要性，这段论述埋在《复始之旅》的文字中。他在回顾自己在通商口岸渡过的岁月时指出，许多在海外的美国人强调他们自己的“硬兴趣”而排斥所有其他人。“努力发现其他人民的“软兴趣”真正是什么，他们如何感觉和认识他们自己的问题和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使命，如果我们能明白历史的发展，正朝着我们称之为妥协，而不是和平的方向的话。”斯诺证明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并非是不可调和的。人民的饮食情况和他们对获得独立的重视程度，成为斯诺用以预测历史的晴雨表。

斯诺对中国人的异常亲善，进而得以洞察他们的思想，都是出于他的人道主义。一个曾为《活的中国》提供过一个小故事的中国人，回忆在编译这本集子（《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于1936年秋在英国伦敦由乔治·G·哈拉普公司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及编译经过，参见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的《纪念埃德加·斯诺》第307至333页张小鼎文：《斯诺与鲁迅——兼谈〈活的中国〉编译经过》。上述“中国人”，指与斯诺合译该书部分内容的萧乾。——译注）过程中斯诺的谦虚态度时说：“那时，大多数外国人对我们就象是能为他们产奶的牛，而斯诺把我们看作为事业与他合作的平等的伙伴。”

无论斯诺同情什么，他首先是一名记者。许多参观者到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为了寻找乌托邦，而斯诺却是带着冷静的问题

题来的。在60年代，如果他能为反击美国歌斯底里的否定中国的宣传而抑制住自己的怀疑态度的话，他就不至于落入这众多的朴素心灵所设置的陷阱。其他人根据他们所受到的特殊对待判断这个国家，而斯诺却鄙视特权。在他写作最后一本书的前后，他试图部分回绝好客的中国人再次向他表示的好意，以避免从一开始就使这次采访的结果表面化，这是意味深长的。对那些不肯放弃教条的人，他几乎没有耐心。《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他与阿夏蒂克斯以及其他左派人士的争论，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可能成为不效仿苏联政策的社会革命家，不理解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比意识形态的纯洁更为重要。尽管斯诺讨厌英帝国主义，但他仍极力劝说甘地为了加强抗日力量而迁就它。中国共产党人有充分的理由说他是一个可靠的记者，但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解释者。斯诺的独立性太强了。

斯诺的许多见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认为是叛逆，而今天看来，如同他最初表述时一样有价值。他明智地主张说，唯一切合实际的苏联政策是发现和利用双方的共同兴趣，而不是依仗军事上的优势去压服对方的妄想。虽然斯诺的这一主张至今没有被广泛接受，但他的看法为人们找到了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新”战略。斯诺也明白，军事力量并非是战胜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的答案，答案是与第三世界所要求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一致的扶持政策。他理解发展中国家不满的内在的原因。例如，斯诺于40年代就注意到，土地改革是阻止菲律宾国内暴动的必要前提。1987年7月，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宣布：“今天，由于国家的土地改革问题，我们正处于被分裂的危险之中。”对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斯诺的理解也同样深刻。

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独立战争之后，“美国人可能已经制定了几乎所有的法规”。无法律限制的空间实际上是无限的资源，又没有什么惯例约束，使美国人有了耍花招的天地。轻易地

达成了各种妥协方案。相比之下，中国却经常似乎象一个没有政府管理的国度。急剧增长的人口压在业已大大超过限度开采的资源之上。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成就已经变成了负担。毛和邓小平，通常被视为与众不同的人，同样面临着如何克服拖累当代中国发展的官僚主义传统的问题。

斯诺从他早年在中国经历的有利地位出发，确认1949年后共产主义的进程是伟大的。由于他看到共产党人已经坚持了这么久，有时便夸大说他们会在多么近的将来取得成就。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夕，尽管这场运动后来削弱了中国的教育体制，但斯诺却错误地预言，到1986年，“中国的青年们在科学教育、文化和身体素质方面所达到的平均水平几乎不会低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使如此，斯诺也准确地强调说，中国是一个穷国，尽管它没有放弃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标，但它的进程尚不能确定。他理解存在于毛所谓农民“想成为资本家的自发的欲望”，与这个社会制度要保证公平的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后者是共产党人合法性的核心。斯诺写道：“道路是漫长的，又是艰难的，它必然包括各个阶段。文化革命将会多次发生。”

与许多美国人相比，斯诺的出众之处在于，他确认美国享有外国所无法搬用的特殊有利条件。他认为，其他国家既不能照搬美国，也不应仿效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找到它们自己的路。但是，对真理并不只存在于河的一岸的信念，正如斯诺喜欢说的，并不妨碍他相信美国在另一方面的优势。使美国得以崛起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认为，也应当产生一个比其他民族更宽容、更高尚的民族。虽然他报怨自己未能打动美国社会采取更为开明的政策，更不必说事实了，但他总是如同能产生重要结果一样去写作。别人都明智地让批评和错误的说法自行消逝，而斯诺却在给编辑的废弃的信中费力，以保持记录的正确，这常常招致

了更多的麻烦。与斯诺同时代的作家项美丽注意到：“或许他的认真是不可救药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诺去世后的许多年间，美国人，比如《堪萨斯城明星报》1979年所作的那样，有时也谈论要纠正“敌视一位勇敢的作家的错误，他想要的是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中国都是最适合的——和平和友谊，”但斯诺的许多想法的确跟这个国家的步调不一致。美国人总是抬高他们自己而不对别人表现出宽容。他们似乎非常怀恋先前的时代，那时美国能够把它自己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在必要的时候，又能够有力地把自已的意志强加给别人。领导者们哀叹两党一致支持的外交政策使人感到困惑，而不去回忆战后是如何错误地指导了异口同声的反共合唱的。美国人依旧把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视为贫穷、落后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阴暗的集团。美国的领导者们不是现实地评估第三世界的希望和意愿，以及他们的进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可能对美国产生的冲击力，而是认为“南方”，就象这些国家常被称呼的那样，是一个东西方的战场。

对共产党中国的幻想落入了旧日巢臼。斯诺去世前不久曾告诫说，重提过去的农民改革的神话是危险的，这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热情，在毛的接班人邓小平在这个国家里寻求自由企业家的力量时，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关于新的改革的报道，淹没了中国没有改变的那些方面的信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中国正在把毛主席的语录换成亚当·斯密关于自由市场的格言。象以往那样，美国人热切期望他们的朋友也变得和他们自己一样，因此，他们经常看不到表明这个政府继续控制着智力和经济方面活动的细微迹象。邓所强调的，中国的社会制度“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更好”，和“我们决不能听任我们的年轻一代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所表明迹象就更看不到了。极端反共的罗纳德·里根总统

承认，在他1984年访华之前，没有多少时间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而他所说的，去“所谓共产党中国”的北京途中，实际上与40年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帕特里克·赫尔利所使用的是同一个字眼。

斯诺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但美国还不得不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考验。它业已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和令人羡慕的公民自由，尽管50年代曾发生过“红色恐怖”那样怪诞的事件。然而，它是否能够学会帮助别人成功，并通过使其他国家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来实现它的理想？美国人是否能够逐渐理解其他国家的看法，预料它们的行动，同它们一起工作？或许美国人只会通过他们自己希望和顾虑的棱镜看待这个世界，并试图笨拙地将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假如美国人不可能追溯斯诺所经历过的漫长历程，那他们能够开始学习，象斯诺那样，看到更多的东西吗？

译 后 记

53年前，在北京的一所四合院里，一位美国记者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本书，轰动了美国朝野，风靡了全世界，启蒙了无数中国青年。这本书，和另一个美国人赛珍珠写的《大地》一书齐名，几十年来，一直被美国人看作是关于中国的两本最权威的著作之一，是了解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读书。这本书，在中国的译名为《西行漫记》，是埃德加·斯诺为中国共产党作的“传”。

他在30年代冲破重重封锁，来到那片鲜为人知的中国贫瘠的西北高原上，发现了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璀璨的“红星”。他的真实报道以及他那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高瞻远瞩的预见，使大洋两岸为之震惊！美国人推崇他为“真正的男子汉”、“我们时代的英雄”。这位31岁的美国记者因此而一举成名。

埃德加·斯诺这个名字，在我攻读新闻硕士学位之前很久便已熟识，对其人其事似乎也已知晓。如今认真想来，不免惭愧，自己对这位彪炳千秋的先驱者的了解，竟是那般粗浅和有限。是30年代的《西行漫记》，还是70年代他作为与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个美国人？或许以往只知道这些。那么，是何等“神力”，使他从当时美国及西方驻华的诸多记者之中出类拔萃、脱颖而出？撰写《西行漫记》之前，是什么动力促使他一定

要远渡重洋来中国“探险”？撰写《西行漫记》之后，在他那极富开拓性和戏剧性的记者生涯中，他又先后闯荡过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的哪十几个国家，目睹了哪些惊心动魄的大事变？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几个不同时期，走遍了中国大地，最后为什么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三晤罗斯福、五会毛泽东，与甘地、尼赫鲁、肖伯纳、白劳德、李维诺夫、伊本·沙特、德莱塞等世界名人是如何交往的？他从周恩来、邓颖超、博古、项英、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们身上看到了什么？他与同时代的“中国通”们为什么关系如此密切，比如密勒、鲍威尔、史沫特莱、斯特朗、马海德、路易·艾黎、艾泼斯坦、谢伟思、费正清、索尔兹伯里……还有，他对国民党的政要们进行了剖析，他先后写出了11本书……

这本《埃德加·斯诺传》，把上面这些全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还远不止这些。通过翻译本书，我终于补上了一课。

本书作者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博士，像许多正直、博学的美国人一样，从年轻时起就景仰斯诺的辉煌业绩。他早年曾担任《密尔沃基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到过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许多地方，并数度访问过中国，与斯诺有着类似的经历。卡特执政时期，他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此后，又当过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和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美国文化学”博士学位，他的第一本著作《功利主义的美国与第三世界》，探讨了致使诸多发展中国家形成美国生活方式的大事变。70年代初，斯诺的逝世及随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他下决心为这位铺设中美相互理解桥梁的先驱立传，并以此推动美国对斯诺的研究。此后，他遍读了几乎所有斯诺的作品及有关评论、介绍和研究文献，采访了许多斯诺生前的亲朋故旧，获得了大量书信及其他第一手资料，研究采访工作进行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终于完成了这部力作。

正因为作者具有大量第一手材料，才使我们得以读到对斯诺从孩提直至长眠瑞士毕生最完整、准确、翔实的记载；才使我们得以领略斯诺偷乘海轮来东方时的坦然，与作为贵宾访华时的忐忑；才使我们得以体味斯诺这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在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前后心绪上所产生的种种波动；才使我们得以明晰斯诺思想、性格变化的过程和根源。正因为作者具有大量第一手材料，他才能对经历如此广泛的斯诺作如此生动、具体的描写；才能从总体上把握斯诺的一生。也正是因为作者具有大量第一手材料，才使这本书的容量远远超出了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斯诺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使这本书成为一部珍贵可信的“通史”，成为一本斯诺的最新、最翔实、最权威的传记。作者对斯诺研究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劳动，具有无量的价值，体现了他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

斯诺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因此捧过鲜花，也因此饮过苦酒；他一脚跨踏在中国的大地上，一脚又留驻于美国密苏里的故乡。他在客死瑞士前说过：“我热爱中国。”中国这么穷，他到底爱的是什么呢？汉密尔顿博士翔实地描述了斯诺是如何带着他那特有的理想主义与密苏里家乡的“眼见为实”的混合心态来到中国的，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斯诺对劳苦大众的炽热情怀、追根究底的探索精神、“眼见为实”的求实态度、敢作敢为的非凡勇气和胆识，以及他作为新闻记者所特有的学识、才华、敏锐和洒脱。而且，作者把这些置于现当代中国革命、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和中美关系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各种政治力量对比格局的调整，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综合构成的整个世界的广阔背景之下加以考察。

这种研究方法，使作者得以驾驭浩繁的原始资料，从而为提纲挈领地阐释斯诺的政治观、历史观、哲学观、社会观的形成过程，准确地标示斯诺性格、思想按其内在逻辑发展的轨迹，提供

了最现实和最有说服力的依据。

这种刻画人物的方式，通过忠实地再现斯诺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与周围人们的思想交锋和心灵碰撞，细致地描绘斯诺在经受人世间罕见的大起大落的浮沉之中，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反差，使斯诺的音容笑貌以至他所独具的爱与憎、热与冷、欢欣与痛苦、喜悦与悲愤、兴奋与沮丧、坚信与疑虑、执着与彷徨……一幕幕、一场场，跃然纸上，催人泪下。使这位作古多年的英才又鲜明、完整地活现在人们眼前，带着他特有的行为方式与个性特征。

这种叙事方式，使人信服地读到，时人是在怎样的氛围之中，如何把斯诺推上中国和世界这个风云变幻的大舞台，如何使他承担起沟通两种国度的重任，时势又如何使斯诺成为应运而生的著名记者和英雄。可贵的奋于探索的精神，使作者摆脱了就事论事的肤浅和无端的猜度，站踞了鸟瞰总观历史的高度。

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度之间，最难达成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心态与追求，都有自己的骄傲和光荣。各自观念的差异和利益的不同，经常造致相互理解的鸿沟以至于最终刀枪相见。这种尖锐的冲突在斯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美国，斯诺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即便是在他最负盛名之时。五六十年代他在美国的苦涩境遇和所受到的不堪忍受的诽谤、诋毁、冷落和敌视，使这位功勋卓越的杰出新闻记者流落他乡以凄楚悲凉而告余生。在斯诺参与开创的中美关系正常化16年之后，汉密尔顿博士以浓墨重彩再现斯诺一生饱经荣辱褒贬的悲喜剧，是为了表达他的殷切期望：通过这本书，能使美国更好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中国以至整个世界，这样才能够同别国人民打交道；我们不一定同意别人的观点，但必须尊重他们，美国不能以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汉密尔顿博士这番赤诚之心和扎实、繁难、具体的著述，或许有益于美国政府反思多年

来在对华政策上的种种失误，找到与中国及其他国家交往的最佳途径。作者力排众议、澄清史实，试图为斯诺作出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他的仗义执言、敢为不平者鸣的正直与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尽管他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但全书无处不洋溢着同情、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努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相比之下，他在立论上多少带有的偏差就无足轻重了。

本书的翻译出版是集体劳动的产物。其中，序、引言、第一、十章及鸣谢、照片说明等由柯为民译，第二章由张哲译、萧耀先校，第三、四章由彭波、虞真译，第五、六章由王之希、许丽霞译，第七章由黄永平、顾蓉帆译，第八章由鲁威、李冰译，第九章由萧耀先译；最后，由柯为民统一核定全书译稿。

老萧是我的前辈，为本书的翻译主动承担了大量组织联络工作，他的敬业实干、为人坦荡和译法娴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晚辈所体现的一贯的信任、理解与支持，凡是与他熟识的人，没有不称道的。此番能与他携手，使我感到非常愉快。

此次翻译工作的完成，得益于未曾谋面的《人民日报》记者仓立德的推荐，得益于三S研究会陈秀霞女士提供的大量参考资料，得益于我的英文启蒙老师陆椿年先生的热心帮助，得益于许多尊长、同志、同事和朋友们的多方关照，得益于我的爱妻盛辰以及在斯诺国度里求学的柯欣、林健红夫妇的无私奉献，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忱。

辽宁大学出版社在前几年国内各出版社群雄逐鹿的严峻形势下，迅速崛起，以选题预见准确、出版物的高质量、出版周期短和印制精良而独树一帜，立足于北国而不同凡响于海内外，令人震惊，发人深省。刘万泉社长决策之大胆、对人才之爱护、广泛的横向联系等等，反映出这位有30年编龄的老编审的深厚功力和不凡素质，令人赞叹和敬佩，也使我在与之接触之中，感触颇深。我为自己参与翻译的这本书能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而感到

由衷的欣喜和荣幸。

本书的责任编辑王海晨，与我有着相似的年龄和经历，他本人的译著曾在国内多次获奖，他学有所长，有较深的史学功底，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亦显示出其热心、诚恳、老练和出色。我认为他是本书最适宜的责任编辑。

最后还需申明，本书译文忠于原著，只对原文中一些明显的差误作了校正。由于翻译时间短促，对有些史料，特别是作者第一次披露的采访记录和引用的大量国外资料，未能一一核对，讹误之处，敬希有识读者不吝赐教。

柯为民

1990年7月1日